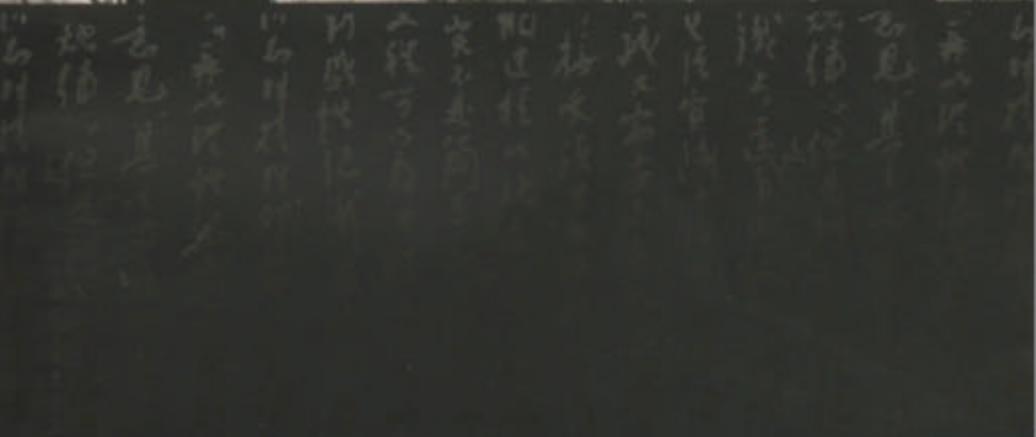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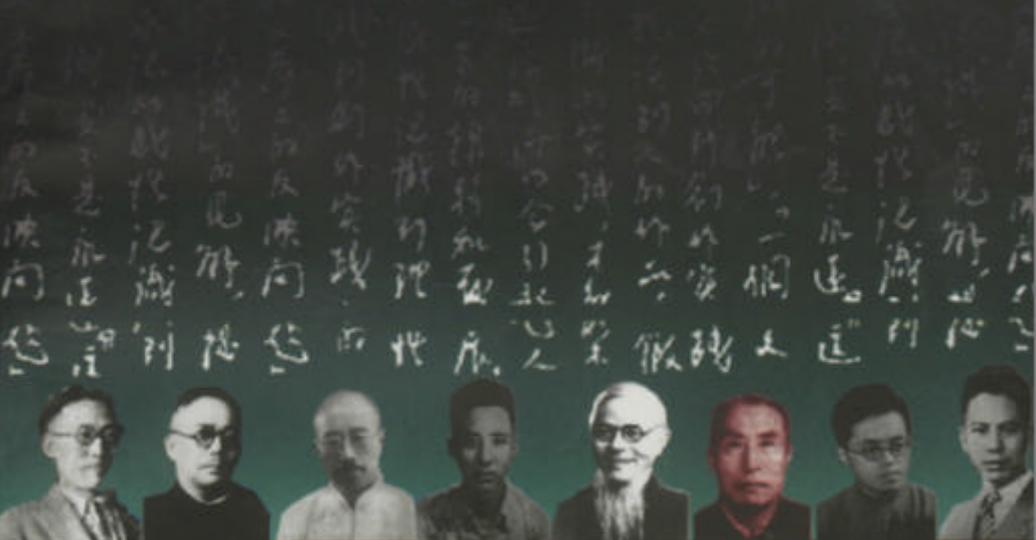


舒群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舒群代表作

短篇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

“果里”

旅居此地的苏联人，都向他这样叫。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久了，他已默认了。虽然，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黑的头发，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对于异国的人，并不觉得怎样陌生。只是说异国的话，不清楚，不完整；听惯了，谁都明白。

蚂蚁河在朝阳里流来，像一片映光的镜面，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果里吹着号筒，已经透过稀疏的绿林，沿着一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于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门开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苏多瓦！”

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一句习惯语。

“果里，一月满了，给你工钱，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

“斯巴细（俄语，谢谢的意思）苏多瓦！”

也许有年轻的姑娘，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手向果里打招呼：

“可爱的果里，回来时，不要忘记了啊！”

“啊。是的，红的小花！”

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然后，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

“啊，列巴（面包），熟白汤（菜汤），斯巴细。”

于是，果里再走起路来，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他的嘴，忙动起来，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腮撑起一对大泡子。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牛在他的身后，已经成了群，黄色的，黑色的，杂色的最多，白色的只有一个，背上还涂着两团黑。小牛，有根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伸长它的颈，吻着母亲的股部，母亲摆起尾巴，极力地打着它。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让脸上所有能叠起皱折的地方全叠起皱折来；牛望着他，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

“果里！”

我们刚洗过脸，拥在展开的楼窗前，叫着他，丢纸团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

“不要！牛害怕。”

我们不听。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并且，弄起一阵恐慌，牛与牛撞着角。这使他的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

“我告诉苏多瓦去。”

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他也不知道，我们对于苏多瓦并不怕，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还没有开始呢。

“我来念书好吗？也住大楼，也看电影。”

果里又同我说了。

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

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对果里说（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 CCCP（俄文：苏联简称）。”

“啊，果瓦列夫，CCCP？”

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

“果里列夫是中国人，怎么行呢？我是高丽人，怎么就不行呢？”

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

“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

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以后，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间，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觉得太无味，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蚂蚁河边的一条草径；那里是泥泞的，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镶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茵。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这块地方好像久已被人憎恶着，遗弃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草茎蔓过他的腰，搔着牛的肚皮，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他；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视着我们。

“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好让果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

我好像在教训果里沙，很严厉的。

“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那不是耻辱吗？”

“那么，安重根呢？”

我立刻记起来，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

一阵牛的哀叫声传来，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

“果里！果里！”

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赶一个号筒样，向果里喊，他会听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留意我们，他不睬我们。

不过，我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径被浸没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这次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恰好又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里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做路的标识。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头一摆一摆地，似乎艰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

我们吃过饭，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黄色的蒲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一堆一堆的，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另一面是无际的远天连着地。散开的牛群，看上去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躺着的，吃

草的，追着母亲的……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牛的去向。我们的视线触着他，惹起他极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也许他会跑开，逃避我们。

“果里，我们给你气受了吗？”

我把他那深沉的头托起来，问他。他竭力把头再低沉下去，说：

“不是，绝不是的。”

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样美的不俗的好句子；而且，说得十分完整，没有脱落一个字音。不过，他的姿态太拘束，太不自然，似乎对陌生人一样地没感情。

果里沙还是原有的脾气，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苏联的。这给果里很大的耻辱；果里是容忍不下去，离开我们去给牛蹄擦泥水。

我们全在寂寞中过了许久许久，我才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问果里：

“牛蹄太脏了，你不怕脏吗？你擦它做什么？”

“就是因为太脏才要擦的。牛的主人是不允许牛蹄脏的啊！”

“那么，你为什么带着牛从河边走呢？我们宿舍门前不是很清爽的吗？”

我的话刚说出来，就又懊悔，说的不妥当。这不是对于果里加了责难吗？在果里的内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吗？

“我是不配从你们宿舍门前走的。”

他说得很快，他得气愤。

我说了许多话，是劝他仍从我们的门前走。实际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放牛的朋友。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并且，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红色与黄色的野花，全是他给我拾来的。这几天来，那些花都憔悴了，落了，我们看着瓶里仅有的花茎，谁都会想起果里来——果里沙也是同样的。果里却抛开我，再不在我们门前走过一次。

最后，果里允许在我们门前走的时候，我几乎痛快得要叫出来。不过，我还不肯信任，直等到他吹起归去的号筒。

暮色里的牛蹄，是疲倦的，笨重的。长久的日子，已经使它们熟悉了从自己的家门走进。余下我们走向宿舍。宿舍的每个角落一片死静。我记起所有的同学已去俱乐部，去看电影。我看时钟还留给我二十分钟的余闲，便叫果里也去，他高兴地说：

“好，看电影去，我还没有看过一次呢。”

但是，在影场的门前，发生了极大的难题，这个守门的大身量的中国人，便坚持不许果里进去。我和他说了许多中国话，仿佛是让他给我些情面，他总是不放开这么一句话：

“他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

“你让他进去吧，我们的先生和同学全认识他。”

“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

果里不懂中国话，他很沉静地站着。

我的喉咙却突然热涨，对那个守门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

“他是我们的朋友！”

他装起像我父亲的尊严说：

“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

在灯光下，我和果里仿佛是停在冰窖里的一对尸体。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

“好小子，慢慢地见！”

现在，我晓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国话才那样气愤的吧！我问他懂中国话吗，他说只会那一句；一句我也高兴，好像为我复仇了。

不过，我一夜没有安静地睡，似乎有很大的耻辱贴在我的脸上。早晨我躺在床上，就听见果里一声声的号音从窗前响过了，远了；我没有看见果里。

在教室里，果里沙对我说：

“从认识果里起，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快做我们一样的学生。”

我想果里为了昨夜受的屈辱，故意给自己开心吧？果里沙却说是真的。我问：

“他和谁说妥的呢？”

“苏多瓦。”

这样我相信了。因为苏多瓦是我们班上的女教员。

“那么，他什么时候上学？”

“他今天去告诉他的哥哥，明天就来。”

我想，果里来了，坐在哪里呢？我们教室里只有一个空座位；而且在小姑娘刘波的身旁。她平常好和每个同学发脾气，小眼睛瞪得圆大的。如果果里坐在她身旁，一定不中她的意。明天教室里，除去我十七八岁，就算果里大了吧？最大的果里沙也不过十三四岁。并且，所有的书桌，仅是我和果里沙坐的比别人的高起些；只有叫果里沙走开，让果里坐在我的身旁。

放学之后，我在宿舍里正为果里安排床位，他来了；却是忧伤地。我问他快做学生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吗？可喜的消息，怎么换来了他的忧伤呢？我清楚地看了一下，他脸上还有泪滴。

同学的快来缠着他。

我问：

“你哭过了吗？”

他点点头，好像又要哭出来。

“你明天不是上学吗？怎么还哭了？”

“我才跑到田里去。对哥哥说，哥哥不许。”他的鼻尖急忙地抽动两下，又说：“你和哥哥商量商量吧。”

于是，我和果里到家去了。同学的等着这个有趣的消息，要我快些告诉他们。其实，果里的家并不远，转过我们宿舍的一个墙角，十几步便可以走进他的房子。来去只要五分钟，事情全可明白。不过，果里的哥哥在田里，没有回来，却是意外的。

时间空空地流过着。我并不躁急；因为果里的家里处处都是奇迹。房子小得像我们宿舍的垃圾箱。不过，垃圾箱里的垃圾也许比果里房里装的东西洁净些，贵重些，墙角下堆着污旧的棉衣；穿衣时，随着身子的动作将自然叠成的折皱展开后，还露出衣布原有的白颜色，很新鲜。

那边……

果里为我找出他一向保存着的好东西，我一样一样地看着；他两手合拢着又举在我的眼前说：

“你猜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用聪明的话暗示我，我也不明白；因为他讲的俄语太乱，所以终是没有被我猜中。最后他说：

“这里有爸爸，也有妈妈。”

是两个从像片上剪下的人头：男人是他的爸爸，女人是他的妈妈。然而我立刻发现极大的疑点问他：

“妈妈这么老，爸爸怎么那样年轻呢？”

“妈妈现在还活着；爸爸是年轻就死的。”

“死得太早了！”

我望着果里爸爸的像，我说话有些怜惜的意思。不曾想竟使果里的牙齿咬紧，很久才放出一口轻松的气息：

“爸爸死得太凶呢！”

我从果里脸上的神态也可以看出他爸爸确不是寻常的死。

“爸爸是读书的人，看，这不是还留着很好看的头发吗？（他指着头像给我看。）爸爸的胆子大，那年他领着成千成万的工人，到总督府闹起来，打死了三十多人，当时，爸爸被抓去了。三个多月，妈妈天天去看，一次也没有看见。妈妈不吃饭了，也不睡觉了。在樱花节的那天，别人都去看樱花，妈妈带着哥哥去看爸爸。这次看见了，在监狱的门口，妈妈差不多不认识爸爸了：爸爸只穿了一条短裤，肩上搭着一块手巾，肋骨一条一条的，很清楚，那上面有血，有烙印。妈妈哭着，爸爸什么话都不说。到爸爸上车的时候，总是喊着……看樱花的人追着车看，妈妈也追着车看……在草场上，拿枪的兵不许妈妈靠近爸爸。爸爸的身子绑得很紧，向妈妈蹦来几步，对妈妈说——你好好地看养孩子，不要忘记了他们的爸爸今天是怎样被——枪响了一声，爸爸立刻倒下去。……那时候，妈妈还没有生下我，这是妈妈以后常常讲给我听，我记住了的。”

他说的话太快，也太多；有些地方，我听不懂；也有他说不懂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完全明白。

“那么，妈妈呢？”我问。

“妈妈？妈妈还在高丽。”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说——我们不要再过猪的生活，你们找些自由的地方去吧！我老了，死了也不怕——五年前，妈妈到姨母家去住。我们来中国的时候，我才十岁。”

天黑了，他哥哥才回来。他说得很好的中国话，所以我们讲话很方便。他直是不许果里做我们学校的学生；并且他说的理由也是很多很多

“我种地太苦，唉，还不赚钱，也许有时要赔钱，你没有看中国年年有灾祸吗？你也知道吧？”

“我们吃饭全靠果里放牛的钱，到冬天又要歇工，好几个月得不到工钱。”

“我知道读书对他好。我是他的哥哥，我不愿意我的弟弟好吗？”

“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他可以去，我不用他管。家里还有母亲呢。每月要给她寄几元钱吃饭。

“唉，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们连家都没有了。”

我把他的话传给我们的同学，同学们失望了，但是很快地也就忘却了。

果里的号筒仍在唤牛群到草场去。

“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

我记住了这句话。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地升到旗竿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像什么光荣似的。

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竿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

于是，散乱的战争骚扰着，威胁着每个地方。不久，那异国的旗子，那异国的兵，便做了每个地方的主人。恰好我们住的地方做了战争上的大本营。戴着钢盔的兵一队一队地开来，原有的兵营不敷用，已挤住在所有的民房里。就是果里那个垃圾箱般的房子，也有兵住下。

我们照常上课。但是，果里的号筒不响了，牛群整天关在每个主人的院内，叫着，似乎在唤着果里。

“果里呢？”

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果里。忙向草场望去，只有一阵一阵的秋风扫着，把草打倒在地上。果里平常坐惯的那个土岗，被风扬起的土粒滚成一团一团的浓烟。我们想果里卷到浓烟里去了吗？等到浓烟散尽的时候，那里没有果里一只手，一只脚，给我们看见。我们想他在家里；可是，他在家里做什么呢？死静得好像连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我们同学的便会指说：

“看！少儿达特（俄语：兵）。”

接着就是：

“少儿达特杀了果里吗？”

“杀了，也像杀了老鼠一样！”

果里沙仍是对自己高傲，对果里轻蔑。我相信果里绝不像老鼠那样懦弱；果里沙却说：

“高丽人都像老鼠一样。如果不是，在世界上，怎么没有了高丽的国家？”这仿佛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语，他的小拳头在胸前击了两下又说：“像果里那样人，我不喜欢，不愿意同他做朋友。”

日子过久，谁也不再谈关于果里的什么话。又加天天到俱乐部去听演说，在时间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闲。这次苏多瓦怕我们太疲倦了，要带我们上山玩一次。

我们怕山上的蛇虫；有一次蛇虫毒伤了我们好几个同学。所以，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体操用的木棒，三十多人排成一列棒子队。

秋天的山，全是一片土与沙粒。已经不是夏天来时那样好看，可爱，什么都没有；只是土与沙粒打着我们的眼睛睁不开；上去后，只感到两腿很酸痛，秋风不住地搜索着我们血流中的温暖。苏多瓦为了我们的趣味，领我们向另一山角蠕动的人群走去。

那里，有许多的人：年老得胡子全白了的，年轻的，半残缺的，年

岁太小的。锄头、铁锹，斧子……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在山脊间已经成了一条沟壕；在沟壕里，我立刻看见果里的哥哥。

“果里呢？”

我正想问他，果里的面孔就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出现了。看来，他那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个放牛的果里；现在的果里是个小工人，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光着脚，身上穿着一件我们给他的破制服；他的颧骨高起许多，使眼球深深地陷进去，被埋藏在泥垢与尘土里。他靠着壕边，同壕一样高，很吃力地握着铁锹向外抛沙土。

“果里！果里！”我们喊着。

其实，他早已看见我们，只是故意地躲开。我们与果里的距离只有八、九步远，喊他自然会听见，他不仅不看我们，而且，把头移动向另一方向，更加紧他的工作。我走近两步，我看出果里是要和我说话的。他所要说的话，全埋藏在他的嘴角与眼角间啊。于是，我更大声地叫起：

“果里，我们来了。”

“果里，你在做什么？”

“果里，很久不见你了。”

果里没说话，只是在动作上给我们一个暗示，让我们向右边的大石头上望去，那里有两个兵安闲地吸着纸烟。然而，我们却不去顾他：

“来！果里。”

“来！来……”

惹起一个兵来了，站在壕的边际上；果里像失了灵魂一样死板。那兵用脚踢他的头；他的头仿佛有弹力地摆动两下，鼻孔有血流出。突然，他的铁锹举高，又轻松地落下，照样向壕外抛着沙土。

不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木棒都向那个兵做了冲击式。兵便比量着给我们看他肩上斜背着的枪。

苏多瓦领我们回去的时候，果里的眼睛溜着我们，终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只有默祝果里最好不再遭到什么不幸。

第二天早晨。

“呀……呀……”传来了这尖锐的叫声，刺痛我们的心。

拍拍的声音连续地响着。果里在一只手两只脚下规规矩矩地躺在自己的家门前。脸贴着地，尘土从他的嘴角不住地飞开，像是新劈下的小树干。那兵的全力都运到这小树干的顶端，落在果里的股部，腰间。

“呀……呀……”

这声音给我的感觉，比小树干落在自己的身上还痛。

果里沙却切齿地说：

“该打，打死好了。”

我用眼睛盯住他，表示我对他的话极愤恨。他又说：

“果瓦列夫，你看果里，那不是一匹老鼠一样吗？”

以后，果里真像一匹老鼠，跟着佩刀的兵，常从我们宿舍前来去；他独个人的时候不多。这使果里沙更看不起他，骂他，向他身上抛小石头，伸出小拇指比量他……果里沙想尽了所有的方法欺辱他；他却不在意。

有一天，我们快就寝的时候，果里跑来。果里沙的手脚堵塞着门，不许果里进来。

“你还有脸来吗？你不要来了。”果里沙说。

“我找果瓦列夫！”

“果瓦列夫都会替你羞耻。”

我看出果里是有什么迫切的事情，不然，他的全身怎么发抖呢？我给他拿来几片面包，他不吃。我问他这些日子怎样过去的，他也不说。仿佛所有的时光没有一刻余闲属于他，很迫忙地说道：

“借我一把刀。”

“做什么？”

“你不要问。我有用途。”

我在衣袋里把平常修铅笔的小刀拿出来。他说：

“太小了！”

“你要多大的？”

他用两手在床上隔成他所需要的刀的长度，我便把我割面包的大尖刀给他。他还用手指试验着刀锋快不快。然后他高兴地说：

“好！太好了！”

他临走时，告诉我：

“那些‘魔鬼’明天早晨去苇沙河。”

果然是去苇沙河，果里房脊上的旗子没有了。一队一队的兵，骑马的，步行的，沿着山路走去。只有几只小船是逆着蚂蚁河划下；船上的兵仅是几个人。果里就坐在小船上，为佩刀的兵背着水壶，食粮袋。我们守门的那个老头子，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时，就起来去看，这些话就是他讲给我们听的。

过后，守门的老头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在一口气里又冒出一串话来，说是果里投河了。

先是一个打猎的外国人看见的——有个孩子顺着蚂蚁河漂来。于是他投到水里把孩子拖上河边，用人工呼吸方法换来孩子的气息；喊了几个人来，守门的老头子也在里面，他认识出了那个孩子是果里。

我们去的时候，苏多瓦也在那里，另外是别班里的同学。果里躺着不动，衣服贴紧在身上，一滴一滴的水湿了他身旁很大的一块地方；他已经没有了知觉；虽然，他嘴里还嚼着不清楚的话。大家正在互相询问果里投河后的情形，我们学校的铃声叫我们立刻回去上课。只有苏多瓦还留在果里的身旁。

今天，苏多瓦告诉我们，在我们这班里有一个新来的学生。每次有新来的学生，苏多瓦都是要先告诉我们的。每次也就打听出这新来的学生是升班的，是降班的，是从外埠新来的。不过，这次却是例外，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新来学生的底细。

距上课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们便随便地猜扯起来。男生说，新来的学生是好看的姑娘，最好和自己坐一个书桌。女生说，新来的学生是猴样的，这样弄得每个书桌都叫响着。

门突然地开了，教室里立刻静下来。我们悄悄地跑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装做整理着书本，修铅笔。是因为我们闹得太厉害，苏多瓦来了。然而，不是苏多瓦。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果里。他穿的同我们一样：黑皮鞋，黑的裤子，黑的卢巴斯卡（俄语：衣名）；胸前也有两个小衣袋，装得饱饱的，书夹里放着一包新书。他张大着嘴，像是有许多要说的话，

想在一句话里吐给我们，可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

在午间，很快吃过饭，我们聚拢在一起。我问他：

“现在，你高兴了吧？”

“我不是骗你，我真不高兴。”仿佛仍有极大的恐怖，痛苦，留在他的眼里。“苏多瓦待我太好了。给我养好病，又送我到学校来。你们看！”他指尽了他身上所有的一切给我们看。

当我问他为什么投河的时候，似乎他的脑里又复活了一幕死的记忆。于是，像给我们背诵出几页熟读的书：

“忘了是哪一天，‘魔鬼’告诉我，他们要走了；要我的哥哥去，还要我去。我知道去了就没好，我想爸爸在‘魔鬼’的手里死了；妈妈怕我们再像爸爸一样，才把我们送出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来。谁想到这‘魔鬼’又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攫住我们，夜夜都没睡觉，哥哥望着我，我望着哥哥，不敢说话……”

“和老鼠一样！”

果里沙冲断了果里的话。

这时候，果里不像个孩子；孩子没有他那样沉静的姿态。他继续说下去：

“那天，哥哥跟着走了。我还跟着那个带刀的‘魔鬼’（他的眼睛，好像在询问着我们有没有看见过他所说那个带刀的‘魔鬼’，我们向他点着头）。船上除去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船夫，‘魔鬼’正用铅笔记着什么，我心跳，跳得太厉害了——你们猜我想做什么？”

“想投河呢！”我们许多人同样地说。

然而果里沙突然地跳上书桌，把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弄散乱了。他轻快地说：

“你们说果里想投河，我看太不对。你们知道吗？河里有老鼠洞。”

“在河里，一共是三只船。两只在前边，我们在后边。前边的船，走得才快呢！没走到三四里的时候，离开我们有半里多远。等他们拐过老山头，我们还留在老山头这面。我只觉得一阵的麻木，我的刀已经插进‘魔鬼’的胸口。然后，我被一脚踢下来，再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把头转向我问：“你知道哪把刀？是你借我的啊！是你借我的啊！”

“好样的，好样的，”果里沙抱住果里又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果里搬到宿舍来，除去苏多瓦赠给他的毛毯之外，再什么都没有。果里沙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他一半，并且，在贩卖部内给他买了牙刷，牙膏，袜子，毛巾，小手帕……费用全写在自己的消费簿上。

此后，果里，果里沙，我们三个人成了不可离散的群，有时缺少一个人，其余的便感到不健全。每天我们都是在一起，到河边去，到俱乐部去，到车站的票房去，到许多人家去看果里以前所放的牛。他还认识哪个叫什么名字，哪个牛有什么习惯，平常他最欢喜的是哪个，最讨厌的是哪个——由牛群给我们讲出许多的笑话。

在冬天，果里学会滑冰，便成了他的嗜好；可是，我们不许他常去冰场。因为那时街头又满了果里所说的“魔鬼”和“魔鬼”的旗子。不过我们学校的旗子，仍是同从前一样——一半中国的，一半苏联的。

只有那半面中国旗，我爱啊；可是，果里为什么也爱呢？我们每天望着，仿佛在旗上开了花。然而花，毕竟要有谢落的一天——校役给我

们看了一面新做的旗，一半是苏联的，黄色的小斧头，镰刀，五角的小星星，在旗面上没有错放一点的位置，但是，另半面却不是属于中国的了。那全新样的，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校役悄悄地把旧的旗子扯落，升上新的旗子。

我们天天仍是希望把旧的旗子升起，哪怕这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可是，我们总失望。只有扑到储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丢在墙角下的旧旗子。

不久，更有惊人的消息传来。我们学校的旗子快完全换新样的了。

我请两点钟假，到叔叔家去；回来晚了。苏多瓦正给我们同学的讲什么，她停下，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迟，我说：

“这地方不安宁；叔叔把祖母送走。祖母留我吃了饺子。”

我说完，苏多瓦完全没有谴责我，真是意外的。她又继续她的问话——问每个苏联学生将要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学生好像喊了一个口号：

“回祖国去！”

“果瓦列夫，你？”苏多瓦又问。

“回祖国去！”我说。

“怎么回去？”

“叔叔回来接我。”

苏多瓦从讲桌来，走近果里的身旁问：

“果里！”

“什么？”

“你呢？”

“……”

果里咕噜两声，说不出什么。他只是呆着，在呆望墙上悬着一张世界地图。在那地图上，靠近海洋的一角，有他的祖国，仍涂着另一种颜色区分他祖国的边疆；但是他说：

“跟果里沙去吧！……”

苏多瓦做出孩子一样的讽刺，手指点着果里的头；果里的头渐渐地沉重下来。她立刻又严肃地说：

“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

为了明天的别离，苏联的同学分赠我与果里许多小物品，做纪念。

“果里呢？”同学的问。

我在院里寻到果里。只是他一个人，在树影下踱着小步子。月光浮在他的脸上，我看见有泪珠。他不住地问着自己：

“到哪里去呢？”

最后，我告诉他：

“我俩一同走吧！”

于是，我们送别苏联同学登上驶向祖国的专车后，便筹备起我们的行程。虽然，已经知道南线车轨被破坏（这是叔叔必经的路），但是，我们仍倚在门前，望着邮差来。那许多信，没有一封是叔叔的；都是从苏联来的。同学的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有许多人欢迎他们；以后，又送他们进了学校……

十几天了，叔叔的消息完全没有。而且守门人天天催着我们走，大

门立刻要锁起来的。守门人为了我们没有路费，在旅程上给我们个秘密的方法。

于是，坐过一天一夜的火车之后，我们又飘流在海洋上了。

虽然我们是藏在货舱里，被塞在麻袋的缝隙间，不住地有老鼠从我们头顶跑过，但是，不停止的轮机似乎在告诉我们：

“向祖国去的孩子们！不要害怕，不要叫饿，这一刻你们应当忍受的！”

我是十分安心，果里却问：

“在岸上被检查了，下船也要检查吧！”

“检查怕什么！”

“你是不怕的。我呢？”

我们同是说着俄语，仿佛忘记了我们是异国的人。为了果里的安全，不应当再说俄语，要说中国话了。所以我改用中国话说：

“从现在起，我们说中国话吧。”

“如果有人问是哪国人呢？”果里仍是说的俄语。

“说中国话，自然你要说是中国人啦。”

“说不好！”

我开始试验他了：

“你是哪国人？”

“中国人。”

是不像中国人。他说话的重音，放在“人”字上。其实，我和他说中国话，他明白，不过，他说的太不中听。

“你装中国人，装我的弟弟。我说话，你一点不要说！”然而，下船的时候，警察偏偏地问果里：

“你怎么不说话，你哑巴吗？”

终于果里被看出是高丽人。果里所说的“魔鬼”，这里也有的；于是果里又被“魔鬼”抓了去。他看我也被一只大手抓住衣领。他说：

“我是高丽人，他不是的。”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沙漠中的火花

在内蒙边区上的一个小地方，以前没有人详细调查过究竟有多少住户；可是旅人都记得那一系列一系列的蒙古包，硷土堆起的小泥房院落；并且有一所极大的兵营；所以从兵营看来，常使人想到驻兵的数目，要比住户多在几倍以上，而且是中国兵，虽然那里是蒙古的地方，蒙古的居民。

经过几个月的炮火熄灭后，那里处处都变成了一片烧焦的土粒，细碎得已经辨认不出是瓦质，是硷土，是砖面，或是其他一些什么东西；总之，与这里的沙漠混卷起来，也正像沙粒一样。不过，也有几块完整的砖块，未燃尽的板扇……以及散落在各处的无数弹筒……那早已被人拾去了。遗留下来的，也只是散落在边角上的几所倾斜的小屋，孤零的墙壁，已经经不起任何力量的摧毁，甚至一指的触动，也许在天气突变

的一天，被一阵暴风卷尽了。卷到哪里去了呢？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因为那里只余下些露宿着一团惊得失了知觉的老太婆和不中用的孩子，此外，全是新来的异族军队，不是中国的，他们自称——“大军”。

自从枯燥的地面遭了雨淋的那天，有一张新布告在一面半截的墙角上贴出之后，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些壮年人，穿着破旧的衣服，每个人都束紧一条腰带，腰带的色调很新奇，似乎在买的时候，经过了一种选择，特意来配合自己拖到地下的长袍，每个人都带着与自己头顶一样大的半球形的毡帽，有的，镶着素色的细边；有的，恰在帽顶上绣了一朵团花。每个人都企图挤到近布告的前边；可是谁也不肯让出一个空位置使自己面前再加多一个人。所以只是一个推拥着一个，不住地涌向前边去，又涌向后边来，好像海风卷起的浪头。

“喔——喔！”

渐渐地近了，仍是：

“喔——喔！”

野兽一般的鸣叫，突然，使每个人把头转开去，立刻又转过来，他们互相地望望许多人同样地说了一声：

“阿虎太又来了。”

虽不是野兽，但是，这个阿虎太的肢体，确极相象野兽那样的粗大，蠢笨，黧黑——他深陷的两颊脱出去的那个大的面孔，恰与猪头仿佛，而且，并不比猪头聪明些，或是纯白些。他就是摇动着那个笨重的头，渐渐跑到布告前的人丛边。他全身的衣服与别人不两样。然而他的吼声，在别人的耳旁响来，比兽叫更要震动耳骨而发抖起来。

“喔——喔！”

“他妈的！”

人丛稍稍飘动一下，在那种低低的咒骂声中，有厌恶，也有恐惧。

阿虎太把一个大拳头举起来叫：

“喔，散开些！”

于是人丛间自动地裂开一条缝隙，让阿虎太走进来，然后又缝闭了。

他站在最前面，脸皮已经快触到布告的纸张，摆摇着划断了许多人的视线。许久他又把身子尽量转过来问：

“什么事情？”

“不会自己看吗！”

有人这样回答，使阿虎太暴躁起来，说：

“你不知道我不认识字吗？”

“知道你是谁！”

阿虎太下垂着的右手，手指渐渐地卷曲起来，合成一个牢牢的拳头，伸给与他对话的那个人。于是又有人伸出两只手握住他的拳头，慢慢地给他送回身旁，等到他手指伸开之后，拍拍他的肩说：

“得了，我们的英雄！”

阿虎太立刻吐出一口笑声，注视着说：

“啊！是你啊，是萨达尔图啊！”

“你还认识我吗？”

“怎不认识！”

“怎么认识呢？”

“得啦，老朋友啦，怎么不认识呢，不是几个月前我们打过一架吗？你忘了吗？天快黑的时候。”

“好记性！好记性！”

“我都记得啊。让我看看你的手吧！”

阿虎太把萨达尔图的左手拖起，拖到自己的胸前寻视着，寻尽了手背，手心以及手指的夹缝，终于没有寻出什么来。他的眼睛刚刚向上翻动了两下，立刻又扯出萨达尔图的右手来，在腕骨上有着一条极大的疤痕，新生的皮肉没有补满疤痕的缺陷，周边仍凝结着血丝。他轻轻地用手指摸试一下，却使萨达尔图怪叫一声，所有的人都起了一阵小小的惊奇。他的脸色突变成紫红之间的一种颜色说：

“我对不起你，我不该用刀子啊！”

萨达尔图沉静下来，一直许久才问：

“你从哪里回来？”

你从哪里回来？”

“我先问你！”

“白庙子。”

“你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你看看还能做什么呢？好好的日子不让过，他妈的，偏来打仗——”

萨达尔图的手掌贴住他的嘴，好使他不再吐出话来。但是，他把头摇开，仍是说：

“怕什么，谁敢不让说话！”

“忍耐些，你这阿虎太。”

“耐忍呢，住什么？吃什么？”

于是，萨达尔图给他读起布告来。

布告上说是什么顺天安民——什么想造东亚乐土——所以注意建设，招募工人，工资由三角至一元，——那全是蒙文写的，不过最后的年月日上有“昭和”两个字。

时间已经是下午，涌动的白云间，没有一丝阳光流走着，仿佛在这抢夺的世界上，太阳也被人抢夺去了。

人丛渐渐地散开。

又渐渐地集合起来。

不过，那是在另一个地方了——没有房屋，也没有院墙，只是一座未被轰毁的门洞，并不怎样高，却很少有那样长，长得像一条夹道。那是不知曾遭受过多少弹粒，两面墙壁上遗下无数未穿透的细孔。

但是，以前所涂下的白粉，粉上的蓝色字迹——天下为公——去除一字模糊了，余下的，仍是看得很清楚。由门洞的两边引开四条麻绳，引长到七八百尺的顶点连成两条，被钉在许多距离相等的木柱上，让中间围住了一个极大的圈面，以及许多军用的帐篷，给养，辎重，炮车，慰劳品……人丛也就是在那里集合起来的；因为人数太多，很难看出比在布告前是增多些，或是减少些。不过阿虎太与萨达尔图确是来了，而且在一处踱着，谈着：

“我想劝你几句话——”

阿虎太没等到萨达尔图说完，便反问一句：

“什么话？”

“你肯听吗？”

“肯的！肯的！”

“你是知道的，这些兵比狼还厉害，你不要随便发脾气，那与你的性命有关啊！”

“啊！”

“你肯听吗？”

于是，野兽自动地顺从了。萨达尔图又说：

“忍耐些吧！”

“你总是忍耐，忍耐；忍耐什么？”

“我们为了吃饭才要做工，也就要忍耐啊！”

“不知忍耐多少辈子啦！难道叫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得忍耐吗？忍耐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这个也来管我们，那个也来管我们，把我们弄成木头人一样，将来一定弄成死人一样啊！你信不信？”

“我们——”

“我们总要有一天——”

萨达尔图触动着，使他的话中断了；处处散布着的哨兵，有两个走近他们，虽然他们的话是哨兵所不懂的。

他们同别人一样，望望四野，望望自己身边所有的陌生景色……像铁钉一样地接触着陌生的面孔；有时，也像在风里飘散的柔丝。当他们所有的人看见从帐篷里走出一个配皮鞘战刀的军官的时候，便赠给他一个公认的绰号——“小狼”。其实，狼也没有他眼睛那样狠毒。

“到这里来报名！”“小狼”喊着。

他说的是蒙古话，由于字音的准确，声调的熟练，使不看见他的人，绝不会想到他是在说着异族的话。

他一面望着每个人，似乎从皮肉望进骨子去；一面又在问着每个人的名字，然后用笔记在—本簿子上。

最后“小狼”哈哈地笑了笑；便指点着他写下的名字，检点他们的人数，共有一百二十九名，他又从帐篷里唤出八个人参加进来。他说：

“这里有几个中国人，也是同你们一样的工人。他们跟我们的军队太久了，比你们能多知道一些，要听他们的活才好。总之，你们大家好好在一起做，有事不妨大家商量。”

这几个中国人，没有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他们上身是杂色的西装，下身全是一色的马裤。虽是短小的肢体，却异常的高傲。每天指示着蒙人的工作。有时一同谈起话来也很和气，意思是常想问出蒙人的内心话来。

不过阿虎太不在意他们，同他的伙伴们一样，整天听从着所指定的工作，把堵塞着各处的砖块，泥土，废掉的一些杂碎东西，一筐一筐地装满起来，或是别人给他装好筐子，由他的一条扁担掬起来，由院内掬到院外四五十步远的地方，不象别人还要把腰缩短些，好让两筐稳稳地落地，然后，再把筐里倾倒出去；在他只是停住一步的工夫，两手先握住系着筐子的一边绳段，把两肩向上一耸，两手也伴随着提高起来，立刻抖动一下，便是空筐了。他掬起三次的时候别人也只有两次。所以“小狼”不停地挥打着的皮鞭，没有落过他的身上。而且，“小狼”招集工

人训话的时候，常常提出阿虎太的名字，给大家听，让大家与阿虎太一样加快工作的速度。

此后同伴中就有许多流言传出来，最难听的是——

“阿虎太甘心做外国奴。”

因为这一句话，阿虎太与同伴们起过许多次冲突，有一次甚至打起架来。每次都是萨达尔图阻止他；他起始不肯听，终于使萨达尔图说出最后的一句话来——

“你肯听吗？”

——这样他才垂下头，不再去与人争辩一句，如果他握紧了拳头，那时候，也松开了。而且常在晚间会对萨达尔图说——

“我肯听吧？”

“我的好朋友。”萨达尔图许久了这样叫他，然后又继续着问：“你做工，怎么这样卖力气？”

“我惯了，向来就是这样，不这样，这倒不舒服。像他们骂我，我真冤，你想，我怎么甘心做外国奴？”

“朋友，你应该着重他们。你想想，你做得越快，皮鞭子在他们身上不是落得越多吗？”

他们几次这样谈话的，最后一次，阿虎太终于答应了，对于工作尽量减慢下来。萨达尔图仍是问：

“真吗？”

当他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发觉身后有一个中国人倾听着，又仿佛是在监视着。可是他们却不留心，而且阿虎太更放高了声音说：

“你看，明天！”

第二天确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刚刚睡醒，躺在沙地上尽量地把他们占有的空闲时间延长些，舒展舒展太疲倦的肢体。那时候，就有两个哨兵闯近来，先叫了萨达尔图的名字；然后逼他立刻到一个帐篷里去。他停了一些时间仿佛有几句话要询问的；但是没被允许便把他拖去了。

几分钟内，大家也骚动过一阵，有人主张，大家一同冲进帐篷，把萨达尔图夺回来，有人主张，去指问萨达尔图究竟违犯了什么事情——，引起哨兵步枪注视之后，大家的喉咙便是断尽了弦的弦琴了。

阿虎太一个人走开些，在距离十几步的地方来去地踱着。他抛出的每一个步子，都是沉重地落下，使地上的沙土留下他深深的脚印。

早晨的风，仍是清冷，一阵一阵地飘走着，给他们带来萨达尔图的消息——在帐篷里的声音：

“你说！”

“什么？”

“是你说的不？”

“不不！”

停止了追问的话，便传来了萨达尔图的叫喊，一声比一声低降下来，在不断地呻吟着：

“留情啊！——你们是强国，你们是文明的国家啊！——留情吧，——你们是强国，你们是文明的国家啊……”

“你说！”

“说啊，说啊……”

“你说，是不是你说阿虎太甘心做外国奴？”

阿虎太三个字被人呼出来的时候，大家全死静了。只是阿虎太自己停一停；他踱着的地方，已经是模糊的地面。突然他看见了萨达尔图从帐篷里被抛出来——像一个人抛掉了自己最厌弃的东西——随后走出两个哨兵和“小狼”。同时“小狼”仍在指问着：

“你说！”

萨达尔图却是一堆泞泥了。他的血流充塞着每条脉管，膨胀，而且加快地在流走。最是他那两颊已经红肿得添补起他原有的枯瘦；眼睛突变成两个肉泡；然而肉泡间只裂开一条缝线，露出眸子来。他用一手撑着地面，起劲地把头扬起些，那种模糊的动作，似乎仍在未睡醒的朦胧中。

然而“小狼”仍是绕着他的身边转走着，逼问着。在“小狼”那种坚决的神情上看来，可以知道这露天的剧场上，将要再展开一幕。

“小狼”用手指发出命令，两个哨兵伸出了两只皮靴脚，一只踏着萨达尔图的腰背，一只落在腿腕上，他的皮鞭任意地抽打着——因为皮鞭下已经是一只羔羊了。

“你说，叫阿虎太减少工作，是你，不是你？”

最后，萨达尔图点着头，一切他都承认了，如果再加重他的罪名，也许不会否认。

于是，哨兵把萨达尔图紧绑起来，使他不能有丝毫自由的转动。

此时已到了上工的时间。“小狼”便挥起皮鞭，好使工作立刻开始。

他们一步一步地移开，一步一步地离远了萨达尔图；虽然他们的眼睛仍是逼近着萨达尔图。

阿虎太却停留着不动。前胸渐渐地凸高，高到快裂开了。当“小狼”唤他的时候，他疯狂了，呼出一片疯狂的叫喊：

“萨达尔图不是人吗？萨达尔图不是人吗？……他是工人，他是人，他是凭自己的力量赚钱！……他不是谁的牛马，谁也不应当这样待他！……”

他一个人冲开，冲向萨达尔图那里去。“小狼”追赶着他，刚把皮鞭扬起，所有的蒙人完全奔跑过来。“小狼”呆住了；不过哨兵的食指，都贴住了自己枪枝的引铁。

“小狼”应付这种突变，也只有摆出笑脸来，招集全体蒙人训话。所说的，也不外安慰他们，勉励他们，使他们恢复了日常的工作。

同时，萨达尔图也解脱了他所遭遇的苦难。不过，在他身上那沉重的伤痕，却不是几天所能养好的。所以几天之后，他仍是在呻吟中，躺在露天的地面上翻转着。他身上裹着同伴的几条被子，在头前，放着一个杯子，被风送来的沙土，落满杯底，一粒一粒地已经落起一层。他自己从没有动过那杯子，每次都是阿虎太偷偷地跑过来送到他嘴旁；如果阿虎太的工作迫忙或是忘却的时候，那么，他便望望天边，以及天线下辽阔的旷野。等到他不能再多忍受一刻的干渴，就加重了几声呻吟，或是，顺便吐出几口长长的气息，不然，也便在自语着——

“我遭难了；可是我犯的什么罪呢？”

如果阿虎太听到这种模糊的声音，便立刻跑来把杯送到他的唇旁

说：

“怎样？胳膊还不能动弹吗？”

他模糊地答应了几声。

阿虎太用许多话，甚至到气愤，坚决地主张去要求“小狼”把他移到帐篷里。他却说——

“忍耐些吧！”

有时使阿虎太反驳了他，他便说——

“你肯听吗？”

于是阿虎太离去了。

他望望阿虎太的背身对自己说——

“好人！”

但是别人对于阿虎太恰是相反；都默认了他是“好人”。说那次萨达尔图的灾难，完全是他告发的，好使“小狼”欢心；他以后所表示出的种种同情，正是怕人家猜出他的秘密来；虽然阿虎太也做了几次的辩白，并且自动地减慢了工作速度。

不到几天的工夫，“小狼”就派给阿虎太另一份工作了。叫他同一个中国人去修理门洞的墙壁，刷洗着一切所有的字句，重新涂上另一种色调。

他们两个人已经快做完了一整天的工作，也没有说一句话。仅仅是互相的望望，然后，又继续起自己的工作。当要涂抹“天下为公”的几个字时，是要他爬上木梯去；然而木梯老朽得时时有折断的可能，他便向那个中国人望了一下，想想才说出来的一句中国话：

“喂！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中国人说出自己的名字，说得丝毫都不清楚。阿虎太只听见类似赵德两个字的字音；于是他又重问了一句：——

“赵德？”

那个中国人默认了。

然后给阿虎太扶住木梯，让他稳稳地爬上去，他的猪毛刷刚触到“天下为公”的“天”字上，又停下来问：

“这是什么字？”

“天——”

赵德摇起头来。他匆忙地追问着：

“这是中国字，你怎么不认识？和我一样？”

“你说的……中国话怎么太好了呢？”

赵德是用蒙古语问的。同时，无意中引起他蒙古语的回答：

“哼！我以前在中国地方多少年啦。这里也是有许多中国人住，我常和他们有来往。他们以为我是中国人呢！”他望望赵德又说：“你说的蒙古话太坏，我们差不多都听不懂！”

“我能听懂你们的。”

“我们都说中国话吧！”

“说蒙古话吧！”

“你说的不好！”阿虎太改用中国话说。

“啊啊！”

“我擦掉这中国字，你心不难受吗？”

赵德不回答，脸上也没露任何的感觉。所以阿虎太轻蔑地说：

“你这样的中国人啊！可是我倒痛快！”

他一下就把“天”字抹去了一半，眼角与嘴角全笑得裂开了；可是他望见哨兵又失意地收拢起来。

赵德愤愤地回答他几句中国话；那比他说的更不熟练。

不过，一天一天地久了，在他们中间多少也会积起些友情来，至少不像从前那样陌生。赵德常把从军队那里分得的慰劳品樱花牌啤酒，与他饮起来。

有一天，在黄昏里，他看见赵德正同那几个中国人饮酒；每个人身边都放满着空瓶。他走近些听见他们高声地谈着；他便退回几步。那时候他发觉了他们的谈话，没有一句是他所能懂的；可是他已经被赵德看见，并且向他摇着手。于是他走去了；他们的话声也立刻就停落下来。

“你们才说的话，我怎么不懂呢？”阿虎太用中国话问。

“我的说的不好？”

赵德说完了，他们又继续着说了几句中国话，也同赵德说的一样；在声调上，非常直硬，字句也太不完全。然后在他们的醉意中，起来一阵痴笑，一阵阿虎太所不懂的话。

从不了远的地方，有一个哨兵走来对阿虎太说：

“什么你的？他们喝醉的有。去吧！”

但是他却问：

“他们不是中国人吧！他们是哪国人？”

“‘八个牙路’！（混蛋的意思）”

他看哨兵是气极了；虽然他不懂“八个牙路”。

从那天起，他的同伴完全确定了他是“奸人”。原因是：有人看见他和哨兵商量过某种的预谋。

因此，他举起过几次拳头，终于被萨达尔图的话——

“忍耐些吧！”

——打落下来。他一直等到萨达尔图健康了，他才说：

“你忍耐吧！我要去了！”

但是“小狼”拒绝了他辞工。并且对他说：有命令传来，四外的蒙匪太多，最近要把他们改编军队，一面去剿匪，一面完成那条××铁路……

过了几天，在门洞上飘起一面新旗，很简单，只有两色：白色旗面的中间，缝补着一个红色的圆球。

渐渐地那面新旗又飘上了旅途。

旗前：是远阔的天和远阔的旷野，边与边连结在一条弧线上。天，只是云片，云团，几乎全是灰色，白色的都很少看见，滚着，涌着，像广茫的海洋中，有一队鲸鱼泳过，使海洋飞起一片片的一团团的浪花，水滴，泡沫。地上呢，尽处都满是沙滩，硷土堆，所以几丛荒草，在这里看来，也是极可尊贵的珍品……旗后：漫延着几里地长的队伍。最先是“小狼”骑着一匹斑马，其次是“小狼”的军队，炮车队，“勒勒车队”，（蒙古的一种载重车，相象中国北方的载重大车。制作得很简单，也不像载重大车那样结实。）最后是新编的队伍，全是灰色的军服，不过，马裤穿在每个人的腿上，都是有着相当的不合适，有的瘦小得结不

起扣子来，有的又太空松，叠起许多的皱折——由膝骨到腿腕；总之，他们每个人的每条腿上都束紧着两条布带，一条在腿腕上，一条在膝骨下。他们每人拖带一枝三八式枪，一个步子连结着步子，在进行中。

“还有多远？”

有人这样问了之后，又有人回答了：

“走吧，小伙子，早呢！”

“我们为什么遭这份罪？”

“来吧！”

“我们为什么去打我们的蒙古人？”

“走吧！”

“我们应当——”

“走吧！加小心阿虎太！”

阿虎太高大的肢体排在队伍的前面；不知来处也无去处的野风吹打着他，使他的眼睛只留着一条缝线，寻视着什么。有时他脱开队伍，望望身旁铺好枕木的路线。于是，就有呼声响来：“阿虎太归队，要守军纪！”

那是赵德的声音。赵德的肩牌上比他多了一条金线。

阿虎太听了让牙齿磨出些声响。于是萨达尔图劝慰他说：“你的脾气，总是这样不好。你看哪里有你的朋友？”“我不要朋友！”

“可是人家把你当做奸细啦！”

“瞎眼的东西，不认识奸细！”

全个的队伍不停息地行进了三天，才达到预定的地方。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晚间，就遭了蒙古土匪子弹的警告。

“小狼”有命令下来了，叫他们严密地防守着，不许未筑成的路线内发生一丝的骚动。

当“小狼”检验枪枝的时候，恰好有一人的枪弹走火了，然而“小狼”却认为那人是有意的图谋，立刻被他枪杀了。两点钟后，他们都集拢起来了，正在商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这样的生活！”

“都是一样的人，谁怕谁！”

“弟兄们，到时候了，我们也该翻翻身了！”

“我们要先指出奸细来！”

许多人，喊叫着，最后又是许多人同样地回答：

“阿虎太！”

“我担保绝不是他！”萨达尔图叫着。

阿虎太推开了萨达尔图冲过去与他们厮打起来。

在这时候，“小狼”从帐篷里走出，才平静下来。阿虎太的眼角落着血滴，他的手腕被萨达尔图握住，他喊着：

“怎么，你还叫我忍耐吗？”

“是的，你不能忍耐啦！”萨达尔图望着暴露旷野上的同伴尸体，又向所有的同伴叫起来：

“我们都不能忍耐啦！可是阿虎太绝不是奸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赵德刚才还在这里，现在怎么没有了？”

恰好，赵德从帐篷里走来。

“小狼”的喉咙快喊裂了，也没弹压住他们的骚动。而且阿虎太拖着枪枝向赵德奔去问：

“你说！你是哪国人？”

“八个牙路！”

远处蒙匪的弹声响近来，“小狼”已经没有余力再去顾及他们，他只是不住喊着：

“开枪！”

所有的蒙人，仿佛丝毫没有听见，不转动地望着：阿虎太的弹粒让赵德安静躺在地上，阿虎太被几个哨兵擒住了。但是“小狼”仍是在下命令：

“开枪！开枪！”

萨达尔图终于开了第一枪，后来都连续地响起来了，然而瞄准的方向不是蒙匪，而是“小狼”与“小狼”的哨兵。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蒙古之夜

那是数不清的刺刀；刀柄上铸着兵工厂的名号和“昭和”字样的年号；一把一把地连续着，冲着战争的烟幕，贪婪地吸取着阳光，吸取着血汗，在我们的背后，追随着我们。

开始游击的战争许久了；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在败走中。但是一次已经几乎败到顶点，毁灭了半数的马匹，士兵……破坏了所有的军纪；全部一百多人全散乱了，几乎没有五个以上的伙伴。每个人为了躲避成为射击标志，全是徒步地奔逃着；恰像遭遇了猎人的兔群，东去一个，西去一个，任随自己的步子。

当月亮裸露出来的时候，我一个人正在踏着一一条沙路。四野的远处近处全披了一层幽光；不过在那种昏暗中，已经看不出地上的沙粒，或是硷土；只能辨识那条远远的，天地相连的一条弧线。晚风仍像敌人的刺刀一样的无情，一样的残暴，从远处滚近我的身边，或是从我的身边滚开去，尽量地搜索着我；有时竟使我回转头来，或是停一停步子，疑心那是敌人的刺刀近了。

渐渐地我觉得清醒过来，我才知道我的步子沉重了，很难拖出一步，像是在拖着几百斤的重载。于是我在路上躺下了，把沙路分成两段。

渐渐地我又听到了有车辆滚走着的声响近了，一直近了我的身旁。我仿佛更听到了我不懂的一句：

“……………”

我很习惯地立刻握紧了枪枝；不过仍是躺着，带着一种惰性的口气问：

“谁？”

回答我的是从女人的喉咙里冲出的一声惊叫，很响亮；在这死静的旷野上，仿佛快要冲断了天地相连的那条弧线。

我的枪枝又脱开手去，再问：

“做什么的？”

“啊？”

“做什么的？”

我的声音又加重了些，我便听见了在抖索和喘息中拖送着的话声：

“先生，你慢慢说话，我听不清。”

“怎么听不清？”

“先生，我是蒙古人。”

我把头扬高些，看看那个人形：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脱开发辫的散发，在风中，不住地飘打着她的两颊。

“你是做什么的？”我仍是逼问着。

“先生，我是回家的。”

我气愤了，仿佛在我这最神圣的休息中，她不该这样无故地来骚扰我；所以我带着骂意地说：

“你回家你就回去得啦。谁他妈不让你回去咧！”

于是她指过她的车轮，又指着。这时候，我才知道她所以骚扰我的休息的，是我的身子横断了她的去路。

“累坏了！”

我一边自语着，一边用一只手按住地面，起劲地撑起上身，然而我的腿是一条树干，直硬得不容我稍稍地弯曲些，我不能动作一下。

“先生，你怎的了！”她问。

我不愿意再多接受她一句话。

“你病了吗？”她再问。

我厌烦了这多嘴的姑娘。我为了她快些离去我，我便随便地答应了一声：

“嗯！”

“那我带你回家去，你愿意吗？”

我自然是愿意；而且在默默中感激了她。但是当她扶助我起来的时候，她惊奇地问：

“你是军人吗？”

于是我告诉了她我所遭遇的情形。然后她的眼睛逼着我，望望我的军帽，破裂的军服；同时她被我也看得清清楚楚：她比我低下些，她那被风卷起的散发，刚刚触到我的耳边，她的头高扬着，直对着我，没有一掌的距离，她呼出的气息，温暖而且湿润，我的下颏都感受到了。她的脸上裹着一层月光，有浓重的两条黑眉和一对活跳的眼睛。我呆呆地望了许久，在她的脸上没有寻出一丝皱纹来。她避开去说：

“让我扶你上车吧。”

她给我解下枪枝弹带后，她的手握住我的手，她血流中的热度经过两只相握的手，传遍了我的全身；在这清冷的晚间，我开始又感受了人类的温暖。我扶靠她走了两步，我的腿压住了车辆的后边，几乎使车辆压翻过来；系着绳套的两个小驴受了极大的惊恐，长长地叫了两声。

突然她像抱起一个包裹似地把我抱起来放在车上了。

车轮继续着未尽的途程滚转去了。那车辆是蒙古特有的一种“勒勒车”，由简单的匠手，简单的质料组合起来的，用不知名的枝条编织的车床，很明显地经不起太重的重量，甚至有时我担心随伴车床塌落下去。并且车轮又是一枝小树干经过烟火卷成的圆圈，中间只有几条不调合的木棒互相地支撑着；一边滚转着，一边发出一种难听的鸣叫。她坐在车前的车沿上，握着麻绳制做的小鞭子，打着小驴的脊背，没有一声是响亮的，仿佛小驴不仅没被打痛，而且感到搔痒的舒适，把蹄子更加放慢些抛开去。

天上轻松的白云，一块连着一块的浮过月亮，浮向远远的天边去，淡了，散落了。车轮不停地进行着；任随车轮的转动怎样的加快，永远永远有一条天线绕裹在我们的身外，保持着固有的距离。

“姑娘——”

她不待我说完，便答应了：

“啊！”

“我们还有多少里路？”

“很快，很快，你看！”

我顺着她鞭子指着的地方望去，有斑斑的黑点，遮断了天线。然后我们便瘖哑下来，让死静，寂寞充塞着这旷野，充塞着我的心。

这条沙路是很平坦的；不过车轮上有着许多未修平的疤结，滚走着，不住地在抖动；由是我的身子也一样地随着在抖动。但是，她在我的

眼前却很自然地摇摆着，向左右歪斜着。

“姑娘，这么晚你去做什么啦？”我问。

“卖羊皮去了。”

“那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那你才见我的时候，你吓呆了。”

“这一个月来不同了。在夜里我也有些害怕。”

“为什么？”

“你们常常在这里打仗。”

“管你什么呢？”

“管我什么？哼，我们这里的姑娘媳妇不知死了多少！”“怎么死姑娘媳妇呢？”

“你想吧！”

她的头不自然地扭开了；我看出些她那少女特有的姿态。“那么你不恨我们吗？”

“不，我恨的是伤害我们的人。”她立刻又把话反转来说，“也恨你们！”

“你还要恨我们！现在‘人家’把我们当做一条狗。”“你们把我不是也看做一条狗吗？”

她恨恨地丢给我一眼。

“那你怎么扶助我呢？”

“我以为你是倒在路上的病人，总是可怜的。”

“现在你不后悔吗？”

“不！”

她给我一声坚决的回答之后，已经近了她所指定的一个“蒙古包。”

当我们走进的时候，我立刻被一层黑幕蒙蔽了眼睛。她很熟悉地牵着我的衣襟把我推坐下来。我听她与谁谈一些什么；我还没有听到她们谈话的终点，便在朦胧中失去了知觉。

我突然醒来的时候，有一只手，很燥热的，浮贴着我的脸颊，每个手指就像在打着钢琴的键子一样。我不转动一下；只是呆呆地接受着，许久许久也没能脱开手指的搔动。于是我急快地翻转过去，想躲避开；不能——我占有的地方，仅是狭小的一条，而且我的背后紧靠着“蒙古包”的边际，只有弯曲着身子，我的腰背才恰好拢合在那条边际的弧线里，舒展着疲劳；所以我不能不保持着原有的姿态，任那手怎样地搔动着我。

“蒙古包”的一处，裂出一条线隙；不知是门洞的一边，或是其他的什么角落，让月亮透进一丝的光线，淡没于昏暗中：有时抖动起来；我知道从缝隙间吹进的夜风暴烈了。同时，那手在我的脸上也加多了动作；把我垂落到前额的散发，经过抚理之后，一缕一缕地又推送到头后去，这时候，我不能不把声音低下些去问：

“谁？”

“我！”

这声音很高，也很自然。我一听到这声音，便晓得并不陌生，而且很熟悉的在我的忆想中。于是我问：

“你是送我来的姑娘吗？”

“嗯！”

很高的一声，使我的舌尖堵塞着齿缝响起一种制止她的声音：

“哟——哟。”

“怎么？”

“你小声些。”

“怎么？”

“不要叫别人听见！”

“为什么怕别人听见？”

“因为——”

我想说的话，我又吞食了。

我脑袋里的表，仍是清醒着，走动着的音响，更加响亮些。她翻转着，突然好像要枕在我的胸上。后来她像取自己的东西一样把我的表取去。她送回来的时候，我托住了她的手，让她每个手指都曲紧起来握住表，我又托着她的手送到她的身边。她说：

“谢谢你！”

我的心跳着，直到天明。

那时候，她已经穿好了衣服：一件长袍，一件坎肩，紫色的，有着零乱的黄色小花，仿佛相象肩襟的黄铜扣子，边缘上绣着黄色的线条。她跳动着，把表举到两个老人的面前，使她没有一丝皱折的脸上加多了几条笑纹。

我仍是躺着，眼睛慌忙地贪望着新鲜的处所。

但是一个老人给我托来一杯凉水，送到我的唇边。我说：

“谢谢！我不渴。”

老人却强迫着我喝。我奇怪了。

“你总是要喝。是应当喝的。”她说。

她扯起我的手去接那杯凉水。我问：

“为什么？”

“你想吧！”

她的头不自然地扭开了，我又看出了她那少女特有的姿态。

“你喝了吧！”她又命令着。

于是我喝了。

我刚刚再躺下，便有人跑来告诉她：追随过我的刺刀又近了。正在搜索着近处的几个“蒙古包”。

她焦虑地给我一个逃避的方法——我穿了她给我的另一件衣服，鞭打着羊群去了。

“这是我住的地方，你回来不要忘记！”

她嘱咐过了我；她的手还在指着她住的“蒙古包”，跳动着。

不到两点钟，那一次惊动过去了，我又鞭打着羊群回来，我没有忘记她所指过的“蒙古包”。

然而她不跳动了。安静地躺在“蒙古包”里，裤子脱落下来，由腹部到膝盖的一段赤露着，涂染了几条血流。不过她遗下的却是完整的尸身，没有一处伤痕，只是一手握住了——一把刺刀；刀柄上铸着兵工厂的名号和“昭和”字样的年号。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已死的与未死的

“我不能再活！……我活不下去了！……”

“保佑他……保佑他平安啊！……”

“……”

冷风卷来一阵一阵从喉咙中爆裂出来的哭喊。

那时候，太阳刚刚落下，遗与天边的霞光，有零乱的金星还在波流上跳动。

继续着的雪天，已经许多日了，一条孤零的小路，又落起了二寸、三寸的积雪，路旁是更高起些的雪场。我们正踏着那无方向的雪场走去；而且，雪还在我们的肩上飘落，飘落……

我们十几个人，是两个人一列一列地排起来；如果没有排尾那两个年轻的女人掺杂着，那么很像一排新编的小队伍：佝偻的肢体，不齐整的步子……一个一个都是陌生地相视着。

虽然，我们真是不相识的；但是，我们却交换着相识的眼色。并且，我们的左肘都联系在同一的麻绳上；绳端被另一只手握着，在我们身后。

已经是十一月天气，江风正拖着冰箭穿过毛孔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感到太冷。不过冷风卷来的哭喊，还听得很清楚：渐渐逼近，渐渐逼到我们的背上来。

“我怎……么……么活……”

“我也不活了……不活了！”

我们的眼睛，互相地探询着——是在寻觅着我们之中的哪一人是哭喊的接受者。

“你回去！你回去！”

突然，有人喊过来；那个人正是和我一列中的同伴，只穿着一件破棉短衣。

“我不放心啊！”

“多难听！不放心什么？”

我的同伴眉间束起几丝忍痛的皱纹。

“怎么能放心呢？”

“你不要怕，没什么要紧的，不放心什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哼！你不骗我吧！啊，你不哄我吧！”

“不放心？……”我的同伴停一停，却暴躁起来，“有死够了！”我立刻抖起一个冷战；别人的呼吸也都缩短了。

不知为什么我问起我的同伴来。

“你为什么？”我低低的声音问。

他摇摇头。

“那是谁？”

我的右手向身后指去，给他看。

“老婆！有老婆，真倒霉！”

于是，我们俩人的肩上分得了两棒，便没再说一句话；我只是偷偷

地回转头来，看见同伴的女人几次向前冲来，几次也没有冲过两只张开的胳膊。最后她说：

“我要把棉袍送给他！”

于是，她从身上脱下棉袍，只余下一件窄小的夹衣紧束着上身，被两乳撑起的衣襟，使乳间的一个衣扣张开着，所以缝间裂出前胸来。她还没有忘记紧缩胸膛，扣起那个衣扣；但是立刻又张开，缝线断了，扣落进雪去，她没有再去寻找，便抱着棉袍匆忙地冲来；仍是被两只张开的胳膊隔住，不许再走近一步，结果，棉袍终是由那胳膊抛给我的同伴。

我们快走尽小路的时候，我们的步子，一步比一步松软下来，直到被拖进这铁与石筑成的房间来，被锁在房角的一个铁棚里。

我们谁也不明白谁是为了什么变故；只是沉默，死静，惊惧，在等待人家来安排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警官问过了每个人的年岁……籍贯之后，就有一个举着薄子的警察指出每个人是什么案件——

“土匪！”

“土匪嫌疑！”

“政治嫌疑！”

“暗娼！”

被指出罪名的每个人，一个一个地垂下头，眼睛在自己身上搜索着什么证据似的。

“暗娼！”

“政治犯！”

“土匪！”

“通匪！”

“……”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受了检查，一个一个地脱下袜了，带子，和衣袋里所有的零碎物件。有尖锐地喊声叫起，穿过我们的耳孔——

“十一号，三个！”

“十六号，两个！”

“……”

一个一个地追随着喊声去了，渐渐只余下我和我的同伴。

“来！李金。”

这是提着手铐脚镣的警官叫他。

他把头一摆，仿佛有铁绳系住地，由头顶直到脚底，于是，年轻的脸色也渐渐佝缩，红涨，让嘴角紧闭起来，拖下两条老人的皱纹，我看他模糊了衣袖的棉衣，胸前用白线缝补的杂色布块抽动起来，那白线就像要从布块的一角裂开来，突然又落下……

“滚来！”

他把那棉袍抛到我怀里。手摇动着走近两步，那两步已经快把脚下的地板踏落下来。他再退回来的时候，两手稳稳地放在胸前，在抚摸杂色的布块，抛开的步子，已经有了固定的距离，最长也不过一尺。

“十八号，两个！”

十八号的牢穴，低小而且拥挤，长只能伸开身子，头顶触着墙壁，脚踏着墙壁与门扇，宽与长也几乎是相等的；常常要留宿十多人，背倚

着背，或是枕着墙壁，或是使肘撑在膝盖上，枕着手掌，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新的睡眠。然而李金在睡眠上，便感到一种极大的磨难；两手与两脚，没有分开过一次，他女人的棉袍，到现在，也没穿起来，天气太冷的时候，他也只好把棉袍披在肩上，让衣袖在颈下束起一个不方便的大结，把两腿屈起，前额垂到膝盖上，那就是他的睡眠。我看见几次他从那种不适的睡眠中惊醒来，牙齿在一声声地发响，两肩高高地耸起，似要撕开手腕上铁与铁的缠绊。白天他的眼睛总是滚动着，寻找什么；但是，四面都像墙壁一样。虽然有窗孔，也有门洞；窗孔间都筑有铁柱，蒙着一层铁网，门紧锁起来比墙壁更结实些，有时候，他眼睛看得朦胧了，便凑到门旁去；然而由小小门孔所能看到的，也不过只是对面同样的铁门，铁锁，窄小的过道。而且过道两端仅有的两个窗子传进来的光线，也渐渐地微弱，微弱到我们的门前已经是暗淡下来。最后他有一口长长的气息吐出了。

于是那个窃盗犯的同伴，便从衣袖抽出一缕旧棉，在子手掌里卷成细绳一样；再把手掌撑在一只破鞋里，让那条棉绳夹在地板与鞋底间，不住地滚动起来。李金望望他，又有一声轻笑响出来。

不过穴里仍旧与眼睛一样黑暗，朦胧，每天只有等到太阳没有落过窗前另一所房脊的时候，而且要把小窗子打开，才能使一缕阳光由玻璃窗反印到墙上，那比黑夜里的月光还要暗淡，停留着短短的一刻，就去了。

最怕的是多雪的天气，一切都埋在昏沉的烟幕中了。就是晴天，也担心太阳刚刚转到我们所等待的地方，有一块游云来遮没。

李金把合拢在一起的两手举起，指给我们看窗外说：

“他妈的！昨天那块云彩又来了。”

真的，有一块灰云浮过我们的窗前，但是阳光反印到墙壁上的时候，却没被遮没。

“你快去晒晒吧！”

我们都这样对李金说。

“你们呢？”

“你快去！”

“唉，从我来，你们就没有晒过一次，我怎么忍心呢，我们不都是一样的难友吗？”

李金总是谦让；可是我们谁也不肯。固然都是一样的难友，一样被一把铁锁锁起来的；不过他比我们更不自由，比我们更多有一副手铐，脚镣。

当他两手伸到阳光里的時候，手背叠落着斑斑的疥疮，已经不是手形，只是一片血滴、毒汁凝结的一块烂肉，那更比我们沉重很多。

“你们看，我的疥疮晒好些吗？”

于是他把手移开些，给我们看；立刻又让头伸到手边，有一块小小的阳光贴在他的鼻尖上，他又说：

“真暖啊！还像八月的天气呢！”他突然转过头来问：“现在到几月了？”

使每个人都探询起自己手甲在墙边刻下的记号，有的已经漫成一片，仍是耐心地数着，数着，终于没有数完，便垂下头来说：

“我都快到五个月了！”

同时又引起李金的问话来——

“我多久了？”

其实，我记得很清楚，还不到半月；他自然也是同样，不会比我多一天。

“那我也要等五个月吗？”

我怕听这句话，我怕他嘴角拖下那两条皱纹，一天比一天深下，已经深到皮肉里，骨子里。

“不要紧，我们都是要忍受啊！”我拍拍他的肩，安慰地说。

“该死该活，我要痛快些！”

他的声音，击到铁门上，铁栅上，仍是钢脆的回响。

“我们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好说呢？就是说，谁又肯听呢？”

“当然要说！押多久了，不过一堂，押也押死了。”他的声音软下来，仍是“押也押死了！”

近几天来，李金惟一的希望就是审讯，所以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从过道上响来的呼声——“李金！李金！”

然而结尾的两个字却是——“接见！”

铁门裂开一条缝隙，他拖出了沉重的步子。

同时，我们也确定是下午了，因为下午的某点钟，才是接见的时

间，我们便放松了一口气息，无期的刑罚中，又快挨过了一天的磨难。

李金抱着一条棉裤，同棉袍是一样的布料，模糊地还可以看见蒙着一层灰尘的小红花。他倒下来，像被暴风吹来的旧棉，堵塞在墙角上。

“一个人死都不能死个干净。”他突然又激动起来。“来一次，哭一次，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的丈夫是好汉子！好汉子敢做敢当！谁要你不放心？”

“女人来过了吗？”我问。

他点点头。

“说些什么？”

“总是不想活，要死，要死！你死又能怎样？”

他仿佛是对墙壁说；而不是回答我。

“她说的都是好话！”我说。

“什么？”

“她挂念你啊。”

“谁要她挂念！”

“像她能不挂念她的丈夫吗？”

“啊！”

他的吼声，仿佛什么都明白了。

“王八蛋，不用闹，明天就枪毙你！”

骂声从过道响进门孔来。

“哼，今天才好！”李金自语着。

我的胸坎好像爬过了一条毛虫。那个窃盗犯的同伴把燃起的烟尾巴偷偷地给他吸了两口。他又偷偷地把马桶移到窗边，慎重地登上去，脖

颈尽量伸长，如果窗前不是有铁栅、铁网，他也许把头伸出，伸到离去的他的女人背后。不过那背影终于是远了，远了，雪场上的风夹着雪裹住她，仅有裤角不住地飘起，飘落……夜里，他没有合拢起眼睛，微弱的灯光落在他的脸上，更加惨白，直是裹着一层松懈皮肉的骷髅；我仿佛再记不起我所初识的那个脸孔。

我看他用牙齿撕着衣袖露出的棉花；所以我问：

“朋友！你要怎样？”

“我要越狱！”

“安静些，朋友。”

他很听话，立刻安静下来，我嘱咐他说：

“你要想想怎样应付过堂。”

“过堂？”

“是的。”

“想想？”

“是的。”

“没有想的。”

“那么你要承认……要承认是土匪吗？”

“土匪？土匪？”他故意把肩膀送到我的眼前，让我看见他那件披在肩上的女人棉袍……

“朋友，我明白你；所以我希望你注意自己的口供。那口供能决定你的生死！”

“我不供。”

“刑罚厉害。”

“我宁死堂上，不死法场！”

他投到我的怀里战抖起来；可是没有一滴泪水浸湿我的衣襟；并且，他自己仍是低语着：

“我不怕。”

“你的女人呢？”

“随她去！这样老婆哭就哭死我了。”

所以以后他拒绝再见他的女人。可是他那女人，每天仍是踏着雪场来，又空空地踏着雪场回去。

“李金！李金！”又从过道上响过来。

“不去！”他立刻拒绝了。

铁门却闪开了，有一条梨木的棒子断在李金的肩上；又一条更粗些的指着他的头说：

“过堂，你不去吗？混蛋！”

李金自然是去了。

阳光从墙角上空过了，冷风不住地从窗孔卷进起，我们好像被锁在冰窖里了。但是我们又不能把窗子闭起，我们怕立刻闷死。

我们正在谈着李金的一些话，总是希望他有意外的胜利；真没想到还是被两个警察拖回来，抛在地板上已经不是人形的一堆垃圾物。

胶黄的灯光又燃起来，我为他抚摸着胸坎，涂成了一双血手。

“朋友，承认了？”

我们都是这样问他。

他摇摇头。

以后他又经过几次的审问；我们每次问他，他每次也只是摇头。不过，他摇头的度数，一次比一次无力，缩短……最后一次他完全失去了知觉，那一丝丝微弱的气息，也快要间断下来。只好征求所有难友的同意，允许把大家早晨留下的一杯凉水浇在他头上，他才清醒些。

“朋友，承认了？”

他仍是摇摇头。

不过，绝望永远藏在他嘴角的两条皱纹里，似乎他自己已经确定了只有死。

所以那个窃盗犯的同伴，很快地又给他燃起一只烟尾巴来。

一天一天地久了，李金的刑伤渐渐地好过来，他便常常预定自己的刑期——由十年到无期；而没有一次估计过死刑，并且又接见他女人一次，他把女人送来的一个小猪蹄分给我们大家吃了。

一天早晨，那个窃盗犯的同伴由警察的谈话中偷听来一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便又卷起一条棉绳，在地板与鞋底间滚转起来，许久之后，他很熟练地把棉绳中间撕成两段，被撕的两端有小小的火星冒出，他巧妙地用一口气吹起一缕火焰，那样才燃起了一只短短的烟尾巴。

“朋友，你再抽一口吧！”他说。

“什么？”——“再？”李金疑问着。

“这是那个官抛在厕所的上等烟头，你尝尝！”

李金刚把烟尾巴接过来，铁门闪开了，武装的警察拥进门来；他明白了，他的生命也只是同烟尾巴一样的了。所以很安静地吃尽了烟尾巴，没向我们说什么，去了。

窗下军号，哭叫，马蹄的骚声中，我又听到了李金的语声：

“你回去！你回去！”

“我回到哪里去？”

“随你去，不是有许多男人可以再嫁吗？”

“你说两句好话吧！”

“没好话对你说。滚开！”

我握住窗子的铁栅，让眼睛集中在铁栅的一个方孔间，李金已经把棉袍棉裤抛到他女人怀里，随同他几个难友上车去了，走过雪场远了；然而那个女人却被阻止在我们的窗下。我看见她身旁还有木棺；那只是四块单薄的木板；而且不是经过匠手制成的；匠手绝不会在每个角下留下那么长的裂缝。她渐渐弯下腰，把棉袍棉裤都放进棺材里；她那轻轻的动作，好像母亲在服侍一个初生的幼儿，然后由两个苦工抬起来，追随着军乐声走去。

她倒在窗下了，有一把短刀刺进喉咙，刀柄握在她自己手里。

两点钟后，李金回来了；丝毫没有受伤，只是自己咬掉了一只手的小指。

这样我们知道了他原去“陪绑”的。

（注：陪绑——正犯执行死刑的时候，把严重的嫌疑犯也和正犯一样解到刑场，使他受到死的恐怖，算是对他的刑罚。这就叫“陪绑”，在北方是常有的事。）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做 人

那时候，我正在报馆里做编辑。为了一件事我挤在人群里等待着电车。突然，我发觉了有人在我的身后扯动了我的衣领，而且说着：

“我昨天才打听到你的地址，正想找你，有一件事情请求你。是的，请求你。”

——几天了，我都在奇怪着。那个人是谁呢？穿了一身田野的衣服，蓝色的夹衣夹裤；有两个衣扣掉了，散开着一半衣襟，赤黑的胸脯露出来，与他的脸色调和着。他没戴帽子，也没留长发；不过他的秃顶好像有两三个月没经过一次修剪，伸长的发丝已经一寸多，有的长过耳边，有的长过了一半衣领；但是那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因为他的眉毛也是很长，而且丛密，以及他的睫毛也同是一样。——我把他那整个的模样记着，想从我的意想中记起他是谁来。渐渐记起他曾在我的眼睛里留过一次或是几次的影子。我终没有记起他的姓名来。

同时，我仍在奇怪着——我刚刚在军队的败走中逃出来；逃到我的旧地哈尔滨来，骚扰了许多朋友，他们好久没有安下心，每天为我奔跑，才给我找到一月三十元钱的编辑职位。到现在还不满俩月；我有什么力量值得人家请求的呢。

在时间上又划过了两昼夜，在我发稿子的时候，那个人来了，第一句话他便说：

“我是申龙，你不认识了吗？”

我完全明白了——一年前他比我年轻，而现在却比我老了几岁，也许不止，黑髭已经蒙蔽了他整个的下颏。我们在战线上有过两天很好的友情；后来在败走中各自分开，直到这次会面。

我再深深地注视了他，无形中我又记起了他留在我脑子里的几个惊人的故事；从那些故事里我将永远承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现在他从军队里回来了，真是我的意外。至于他有事要请求我，也更加疑惑。所以我又重问一遍：

“那天我在电车站上遇见你；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昨天才打听到你的地址，正想找你，有一件事情请求你。是的，请求你。”

申龙重说了，证实了他那天没有说错。同时也更加重了我问他的口气：

“你有什么请求我的呢？”

“自然是有的。”

他说的很肯定；并且追问我一句：

“你答应不答应呢？”

“我愿意我有力量答应！”

于是他说了：前一月才从军队里回来，回家去过一次，父亲哥哥都被飞机炸死了，只有母亲带着一个小弟弟还在亲戚家里活着。这样他不能不找到一份职业，至少也要维持住自己的生活……

当时我告诉他等几天，我有朋友可以帮他忙，可以给他在地方法院找一个书记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我问：

“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的报馆里不是要出晚刊吗？”

“你怎么知道呢？”

“谁能不知道呢。”

是的，报馆里早已发出了晚刊的消息。

“那你给我留一个位置好了。”

他很轻快地说出了，去了。

但是我却很难地对社长说出：

“你怎样都得答应我！”

社长这个老头子，总是厌烦别人说话；与他职责有关系的时候，也是一样。每天，他都是躺在社长室里，吸着鸦片烟，在表面上，不但社务与他没有多大关系，就是世界与他也有了隔离。不过，我却没想到他一听了申龙是从军队里回来的；就好像触犯了他的神经病一样，滚起身来说：

“你叫申龙先生来吧。可是晚报的人位早就定好了。”

“那叫他来做什么呢？”

“我对于从军队里回来的人，我总应当尽力地想办法；你不也是一样吗？”

我带着这满意的结果，等了两天，申龙来了。

我把他让到我的房间来，他说了几句感谢我的话。然而，他的态度丝毫不谦恭，一直保持着一个立正的姿势，让一对大眼睛更加张大些来注视我，我说：

“朋友，请坐！”

“好！”

他答应了几次，总是没有坐下。他的头开始绕转着，让屋中的每一角处，都在他的眼睛里留下影子。

“坐下，朋友！”

我用两只手压住他的两肩，恰好把他压落在椅上。他又把椅子扯近我的床边来；他问：

“我的职务呢？”

我没回答，也没有看他；只是把两只手张开，让肩膀向上耸了一下。

我的姿态感染了他；他失望了，好像连他的生命也在这失望中灭掉。

他问：

“这是什么意思，让我白跑好几次吗？”

“你安心，总会有你的职务！”

他想想，把头深沉下来。他又问：

“那么我住在哪里呢？”

“随便你。”

“我想住在你这房间。”

“好吧！”

“不过，我不知道你来的朋友多不？”

“我的朋友，与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要安静些。”

最后我告诉了他，我的朋友很多。不过我因为刚从军队里回来，最近还避见朋友。

他高兴着，要去搬东西。我问：

“你现在住在哪里？”

“朋友地方。”

“在道里，道外？”

“你问的这么详细做什么！”

“我想帮你去搬东西，问问你的住址，难道这也是一种罪恶吗？”

他一个人去了。在下午，不知从什么地方他一个人用人力车把东西拖来了。共有两件同样的柳包，其中一个，在中间断了几条线绳；柳条还是很完好地连着。他自己由楼下搬到我的房间去的时候，他想一手提着一个，一次提进来。可是他提起之后，他的腰向后挺斜着，沉重得使他放开步子踏不稳地面；终于是掬的，掬了两次。

房间很小的，又添了一架铁床，更见小了，竟把我的方桌由地心挤到墙边去。

我又从报社那里暂借十五元钱给他；他去换一身适当的衣服。

我给他打扫了一次铁床之后，我看着他的行装仅是两个柳包，便想到也不会有他够用的被褥。从我的床上抽下了一条狗皮褥子给他铺在床上；顺便又想把他的柳包打开，给他完全铺好。但是我一提柳包，没有提起来；那柳包里有我意外的重量。并且，还有铁锁锁着；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问：

“你的柳包怎么这样重呢？”

“你试验过了吗？”

“不，我想替你打开。”

他立刻把柳包的每角检视一下；一个一个地推送到床下去。他说：

“人家的东西，怎么好随便打开呢？”

“那么，你的东西，太神圣啦！”

我讽刺他，我感觉我的脸由眼角温暖下来。他仿佛怕我气愤，故意凑近我的身边来，拍打着我的肩：

“请你原谅我！”

“自然可以原谅。”

我加重了讽刺的口吻，退后一步，让我的肩脱开他的手；他又凑近些，我继续又后退一步。

“请你原谅我的苦衷！”

他的声音低沉着，低沉得像在远处。

我很坦白地笑了，让笑来表示，我并没有对他气愤；并且也没有认为是一件难忘的大事。

晚间，我请他剪了头，脸色新鲜许多；他又换了新买来的学生制服，皮鞋，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我叫他出去玩玩。他回答我却是：

“我太疲倦了。”

我坚决地扯着他。他拒绝着：

“我永远都不好出去玩的。”

晚刊出版的前三天，社长才决定了叫申龙去担任校对。可是申龙对我说：

“我不愿意校对。”

这时候，我觉得他这几天给我的认识，他的个性真是奇特的。于是我问：

“那么什么是你愿意的？”

“外勤记者。”

“为什么？”

“我可以多接触几个地方，我可以多认识几个朋友，我可以常在外面逛逛。”

“你忘记了吗？——”

“什么？”

“你永远都不好出去玩吗？”

“……也不一定。”

他说话好像一个姑娘在夜里偷偷送走处女的时代，第二天被人指问的时候一样。他的眸子流转几下，仿佛拖着一种秘密，时时刻刻想潜藏在眼角里；最好是避开我。于是我说：

“朋友，我看你太奇怪！”

他坚持地给我一个表示：

“你会认识我的，绝不会对不起你，放心吧，朋友！”于是我再没有什么异议加在他的身上。并且，我还对社长说：申龙虽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记者，但是他懂得怎样采取新闻，怎样写稿子，他可以照顾整面的本埠版；总之，他去做外勤记者，没有一样不好的。社长经过几次的思索允许了。

然而他从开始的第一天起，我已经替他难为情了；为了他几乎使晚刊没有出版——他出去一整天，很晚地才回来，其他的版页早已排好，他一个人还是坐在编辑室里冷清地写着。写完了，也不过只是两段三四百字的小消息，并且所有的字句，也完全不适于新闻的用语。

“朋友，你担任不了外勤记者。”我说。

“不，我一定要多做几天！”

毕竟是一天比一天好些。

同时，也一天一天地逼近了我们难忘的九月，我们永远记忆着的九月。

在十八的那天，在公园里搭好了几所华丽的席棚，一间悬满着灯彩，一间高搭着讲台，四角垂着新样的旗子：四分之三是黄布，四分之一是红蓝白黑四色。中间高悬着万国旗，那里没有祖国的旗子，全数都是新样的代替了。

龙灯、高跷……一群连续着一群，不断地绕满着公园的四周。锣鼓响叫着，在唤着游人，像往年元宵节一样；不过游人却不像元宵节那样多。所去的，都是指定不能不去的人，每个人的衣上都戴着一个记号——黄色的，圆形，那上面写着的字是：参加庆祝典礼入场券。

同时我们的报社也正在分配着这种入场券。共有五份；除去申龙和另外两个外勤记者使用三份之后，还余下两份来；社长拖着那两份送到每个人面前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推开他的手说：“社长一个人带着两份

去吧！”

“那还不如让我死吧！”

社长终于没办法；有人主张把那两份丢到纸篓去。但是社长说：

“你是想叫我去住监狱啊！”

其实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意思。

申龙看社长踌躇着，他说：

“怎样都要按着入场券的份数去人，不然的话，社长真要坐监狱了。”

社长想了许久，说：

“叫两个印刷工人去吧！”

可是印刷工人却说：

“我们工人不是人吗？”

时钟已经快到了开会的时间；社长在编辑室里绕着圈子，最后申龙说：

“我有了办法。”

他利用抽签的方法；结果我分摊了一份，我的心立刻跳起来，仿佛沦入险难中了。

申龙劝慰着我：

“去吧！”

“都是你想的好办法！”

我抱怨着他，我狠狠地击了一掌，在他的肩背上。他笑了，笑得很不平常。他说：

“这种机会，我们不应当放过！”

“怎么？”

“这正是我们的教训！”

“哼！”

“这正是叫你去做人！”

这时候申龙被另外两个外勤记者叫出门去；他在门口停留一下对我说：

“你把我的柳包拿来一个。”

“哪个？”

“随便哪个。”

然后他就去了。

我到公园的时候，各处已经排起整齐的队伍，每排队前都飘着一面旗子写着什么学校，什么机关，什么公会……他们每个人都像岗兵一样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岗位。记者比较自由些，可以随便走到哪里去。

不过我找申龙找了许久，只是在公园一条僻静的路上遇见了他的背影。我喊：

“申龙！”

他回转头来，看看是我，便把手摇了两下。我还叫着：“你等等我！”

他紧紧握住了我；几乎要把我的手指握碎，使我的上身向他倾斜一

下。我说：

“朋友，我们一同走好点，我不愿意一个人在这里。”“我有事！”

“记者有什么事情，看看就算了。”

他甩开我的手：

“再见！”

他走开了，他的步子很匆忙。

会场鸣了三声纸炮，那种响声好像镇压着群众，不许走动，不许说话。继续着响起大乐来；虽然是欢快的歌曲，健壮的调子，但是却激起我心的凄冷。

讲台上有人在演说着；突然响了一声惊人的轰炸声；台下形成的人海里起了巨潮。原有的秩序已经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恢复的了。

当时就证明了那是暴徒投掷的炸弹；不过被伤亡的要人，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不久又传遍了暴徒逃走了，只是勾起二三十个嫌疑犯。

我被拘留在公园里，有两小时的工夫，然后经过严重的搜查，才把我放开。

我回到报馆的时候，那里集合着许多人来问我这个消息的详情。我说：

“我怎么知道详情况。你们等申龙回来，他自然可以知道。”

我们一直等申龙等了好几点钟，他也没回来。我们焦急了，晚刊只是等着他写这段惊人的新闻。

第二天，也没有听到申龙的消息。我便把他所有的东西检视一下，在他留下的那个柳包里发现了炸弹。我详细地看看，我便想起他的话来：

“这正是叫你去做人！”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肖 苓

我们学校的学生，并不多，总数只有七十几个人，其中女生占了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学校却是很有名的体育专修科。而且我们学校有一个更有名的同学，每个人都称她是我们学校的皇后。她姓肖，她的名字只是一个字——苓，这两个字合并在一起，读起来，很方便，声调也很调和，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容易使人记住，容易使人常常叫起来，叫得那样响亮。听说她家很穷，才来考我们这个免费学校；所以她从入学起，没有看见她穿过一件漂亮的衣服，像她女同学所穿的那样的。她每天都是同样的蓝色衫子，那上面很难找出一滴污点，因为她常洗，常换，她最爱的是清洁。同学的每个人都很愿意和她要好，不管男的，或是女的。她的“五十公尺”，“百公尺”，“跳远”，保持着我们几省女子的最高记录。并且她的年纪最小，眼睛很大，嘴唇极薄，两颊总是浸藏着一种浅淡的晕红，——所以不知道她的人说她爱涂胭脂。

秋末的时候，总有几日是这样的天色：太阳的边廓淡映在飘起飘落的云层间，是一团清淡的光团，不温暖，也不刺眼睛，在天面上，距离不足一丈高的地方。有时太阳的光线，像针一样的锐利，突破了云层，闪射出来，一条一条地抖跳着；有时，也从云层的隙缝里，滴漏下来，渐渐地延开一片，或是一条，如同一团野火的反光，染了天面。这种景色，就是我们的早晨。

起床的铃声，响过了。

我们男生的寝室，仍是浸没在夜境里。窗子上垂着窗幔，是很厚的

绒毡质料，透不进一丝的阳光来。几条铁床，排了两列；我们正舒适地睡在床上，被边裹着头，脚却赤露在外面。有的鼾声，刚开始响亮。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门被人敲响着，一声连续着一声，好像永远不会终止；渐渐地，我们床上的被卷滚转起来，渐渐地，一个一个披着乱发的面孔，从被卷里伸出。于是，有的喊叫了：

“去吧！”

门扇仍是被敲响着，仍是原有的节奏。于是又有人模糊地叫“肖苓！”开门了；肖苓走近我们的面前，尽量地让洁白的牙齿露出，放开笑声。

我没去看她，背着她的身子说：

“你真是一个坏孩子！”

“谁是坏孩子？你说谁？”

她故意把笑脸收拾去，嘴角紧皱着，向外伸出，像一只没有脱开树枝的不知名的红果，那样的新鲜，那样的可爱。两手叉着腰急快地走近我来，在我的床前把脚一顿，她仿佛用这个动作，吓我起来，或是要把我从房间里驱逐出去。可是我笑了：

“小姑娘！我胆小，你不要吓着我！”

她不想笑，又不能不笑了。但是她仍逼问着我：

“谁是坏孩子？你说谁？”

我用被又把头蒙起来，不去理睬她。

有人却被她的话声打扰得不耐烦了；立刻把头从枕头边离开些，向她喊叫着：

“肖苓！你是想做什么？你说！你怎么天天跑到我们寝室来，你怎么天天不叫我们睡早觉！”

“活该！活该！”

她的话有些变了声调。她的头转动了一下，从眼角发现了她的几个女同学安静的挤在开些的门旁，观望着她，一阵笑声冲向她来。她的脸红了，由脸颊红到下颏，走到窗边去。我们寝室共有三个窗子，全被她扯开了窗幔。

我看她已经不是平常的脸色，我便问：

“生气了吗？”

她不做声。我又问：

“生气了吗？”

她所有的气愤都集中在她的眼角里，给我看，我改成老年人的声音说：

“你不要生我们的气！”

“偏生，偏生！”

她狠狠地摇动着身子；我学着她的声调回答着她：

“不许，不许！”

“偏生，偏生！”

“那我们将来不给你找好婆家啦！”

于是她紧闭着的嘴唇，被一声清脆的笑声冲破了。她离我没有七八步远，还是跑跳过来；一边用手指指点着我的脸，一边握着我被端的一角：

“你还敢说不？”

我很奇怪，她有什么力量这样威胁着我呢？我想最厉害，她也不过握起拳头来，向我头顶使劲地击两下；所以我不在意地问她：

“那我还怕你吗？”

“怕我！”

“哼！”

我把头摇一下，是让她知道——我怎样也不怕她。她的脸沉落下来几乎快要贴到我的脸：

“好！”

她在我防备之下，突然把我的被子扯开，扯落地下去。我从来的习惯，在夜里，是脱尽了所有的衣服的，就是短短的小裤我也不留在身上。当她扯落被子的时候，我惊慌了，我两手一抱，只抱住了一条被角，在胸脯上。我无一丝遮蔽着下身，完全赤露出来——由脚底直到腹部以上。

“看啊！看啊！”

她像鸟一样地叫着飞开了，引起她在门旁的同学的一片混杂的掌声与笑声来。

我刚刚起床来；这个故事已经传遍了我们的学校。早起的同学，有人跑来告诉我：肖苓被张训育员唤去了。

我们知道张训育员是女同学最怕的一个人。她的话，可以使女同学流出泪来。

我还没洗脸，就跑到训育室去。那门前已经围住了几个人，有的扬起脚来，把头伸过那几片玻璃糊了一半的纸膜之上，有的拥在门缝旁，我挤进来，也从门缝窥视着：张训育员与肖苓相向地站着，她们的侧面，恰好对着我。开始的时候，她们交换了两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不过从声调上，我分辨出来，张训育员的话，是严厉的谴责；肖苓却在反驳。

“你这个学生，我简直管不了了。”

张训育员尽可能地把脸孔紧皱起来，两条眉间，陷入两条很深的短纹；临产的大肚子，仿佛是被气愤充饱起来的。她等了许久肖苓的回答，终没有一句回答她。她的脸色稍稍改变些说：“男女怎么可以那样随便呢？随便跑到男寝室去，都是不可以的。”

“男生怎么可以跑到我们的寝室去？”

“怎么能扯男生的被子呢？这话传出去，像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也不像；就像扯被子！”

张训育员被肖苓的话塞住喉咙，几乎连气息也呼不动了。于是她转换了讽刺的口吻说：

“你现在越学越野啦！”

“我野什么啦？”

“每天你都有几封信来……”

“谁要他们给我来信？他们偏要给我来嘛！”

肖苓用力地推开门去了；我们的头在没注意中被门扇撞响了一下。我摸摸自己的前额稍稍凸起一块皮肉，有些痛热。我正想走开，她又跑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纸盒；没有看我，只是很用力地把我肩膀推开，她走进去。可是我很感激她给留上的门缝更大些。

“你看，你检查！”

她把盒盖揭去，一封一封的信被她抖落出来，落到地上和办公桌上。她又指划着说：

“你看这么多信，只有几封是我认识的！”

然后她说出她所认识的人名来，有几个是她的男同学。于是我身旁有两个同学红着脸，悄悄地走掉了。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张训育员说。

“谁要你管！”

“不过以后你自己应当慎重些，不许再那样随便！”

但是肖苓仍是继续敲打着我们的寝室门。又经过了张训育员几次的斥责，她没有听。

当张训育员临产请假的那天，肖苓没有来，我们几乎睡过了吃早饭的时间。

我在饭厅里寻视了许久，没有看见肖苓。等到碗筷响动起来，我注视一下她坐惯的那个座位——距离我有两个桌子，也没有看见她。我赶快吃完了饭，绕着那桌边走了一圈；——每桌是八个人，这次只坐了七个人，有一个座位空闲着，恰是她的。

“肖苓呢？”

我们男同学这样互相地询问着，没有一个人来回答。

最后还是由一个女同学的嘴里说出来：肖苓病了。

是肖苓病了。她一个人独自躺在寝室里，没有人看护她；也没有人陪伴着。她的床紧靠着墙边，床前有一个小木凳，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一个玻璃杯子。墙上贴着一张她的剪影，很像她，只要看见剪影上凸出的鼻子，就可以认出她来。我们几个男同学走近她的床旁，坐在她侧面的一只床上。

我们看她还在朦胧中，没人敢悄悄地推动她，唤醒她。

她的脸色，与平常比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她那两颊的红晕淡了些。

有裂缝的窗幔，透进一缕阳光，落在她的脸上。我们赶快把窗幔移动一下位置，让那一缕阳光移到墙上去。

“肖苓！”

我用很低的声音唤着她。她翻转一下身子，一只手腕露出被边；可是她的眼睛，仍是两条短短的黑线。

“肖苓！”

她随着我的叫声坐起，两手一起地摇摆着：

“你们来了，怎么不坐在我的床上呢？”

她只顾叫我们坐到她的床上去；她却忘记了她那紧小的衬衣，散开着，白嫩的胸脯，白嫩的乳头，全露在外面。我故意指给她看，她立刻把两手交叉地放在两边肩头拢抱起来：

“呀——呀！”

她这尖锐的叫声，几乎刺破了我的耳膜。

她又像平常一样地笑了；把被子扯到肩上，用下颌压住被边，给我们看看那永不改变的笑脸。可是，我们仍想惹起她的笑声来，所以我说：

“这次该轮到扯你的被子了吧？”

她像一匹老鼠样的钻进被洞去：

“不要你们再和我闹！”

“不闹。我们是来看你的病的。”我又补了一句：“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有病啊？”

“那你们就不要看我吧！”

“不，你告诉我们，你是什么病？”

“头痛！”

“从来也没听你说头痛过。”

“不然，是我骗你们吗？”

“也许。”

然后她说了：昨天她接到一封家信，她父亲没有一句话不是在骂她。

“为什么骂你？”我问“他接到了我们学校的一封通知书，说我的名誉太坏。”她说完之后，便骂起张训育员来。我们劝她找校医诊察一下，她顺从我们的话去了。

我们下午四时后是课外运动。我们三五个人一群一群地到体育场去。

在体育场里，我们也是分成三五个人一组一组地去练习。我正在跑道上挖好两个小坑，准备着练习短跑起脚的方法；很远的，我就听见了肖苓拖着一条叫声冲近来。

“你们看呀？”

她摆摇着一页印字的纸张，顶端印着两个大字——“号外”。我们的眼睛刚刚接触了特号标题的字句，每个人都像经过一次径赛，冲过了最后的终点一样了：两只脚没有一点力量，再支撑着沉重的头，沉重的身子；只是急切地需要休息。

我正想问肖苓：

“你从哪里买来的？”

疯狂的卖报人，叫卖着“号外”的喊声，已经充塞了每条街头，充塞着我们的耳孔。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就在那种叫卖声中被占领了，被杀害了。

虽然我们没有听见炮声；但是知道炮声一天一天地逼近我们；并且相信终会有一天临到我们的身边。

全埠的学联合会开过几次会议。议决开始一次最大的游行示威。

但是张训育员听到了这个消息，她还没有恢复了产前的健康，就跑到学校里来，她把大门锁了；我们排起的游行队伍，被她锁在校院里。

我们惊奇她；派出代表去质问她。她说：

“自从发生这次从所未有的国难以来，没有一个人不注意，自然，你们是更关心的。不过，学校当局屡接到明令，叫你们大家‘镇静’。并且你们也不要忘记‘读书救国’！——”

“读书救国”这句老朽的口号，在她的话里还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可是肖苓不等她的话说完，便向前跳出一步，脖颈向她伸长着：

“什么叫‘读书救国’？我们的土地都快被人家占完了，我们上哪里读书？怎么还能救国？”

我们所有的同学为着拥护肖苓的话击起掌来。张训育员脸红了，吓着肖苓：

“你小孩子，哪里有你说话的地位！”

“我也是代表！”

又是我们同学的一阵掌声。

她喊叫了：

“我们为了维持国家的纲纪——”

“放屁，放屁！”

这是女同学先骂了她。然后我们男同学中有人喊了一声：“打她，她是我们的汉奸！”

肖苓离她最近，所以她也先遭了肖苓的手掌；其次的许多手掌，她已经分辨不出究竟是谁的。

当时有几位教员给我们说了许多好话，才把她从我们的重围里拖救出去。她的夹袍撕裂了，她蒙着脂粉的面孔上，印下我们的指印。她的眼睛昏蒙着，在我们的身上寻觅着什么；说着：“开除肖苓，开除肖苓！”

果然，在我们游行回来，揭示牌上有一张开除肖苓的布告贴出来。她自己看着呆住了。许久之后，她奔到自己的寝室去，把散落在外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收拾起来；她想了想，又一件一件放向原来的位置去。

我们劝她静静地休息些；因为她还在头痛。她不肯，匆忙地跑到训育室的门前；那门已经被锁了，她猛烈地击了两拳，震落一块玻璃，她才走开。

她一个人躺在寝室里，一只手遮着前额，直望着天棚。她的女同学把一条用冷水的手巾蒙起她的头顶。

“你放心，肖苓，我们总有办法。”

许多男同学在她身边劝慰着她。没有一个人再想惹起她的笑声。

我们召集了全体同学大会，讨论肖苓开除的问题。大家一致主张，要求校长声明开除肖苓的布告无效，不然，我们全体罢课。校长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意见，在我们那种形势之下。但是，听说张训育员坚决地主张辞职；经过校长几次的慰留，几次的慰问，才自动地撤消了辞意。不过她在学校里对于我们的行动很少说话，甚至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报纸发出了可怕的消息：敌人的炮弹已经逼近了我们。全埠发生了极大的恐慌，每天在街道上都充满着搬家的人群、衣物。四处的谣言也随着增多起来。

在各处不抵抗的时候，突然，我们当地的驻军发动了抗敌的战争，在我们是极意外的。我们欢快得常常合抱着，已经忘记男女的性别。并且我们全校的学生分开了许多小组，每组有四五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到各机关，商店，街头……去募捐。男的握着几本簿子，女的提着许多纸做的花朵。募来的现款、东西，全部送到前线去，慰劳我们抗敌的将士。

我们寝室的同学，早早自动地起来了；肖苓却躺在床上，她不时地叫着：

“头痛啊，头痛啊！”

“不好些吗？”

这是在募捐之前，我特意来探视她一下。她半开露的眸子，已经不是平常那样活泼。她回答我说：

“不好，更痛了。”

“温度呢？”

她不说话，把我的手扯去，轻轻地放在她的前额上：她的手却起劲地压着我的手背，紧紧地贴着她的皮肉——仿佛怕我感觉不出她的温度来。我说：

“很热的，是的，很热的。”

她又把我的手移向被边去；可是被我抽缩回来。她用一种烦躁的声调说：

“你看看，人家的心跳得厉害呢！”

于是，我顺从着她，我的手停留在她的脸旁，任她去安放在什么地方。

“你的脸，怎么红啦？”

她指着我的脸，我更觉得脸火热了。

她把头藏进被边里，整理一下衣服，然后又把被边推落些，露出她健美的胸膛来。

我警告她：

“加小心，受风啊！”

“我不怕。”

她把我的手丢落在她胸膛上的时候，她问：

“厉害吧？”

“是的！”

我答应了她，我的手赶快地从她的胸膛上隔开了一些距离：“你这几天去医过吗？”

“没有！”

“怎么？”

“医生讨厌！”

“你应当少闹些孩子脾气，多看重些自己的身体。”

我站起身来，她问：

“走吗？”

“是的。”

“捐款去吗？”

“是的。”

我把手一摇，走开了。可是，我走出门的时候，又听见她的呼声：

“等等我，等等我！”

我再走到她的身边，看她已经披起外衣来。我问：“做什么？”

“我也去！”

“看病吗？”

“不，我要同你们一同去募捐！”

“你不能！”

“怎么不能？”

她一边说着，一边穿着鞋子。我叫她躺下，她不允许。又跑来几个女同学劝她，她也是同样不听。终于跟一个小组跑了一整天。

昨夜里，不停地咳嗽着，失眠了。

有几个同她要好的男同学，女同学，轮班地看护她。她在那惨淡的灯光下，手握着一个玻璃杯子，头下倾着，头发也伴随着垂落下来。一

阵咳嗽过后，自己敲打着胸脯喘息着对看护她的每个人说：

“你待我太好了，你睡觉去吧！”

没有一个人肯丢下她离开去。一直看护到她渐渐好了的那天——她可以从自己的寝室走到另一个寝室去，一次也不咳嗽。同时战事也紧张起来了。军队整天从街头经过着，辎重车跟随在后面。大商店已经停止了买卖，门扇和窗子都上了铁锁，每处全散布着哨兵，食指贴住枪枝的引铁，检查着行人；我们学生都是例外——因为我们左衣袖上都戴着红色的袖章。

终于在一天的夜里，我们的军队悄悄地退走了。我们疲倦的身子还睡在梦中。

“起来，起来！”

这样的呼声沿着我们寝室响亮着；接着，就是拳头击打着门扇的声音。

门开了，我们都穿好了衣服，张训育员不停地来去跑着，叫着：

“你们把自己的东西整理整理，最要紧的是书籍。除掉教科书以外，都抱到篮球场去。你们要听话！如果不听话，发生了意外，学校不负责任！”

淡淡的月光，铺满着地面。人影交叉的来去着，脚步的响声不断地在起落。篮球场是所有人的集中地方，四周牢牢地围着一层一层的人群，像往日等待着名手的篮球赛一样。

“散开呀！”

肖苓的叫声，由远处响过来。她的身子向两旁摇摆着，两手环抱着一个极大的书捆，问：

“放在哪里呀？”

我们给她闪开一条路，让她走进来，并且指给她看被我们围裹着一座书山。可是她仍是环抱着她的书捆；虽然她两手已经经不起那样的重量，发着抖索。

张训育员叫来一个校役，沿着书山的周边丢下几枝燃起的火柴。不久，便烧着了几处的火苗，渐渐地连成了一个火环向书山的顶端爬行着。

火焰伸缩着，张大着，把我们脸色染红了；我们仿佛等待着燃干了我们的血流，烧焦了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自己举行着火葬。

我们没有说话，动作也很简单——摸搓着手掌或是踏着脚。注视着火焰中的书本，书本上作者的名字：马克思，列宁，甘地，孙中山……渐渐地都变成被夜风飘走的纸灰。

肖苓呆立在我的身旁，仍是抱着她自己的书捆。我拉住她几条发丝，她的头随着我的手，转向了我。我说：

“丢进去吧！”

“不！”

“早晚不都是一样要烧的吗？”

“我等到最后！”

“那么你不好放下吗？”

于是她把书捆放下；她看看火苗不时地伸向她的书捆来，又移动了一下，让火苗接触不到她的书捆。

张训育员对校役说：

“快快，把国旗都找来！”

“你怎么不说‘读书救国’啦。”

肖苓好像把所有的怨气都吐露在这一句话里。张训育员只是长吁了一口气。肖苓还想说些什么，被同学突起的骚动打断了。

我们的眼睛全集中在一处——七八丈长的旗杆顶点像有一块模糊的彩霞飘落下来。

突然有几面国旗丢向火中去，肖苓立刻抢了一面，她用手摆动着，叫着：

“中国不亡！中国不亡！”

这叫声仿佛冲裂了我们每个人的每个毛孔，落着一滴一滴的鲜血。

“安静些！现在是多么危险的时候。”

张训育员的话，不但肖苓不听，而且我们的同学都伴着肖苓合叫起来。

这时候，我们的叫声传遍了世界，占有了世界。

没有天亮，我们的城市就发现了新样的军队，并且有一小队开进我们的学校。张训育员称他们是——“友军”；她叫女生搬出行李，把寝室借给“友军”住。女生却是野狗一样找寻着自己的住处。她们去问张训育员；张训育员却说：

“你们随便吧！”

我们男生看着她们有的哭着搬运着自己的行李，便一个一个地推开她们，我们男同学甘心代替着她们。

这种工作，从我们同学起，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男同学刚刚给她们搬完所有的东西；中断几天了的起床铃声，又响了，张训育员说：

“照常上课！”

可是我们拒绝了。

每天看着“友军”，在我们的院里一天比一天增多。各处都挤满着“友军”的炮车，马匹……校门前堆起两座防守的沙袋，设了岗兵。从那天起，校门便隔绝了我们的去路。“友军”允许我们走的只有一扇小小的后门，出入都有刺刀对着我们在受着严重的检查。女同学中除掉肖苓另外一两个人，几乎是整个星期留在校里，不出去一次。他们每天团集在一块儿悄悄地谈着些什么。肖苓却像我们的侦探一样，跑来跑去地给我们传布着消息：开走了多少兵，开来了多少兵或是又占用了我们的几个房间，占用了我们多少器具；或是其他一些什么话……

“张训育员来了！”

这又是肖苓在告诉我们。

“今天一定要照常上课了：不能再拖延一天！”

我们仍是拒绝着。她又说：

“这是‘友军’的命令，叫我们学生立刻恢复常态，并且要筹备一次慰劳‘友军’大会。”

于是我们第一小时就开始了慰劳“友军”大会中的一项课程。但是我们在教室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那个新来的教员便把张训育员找来。张训育员沿着我们的书桌，一个一个地检阅着，用笔记下缺席学生的名字。然后他扯去一把空闲的椅子在讲桌旁坐下，看守着我们。

那个新来的教员等待她说话。许久，她说了：

“在最近两天，你们一定要把‘新国歌’唱熟！”

然后新来的教员用手打着拍子，给唱过了一次简谱，又唱起歌词来——她唱一句，我们便随便哼一句。但是她唱到——……人民三千万，无苦无忧（“新国歌”中的一句歌词）……——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一同瘖哑下来。张训育员在讲桌上击了一掌，叫：

“怎么的？你们想怎么的？”

肖苓还给她一掌，在书桌上：

“你亡国奴，你走狗！”

“叫你一个人唱；你不唱不行！”

肖苓唱了：

“……人民三千万，如猪如狗……”

新来的教员，脸色红涨着，离去了我们。张训育员暴躁的气息，冲向着肖苓：

“这个消息传出去，你还想活吗？”

“我不活！我也不愿意做亡国奴！像你。”

但是，那天“友军”伤兵的病院，派来一个“曹长”（同我们军队中的下士一样）与张训育员“接洽”好了——我们学校派去五个女生，去看护伤兵。

那时候，我没有在校内，不知道我们五个女同学是怎样被“友军”抢去，威逼去；不过我知道其中有肖苓。我正想询问询问当时的情形，看见肖苓和另外四个同学已经冲进学校来；同时有大批的“友军”把我们学校包围了。

我们全体同学受了一次严格的检查之后，派去看护伤兵的那五个女同学的左胳膊被系在一条麻绳上了——同屠场中的牲畜一样，已经有两个人哭着，失去了声音。

一个“友军”的大尉愤怒地教训着张训育员。他的话是由他带来的翻译人的口中译出：

“你看看她们是什么样的学生！——”

张训育员规规矩矩地站着，她的身子抖索得那样的厉害，几乎要引起我们的抖索来。她点着头，做出笑脸：但是她的皮肉异常死板，没有微动一下；只是裂开嘴，裂出一条纯白的牙齿来。

“——叫她们去看护伤兵；是叫她们谋害伤兵吗？”

“怎么？”

“有一个伤兵被打了一茶杯，脸都打破啦！”

“谁呢？”

“我正要问你是谁？”

张训育员转过头来问她们：

“谁？”

“我！”

肖苓答应了。于是她被“友军”的大尉抓着衣领，扯到我们的储藏室去，门前多添了一个岗兵。

我们同学天天想去探视肖苓，“友军”没有允许过一次。不过每天可以去送一次吃食的东西，除开水果外，要由岗兵慎重地检查一下，再

转给她，有一次岗兵从米饭里检查出一枝短短的蜡笔，他告发了，便停止了三天给肖苓送东西，后来，有两个聪明的女同学，想出了方法：剪了一条纸条，写了我们所要对肖苓说的话，搓成细细的小卷，同一枝小铅笔头，从香蕉有黑斑的地方插进去，在果皮上辨识不出丝毫的破绽来。不久，岗兵对我们说：肖苓吃不了的香蕉又还给我们。我们在香蕉里查出了同样的纸卷（是从我们包水果用的纸张撕裂下来的），有小小的几个字迹：

“同学们，我感谢你们照顾我，你们也可以来看我，只要在夜深两点钟，岗兵睡的时候。”

于是我们有许多同学看过她了。

一天我也决定去看她一次，便一直等到夜深两点钟。

天上没有星星和月亮。几个浸透灯火的窗子，也只是染黄了窗沿，窗沿下一块小小的地方。

已经是初冬了，雪花在黑暗中偷偷地飘落着，地上积满了一层雪面。

四处没有一点的音响。“友军”正安安静静睡着好觉；也许校门外的岗兵还在清醒着。

我拖着轻悄的步子，沿着楼房的墙壁摸索着，一步一步地踏破了完整的雪面。

在楼房的转角处，我停下来，听一听，仍是一点没有音响。于是我注视一下面前的窗子，有半面窗扇张开着，堵塞着望不尽的一团浓黑。我起劲地扬起手来，抓住了窗上交组着的一条铁条。我悄悄地拖长着叫着：

“肖——苓！”

“啊！”

“你好！”

“谢谢你，你是谁？”

“你听不出来吗？”

“啊！啊！我要摸摸你的手！”

于是我把手伸进窗去，她用两手握住了，极力向她的怀里拖扯着，几乎拖掉了我的手指——因为窗沿隔开我们有一尺多的距离。

我所要问她的话，全忘记了。我想了想，仿佛是要给她买些食品；所以我说：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办到！”

但是她说的话是：

“我要出去！”

两个月后，我们院内走出了个瘦弱的姑娘，两手与脸孔生满着一层一层的疥疮……我们已经记不起她就是以前的肖苓。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农家姑娘

我们走了几百里的行程，作了两昼夜的苦战，终于在一处击败了敌军。而且我们为了追击他们，又过了一天的工夫，走过好多的乡村。可是，最后我们疲倦了、饥饿了。于是，我们的全部队伍开入一个大的乡

村停下了。

这里，有好几十家住户；不过，没有一家蓄着猪，或是马；只有一家地主养着一匹小驴。据说他们完全困在战争的贫穷中，没有食粮，几乎吃尽了春耕的粮种。

我们呢，虽然是胜利了；但是那种兴奋、快感，也只能稍稍解除些我们的疲倦，却解除不了我们的饥饿；所以除去负有勤务之外的人员，完全散开了，七八人一群，三五人一群，也有一两人的，自动地去找自己的吃食。我看看附近的几家大院，已经住满了我们这些饿狼，在争抢着地主的那匹小驴，我便偷偷地离去他们，一个人独自走开了。

冬末的天气，是最冷的时候，天色苍白着，散尽了异样的云块；有的，只是淡黑的几团，也很快地被暴风卷去了，没入了天边。地上蒙起厚厚的雪面，常常随暴风飞散着，像一片白色的烟雾，隔绝着投开的视线。四处交叉着几条雪路；在很远的地方，集中了一条，爬过了山脊。路旁堆聚着农家的小房，一家连一家，好像连成了被雪埋了的一条极大的土垄。我沿着那些小房走着；经过每一家，我都停留一下，从门缝，或是从破了窗纸的窗孔探视一下，都是同样的死静，仿佛是完全没有人住的空房。我快走尽了这条路，已经快走上了山脊，也没有看见一个人。于是，我又转回来；因为我不相信每家都没有人——每家门前不都是有着一一条一条的雪路吗？

“有人吗？”

我用拳头敲响了几家的门，都没有人回答我。我走开了又继续着叫另一家的门。

“有人吗？”

同样地没有人回答我；可是我走后在无意中转过头的时候，却看见了一个姑娘，她的头从展开些的门缝间探出来，我正想叫她，她立刻又缩回去，门缝随着关闭了。在那短短的一刻中，她给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她整幅的面影。最使我难忘的，是她那垂过耳边的发辫，发尾的红绳，还有她那最动人的眼睛，像一对小宝石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开门！”

我叫着，门牢牢地关闭着。房内仍是同样的死静，仿佛是没有住人的空房。我认错了门吗？我相信自己记得很清楚；于是我用枪柄打起门来：

“有人——出来！”

仍是没有人回答我；那么，我看见的那个姑娘呢？

我气愤了的时候，门被我踢裂了，开了。

房内确是没有我看见的那个姑娘；我寻遍了每处，只有一个老妇人在炕上躺着，她见了我便呻吟起来——她似乎在告诉我她有沉重的疾病。我问她：

“只有你一个人吗？”

她不说话；只是向我点点头，表示除她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我奇怪了，便自动地再做一次寻找。

房内很暗的，混着一种雾色，使我的眼睛遮了一层轻纱，使我飘在云里一样，摸索着；终于在石磨下看见了一个模糊的人影，面孔被埋手掌里。我暴叫着：

“起来！”

不做声，是谁呢？当我发现了一条发辫的辫绳，我便确定了是我看见的那个姑娘；虽然她的辫绳在暗中退淡了原有的红色。我不耐烦地说：

“起来吧！”

她听见我的呼声，便更加紧紧地拘缩起来——仿佛要缩成在我眼中去的一点；所以我说：

“我已经看见你了，姑娘！”

她受惊似地哭了，站起了。我看她一下，我感到很大的恐慌，退后了几步；她不是我看见的那个姑娘，我也分辨不出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她脸上涂满着的柴灰，掩遮了她的年岁、她的美丑；我要叫她是魔鬼。

“你是谁？”

我问她；她抖起来，声音也随她抖着：

“我是我。”

“我要知道，你家里有几个人。”

“两个人。”

“哪两个人？都是谁？”

“我同我的母亲。”

“再没有第三个人吗？”

“没有。”

我不相信她的话了，又寻了一次；是的，再没有找出另外的一个人来。我问她：

“你说真话，再没有第三个人吗？”

“真的没有！”

“那么，我才看见的那个姑娘呢？”

“就是我！”

我立刻把她扯到门边来，让透入的阳光落在她的脸上；我注视着：

“是你？”

她似乎有着几分难为情的神色，垂下头去。不过，从她那动人的眼睛和红色的辫绳，已经证实了——她就是我看见的那个姑娘，我便问了她：

“你的脸上怎么满了柴灰呢？”

她避开我的问话，她又在问我：

“你不是××人吗？”

“你没有听见我说的是中国话吗？”

“真的，不是××人吗？”

“真的，他们退了。”

于是她洗净了脸，恢复了我记忆中那副面影。

这时候，我还有许多话要问她要问她的母亲，可是饥饿却逼迫我说：

“姑娘，你给我找些吃的东西吧。”

“吃的东西？”

“是的。”

“吃什么呢？”

“什么都好。”

“什么都没有了。”

“啊。”

“还有点大豆，你可以吃吗？”

我没有同意，她要到她的邻家为我借些米来；我随在她的身后：在她刚要走进的那家，我阻止了她：

“这家没有人。”

“你怎么知道？”

“我才在这家叫了许久的门，都没有人答应！”

她推着我，让我离她远些。我听她敲了几声门，向门里喊着：

“出来吧；进来的是中国兵。”

有人答应了她，不过没有借到一粒米。

我又随她走了几家，几家都有人，有的是残缺者，有的是老太婆，姑娘呢，脸上都涂了柴灰。当她说到借米的时候，她们都是把两手一张，做了无法的表示。于是我们一直走到最后的一家，她的衣襟里，才蓄了几把异样的米粒。我们走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每家门里有人走出走入，仍是那些残缺者，老太婆，不过姑娘都换了洁净的面孔，偷看着我们两人的背影；于是她推开我的身子说：

“你离我远些走！”

可是到了家的时候，她却不再拒绝我靠近她的身边。她在小泥炉里燃起荒草，燃着炉上的小铁锅。火苗伸缩着，诱她烤起手来。她转过头，看我在注视她；她避开了，向炉里送入一束荒草，很快地燃成了灰烬，她又送入了第二束，第三束……。锅水开了，滚着泡沫，滚落了锅盖；可是，米粒还没完全熟透，随着泡沫滚转来，滚转去……。

她的母亲，仍是呻吟着，自语着一些不清楚的话声，给人一种凄感的想念。

暴风在门外卷着积雪，卷成耸起的雪柱，旋转着移开去；也许从破裂的门缝冲进屋来，又从我的破裂的衣缝冲进我的衣里，使我冷得抖索起来。我跳动了几下，我说：

“真冷啊！”

她有些怨意地说：

“谁叫你把门踢坏啦？”

“谁叫你不给我开门呢！”

随着我又说起她同她的母亲不应那样冷待我，让我在门前空空地走过了两次，也不应欺骗我……她怒视我一眼，却又淡淡地笑了：

“谁知道你是中国人啊！”

这时候，我有了另一种感觉——是忏悔吗？我悄悄去修理被、我踢裂的门扇，合拢着几条裂缝；然而我不是匠人，并且也没有适用的器具，只是任随我两只蠢笨的手，很难再恢复原有的完好的门扇；我终于叹息一声，好像让一件罪恶的影子，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她不明白我；所以她问：

“你忧愁吗？”

“不。”

“那么——”

“噢噢，我太冷啊！”

她摸摸我破裂的衣缝，已经露出了皮肉，于是她跑开了，为我找来一只垂有线绳的针。我故意问她：

“做什么？”

“我给你缝缝呀！”

——她是要用她更多的善良，换取我更大的忏悔吧？——我在这样想着，在自语着：

“痛啊——心痛！”

她立刻把针停住，问我：

“针碰了你的肉吗？”

我摇了摇头。

“那你痛什么？”

我默默地代她向炉里送着荒草，米粒熟透了，有的已经破了。她快地给我缝好了衣缝；我说：

“好妹妹，我谢谢你！”

我拍拍她的肩，她气愤地打开我的手，让一种少女的羞红，浸满着她的脸颊：

“谁是你的妹妹？”

“那么又能称你什么呢？——好吧，我只说谢谢你！”

两天以后，我们很熟了。我除去每天分担防守的勤务之外，所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她的家里；夜里，就宿在她家的地下——因为她家只有一段短炕，被她同她的母亲占有着。为了住宿的不便，我曾找过几次的新址；可是没有一块适当的处所；我的伙伴，许多都住在马棚里，或是仓房里；就她的邻家，也没有一家不是做了我们临时的宿舍；所以我只有勉强地挨过这可怕的长夜。

那天夜里的暴风，是疯狂了吧？那种怪叫的声响，会使人疑心是兽鸣，不住地包围着房屋，让那般的冰冷透入我每条的血流里。我翻转着，在地下不能睡去——虽然夜已经深了。我悄悄地爬起来，集拢了几捆荒草，铺在地上，遮在我的身上；可是荒草却不给我一丝的温暖，我仍没有一丝睡意。

月亮的幽光，染了窗纸，从窗边冲过的暴风卷着雪花让窗纸上浮荡着一种飞沙的淡影。在远远的地方，常有喊叫口令的声音，透进窗里。我的眼睛，疲倦了；可是，我仍在清醒着，把身体尽量地缩成一团。最后，那种难受的苦痛，使我站起了，在地上踱起小步子来。

“你不睡吗？”

她模糊的头影，从枕边扬起，问了我。我的两手交叉在两肩上，抖索着说：

“冰窖一样！”

“那你上炕来睡吧。”

“那怎么可以呢？”

“我把你当哥哥看待吧！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那么可以允许我叫你——妹妹吗？”

她笑了；从我认识她起，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了她的笑声。

可是她的母亲，加重了呻吟声；好像为我在做着催眠歌。我在温暖的炕上，经过了一夜舒适的睡眠；她的母亲，就在夜里悄悄地死去了；

而且村外遭了敌人的包围。

太阳刚刚爬过了山脊，我已经听见了紧急集合的号令；所以我没有多余的工夫照顾死者和安慰她。我只说：

“谢谢你——你待我的好心；现在我要走了。”

她抿着唇，眼里饱蓄着泪水；她刚要说话；泪水便被震落了。因此，她又沉默了一刻，才说：

“现在我只有一个人了……”

这时候，我也好像替她分受了孤独之苦；可是我说：“没什么，你在家好好地生活吧！”

“不，我怕××人。”

“那么，你跟我去吧！”

“不，我怕打仗。”

我陷于两难之间了，我只好这样说：

“怎样都好，就是不要怕！”

我说完话，立刻离去了她，随着我们的大队破了敌军的包围。

不知敌军又加多了多少援队；只听见四外的枪声，向我们的身上集中着。还有许多农家的小房遭了炮轰，燃起了火焰，冲向明朗的天空去，浓黑的烟气，却绕着我们的身边，模糊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完整的队伍，不时地陷入了缺口——我们的伙伴伤了，死了；余下我们没有死伤的伙伴，冲开了敌军包围的一面，一直冲出了二十里地以外。敌军的枪声远了些；仍是向我们射来。我的马喘息了，步子渐渐减慢下来；突然我听见有人在身后呼唤着我：

“等等我吧！”

是她；她的脸上又涂满了柴灰，短的衣袖露出了一段赤裸的手腕；裤脚一条紧束着腿带，另一条散开着，疯子一样向我奔来，红色的辫绳在风里飘成一条直线。

我勒住了缰绳，待她跑近我的身边的时候，我看见她仅有的一条绳带松懈着开了，随着裤脚落下了几滴血；我第一句话对她说的就是：

“你伤了！”

于是她痴人一般地倒在雪地上了。我不顾一切地下了马，扶她起来：可是她已经没有再起的力量；而且在自语：

“是的，我伤了。”

我为她检视着伤处，翻卷着她的裤脚；在我已经卷到膝头的时候，也没检出伤处来，只有几条血污染了她的皮肤。因为我要知道她伤的轻重，想把裤脚卷过伤处之上；可是我又卷上大腿，也没露出血流的尽头。不过我已默认了她的伤处，是在股部的地方。

“我的伤，重不重？”她问我。

一个男人既不便解落一个女人的裤子——我怎么能确定她怎样的伤痕呢？

幸亏有我的一个年老伙伴，为了照顾我，他回来，下了马，向她嗅嗅之后，让一种特有的表情，说明她并没受伤，那是健康女人每月所必流一次的鲜血，这样我才安心了，她却在恐怖的脸上，加多了一层羞红。

然而，在下午，敌军截断我们去路的时候她确实受伤了，腹部遭了弹击，衣上遗下了一个小小的弹孔；孔边透过了衣里的棉花。我说她伤

了；可是她却反驳我说：

“没有！”

我们又奔出几里以外，我把她的伤处指给了她，她自己检视了许久，才确认自己已经快流尽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滴血。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战 地

我们的大部队从前线退却下来，一个人一个人地零散了；渐渐地又一个人一个人地集起了我们二十几个人。其中只有两个人相伴着，没有离开过一刻；一个是刘平，另一个是姚中，他们两个人比起我们来还都年轻些，他们是几年的同学，几年的朋友，直到现在，没有过一次的别离，不是他随着他，便是他伴着他，他们互相地照顾着，仿佛是一对最有好感的弟兄。

在前线三四十里地以外，我们休息下来，要在几分钟内决定一个最大的问题。

“怎么办呢？”

——这就是说：我们是继续抗敌呢？或是各自逃命去呢？

“怎么办呢？”

我们每个人都说着；却没有一个人来回答。可是后边敌人追逐着我们的流弹，不容许我们再多迟延一刻。

“我主张我们一直战到死！”

刘平暴叫的声音，几乎冲破了他的喉咙。姚中为了拥护他的主张，伸出一只拳头来：

“赞成！”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赞成了。我们决定退到二三十里远的黑岭去。那里有一条高起的山脊、森林，做我们的防地；并且有几户农家供给我们一些粮食。

春天了。

山间的小溪、河流，所有的水面都划开了蛛网般的裂纹，一条交组着一条，一条横断着一条；其中没有一条是完整的，挺直的，从一端可以望见另一端的；每条裂纹在太阳下渐渐地隔开了距离，涌出水丝来，浅浅的一层浮在冰面上，没有遮住原有的裂痕。我们提高了缰绳，让马头高昂着，望不见冰面；悄悄地从冰面上走过去。

田垄上，还没有撒下种子，也没有走过牛犁；我们仍没有看哪里是春天的景色；所有的，也只是很少的、野草的绿苗，突破了地面，一小丛一小丛地裹着一些没花的蒲公英的小叶。

然而春天可怕的泥泞却满了，阻塞了每条山路，荒草中的小径，深下一寸、两寸，有的竟有一尺；不管任何的地方，都是一样难走。我们就是在那种难走的泥泞中骑着马，奔驰着，从早晨快近黄昏了，没有舒展一下我们的身体，也没有吃饭；并且我们二十几个人，每人的身上都有几十斤的重量：一条毯子，一枝步枪，或是一枝马枪，二三百粒的枪弹……另外还有一架轻机关枪背在刘平的肩上，两箱弹粒系在姚中的马鞍两边。

我鞭打一下马股，追上了刘平与姚中，我问：

“你们累了。吧？”

“不！”

我知道他们最好刚强，尤其是刘平，所以我又向姚中说：

“弹箱太累了你。”

“不！”

“也累了马啊！”

“不！”

我再向刘平说：

“换我来背机关枪吧！”

“不！”

“累坏了你！”

这好像鄙视了他，欺辱了他，他比姚中更严厉地拒绝了我；虽然他终于是喘息了，头上流着汗水。

敌人在追随我们；流云追随着太阳西去了。太阳没了，流云留在天边。由一条延开一片，染了一层新鲜的红色，渐渐地淡没了；可是敌人仍在追随着我们。

地上的光色，由明亮已经转到模糊，我们牢牢地探视着我们的去路。

马蹄疲倦了，艰难地从泥泞中拖出，一下一下地走着。这时候我们的马鞭已经失掉了尊严。

突然姚中的马倒了，他从马鞍上滚落下来，脸孔恰好触着了地面，涂满了泥水；他用手摸擦几下，才露出他的眼睛、鼻孔、滴着泥水的唇边。

我们都停下了，等着他上马。但是马安静地躺在泥泞中；虽然他一面鞭抽着，一面在吆喝：

“起来，起来！”

我看马渐渐地伸直了四蹄，眼睛已经闭紧了；我说：

“完了，完了！”

他仍是鞭抽着；马一动也不动。

“马快死了！”

刘平说完，我又说：

“已经死了！”

我的话激起了他的忧郁来：

“死了？”

刘平从马上下来，他安慰着姚中：

“不要紧！”

“那我骑什么？”

“你骑我的。”

“你呢？”

刘平想了想：

“我走路。”

他仍是留恋着他的马，伸出一只手来，贴住了马鼻：“也许还没死吧？”

刘平给他指了一下背后，意思是说敌人近了。可是他继续问着自己：

“也许还没有死吧？”

刘平突然从腰带间抽出了匣枪，向马头放了一弹；然后他问姚中：

“你看看，还没死吗？”

姚中垂着头默然了，从马鞍上解下了弹箱，移到我的马上来。我们又继续起我们未尽的路程，死马渐渐地离我们远了。刘平拖着自己的马的缰绳，姚中随在马后；他们步行着，也并不比我们骑马的人慢些。

黑岭近了的时候，敌人也追近了我们，好像就在我们的背后。弹粒从我们身边飞过去，一刻比一刻加紧起来。我们的马鞭交响着，马拚命地向前冲去。在我不注意中，看见我们的一个伙伴中了弹粒落下去；我立刻又听见姚中说：

“救救他！”

“快跑吧！”

——这是刘平的回声，我也听见了。

我转过头来，看见他们两人，落在我的背后，有七八步远，两人正在谦让着一匹马。我的两只手合拢起来，在唇边做个号筒，向他们放高了声音：

“快来，快来！”

敌人的影子在远处张大着，我用手指指着：

“你们看！”

刘平向远处注视了一下，从肩上脱下了轻机关枪，我跑回来解下了弹药箱。其他的伙伴都下了马；所有马的缰绳，分开交给两个人手里。我们各自拣了一块地方躺下了。我、刘平、姚中，三个人是在一处，因为我们不十分熟练使用的缘故，他们两人看管轻机关枪，我整理着弹带。并且这里也不是我适当的战地，完全是一片原野。

我们的轻机关枪响了，敌人的骑队划开了包围我们的队形；同时，也向我们射击着。

“呀……呀！”

我们的一个伙伴中了枪弹叫了一声。

高空中散开了层层的黑雾，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姚中正在瞄视的时候，他同样地叫了一声：

“呀……呀！”

他的头落进泥水中去，前胸与后背，被枪弹穿透了一个细孔，流着血滴。

敌人近了。

我回转头；我们的伙伴已经骑上马了，奔开了，我的背后散开着两匹马，寻找它们的主人——我与刘平。

刘平扯住了我的肩：

“逃吧！”

于是我拖起了弹箱，他拖姚中，又摸了一下轻机关枪；最后仍是背起了轻机关枪。他刚刚抛开了一只脚，另一只脚却留在原地——姚中的两只手握住了他的脚腕：

“刘平！”

“啊！”

“你要逃吗？”

“啊！”

“我呢？”

“你让我做俘虏吗？”

“……”

“我们有再见的一天吗？”

“我们永别了！”

——刘平从腰带间抽出匣枪来，向姚中的头上连续地开了四枪。

然后我们骑马逃了。我的脑里没有忘记姚中的血迹模糊的面孔；虽然战地的惊恐在威胁着我。

渐渐地我们追上小张与老赵两个落后的伙伴。

天黑了，月亮把我们的影子印在地上，像四个迷途的伙伴，互相地交换着眼色。

敌人追随我们的流弹息下了，我们的马蹄也减低了速度。渐渐地我们看见了黑岭的近景：一条无边际的山岭，中间断开了一条路口，很小的，补塞着一块深灰的远天。

当我们穿过一条桦林的时候，我们仿佛误入了可怕的地穴里；地下的积雪，还没有化开，马蹄踏下去，有一种轻微的回响；四周尽是桦树的树干，脱开了白皮，露着异色的斑痕，很多的一枝靠近一枝，挺直着，直冲到天空，落尽了叶子的树枝，开散着，交叉着，把天面隔成了杂样的碎块，漏下了一缕一缕的月光，照着我们的去路。

“他们哪儿去了？”

我们互相地问着，没有谁知道。

我们走出了桦林，一片林影遮蔽了我们；可是黑岭的山口就在我们的面前了。

突然，我们听见了两处交换的枪声；一处是山脊我们伙伴的，一处是山外一二里地远敌人的。

“快啊，快啊！”

刘平喊着。

但是山脊也被林影遮蔽着，我没有看见伙伴的影子；所以我问他：

“他们在哪里呢？”

“快啊，快啊！”

这时候山脊上的伙伴误认了我们，传来了高声的叫喊：

“敌人上来了！”

随着向我们开放了几枪，中在两个人身上——小张与刘平。我们喊了：

“不是，是我们！”

那已经迟了，小张死了，刘平受了重伤；不过他还明白；可以说出他所要说的话：

“你们去吧……去帮助他们守住黑岭，哪管守住一夜也好啊，你们找点饭吃好再逃啊，再打啊……你们两人快把我身上的枪和子弹解下来，去吧！”

“你呢？”我问。

“你……你忘记了我吧！”

然而，我与老赵不允许他。我从背上解下了毯子，我们两人每人扯住两个毯角，拖着他。

在林影下，我看不见他变成了怎样的面孔：是惨白，或是红涨；只听他说着：

“放下我！”

两处的枪声更加激烈起来，并且敌方发出了炮弹，拖着一条火线，向山脊落去。

于是刘平在毯上，更加挣脱起来：

“你们去吧！”

我气愤了，也严厉了：

“你要投降吗？”

“不！”

“你要做敌人的俘虏吗？”

“不！”

“那你想怎么的？”

“我受伤了，完了……这种时候，我为什么要两个人帮我一个已经没有用了的人呢？你们两个人在斗争中不是很有用处的吗？”“这里，不是容许我们救你吗？”

“救？忘记了我吧！总是免不了死。”

“你不是还没有死吗？我们怎能忘记你呢？如果是小张那样，我们就不救啦，也就忘记你啦。”

他手抖索了几下，从胸脯摸到腰间；他嘱咐着我：

“忘记了我吧……可不要忘记了我身上的枪和子弹！”

他说完了，很快地从腰带间抽出了匣枪，向自己的头上放了一弹。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孤 儿

在我看见那红色楼房的时候，我的脑里重现了一幕记忆：我同友人曹维走出了红色楼房的门外，他的儿子小村追着他，并且扯住了他的衣角哭了：

“爸爸……”“好孩子！”

“爸爸，你上哪去？”

“我出去一次。”

“不……，不许你走！”

小村只有六七岁，他还不明白他父亲要离开他的原因，是为了守护他的祖国从军去的；所以他紧握着他父亲的衣角，终不肯放开小拳头。

曹维最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才哄好他，送到他母亲的怀里去，仍在哄着他：

“你等着我吧！”

于是我们走了，到现在，已经快整整的一年；想象着好像是昨天一样——在我看见那红色楼房的时候。

楼角比一年前老旧了些，已经褪淡了原有的鲜红颜色；并且有砖块倾落下来，碎了，堆积在阴湿的墙根下，一堆一堆地散着，仿佛许久没有人打扫过一次，只是让风随意吹散着，迷着我的眼睛。

我敲打着门，门内没有一声的回响，也听不见有脚步声。我想也许是搬家了吗？那么楼窗的窗幔怎么仍是我所熟识的呢？我再敲响着门，门内仍是一样的静悄。我为了必要的任务，当日还要回到军队去，所以没有多余的工夫；并且到曹维的家来，也只是探望一下，传达一下曹维的消息。于是，我自动地推动着门。门没有锁，开了；我走进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搬家前后的情况：在过道上，堆满着椅子、绳套、

细碎的纸张、孩子的玩具……。

“有人吗？”

我问着，敲遍了所有的四五个房间，都没有人回答我。我想，家人都出去玩了吗？可是时间也太早，最多也不过是早晨八点钟并且，曹维的父亲母亲……总共六七个人，怎么能完全走开呢？就是完全走开，也要有仆人留在家里的吧！

这时候，我的脑里，起了许多意外的想象；最主要的，我担心着“友军”发觉了我，逮捕了我。因此我决定离开，不想再在曹家见到谁，但是我刚走出门去，就遇见了老仆妇从菜场上买菜回来，她看见我，眼角下垂落了两滴泪水，嘴角抽动着，仿佛有许多话，是要向我倾吐的。

她牵着我的衣袖，把我引到一个房间去，她匆忙地走了，——意思是为我取茶去。

这个房间是仆人住的，每处都很简陋，我找一把椅子坐下也没有；我因为太疲倦的缘故，便随便坐了仆人的木床。床上的被还没有叠好，被里正熟睡着一个孩子；眼睛与脸颊，全陷入骨里去，他那种脸色，是病态中所有的，没有一丝健康的精神。我转着头，望了他许久，无意中间了：

“小村吗？”

他在安适的睡眠中，被我的手掌轻轻地拍了两下：

“小村吗？”

他只是翻转了一下身子，把小拳头丢在枕旁，我便确定了他是小村。

于是，我唤醒了，他，他怅望着我，望了许久，仿佛才记起了我仍是他所认识的人——同他父亲从军去的伙伴。然后他赤裸地跳起，扑到我的怀里来问：

“爸爸呢？”

这一句问话，使我感到无限的苦痛，没有他所满意的话来回答他；所以我只有把他引入另一种谈话中去，我问：

“你的妈妈呢？”

“找爸爸去啦。”

我们行军的路线，时时刻刻守着秘密的，不仅外人无从探悉，就是我们内部的一般人也很少知道。小村的母亲真的是找她丈夫去了吗？她不会的，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那么我能不奇怪小村的话吗？当他很严肃地说出的时候。

于是我又重问他一句：

“你的妈妈呢？”

“找爸爸去啦！”

“去几天了？”

“三天啦。”

“三天啦？”

“不，算今天四天啦。”

“到什么地方去找？”

“不知道。”

“几天回来？”

“也不知道。”

我不想再多问他些什么；可是老仆人也没回来，只有再问他一次：

“你的爷爷呢？”

“跟她去啦。”

“奶奶呢？”

“也跟她去啦。”

“怎么都去啦？”

“不去不行嘛，还是绑着去的呢！”

老仆人给我送一杯茶来，用一种暗示的眼色唤出我去。我从她的话中，才明白了，原是“友军”查出了曹维从军的事情，捕去了他的家人，可是她为了哄着小村，便骗了他。

我预定是要立刻走开的；但是老仆人留我吃早饭。而且我自：已也很留恋小村，这个孤儿。

他自己从床角找到衣服、袜子，穿起来，跳下地去，在大脸盆旁，起劲地伸高两只小手，勉强伸入盆里，向脸上贴了几次水：然后又用一条手巾拭去，结果脸上好像更多了几条泪痕，并不比没洗脸时净些。

我看他的书包、书本，散乱地堆在地下，我问他：

“你不上学吗？”

他让眼睛向我放大些，仿佛把我看做了小孩子一样：

“谁还念亡国奴的书！妈妈早就不要我上学啦。”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他跑开了。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一把木刀，向我比量着，尽量地凸出他的胸脯说：

“我要打仗去！”

“不怕吗？”

“谁怕谁？”

“好，小村真英雄！”

我赞扬他，使他笑出声来。

然而在吃饭的时候，我同老仆人悄悄地谈着他的问题，他却常常插进一两句话来，脸上也露出了一些焦虑；于是我们便不再提起他的名字，只说“他”。

“把他寄养在哪里呢？”

我踌躇着，终于想不出适当的办法。老仆人也是同样的没有办法，只是：

“你回去的时候，叫他的爸爸立刻回来。”

——“爸爸”这两个字，使小村丢开了饭碗，又扑到我的怀里来，他问我：

“谁的爸爸？”

“别人的。”

“那，我的爸爸呢？”

“你告诉他，我等着他呢！”

告诉谁？他已经在半年前战死了。

——可是我没有说出来。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秘密的旅途

中东铁路哈绥线的火车，开到绥芬河站的时候，每辆车门在前五分钟，已经锁闭了，所有的乘客都在等候着检查。由护路军与路警组成的一批人，开放车门，走进车去检视着外国乘客的护照和搜查着中国乘客的行囊，有时候他们很快的一刻便尽了职责；他们经过的车辆，乘客就可以随意地出入了。有时候，他们发现了可疑的人，便要这样地诘问：

“你叫什么名字？”

“王之民。”

王之民是一个青年，他的年龄，最多也不过二十五岁；头发很长，也很乱，仿佛有了长久的时期，没有经过修剪，穿了一件棉袍，有几处破出了棉花，有几处也经过不熟练的手工缝补，每针的线段，没有保持着均等的距离，而且他的身量又不相称，衣袖几乎长过了他的手指。像他这样的人，任谁也难向他消去猜疑；所以护路军、路警搜查他的时候，都不肯放过他，检视了他的行囊，又检视了他的每个衣袋，甚至要撕裂他的棉袍，拖出袍内的棉花来。可是，在他的行囊中，衣袋里，并没有检出任何的物件。不过，仍不肯放过他，还在严厉地诘问他：

“从什么地方来？”

“哈尔滨。”

“往什么地方去？”

“东宁。”

“东宁？”

“是的。”

“喂，你是私自去苏联的吗？”

王之民很自然地扬高了头，很自然地做了一下手势，仿佛以他最坦白的心境说：

“不是的；我家在东宁。”

“你家是做什么的？”

“种田”

“你是做什么的？”

“学生。”

“既是学生怎样可以随便回家呢？”

“现在不是放寒假吗？”

“……”

“……”

王之民终于被检查完了，终于到了东宁。可是他在东宁没有家庭，也没有友人，他投入了一家叫东平栈的旅店。在旅店留宿的客人，都要在店簿上写明自己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事由。他也同样地写了；赵列天，哈尔滨人，现年二十一岁，学生，访友。

东平栈是很大的车店，有旷大的院场，有长列的房屋；泥草的墙壁，纸的窗子。这里的主人，是一个胖胖的老妇，她经年留宿着过路的载重车辆，或是过路的农家旅客，同时，她还有一种秘密的生意，是这样：偷偷地把王之民推进她的房屋去，给他倒满一杯茶。她问：

“出国吗？”

“是的。”

王之民心里还跳动了几下，有些疑惑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出国呢？”

“你看看我的眼睛！”

她把头送近他，让眼睛闪动了几下，意思是在表示她的眼睛是如何的明亮，如何善于辨识着旅客。

王之民笑了，他说：

“我以为不知要费多少事；你的眼睛太好了。”

“先生，我就是凭着眼睛吃饭呢！”

“那么你的眼睛比金子还要高贵！”

“少说些吧，我也是凭着头吃饭呢！”

“怎么？”

“不知道哪天让人家告发了，我就遭祸了，这不是凭着头吃饭吗？”

“你怕吗？”

“怕？哼，怕什么，为了生活。”

最后，她问：

“先生，你哪天走？”

“最快才好。”

于是她立刻找来一个姑娘。王之民惊奇着问：

“没有男人吗？”

“先生，少说些吧，是走的时候了！”

夜了。

院内，有几间马棚系满了马群。靠近墙边的地方，停放着车辆，被豆袋集起的影子，仿佛是一列模糊的土丘。守院人提着灯火，随处徘徊着。车辆的主人，在温暖的土炕上，已经响起了甜蜜的鼾声。

王之民整理好了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包裹，其余的，便丢给了东平栈的主人，又问：

“多少钱？”

“先生，随便你吧。”

王之民从六页五元的钞票中，拖出了五页给她；她谢了他，并且嘱咐了她找来的那个姑娘怎样照顾着这位旅客，使他在旅途上安心些。

夜深了。

这个小城市，完全睡熟了，死般的寂静，充满着每处，没有任何的声音，骚扰着熟睡者的梦境。

这时候，东平栈的主人用许多的好话送别了王之民，使他伴随她找来的那个姑娘走去。

天上满着明亮的月光，没有被走过的云块遮过一刻，雪路披着月光，异常明亮，遗下的黑影有着清晰的轮廓。不过寒风不住地冲来，冲去，搜取着雪路上的积雪冲向远边去。

他们两人默默地走着，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有时，只是相望一下，然后，便避开去。

在临尽街边的时候，姑娘终于说话了：

“先生，如果有人指问我们，你要说我是你的妹妹。”

“你姓什么？”

“你姓什么，我便姓什么。”

“聪明的姑娘！”

王之民一面低声地自语着，一面减慢着步子，留在她的身后，注视着她：黑色的发辫，黑色的短袄短裤，短的毡靴，黑色的影子，随着她的步子移动。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兰。”

“小兰？”

“是啦，这不是你所要知道的！”

“我要知道的是什么？”

“是什么？如果有人指问我们做什么去呢？”

“做什么去呢？”

“你就说，去找我们丢了的羊羔！”

“说丢了牛不好吗？”

“随便你吧！”

街路的近边。连着无边际的雪场，日久的积雪，已经加高一二尺的地面，由行人踏开的小路有三四条割断着雪场，深深地陷入雪中，望开去，仿佛在纯白的雪场上，被人染了几条黑线，也仿佛是被人分割了的一块白银的世界。四处没有一株老树，没有一条艳丽的色调，所有的只是一些凸起的雪包——不知那是被雪遮埋了的草堆，还是失去了主人的坟墓？

城市的灯光远了，淡了。

他们走着，身边的景物，渐渐地离远了他们，只余下了天边的环形绕裹着他们，月亮投落雪场上的光辉，不住地诱着他们的眼睛，为他们在跳动着小小的银星。

“这边走！”

小兰引着王之民从雪场上转了去向，走过了一条小小的冰流，渐渐地走入一列丛林中。小兰的嘴唇，送近王之民的耳边，仿佛是一对情人要开始密语了，她说：

“站下。”

然后她又说：

“蹲下。”

于是王之民站下了，又蹲下了，他的身体随着没人了的雪面，只让他的头留在雪面上，望着落尽了叶子的小枝，在他眼前组成着蛛网一样。他问小兰：

“你要往哪去？”

“不许你说话，这里是最难走的地方！”

“怎么？”

“有岗兵！”

“中国的吗？”

“那么你以为到苏联了吗？”

她自己几乎笑了，悄悄地又走开了几步，伸长着脖颈，从丛林中探视着外面，然后她好像命令着他说：

“快走！”

两个像两匹小兔一样，窜出丛林，窜向远方去。

这样寒冷的气候常常冻僵着野兽，冻死了行人，在他们好像没有受着，而且流了汗水。

在两条河流交流的地方，小兰站住了，伸出她的手指指着前面说：

“去吧？”

“我自己吗？”

“那么我还跟你去吗？”

“不，我是说到了吗？”

“我告诉你这一条是绥芬河，这一条是瑚布图河。瑚布图河这边是中国，那边是苏联。”

“我怎样走啊？”

“你要走过瑚布图河，呸，再沿着绥芬河一直走，你如果听见有人叫你的时候，不要跑，要站下，举起你的两手……”

“不要说吧，这我比你明白——”

“那么你去吧！”

“你不可以多送我几步吗？”

“你怕吗？”

“我要去的地方，我怕什么；我是因为这段路不熟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气愤了，又继续引着他走去。

冻了的河流，在雪下完全失去了原形，被雪饰成了一条平坦的大路，两岸做了大路的边界。不过这条大路，却使人放不开大些的步子，每步都要试探着踏下去，不然，便会滑倒了。

月亮已经由天面的斜方移至中点，月亮直射下来，路上更明亮了些。可是吹过的夜风，却暴了，冷了，好像有着钢针，刺入了毛孔；而且，拖着一种嘶叫的声音，在震碎着这般的寂静。被风卷起的积雪，便像细薄的白纱一样，被飘来，被飘去，在遮塞着向远处投开的视线。

小兰一边走着，一边用愤恨的眼色注视着王之民，有时，故意把嘴咬紧些，表示她有着更多的愤恨。王之民拖着沉重的步子，已经喘息了，他却笑着说：

“姑娘，不要生气吧。”

“那么，我回去吧？”

“再走几步。”

“再走几步送你到莫斯科啦！”

“莫斯科还远着呢。”

在谈话里，仿佛引起了她的兴趣，脸色的气愤神情，淡了些。并且她还在问着他：

“莫斯科有多远呢？”

“西伯利亚铁路你知道不？”

“不知道。”

“那我怎样告诉你呢？……就是很远很远的吧。”“多远呢？在天边？”

她张望着远方，在夜色中的模糊的天边。王之民给她摇着手，使她

的眼睛转向了他，他说：

“你不知道莫斯科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认识绥芬河、瑚布图河呢？”

“这是我常走的地方呀！”

“常走？”

“是啦，常常送人，像送你一样！”

“为什么要用女人呢？”

“男人如果让中国兵抓去了，就要坐监了，杀头了。”

“女人呢？”

“总比男人好些！”

他们谈着，已经走上河岸，地上的积雪更高起些，几乎高过了他们的膝骨。小兰一步交替着一步，向前走着，仿佛已经忘去了她的归路。王之民没有一刻不是在注视着他的身外；虽然没有任何的响声惊动他。

突然，小兰笑了，她说：

“这次真快送你到莫斯科啦！”

“不，还远着呢！”

“你是去莫斯科的吗？”

“是啦，这也不是你所要知道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许多人私自去莫斯科？”

“这更不是你所要知道的！”

他沿着绥芬河望望自己的去路，又望望她的归路，然后他很严肃地向她说：

“很远了，你回去吧！”

“不！”

“我谢谢你这次的辛苦！”

他从衣袋里扯出五元的钞票，送给她；可是被她拒绝了，他问：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知道为什么有许多人私自去莫斯科呢？”“让我这样告诉你吧……因为莫斯科有工作，有饭吃，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不轻视穷人，还收留穷人，人与人都是一样，一样地工作，一样地吃饭，一样地……”

“人家说莫斯科是穷党的地方。”

“那是人家骗了你！”

他转过头，看着被他们踏破的雪面遗下的脚印，延开着长长的一条，他说：

“太远了，你回去吧！”

“不，我也要去！”

可是，她终于被他拒绝了，她哭了，别了他。

三年后，王之民为了“九·一八”事变归国了，指挥着一部义勇军攻入了绥芬河，又攻入了东宁。

在东宁，他趁着仅有的一些机会，探询着东平栈主人与小兰的消息，可是终于没有见着她们，只是听着人家传说东平栈的主人，因为很大的罪名被判了死刑，小兰到莫斯科去了。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舰 上

我做海军学生的时候。

我们四五十名同学被分成十几小批，每批的人数不一样，有的多些，也有的少些。驾驶班有我与马斌元，轮机班还有三人，我们是其中的一批，被学校派往舰上实习。

军舰的名字，叫江清，是欧战以后中国分得的胜利品之一，已经老朽了，它的年岁也许比我多一倍，不过它仍有着日尔曼民族的姿势：雄伟，健壮，它的尾部，仍有德国的文字记载着它诞生的地方和时日。我们常从那些遗迹上追想它所经历的故事，怎样地承受着光荣的下水典礼，又怎样地遭遇了惨酷的战斗，更怎样地被人俘虏了。这常使我们感受光耀、恐怖、耻辱，常使我们谈尽了整天的时光。也许是因为长久的军训生活苦恼了我们，舰上新鲜的生活迷惑着我们，感到了意外的欢快。可是，不久舰长分给了我们工作，轮机班的三人，穿了蓝色的工作服装，走入了机舱。我与马斌元仍穿着学生的制服，留在舱面，在大厅后面的一间舱房，做了我们两人的寝室，每天听候舰长支配，教我们一些已经熟知了的升旗降旗的敬礼和一些海军方面浅近的常识，久了，我们便厌倦了。

当舰长发出江清沿着松花江巡游的消息以后，我们欢快地跳起脚来。我们用了一天的工夫，告别家人、友人、同学，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和两筐水果。

月亮已经退去，太阳还没出来，天上荡着一层朦胧的雾色，模糊了每个人投向远处的视线。江上浮着一种轻气，随着波流，流向远方去。不时地响着雄鸡的鸣叫，很清脆地透入耳孔，使人可以听出是在远处，或是近处。夏天的晨风，也裹着一种清凉，浸入皮肤，使人感受到意外的舒快。在这时候，江清舰已经开动机轮，驶行了。

沿岸新鲜的景色诱着我们，使我们常停止了我们要实习的工作。在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的地方，我们站在甲板上，手握住铁栏，垂下头，望着混黄的松花江，沉浊的黑龙江，仿佛是两条异色的轻纱，在风里飘荡着，拖着舰底。几里以外，两条江水合流的边缘，仍遗着异色的纹痕，好像它们永远不会溶成一色，溶成一条江水。

江清舰近了三江口的时候，已经是几天以后了。

江水隔成的两岸，有两种景色。属于苏联的一面：绿色的树间，飘动着红色的旗子，房屋镶着精致的玻窗，浸满着阳光，草地上散着交叉的小径，散着一些步行者，虽然辨不出他们是年老的，年轻的，但是从他们的衣色上，可以知道是男人，或是女人，从歌声中，可以知道他们是在同样的欢乐中。属于中国的一面，只是一片无边际的荒原，有几处堆集着一些简陋的小房：泥土的墙壁，草茎的房顶，破了窗纸的小窗，任着风吹雨淋；路上异常地安静，没有任何的骚动，有时候，也许会听见几句拾柴孩子惯唱的歌谣，或是乞讨者哀求的呼声。江清舰就是靠近这一面投下了铁锚。

不惯航行的人，像我与马斌元在这航行中，也感到了疲倦，虽然在几处的码头有过几次的停留。

在三江口停泊后，我们立刻恢复了健全的精神。

我们因为天气太热，并且看见苏联海军士兵练习跳水，便默默地换了游泳衣。可是苏联的海军士兵在岸旁的一处，有他们细粉一样的沙滩，有他们乘凉的白色布棚。我们呢，只有舰上的甲板，一块小小的地方。从餐厅中，我们每人暴饮了一口酒，叫了一声，便投下水去。

在刚刚投入水中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清凉，过了一刻，便感到了波流的温暖。马斌元只顾摇摆着胳膊，迅速地驰过水面，使我落后有十几步的距离。不过他游泳的成绩，并不比我好些；我最好的记录，是一千多米。他只有六七百米。可是他为了苏联的海军士兵注视着我们，赞扬着我们，他一直顺着水流泳去。在四五百米的地方，我唤了他，才转回了方向；还没有游过一百米的时候，我看他喘息了，他的力量已经抵不住迅速的逆流。我看较近的地方，正停泊着一只苏联的红星舰，我指给他了，意思是让他握住锚链或是伸入水中的软梯，休息一刻，然后再泳向我们自己的舰去。可是，他不听从我，仍逞着英勇，继续泳行，终于让波流遮没了他的面孔；他的全身，只余下一块小小的皮肉，留在水面。我惊跳了，叫了一声：

“呀——呀！”

这时候，红星舰上有一个人影，突然投落水面；于是马斌元才脱了危险，被拖到红星舰上。

我到红星舰上的时候，马斌元已经被放在客厅里，有医生正给他注射药针。四边都围满着士兵、军官，他们的服装与我们几乎是同样的质料、颜色，所异样的，只是他们的帽边比我们多了一个五角星形。我伸长着脖颈，注视他们，想认出他们谁救了马斌元。可是，好像他们都比我高些，我的视线透不过他们人丛间所遗下的缝隙，所以我问了：

“我要知道，是谁救了我的朋友。”

“我！”

回答我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士兵，有着深蓝的眼睛，高起的鼻子，他的衣服，完全被浸湿了在滴落着水滴。

我问：

“你的名字？”

“苏斯洛夫。”

“我感谢你的好意！”

他笑了；然后他为了照顾马斌元也没有再向我说些什么。可是我又唤了他：

“你看看！”

“什么？”

“你的衣服太湿啦，换换吧！”

他却为我猛力地拍打了几下胸脯，表示他的身体不怕任何的损伤。直到马斌元清醒了，苏斯洛夫才换了衣服，划着舢板送我们回了军舰。

我们的舰长为了感谢苏斯洛夫，送了一件并不贵重的赠品。

可是，以后他不允许我们再去探访苏斯洛夫。有一次我们练习舢板，划过红星舰旁，我们只叫了苏斯洛夫的名字，他便斥责了我们，好像我们违犯了海军最大的禁令。

有一天的早晨，落着暴雨，雨滴同弹粒一般地从高空中射下来，打

着舰面的钢铁发出了响声。舰外的四边，完全被沉重的浓雾遮没了。暴风，一阵一阵地激起了江上的波浪，仿佛是海上涨了海潮；军舰就像婴儿的摇篮一样摇着我们，催眠着我们，可是，有人唤醒了我与马斌元，说有人要见我们。

我们还没穿好衣服，便跑出去了，暴雨立刻湿透我们的衣服，使我们不能尽量地张开眼睛；像这般的暴雨，仿佛是我生来第一次遭遇了。

“谁找？”

我们停在甲板上问了一声，没有人，又跑到客厅，也没有人。我们正要向回跑去，有人唤了我们。我勉强张大些眼睛，向四外探视着问：

“谁？”

“这里！”

是苏斯洛夫，与另一个我们所不相识的士兵，他们握着我们舰旁的铁梯，使他们坐着的舢板，停在我们的舰旁。苏斯洛夫向我们摇着手，好像怕我们从视线中遗掉了他。我们跑近他去，马斌元问他：

“有事情吗？”

“没有！”

我很奇怪地问他：

“像这样的大雨，那你来做什么？”

他拢了手，仿佛雨再大些，他也不怕，他说：

“我是向你们来辞别的。”

“你们的军舰要开走吗？哪天？”

“一点钟以后。”

我们很恋着这位热情的朋友，在雨天里，向我辞别，而且，他又没有多余的时间，使我们尽情地招待他一次，我们不住摆起头来。他却错过了我们，他问：

“你们不喜欢我来吗？”

“不是的，不是的！”

“那么，你们怎么总也不去看我呢？”

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只有用坚决的表示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苦衷。

最后，他站起了，挺直着身体，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来，让我们去握，他说：

“希望你们做我的好友！”

我做海军练习生的时候。

因为中国武力接受中东铁路，中苏开始了战争。因为预防苏联海军侵入松花江，我们全部的军舰开往了三江口附近的地方。因为多数的防地，我们全部的军舰也不敷支配，海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又从航务局借了几只货船，四边装置了钢板，舱面上设了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命了舰名，便做了我们的军舰。舰上仍是从前的船员，只是加多了一二百陆战队的士兵，几个海军毕业的学生，由陆战队的中队长负全责指挥。

我、马斌元与另外的两个同学，被派在同一舰上。开走的那天，有很多欢送我们的人们，好像在欢送着他们最伟大的英雄，也有青年，从人丛中摇起拳头，破着喉咙，喊着反对我们这种战争的口号；我们的心情，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舰还没有驶出二三里地的时候，我们便绕着客厅的方桌，饮起酒来。只看见空了的酒瓶，一个一个地加多了，却很少

谈着我们将来要遭遇的战争。是醉了？还是清醒？我们悄悄地唱起了：

别了，别了，
这里的山河，
这里的园林

……

这歌唱的调子，好像是在默语着我们只有去路，很难寻找我们自己的归途，好像在埋伏着我们对于这种战争的疑问。好像……

天黑了，我们这四个醉人，都沉入自己的默想中，不让任何的骚音，扰乱了我们醉人所保持的寂静。

舰头留了一个水手，持着一条长长的木棒，不时地捶入水中，立刻又拖出水面在试探着水深：

“八尺！”

或是：

“九尺！”

大副听了，便向着通入机舰的铁筒，用着俄人惯用的言语指挥着：

“‘马累’（俄语慢些的意思）。”

或是：

“‘包含’（俄语快些的意思）。”

这声音很清地透入客厅，透入我们的耳中。

几天以后，我们不知道已经走近了什么地方，只听见轰炸的声音，近了我们的。

陆战队的中队长，命令我们配置好了炮位，命令大副使舰向前直进。

我从衣箱里，找出望远镜来，希望看见我们前方的一切景象；可是一切都在遥远的渺茫中。

不久，中队长派了一个士兵，在舵楼上做着旗语；我从望远镜中看见了前方的舰影，漫没江面的炮火。不久，中队长喊了发炮的命令。

第一炮是马斌元指挥放出的；他那勇敢的姿态，表示着他最大的复仇的决心。

我叫了他，问他：

“你了解了我们这次的战争吗？”

他只顾前方，没有睬我。我又问：

“小心些，那里也许有我们的朋友呢？”

“朋友——谁？”

“忘记了吗？——苏斯洛夫。”

“打的就是他！”

“为什么？”

“他正是我们的敌人。”

这战争经过两个月的时候，我们陆军防守满洲里失守了。苏联的海军、陆军，沿着松花江占领了富锦——我们的海军，已经败走了，每只军舰的钢板，都遭了炮轰，遗下一些破碎的洞孔，而且有一只是江防舰队最大的江亨军舰，因为苏联海军的威胁，自动地沉入江中，还有几只被扣留了——因此我们有些人便做了俘虏。

俘虏的生活，在人的想象中，是多么可怕的悲惨的待遇。绝不会有人相信我们却是如此的安适，有菜汤，有面包，任着我们随意的动作、

谈话。而且我们恰好是被留在红星舰上，有我们一个友人苏斯洛夫；在他值班看守我们的时间里，总是提来他的手风琴，为我们奏起歌来。在每节歌停息一刻的时候，他总要说一句：

“朋友们，快乐些！”

可是，马斌元仍是垂着头，耸着肩，从眼角边敌视着苏斯洛夫，仿佛永远认为苏斯洛夫是他的敌人。

“老友，你也要快乐些！”

苏斯洛夫这样劝慰他，却更激动了他的反感，狠狠地指问着：

“既然做了俘虏，能有快乐吗？”

“俘虏？——不是！”

“不是？”

“是的；我们把你们看做友人一样。”

“友人？”

“是的！”

“……永远是敌人！”

苏斯洛夫没话说了，默然地笑了几声。马斌元跳向他的身边去，警告他：

“你不要以你的胜利来向俘虏骄傲，听见没有？”苏斯洛夫转向了我，抽动了一下嘴角，好像要我来批评他们俩人间究竟是谁错。

马斌元也许便误会了苏斯洛夫，气愤了：

“你离我远些；看看，认识吗？”

他伸出两只拳头，送近苏斯洛夫的眼边。苏斯洛夫把头更加倾近他些，仿佛准备接受他的拳头。

“你是要这样吗？”

“嗯，差不多！”

“你还要怎样？告诉我！”

“告诉你，表示我不屈服你！”

“我没有要你屈服！”

“告诉你表示中国不屈服苏联！”

“苏联也没有要中国屈服！”

他们常常这样吵嘴，使我感受十分不安，甚至在夜里失眠。

可是以后中苏停战了。苏联占有我们的土地又归还了我们。

我们被释放的那天，苏斯洛夫先把这消息传给了我们，这种兴奋，使我们失了常态。在吃早饭的时候，苏斯洛夫为我们送来一瓶酒，满了几杯，分放在桌边；他自己先举起一杯，举过他的头顶，高呼着：

“朋友们，祝福你们安好！”

马斌元握起一杯，投在地上。清脆地响了一声：杯碎了，酒流开了。

可是苏斯洛夫送行我们，还说：

“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好友！”

我做海军候补副长的时候。

“九·一八”事变了。

日本由沈阳展开了战争，抢占我们东北的土地。在绝大的威胁下，我们的陆军，有的投降，有的退走，有的反抗；我们的海军完全被日本的暴力屈服了，松花江的江防舰队，已经接受了日本指挥的命令。

不久，日本做了一面新的旗子，红、蓝、白、黑，占了全面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完全是黄色，不久，便悬遍了东北的土地，悬在我们的舰上。

不过，有许多地方，仍集中着我们的义勇军在抗战着，在夺取着已经失去的城市。并且松花江依兰以外的地方，仍由我们原有驻防的陆军固守着。因此，我们海军接到了进攻依兰的命令。

依兰的驻军，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宁肯牺牲自己的父母、弟兄、姊妹……以及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疯人，我们的思想非常清醒，我们既不能援助他们取着同一的战略反抗我们的敌人，我们又怎能忍心援助敌人去杀他们？

可是，我们终于向依兰出发了，终于向依兰开放了炮弹。

舰上新配的两只迫击炮，由我与马斌元负责指挥。我连续地发出了两炮，他却同木人一样地停着，炮旁的几个士兵都在等待他的命令。于是，我叫他：

“发炮啊！”

他仍是不动，我又叫他：

“指挥官要你发炮呢！”

这时候，我们舰上所有的炮，同时开放了一次，最后一炮是马斌元指挥放出的，炮弹飞向江中去。我怕他受指挥官的惩罚，向他说：

“瞄准！”

他从衣袋中拖出了一块手帕，遮住了眼睛，我问他：

“你哭了吗？”

他哭出声来；我制止他，还在喊：

“瞄准！”

“是的，瞄准。”

于是，他指挥的第二炮发出了，燃起了依兰一角的火焰，散着浓烟。

可是，我也哭了。

在几天内，依兰的驻军，沿着松花江、佳木斯、桦川、富锦退走着，我们的舰队，直追到三江口，仍是不住地轰击着，退走的军队，被迫退入了苏联的领土。

为了预防退走的军队再次的反攻，我们的舰队暂时留守三江口。可是我同马斌元经过几次的计议，另有了秘密的决定。

在我们发见红星舰以后的一天深夜，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江上只是流动着的灯光。我们约会了两个值班的岗兵，偷偷地落下一只舢板，立刻划向红星舰去了。在我们划近红星舰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舰队中的哪只舰的岗兵发觉了我们，向我们放出了几粒枪弹，同时，红星舰上的岗兵也拖着步枪，瞄向着我们，我们说了些话，又交去了我们的枪与弹，才允许我登上了甲板。然后，便见了红星舰的舰长，说明我们是追随退入苏联境内的军队去的。于是，他派了几个水兵，护送我们登岸。可是苏斯洛夫从睡中被人唤醒了；他看见我们，便拖住了我与马斌元：

“我正担心着你们呢！”

他为了友情的留恋，自动请求舰长护送我们。舰长允许了他，他便与另外的几个水兵，领我们走上舢板。

我们这次坐在舢板上，心里很安静。虽然仍是我们原有的舢板，但

是前面却多了一面苏联的红旗，后面多了一盏红灯。

江水打着舢板，向我们的脸上不住地溅着水星。苏斯洛夫一边划着，一边向我们谈着：

“我绝没有想到还有会见你们的一天；你们呢？”

“我们也是！”

这是我答他的。马斌元始终都在沉默着，好像他已经是一个哑子了。

苏斯洛夫唤着他说：

“船快近岸了，我们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朋友，我们谈谈吧！”

马斌元没说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是在留恋着已经失去的土地、受难的同胞……而且，在他的默默中，不知道还埋藏着多少逃亡的痛苦。

登岸以后，苏斯洛夫把舰长写的字据交给了当地的驻军，收容我们；然后再转送我们到退入苏联境内的军队去。

在临别的一刻我们向苏斯洛夫和另外的几个水兵行了谢礼。

苏斯洛夫走近马斌元的身边问：

“朋友，你还仇恨我吗？”

“不！”

他伸出一只手来，让苏斯洛夫去握：

“我要做你的好友！”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婚 夜

敌人的部队，又由都市开入乡村了。

在乡村，已经是农家耕种的时候；不知名的老树，枝梢上，染了一层淡淡的绿色，脱露着新鲜的嫩叶；叶边，飞绕着归来的小燕，在寻觅着宿巢；年老的树根，突破地面，蒙了几条蒲公英的长叶和没名的小草；河流完全解冰了，再没一块冰花从水面上飘过，只有些没灭绝了的秋叶、荒草，被风送来，随着河流流去；野风打着脸颊，已经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农家所期待的春天来了。

然而农家却无声息，家家仍是闭着门扇，很少张开一次；在田垄间没看见有风筝、牛犁，以及唱着牧歌的孩子。那般的死静中，只有几声犬吠，惹起门扇裂一条缝隙，露出几个张望着的面孔，姑娘的，少妇的，老太婆的，孩子的，很少有壮年男人的；就是有，也是病人，或是残缺者。

远处的林间，突然有几只黑鸦飞起，翅膀打断着枯枝，惊慌地飞出林外，向天边叫着使人厌烦的声响。

然后，从林间的小路上走出了两个人：年轻的姑娘和壮年的男人。他们穿着同样布料而不是同样样式的衣服，全破旧了的夹衣，姑娘是长的，男人是短的。他们的面孔也很相似，都是大眼睛，高起的鼻子；只是姑娘比男人年轻些，胖些，头后拖着一条粗壮的发辫，系着半旧的红色绒绳，肩上背着一个小包裹，缝隙间，露着一角花花的新衣，同包皮是一样鲜红的团花。他们的步子都是同样地加快着，一只脚迅速地交换着另一只脚；可是姑娘总是比男人落后一两步远。

“小兰！”

男人仍是走着；只是把头转向侧面唤了一声。小兰喘息着，答应着：

“啊，哥哥。”

男人没说什么，眉间集起了几条皱纹。她追随着，又问了一句话：

“哥哥！你叫我做什么？”

“我叫你快走！”

于是她耸一耸肩膀，让小包裹自由地抖动了两下，随着她的步子便张大起来，仿佛要一步或是两步踏到她所要去的地方似的。

渐渐地他们离远了树林，转入了一条无尽处的大路，两边散着一些农家的小房。村内的狗，集起了一群，追在他们的背后，狂吠着；有的追过了他们的身边，堵着他们的去路，好像不允许他们从这村内走过。

农家的门缝间有头探出，唤着自己的狗。

她摆摆手，向唤狗的人问：

“山庄还有多远？”

“二十多里呢。”

“我问的是——山——庄！”

“是啊，二十多里呢！进屋歇歇脚吧！”

“不，谢谢你！”

“怎么这样忙？”

“有事，有事。”

“什么事，这样忙？”

她没回答，她的脸已经红了。于是，她说：

“就是忙啊！”

“姑娘，你站站脚。”

“忙呀！”

“我有话嘱咐你！”

“什么？”

“山庄尽是鬼子兵了，你要小心些。”

她停住了，仿佛惹起她许多话来。但是男的转过头来，狠狠地谴责了她：

“你真好多嘴！”

“说两句话怕什么。”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她凝望着他，望了许久；然后用手掌拍打着胸脯，长吁了几口气，又走起路来。

蓝色的天，很少有异色的云块；太阳已经离去了地线很远；不过，还是早晨。远近的景色，全是一样的明朗；就是树枝印在地下的影子，也不模糊。

他们走着，渐渐地隔开了更大的距离，仍是男人在前面，姑娘在后面。他常常回顾着她，向她投以愤怒的神情：瞪大着眼睛，深垂着两边的嘴角。她喘着，避着他的面孔；她用小的步子，追上他。她问：

“哥哥，你生气了吗？”

他不说话；可是她仿佛要他给她回答，握住了他的衣袖：

“哥哥，苦了你吗？”

“哼，就为你一个人，多跑七十八里路。山庄还有鬼子兵，这就是他妈送死去一样！”

“是我愿意吗？这不是妈的主张吗？”

他没话说了。可是自己还在埋怨着：

“这年头，有姑娘就算倒霉啦！”

她一只手按住了胸脯，一只手摸搓着前额；嘴里吞吐着不清楚的话声。

当太阳占有了天面的中点的时候，他们到了山庄，头上流满了汗水。他看看半里外的一面旗子，他停下了：

“到啦，你去吧！”

“你呢？”

“我回去啦！”

他说了，便转向了归路。于是她激愤地跳起脚来，把土块踏成了一片细面，印着她杂乱的脚印：

“哥哥，你只顾你自己，你就不替我想想吗？”她已经是哭泣的调子了：“一个人怎么到张家去。”

“你嫁了张家，不是总要到张家吗？”

“哥哥，你想想我这是第一次到张家，也不认识门。”他指给她那不远的地方的三间草房，快要倾塌的泥墙，撑着几支木柱。他又问：

“记住了吧？”

“我也不认识张家的人啊！”

“你的婆婆呢？”

“只见过两次。”

“这就行啦。”

“那‘他’呢？”

“哼，还‘他’呢！你就说你的丈夫好啦，不要脸！你总有一天认识‘他’。放心吧！”

她的脸红了；一个人气愤地走开去；可是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哥哥，我进屋先说什么呢？”

他不睬她，走了。她也走了；可是她又听见他的笑声：

“小兰，好妹妹！他给你的钱，给我吧！”

“不要脸，他只给我两角钱，你还要。”

她把手腕甩动了一下，继续走了她自己的路。她走近她所要去的那草房的时候，在一面旗下，站着的岗兵隔住了她的去路，要她停下了，举起两只手来；后来那个岗兵用手摸遍了她的全身，又解着她的衣扣；她匆忙地退后了两步，避开岗兵的两手，自动地扣着被解开的衣扣，她望一望岗兵，她尖叫了一声：

“呀——”

岗兵向她晃着刺刀，又凑近她的身旁。于是，她被吓呆了，顺从地让刺刀割断她所有的衣扣，衣襟垂开了，露出她红色的小胸衣来。岗兵向她笑了笑，刺刀又靠近胸衣的衣扣，她耸高了肩膀，眼睛突大起来，转头望望她的哥哥——在路的远处，缩成了那样小的一个人影。

“不——”

她推开岗兵的手，便惹起了岗兵的愤怒，终于撕裂了她的小胸衣，放她走过了。

那飘起了炊烟的草房，在二三十步外，静静地等候着她；她却望着辽远的天线，一步一步地走着。春风不住地吹过她的身边，不住地吹起着她的衣襟；她的腹，她的乳头，有时全露出来。四处的野狗向她身边集合着，扑着她，仿佛要分取着她那已经破裂了的衣服。

她站下了，在草房的院墙外。院门没有关闭；可是她也没有走进去；只有她的手，几次地摇动了门扇，又几次地退缩回来；眼睛停留在一种默想中。

狗的吠声，好像替她唤着张家的主人。

“是姓张吗？”

她终于问了。

从院内走出了一个人，脸上涂满着尘垢，使人分辨不出他究竟有多大年纪；只是他那两条浓眉，长过眼角，似乎在象征着他还是年轻的，穿的衣服，破了，已经破露了膝骨和一块肩膀。他用陌生的眼色注视着她：

“找谁？”

“这是姓张的吗？”

农人点着头，默认着。

她的脸红了！

“我找张老太太。”

农人的眼睛一面追随着她的视线，在猜想着什么；一面问着她：

“你是谁？”

“……”

“找张老太太做什么？”

以后，张老太太走来，没有说什么话，便把她领进屋了。屋内很黑的，她避入更黑的一角去，让两只手交叉起来，遮住胸脯，张老太太问了她许多话，她不说，只是摇头，或是点头，直到最后，她垂了头。张老太太说：

“你妈心眼真多，叫你来了，这不是又多给我添心事吗？”她望望那个农人：“锁子，你的媳妇来了，你看怎么办？”锁子走近她的身边：

“妈看着办吧。”

“鬼子不是要抓人上前线吗？”

“那都是瞎说！”

小兰勉强着自己的动作，偷偷地望了他一下，她的脸便红了。

张老太太扬起头，眼睛望着房间的木梁，向自己打着商量。最后她是这样决定的：

“你们拜个天地吧！”

于是小兰与锁子磕过了几个头，她的发辫在头后卷成了发饼，穿起一件新的花衫，便做了新娘。

太阳没过了天边，开始了她的婚夜。

然而她正在整理着房间的时候，她听见院门被敲响着，然后在院内起了谈话的声音。过了一刻，她随着张老太太走出去。她看见锁子在两个鬼子兵的面前垂着头不自然地动着：

“老爷，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人！”

“不行的，我们太君叫你去的。”

“晚几天，不好吗？”

“明天早晨，不去的不行。”

鬼子兵走了。小兰几次地走过了锁子的身旁，想探询他是什么事情；可是每次她都是红着脸离开他。当张老太太一边哭着，一边说着，她才明白了——那是鬼子兵要强迫着她的丈夫做苦工去。她问张老太太：

“不去不行吗？”

“那怎么行呢！你知道隔壁老于家一家是怎样死的吗？那还不如去，也许有个活路。”

张老太太的眼里凝住了两滴泪水。

“你去给他缝缝衣服吧！”

远处的军号响起来，使人失去了安静的睡眠。在张家的三间草房里，一间装放着农具，一间是外屋，烧饭的地方，一间团集着三个人：锁子躺着，闭住眼睛翻转着，张老太太躲在一边偷偷地流着泪水，小兰缝补着一件夹衣，她常常注视着他，可是对他没有说过一句话。

夜渐渐地深了，张老太太坐着打盹，锁子抱着被子的一角，好像已经熟睡了。小兰缝好了夹衣放在他的枕边，并且拉开被，遮住了他的前胸，手留在他的被边，手指相互地揉搓着。当张老太太的身体转动一下的时候，小兰便偷偷地将手缩回自己的身边。她清醒着没有一丝睡意，直到天亮。张老太太问她：

“他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说？”

她没说什么，只是把她的两角钞票，从自己的衣袋移到他的衣袋里去。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死 亡

“……”

“又是一个，你看！”

“昨天的那个吗？”

“昨天的那个，早到狗肚子里了。你没看见这是今天早晨才拖下来的吗？”

楼下两个看守的熟识语声，是那样清脆地沿着石地，送入我的铁门里；让这阴森的地方，没有鞭打与嚎叫的骚扰，也不像死一般的静寂，的确是太意外的一刻。

于是，我感受了意外的幸福。因为我是被优待的犯人的缘故，每天我的铁门，可以任着我的意思多开一次。因为我怕这幸福的时间，悄悄地走过了，我便披起了大衣，叫楼上的看守给我开了铁门。在像穴洞一般的过道上，我注视一下，我身边的两列铁门，看见许多拥挤的眼睛，从每个铁门仅有的小小的洞孔里，向我闪动着，仿佛都在留恋着，希望跟在我的身后，随我出去，看看蓝色的天，白色的雪地，希望从死的世界逃出，走上活的世界；而且，有一个人伸出一只手来，向我打了招呼，为了避免看守看见，我立刻缩回去。我认识他，他是王海，我们是在同一天被捕来而相识的友人，可是，我没向他说话，慢慢地拖着疲倦的步子，走了。他用眼睛送着我，我几次地回头探视着他，在天窗透入一束阳光的地方，被楼梯的转角隔绝了我们。

楼下那两个看守的语声，仍在继续着：

“死一个少一个，不死也是活遭罪！”

“死，总不如活着！”

他们俩人：一个是老年人，使人看见他的时候，便感到可怕，虽然几年前他在煤烟里，是被烧伤了的残缺人：脸上满着疤结，头后仍包裹着药布，不过，他残余的那一只眼睛和那一只手，仍有着人类所有的狠毒，可以使每个犯人听从他，给他永远露着笑脸；一个是年轻人，爱笑的脸面，爱说话的嘴，仍保持着童年的纯真。他们俩人：一个是最厌烦的，一个是最喜欢的；所以我的眼睛丢开了那个老年的看守，注视着那个年轻的看守打了招呼。我问他：

“你方才在讲什么？”

“没讲什么，王先生！”

“我才听见——又是一个——是什么呢？”

他没说什么，只是把右手举高些，引着我的视线，走过了几个铁门，走到最后的一个铁门前，他站下了，指给我看，好像给了我我所问他的回答，是被锁在这铁门里。我便望着，搜索着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望了许久，这铁门和另外的铁门，是同样的铁质，同样的色调，门环上，也是垂着同样的铁锁，门的一边，也是悬着同样的满了灰土的门牌，写着养病室的字样。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了。

他仍旧没有说什么；不过他那挺直的身体和手指，渐渐地松软下来。然而老年的看守走近我的身边，却无感觉地向我说：

“往里看，王先生！”

我为了表示厌烦他，更厌烦他的话，故意离远他些。

年轻的看守，做着同意的神情，推着我的肩，让我靠近些那个铁门。他说：

“是的，王先生，往里看！”

于是，我匆匆地把头贴近门前，让一个眼睛的视线，由门上的小孔透入；立刻好像有许多的芒刺在伸长着，刺伤了我的眼睛，我的毛孔都在一阵的突涨，又一阵的紧缩。

其实那屋内也和另外的屋内是同样阴湿的墙壁，同样破碎的地板；可是，我更加感受了意外的恐怖、残酷，那里横躺着一个尸身：惨白着脸色，直挺着的四肢，戴着手铐与脚镣。

“他死了吗？”我问青年的看守。

“他昨夜就死了。”

“在他生前，给他医治了吗？”

“天天医治，他也不好；像他这样的短命鬼，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这是老年的看守在回答着我。不过青年的看守缩紧着眉毛，哼了一声，表示对他的话的不信任同对医治的不信任是一样的——使他对于自己的话，也感觉着有了缺陷，便自语地说着：

“好好的人，偏偏要犯罪，父母白白地生了他，国家也白白地养了他——”

“你少说些吧！”

青年的看守打断了他的话，他却仍在继续地说着：

“再说这些犯人，哪个有好身体？怎么能不死呢？像王海那样的小伙子再也不会死！”

我忍受不了静默地听着他说话，我让他看看所有的每处，我说：

“即使有好身体，他的好身体能够保持几天？”

“几天？哼，十年八年都是一样！”

“那也许只有你！”

年轻的看守担心我与他吵起嘴来，便拍打着我的肩，劝慰着我，而且要他走开去。

突然，我听见在粗燥的喘息中，发出一些轻微的抖索的呼声：

“老爷，费心吧！我不能忘记老爷待我的好……只这一次，再也不麻烦老爷……我也许会好的，那老爷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救救我吧，老爷，给我一杯水！”

我在痛苦与惊恐中，也有些欢快，我想像那个尸身又复活了，他的血，又重新开始流动起来。结果却不是那个尸身，而是墙角阴影下的另外一个病人。

这时候老年的看守一面拖着散碎的步骤，一面在向养病室的犯人说着：

“你他妈真会享福，还要一杯水伺候你，谁是你的儿女？再有一点钟够你活了，还要一杯水呢！”

我被他激起了不可抑制的气愤，我叫着：

“为什么不给他一杯水呢？并且水不是可以医治病人的吗？为什么看着他死去，不给他医治呢？”

“他该死了，早就该死了！”老年的看守摆出好像很正大的态度说下去：“他自己寻死，活着也是遭罪，不如叫他快些死去吧，这是实话。”

如果不是青年看守的两手，隔着我们两人的胸脯，我的拳头要在他的肩上猛力地落下几次。即使有法律的条文限制我，我也要伤害他，我不怕接受任何的重大罪名。

最后是青年的看守，向养病室里送了一杯冷水，并且向我说明他们从不预备暖水。

同时，老年的看守看着我激愤的神情，故意用一种微笑换取我的欢心。然而，这使我对他只有更加多了仇恨。

此后，我每次见他，都不睬他，好像他在我的眼中，已经失去存在的影子。因为我知道他那仅有的看守的权威，不敢施用给我；因为他也知道我每天有菜有汤，有米饭与馒头，有吃烟与其他一些的自由，他的长官与我有很好的友情，我是优待的犯人。

不过，我被锁在一个大的房间里，常常感受着孤独、冷清、寂寞、焦躁，我常常放高着喉咙，唱着不熟练的歌。

这几天，我在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我张着眼睛，直到天亮的时候，听着值班的看守起了匆忙的脚步声、呼唤声：

“起来，放茅了！”

喊过了，值班看守的木棒，一面摇摆着，一面敲打着每个铁门。

“你们这些王八旦，能吃、能睡，这是你们养老的地方吗？他妈的，我有权，我都枪毙你们！”

我知道这是老年看守的语声，同时，我也想到他握着的木棒会在几个不幸犯人的头上，肩上，折断几支。立刻，我所想的便被证实了，有木棒接触着皮肉的声音响了。女拘留室的孩子的哭声，被母亲的手掌遮断了，几乎被遮断了气息，留下一片旷野上的寂静。

突然老年的看守又向某个犯人咆哮起来：

“跪下，我教训教训你！”

“老爷，我早就醒了，因为肚子痛，我起不来呀，老爷，宽恕宽恕我吧！”

“啊，你是病人了！”

“是真病了！”

“我给你治治病，”随着在皮肉上响了几下木棒的声音：“你的病好不好？如果是没好，我再给你治！”

“好了，好了！”

“他妈的，这成了养病院啦！”他走过来，看见我——在怒视着他；故意讨好地向我说：“王先生，起来得太早啦！”

我摇摇头。

“怎么这几天，起来得这么早呢？”

我又摇摇头。

“王先生，我告诉你，快有一位大人物来参观啦，所以我不得不管理严厉些！”

他终于无趣地走开了。在我对面的门孔里，王海的拳头向他的背影比量了几下，告诉我说：

“这小子最不是东西啦！”

“是的！”

铁锁响着，铁门顺序地开了，犯人拖着慢步，从我眼前走过，有的赤着脚，有的拖着一只鞋子，穿了棉衣的只是很少的几个人，其余多半是穿着单衣，垂着曾经缝补而又破裂下来的布条、布块，而且，有的戴着脚镣与手铐，手推着墙壁，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着，给我的耳边留着永远不断的呻吟与叹息。

“都他妈的快死了；你呢，王海，给王先生倒马桶吧！”

王海被老年的看守命令着，走进我的屋里来。他正是在壮年，他那凸出的胸脯，健美的筋肉，散在破碎的布衫的外面。我赞美着他，在他的胸脯拍了几下；他立刻握紧了两个拳头，耸着肩，使他自己的筋肉，更凸出些给我看，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体力，不怕任何暴力摧残。

然后，他提着我的马桶，轻飘地走去了，又轻飘地走来了，他把马桶放在原位的时候，悄悄地问我：

“王先生，你有烟吗？”

“有的，有的！”

我从皮包里丢给他一包纸烟，他向门外瞥了一下，立刻把纸烟藏入他的衣袋里，然后说：

“一整盒，太多了。”

“爱吃烟的人，不怕烟多。”

“王先生，我不吃烟。”

“那么，你为什么耍烟呢？”

“我那号里，有一个病重的难友，也许快死了，他没有一天不在想烟吃——”

“多久了，还没倒完马桶吗？”

老年的看守来了，用木棒在我的门上敲了几下，注视着王海，他又命令地说：

“快滚出去！”

我知道我只是给王海一包纸烟，我还没有给他火柴，所以我向老年看守说：

“我还要他给我扫扫地呢！”

王海找来条帚，在地上扫着，偷视着老年的看守，恰好在楼梯间发生了犯人与犯人的吵声，老年的看守去了，他才伸手接过我给他的几支火柴。不久，老年的看守，又来了，站在我的门边监视着他，仿佛已经看破了他的秘密，随着他的动作转移着视线，不肯放松一刻；他也许猜着了老年看守的用意，不肯立刻离去我的房间，扫完地了，又故意为我整理着零乱的物件，把我的被褥、鞋子、书籍、纸张……都找了适当的位置，安放了它们。趁着老年看守离去的一刻，他匆忙地退出我的房间。可是，在他没有走进自己的房间以前，却被老年看守唤住了：

“站下，等等我！”

他在王海的衣袋里搜出我送给的一包纸烟和几支火柴，他立刻把纸烟丢在地上，用脚踏成了烟面，余了的仅有的一段，又被他狠狠地踏了

两脚，好像看待他的仇敌一样，不肯有一丝的宽恕。并且，用木棒在王海的头上，猛力地打了几下；他说：

“滚吧！”

王海微笑着，抖动一下肩膀，表示那几棒打在他的头上他并没有在意，轻快地走了。

这时候，我有两种感觉，一是对王海的惭愧，一是对老年看守的愤怒。

第二天，我仍没有平息那两种感觉，虽然我倚着窗边在探望着远方。

为了有高级的长官参观，常常派出一批一批的犯人，刷洗地板，打扫墙上积留着的尘土，整理院内每个角落里的零乱东西；并且允许打开窗流通着新鲜的空气。不过，暴风吹送着的寒冷，使每个犯人都缩成了一团，不敢站起来，活动一下血流。虽然我穿着皮大衣，在地上踱着，我终于也抖索起来。结果，我还是要值班的看守给我开了门，走向外面去。

银白的雪花，好像银白的蝶翅，从高空中飘落下来，染了一片白色的地面。高起的墙脊上，也披了一条白纱。暴风不住地吹来吹去，常常被高墙隔断着它们的去路，如同犯人一样失去了自由，在院子里不住地打着旋转，有时，突然施展一阵暴力，拖着一片积雪，飘过了高墙，自由地飘向远方。被拘留在院内的犯人，仍在劳苦地工作着，缩着头，躲避着寒冷；只有王海挺直着肢体，向储藏室移送着零碎的铁具。他看见我的时候，把工作停留了一下，问我：

“王先生，你不怕冷吗？”

因为是那个年轻的看守在院内值班，他便又走近我的身边，向我亲热地打了一下招呼，又说：

“王先生，你不怕冷吗？”

“不怕。”

我回答着他，在墙角边拣了一块没被雪遮没的地方站下，望着那许多在工作的犯人，喘息着，有的流了汗水，我向他说：

“他们会伤风吧？”

“哼，伤风呢，死了，也就像死了一条狗！”他皱紧眉毛又继续地说：“王先生，你不知道吧？今天早晨又死了一个犯人，你不记得吗？那个人给你倒过马桶。”

于是他用手比量着那个人的身量、脸面，使我立刻在记忆中记起了那个健康的年轻人。我有些伤感，也有些怀疑地说：“他会死了？”

“你不信吗，王先生？”

“不是不信，我没有想到他会死的！”

“我也没有想到！”

“他是什么病呢？”

“没有经过医生一次的诊断，谁知道他是什么病！”

他说着，仿佛感受了死的恐怖，在威胁着他，使他在暴风中抖动了两下寒战。他的脸色突然由苍白转为惨白，泪水渐渐地充饱了眼角。

“你不怕，你不怕死？”

“为什么我不怕？死不是可怕的吗？”

“谁敢比你的身体，你自己看看。”我拍拍他的胸脯继续说：“你

可以安心吧！”

于是王海笑着，离去我的身边。

暴风拖着一种吼声，从遥远的地方冲进来，使人不敢扬头探望它的来路与去路；从身边冲过的时候，感觉着一片芒刺刺透了每个毛孔，并不怎样寒冷，而是不可忍受的苦痛，仿佛遭了暴力的伤害。我沿着院地的四边，奔跑起来，被冰冷了的血流，才渐渐地温暖了些。王海仍在工作着，他只是穿了一件经过新线缝补的单衣，因为完全脱落了衣扣，两面的衣襟开散着，让胸前赤露的皮肉抵抗着暴风。有两个犯人所举不起的一个铁锅，又放在他的肩上，他却很轻快地走了，好像他有老牛一样的力量，拖着重载。

在年轻看守允许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分赠他们每人一只纸烟，他们欢喜着，几乎要以跪拜礼感谢我。其中只有王海一人没有吃烟的嗜好，独自在墙边下跳动着，我向他问：

“你吃枝烟吧？”

“不，不，谢谢你，王先生。”

有一个犯人听了我的话，便用手指偷偷地触着王海的腰，意思是要王海接受我的纸烟，然后转送给他。然而，王海却没有听从他，仍向我做着拒受的表现：

“谢谢你，王先生。”

“你吃枝烟也许会暖些。”

“谢谢你，王先生。”

“那么你太受冻了。”

“冻怕什么！”

他立刻停下了，挺直着身体，握着拳头，在胸前击了两拳，表示着健壮者所有的刚强。不过，我看他那不灵活的手腕，已经被冻得僵硬了。我又问他：

“你没有棉衣吗？”

他垂下头，想了想，回答我说：

“有的！”

“那你为什么不穿呢？”

“母亲正穿着。”

于是我知道在他身边并没有棉衣。我告诉青年的看守，去我的住处，取我余剩的棉衣赠他。可是他仿佛感受了意外的惊慌，拖住青年的看守，扯回我的身边来。他几乎流出眼泪在表示向我感谢的神情：

“谢谢你，王先生。”

我坚决地要他放走青年的看守的时候，使他更加紧地握住青年看守的手腕。他的表示：如果接受了我的赠物，好像我给他以极大的侮辱；虽然他是一个窃犯。

从此，我不再赠送他任何的物件。不过，我更关心他，认为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友人，默祝他保持他的健康早些脱难。

然而在一天的夜里，他却遭了更大的不幸：老年的看守值班的时候，发觉了三个犯人自动地脱掉了脚镣，他用很重的铁棒拷问他们——因为忍受不了皮肉的痛苦，说明了如何地用一条铁丝撞开了脚镣的铁锁。

“谁给你们的铁丝？”

老年看守又很快地向他们每人打了一下，然后仍在摇摆着铁棒，表示他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前，他的铁棒绝不肯宽恕他们任何人。于是他们被迫着，抖着肢体与声音说出一个人的姓名：

“王海！”

于是王海替他们遭受了更大的苦难，被老年的看守唤出来，不容他分辩一句话，便先向他的脖颈打了两棒：

“跪下！”

王海没有听从他的话，仍然站着，仿佛是宁肯让他施展着暴力摧残，绝不肯服从他。

“跪下，跪下！”

老年的看守喊了。一切犯人都经不起一丝的惊动，被他惊醒了，不安着，却悄悄地听着，好像在担心着王海的不幸临给自己。

突然，老年的看守握住王海的衣领，愤激地叫着：

“跪下，跪下！”

“你有什么权，要我跪下？”

“我没什么权，才叫你跪下；如果我有权，我就枪毙你啦。”

我从门孔间探望着，知道他们两人都已经激愤了。王海既不肯服从老年的看守，老年的看守更不肯被王海屈服，结果怕有更大的不幸，属于王海，所以我自动地从中给他们调解一次。然而王海却说：

“王先生，谢谢你的好意吧！”

这时候，他表示着他没有一丝的恐惧，任着老年的看守怎样地威胁着他。

然而，他终于被迫屈服了，由老年的看守唤来的另外的几个看守，把他打倒地上。他的头，他的手脚，完全被压住、握住，使他没有一丝转动的力量，安静地让老年的看守的铁棒，任意地打着他的身体。

我为了他那样默然地忍着苦痛，我要爱护他，不容我有一刻的迟疑，应当立刻把他从难中拖救出来，可是，我的铁门关闭着，铁锁紧锁着，我的手被隔绝着，不能伸近他的身边。

渐渐地走近了青年的看守，伸张着两手，舒展着在睡中没有舒展的疲倦。他经过每个铁门前时，从每个门孔间都在传送着一种轻微的语声，亲热地呼唤他，呼送他，仿佛认为他是犯人的唯一的保护者，失去了他，犯人便失去了一切的保障，他的存在，等于犯人的生命存在一样。他并没有听从犯人的请求，便自动地冲入包裹王海的重围中，猛力地推脱老年的看守的身体与铁棒：

“你想打死他吗？”

“打死他，也就像死了一个小鸡！”“告诉你，打死人要偿命呢！”

他的这句话，好像替我说出我所要说的话，使涨饱我胸中的气愤舒散一下。并且，因为看守与看守间的冲突，王海才得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过，他的嘴角，已经流了血，倚扶墙壁抛开步子的时候，完全是一个跛足者了。

几天以后，我都没有看见他，甚至他的眼睛，他的手指，也不再从门孔间给我看见。我只是不时地听见他那般病者的呻吟与叹息，在打动我的感情。我因为关心他近日生活的情况，几次地想向他说话，总是没有一刻的机会。据与他同屋的犯人，在放茅的时候，经过门前给我留下

的一些动作——表示他病了，而且，很沉重。

于是我趁着那个青年看守值班的时候，要他开了我们门上的铁锁。在王海的门旁，我低低地唤了一声：

“王海！”

他没回答我。

“王海，我来了。”

然后我的眼睛，便投近门孔，看见他躺着，合拢着眼睛，枕着自己的手腕。我想用大些的声音，唤他起来，可是另有一个犯人，却阻止了我，原因是：他几夜来，这次他才刚刚睡去，所以我也不忍心叫醒他——仅仅是为了我探望他。不过，我又不肯放过这次机会，让自己失望地回去。我望着他，自己陷入很大的踌躇中。这时候，我感受了仅仅是探望他，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是爱护他，便要设法援助他，所以我以被优待的犯人资格请求拘留所的负责者，允许他搬入我的屋里来。

“我谢谢你，王先生。”

他来了，仍然穿着他仅有的单衣，脚下拖着一双不同样式的鞋子，鞋尖裂开很大的口缝，使脚趾尽量地伸出鞋外。他在我的面前垂下头，仿佛我施与他极大的恩惠，故意在感激我。

我怕他长时间的停立，更加苦了他的病体，我便立刻理好了床位，让他躺下休息。他却问我：

“王先生的床，我可以躺吗？王先生不嫌弃我吗？不嫌弃我是一个下流的人吗？”

“我们同是一样的难友！”

我只好这样地回答他，只好又满了两杯酒：一杯给了他，一杯举在我的手里：

“你喝一杯吧，我们同是一样的难友！”

“不是，不是！”

他摇着头，否认我的话；虽然，他一口饮尽了我给他的一杯酒。也许正是因为那一杯酒，红了他的耳、他的脸颊，湿了他的眼角，使他的身肢颤动起来，好像他失去了停立的重心，一刻后，会倾倒地地上。

“你不惯喝酒吗？”

我问他，扶助他，让他坐在床边。他说：

“不，我最爱喝酒，我的酒量很大呢！”

“那你为什么这样地受刺激呢？”

“因为我说不出来我感谢你的话。”

于是，他哭出声来，仿佛只有哭泣，才能传出他的心情。可是我怕听哭声，我怕哭声所给我的感动，所以我劝阻他说：“你不要哭，你不要为我哭吧！”

“王先生，我就是不为你哭，我自己能不难过吗？我的家里有老娘，有媳妇，还有两个孩子……”

“总会有你出去的一天……”

“哪年是出去的时候？出去见老娘、见媳妇、孩子吗？哼，她们饿也饿死了，出去只有见她们的坟地吧！”

我向他手里的空杯，又满了一杯酒。他的手抖动着，使酒流出杯外，一滴一滴地流落地上。同时，他的泪水也一滴一滴地流落着，有的落在

衣边，有的落入杯中，好像在添补着流出的酒滴遗下的缺痕。

黄昏的时候了，窗外的每处，都在凝结着黑暗的色调，渐渐地透入窗内。我们俩人相望着，已经望不清了如何的神情。不过，我从他谈话的声调中，知道他仍是在悲痛着。

我们在黑暗中，盼望灯火明亮起来，准备我们的睡眠。我为了要使他早些安息，便摸索着，从床上移下被褥，余下的留给了他。可是他谦让着，不肯睡在我的床上，使我睡在床边的地上。最后是我强迫着他躺下睡了。

他的病体并没有因为几夜安适的睡眠而渐好转起来。我担心着他的身体再日渐加重，为他请来拘留所的医官。诊察他的病状的时候，医生虽然鄙视他，敲打着他的胸脯，但是，因为我，医生又不得不给他送来几瓶药水，所以经过医治，他的病状，也并未减轻。

我敢确定他终于恢复了健康的缘故，是因为我把我被优待的伙食的一部分给了他。不久，他便挺着健壮的胸脯，摇摆着结实的拳头，向我说：

“我好了，真好了！”

然而，他在侦缉队，经过两次审问以后，又病了，病得更沉重，因为他受了重刑，身上的几处，都满着血迹。

虽然我仍是尽量地看护他，甚至，把我全部的伙食分给他，但是，他却减退了他原有的食量，他每天所必需的，只是几杯开水。这样经过几天，他的病状，突然转重了，常常失去知觉，讲些模糊的话语。因此，拘留所的负责者，拒绝我再收留他，要把他送入养病室。

“……你让我去吧……随便他们把我送到哪里去……你看你为我，苦死你了……你也该安静几天了，王先生。我没有什么说的了，就是说谢谢你吧，王先生……”

他说着，流了眼泪。

拘留所的负责者，叫来了老年的看守，去了。

“起来，走吧！”

老年的看守，用脚尖触着王海的腰部，迫着王海从床上起来，随他走去。当我告诉他王海已经不能自动起来的时候，他却骂着说：

“他装死了！”

于是他拖着王海的两只手走了，仿佛从我身边拖走了一条死狗。在转下楼梯处的时候，我听见他打着、骂着王海的声音：

“你他妈真享福了……我真想把你摔下去……”

我想冲出门外，可是我的门，已经被锁住了。

我失眠了一夜。第二天起来很早，为了快些知道王海的情形，寻找着值班的看守。这时候，正是老年看守值班，我悔我不该唤来了他。

“王先生，你问王海吗？他已经完全好啦！”

他说了，便去了。

像王海那样的重病，在一夜里，会好转的吗？我不相信他的话，希望亲自去探望一下王海，骗他我要到院内散步去，让他给我开了门锁。

我走下楼梯的时候，遇见了青年的看守，他告诉我王海死了，刚刚抬往荒地里去。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贼

他们父子两人的脸面，几乎完全相似，而且，有着同等的身量；所差的，只是年岁的距离，所以他们被他们认识的人这样地区分着：老张与小张。

听说老张是一个工人，三十年前他三十岁的时候，结婚了。他的独身的伙伴们都赞颂着他是一个幸运者。然而，在他却开始了不幸的悲剧——他的女人生了一个婴儿，便死去了。那时候，婴儿叫着、哭着、摇着小拳头，需要保姆；他没有钱雇一位保姆，同时，他自己也没有能力代替保姆。因此，有人劝他把婴儿抛弃，可是，他拒绝了。他宁肯牺牲自己的工作，让婴儿累着他，在穷困中，甚至乞讨中，过了许多的年月；终于养大了婴儿，随他也做了工人，并且他给他的儿子娶了女人。不过，不幸的悲剧，却没有结束；老张因为长久的劳苦，已经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又加他近了死亡的年岁，他的生活也只有移给他的儿子负担；但是，小张因为在童年失去了营养，他的身体常常有病，不是头昏，便是腰痛，总之，他是一个很不健壮的人，不仅因为缺少出卖劳力的地方，即使有广大的劳力市场，他也要自动地退却下来。他们陷入最恐慌的生活中，已经有一月多了。小张整天出外，寻找生活的门路，他的女人整天缝补着破旧的衣服，换取些米粮，勉强地维持着全家的生命，老张整天守着土炕的一边，长声地叹息着、默语着。

“他到哪儿去啦？”

老张望着小张的女人问她；她不耐烦地摇了一下头，没有回答，仿佛他的话扰乱了她的工作。不过，她被他迫问着，不得不说明小张的去处：

“到赵林家去啦！”

于是老张默然了，他的眼睛，注视着天棚的一角，呆了，好像是一个痴子，好像是脱了筋络、失了知觉的骷髅，头在窗下任凭从破裂的窗纸透入的冷风吹打着，他并没有用手阻塞一下冷风的去路，或是遮蔽他最怕冷风吹打的脸色，也没有躲开些，移换些位置。

地下的小桌、缺了椅腿的椅子……都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原位；只是那一条破碎的门帘被风吹动着，飘来飘去，扫尽了门槛的灰尘，甚至不让灰尘在它近边有一刻的停留。

突然，老张从炕上坐起来了，摇着拳头，挺直了腰肢，仿佛他恢复了他的年青，他的健康，他的勇敢，充饱着他的神情。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一面墙壁被他看做仇人，被他指着、骂着，他在发泄着已经不可抑止的愤怒。

小张的女人被这意外的惊扰停下了她的针线，注视着他，问他：

“爸爸，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他到赵林家去？”

“他去想办法，他不是天天出去想办法吗？为什么他不可到赵林家去？……”

“谁家都可以去，就不许他到赵林家去！”

“为什么？”

“赵林，他是贼！”

他故意把“贼”字加高了重音，然后，他又躺下了，尽量地从胸中吁送着自己愤怒的气息，投入空气中，仿佛投入了一缕一缕的浓烟；被冲动的白色的胡须，不住地搔着自己的唇边；老年已经凹下了的胸脯，也增高起来，有时，张大着嘴，贪吸着空气的时候，会触了他低垂的下颌，然后又随着一声叹息突落下来；这种不安终没有停止一刻，并且在自语着：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爸爸，你歇歇吧，他快回来了，有什么话你不是都可以向他说吗？”

“他肯听他爸爸的话吗？我不要他到赵林家，他到底去啦，不是人，完全不是人！”

“那么……”

她把自己要说的话，又留在喉咙内，让神情表示她久蓄的痛苦，默默地退下炕去，拖着布鞋，由屋内转入厨房。她把米袋里所有的米，投入一个小小的泥盆，随着，又燃起了火。然后，她便绕着锅台转着走，没有离去一刻。

太阳每日的遥远的旅途，又快走尽了，已经近了西山的山顶。山坡的一面，仍披着一片强烈的阳光，如同早晨东山的一面一样；山上有几条艳丽的彩霞，从天空划开了一条异色的天线，裹着一些异色的天花，以一种诱惑性在诱惑人们的眼睛，还有几只黑色的老鸦，飞奔着，追逐着美丽的景色，有的，转了另一方向，在寻觅着自己的宿巢。冷风残暴地吹过，不知道那样匆忙地吹向什么地方去，只看见拖走了些败落的枯叶和房脊上的草茎，却永远也吹不尽这属于雪的世界的地上的积雪，永远还在院里，房上……其他的每处，永远是一片银白的色彩。

小张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沉入夜色中，四面都充塞着一种昏沉的气氛，使他住的小房，在旷大的院中，仅遗下模糊的孤影，纸窗上透出的灯火，还没有雪地上反映的月光明亮。他走进去，看见桌上已经放好了碗筷在等待着他。他的女人没问他什么，也没说什么，只是匆匆地从厨房里把饭送来，放满了三碗，饭盆便空了。

“爸爸，吃饭啦！”

小张唤着老张；可是老张没有回答，也没有一丝的反响，仍是躺着，用手遮着自己的脸。他走过去，扯动了一下老张的衣襟，问着：

“爸爸，睡了吗？”

他又用这话问了他的女人；他的女人，用着一种不敢确定的口气说：

“也许睡了吧？……”

这时候，老张稍把头扬起些，低声地说：

“我不吃啦，你们吃吧！”

小张已经从这话的声调中，辨出了愤怒的成分，他把眼睛向上翻动一下，一只手在拍打着另一只手，从想象中搜取着那愤怒的原因，最后他拖着他女人的衣袖，悄悄地走出来，用最低的声音问他的女人：

“你说什么啦？”

“没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只说一句——”

“说我去赵林家了，是吧？”

“是。”

于是，小张用手掌把他的女人打倒在地上，狠狠地踢了两脚，他问：

“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说吗？”

他的女人，从喉咙中，透出了尖锐的哭声，使老张在屋中向他叫起来：

“我还告诉你不让你去赵林家呢！你怎么去了？”

“我不去，我们都等着饿死吗？”

“宁肯饿死，我不让你去做贼！”

他们坚持着自己的理由，争吵起来，谁也不肯有一丝的退让；最后小张说了：

“谁愿意饿死，谁就饿死；我绝不肯饿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啊，大家都活着，还是那样舒服地活着；我为什么饿死呢？我不也是一样的人吗？”

在这夜里，老张失眠了。小张也没有睡，在地下磨亮了一把旧的尖刀——他将来寻找生活的用具。他的女人，在他身旁哭着，几乎流尽了她所有的泪水。

因为小张的主张，终于把家人从饥饿中挣扎出来，每日的饭菜，没有断过一次，而且在屋内的一角，永远积留着饱饱的面袋和米袋。不过，家里却没有安静过一天，不是吵嘴，便是互相气愤。开始是因为老张自动地绝食了；他的意思——偷盗是最大的罪恶，他绝不愿意从罪恶中寻找食粮。他在三天以内，没有吃过一口饭，所以他病了。虽然经过小张和他的女人几次的劝慰，却没有摇动他的信念。最后他失去了知觉，已经近了死前的一刻；小张和他的女人，用米汤又把他救过来；可是在他发现汤碗的时候，他哭了——仿佛是一个教徒违犯了自己的戒条。于是他吃饭了，不再拒绝给他送来的饭菜。小张特意为他买来些药品和鸡蛋，他在几天后，便恢复了他以前的健康。以后，他因此却常常忏悔，有时，甚至自己偷偷地哭起来，每日躺在炕上不走出门外一步。并且常常骂着小张；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然而在吃饭的时候，却又常常因为骂了小张而使自己更加忏悔起来，感到了更大的罪恶。

虽然，久了；但是他却没有一天不劝小张改悔那种生活方法。他说：

“另去找一条生活的门路吧……”

“我没处去找！”

“那你就留在家里——”

“饿死吗？”

“宁肯饿死，我也不让你再去做贼！”

小张记着自己在恐怖中、苦难中寻找生活，而且常常遭受老张的责骂，他终于严厉地说了：

“你宁肯饿死，你走吧！”

老张走了；在路上经过小张的女人的劝慰，又被拖送回来，仍继续

着小张的主张生活着。

不过，他们父子的感情，却渐渐地淡了。吵嘴的时候，几乎是两个对立的敌人。

有一天的深夜，老张睡了。小张从外面回来，衣襟上有着血滴，脸色苍白，显出可怕的神情。他的女人，惊恐着立刻掩闭了每个门扇，问他：

“你杀了人吗？”

“没有！”

然而在他的女人看见他的尖刀的时候，却证实了他杀人了，不然便是伤人了；因为刀上仍有新鲜的血迹。于是他垂着头默认了。

“呀——”

他的女人被惊得叫了起来；他怕惊醒老张，立刻堵住了她的嘴；可是老张已经醒了，在询问着他。他从衣袋里掏出三个金的戒指，指着他的女人说：

“她看见了，她大声地笑起来了。”

老张无意中笑了，握着戒指，好像在抱着婴儿时候的小张，——在想象中充满着幸福与希望；许久不肯放下，让戒指贴近自己的胸脯，温暖着血流。

突然他看见了尖刀上的血迹，又听见了小张的女人渐渐加高起来的哭声，他明白了，把戒指完全抛在地上，仿佛是随便抛出的垃圾物。他的声音随着他的手抖索出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问着小张：

“你——杀——了——推？”

“我偷了谁，就杀了谁！”

他的声音，表示了厌烦老张的问话。随着老张也被他的话激起了愤怒：

“你知道吗？你不应当杀人！”

“那么我让他捉住我杀我吗？”

老张默然了，没有适当的话反驳小张。经过一刻，他却又愤怒地说：

“你知道，你要知道，你不应当杀人；因为你偷人已经犯了罪，你再杀人，不是更犯了罪吗？”

“谁犯罪啦？我没犯罪，是有戒指的人犯罪了，不然，我能偷他吗？我既不能偷他，我能杀他吗？”

“你说这话，你要拍拍你自己的良心！”

“谁有良心？谁有良心不救救我，为什么让我去偷？”

老张被他的话逼迫着，无话可说了；最后他无情地骂了他一些话，结束了。

然而小张却故意地讲起他这次偷窃的故事，在气着老张。他的女人，一面拭着尖刀上的鲜血，一面给他暗示着眼色，意思是让他中止。他地问：

“你怕听吗？”

她在胸前摇摇手，然后指了老张的背影。他随着她的手指望望，又说：

“谁怕听，谁走啊！”

他又继续讲下去，他讲得最详细的，是故事最惊人的几段；第一段

是掘洞，第二段是开箱，第三段是杀人。每一段他都赞颂那把尖刀，一直到最后，他还在赞颂着：

“真是万能的刀子，有它，我不怕一切！”

老张听着，好像那把尖刀撞入了他的胸脯；可是他忍耐着，到了天明。

小张与他的女人，刚刚睡去；因为在夜里，他仿佛几次地做了恶梦，被惊醒来，脸红着，额边满了汗水，她陪伴着他，看守着他，直到他睡去以后。这时候，老张悄悄地起来了，偷了那把尖刀，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使小张失去了偷窃的用具，也许改悔了，即使他仍继续偷窃，买了新的刀，也许不如原有的尖刀惯用；二是准备着自杀。

太阳起来了。早晨有着比黄昏更美丽的景色；杂色的云，白色的雪野……没有一处不是在诱惑着人们，给人们一种不是金钱所能购买的幸福；更幸福的，是鸟；因为它们比人们更能接近那种美丽的景色；它们张着翅，可以随意飞向它们所愿去的地方；然而它们却忙迫着，经过遥远的飞行，去觅粮粒，去找草茎，给自己造宿巢。

街上的人声，渐渐地响起了，老张一个人走出了自己的家门。

老张在街边的破庙里伴着许多乞丐睡了一夜之后，他把他离家的原因，说给他们听了。有人因为他已经年老，怜悯他，劝他回家；他却没有被接受，他说他情愿随他们做一个乞丐。他很得意地说：

“做一个乞丐总比做一个贼好！”

然而，不久他便知道了好多乞丐都是贼。因为讨不着饭，在饥饿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就去偷窃食物，甚至没有机会的时候，都去抢夺食物。他既不能偷窃，更不能抢夺，便不得不饿着肚子了。即使有同情他的乞丐，分给他一些食物，那不是偷窃的或是抢夺的吗？也许比吃着小张的食物更加痛苦吧？于是他悔了。随着他便起了自杀的想念；可是被一个乞丐看破了，救了他，劝他仍是回家去，他听了，走了。

然而，在他走近家门前，遇见了小张，听见小张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还是得回来吧！爸爸，这次你也许赞成了我以前的主张。”

老张感受了意外的羞辱，脸红了，白色的胡须，仿佛更白了些，他抑制着自己的气愤，终于是不可抑制了：

“你不应当这样说，一个儿子不应当这样对他父亲说——你要知道！”

“一个父亲也不应当不原谅他的儿子，骂他的儿子——像以前你待我那样！”

老张知道了他们父子的感情已经破裂，任谁也无法弥补了，他更任着暴性，痛骂了小张：

“你不是人——”

“那你就走吧！”

“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东西，在你小的时候就把你活埋了……”

他没有骂完，小张已经走远了，他终于又走回了破庙。乞丐都奇怪他为什么又走回来呢？他不得不把他这次的经过讲给了他们。救过他的那个乞丐听了，最愤恨了，主张用那把尖刀杀死小张。他却不同意，他说：

“一个人最好是少造些罪恶！”

然而他在几次饥饿的时候，也做过几次偷窃。不过，被他偷窃的人家，都是他认识的朋友。因为他想如果他偷窃的行为败露了，他的朋友也会宽恕他；如果他偷窃的地方，都是他不相识的人，被人发觉的时候，必然要受到无情的打骂，甚至被捕，做了犯人。

此后，他在生活上，确是遭了很大的打击，已经是一个疯人，在狂乱的思想中，只有生的意志，却很少起着自杀的动机——虽然有一次几乎被他的朋友捕获了，他准备着把身边的尖刀撞入自己的胸脯。

小张在幸运中，没有被捕过一次，并且渐渐有了一些积蓄。裹成了一个小小的纸包，放在一处最秘密的地方——这也许正是一个贼人担心着另外的贼人。

那天他吃了酒，很早地睡了，在夜深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丝的睡意。

窗外死静着，月光偷偷地透入了他的房间，所有的东西：桌子、椅子……都从模糊的色中，露出了清晰的轮廓。他在预想着他所要偷窃的时候，他发觉了房门边一些轻微的响声。于是他走出去了，看见了门槛下已经被人掘了一个洞穴，而且有一个人正恐慌地向外爬行着，他立刻拖住了那人的两腿，从身边拖过几条木柴，添塞在两腿下，使那人既不能爬出，也不能退入，只是让整个的身体，一半留在门外，一半留在门内，腰部恰好被压在门槛下。

“起来！”

他唤醒了他的女人，她因为骇怕，特意燃起灯火，她看见那人在那种留难中，便斥责了他：

“他如果是你的时候，你该怎样想呢？”

“我不想捉住他，我要放走他。”他把头送到那人的近边说：“我是告诉你下次不要再来了。”

然后，他把添塞在那人腿下的木柴移开了；可是，那人没有立刻脱逃着爬出，他又用脚触动那人说：

“留给你活命，快些跑吧！”

他的女人，奇怪了，把灯放下，她轻轻地拍着那人的腿，低声地说：

“我们放了你，怎么还不快跑呢？”

那人仍留守着原位，没有移动一些。

“这是为什么？你说，你说！”

她又向那人说了；仍是没有回答。

他惊了，握住菜刀，把门开了。门外没有一个人，他便放下了菜刀，又移过灯火来，他看见了那人手里握着一把尖刀，已经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虽然是在夜里，仅有微弱的灯光；但是他与他的女人都认出了那人是一个年老人，是老张。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无国籍的人们

在我们这些被拘留的犯人中，有两个白俄，一个是穆果夫宁，另一个是他的女人。听说他们犯的不是同一的案件，穆果夫宁是因为偷窃的嫌疑，他的女人是因为做私娼的缘故。不过他们被拘来，先后只隔六七天，在一星期内他的女人已被判决了五十元的罚金，可是她没有钱，也交不出铺保；他呢，还在侦察的期内，所以他们仍是同样地被拘留着。

我认识穆果夫宁，那是因为我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常常感到苦寂，便常常把身体移近门边去，从门孔探视着外面；恰好他的门孔正对着我，中间只隔了一条窄窄的过道；他总是把脸孔塞在门孔间，我很清楚地看见他那哥萨克衣服的花领，他那深陷的眼睛，过长的头发和过长的明须，遮住了他的脸颊、下颏，只让沿着眼边的一圈皮肤赤裸着，蓄藏着尘土。我常常很清楚地听见他唱的歌：

花落了，
心伤了，
在这天涯！

……

……

这种悲哀的调子，常常打动我的心，使我记起了一些悲哀的回忆。

有一次我向他说：

“你不唱吧，朋友！”

“那要在死后的时候。”

我们这样地认识了；以后，便常常打招呼：

“你好？朋友！”

我们这样互相交换了一句话，几乎像是几年前的旧友一样。

他的女人，我不认识，并且，从未见一面。她被锁在女拘留室里，没有一些机会让我们相识。只有每天“放茅”的时候，尽量地把眼睛从门孔投向侧方去，看见她的一块红色的衣襟，飘下了楼梯，立刻便没尽在转角处。在晚间，我常听她唱歌，向看守换取几段短短的烟尾巴；或是看守故意找了她，调笑着她：

“我住你一夜，多少钱？”

或是：

“天生不是人种，谁像那样蓝色的眼睛，黄色的头发？就是一块钱，有谁肯住你？”

然而也许赠送她一只贱价的整烟，使她清脆的笑声充塞了长长的过道，从所有的门孔透入房里。有的犯人偷偷地骂着她，谈着她；穆果夫宁却闭拢了眼睛，默默地叹息了。随着，他又独自地唱起来了：

白云下，
有我的祖国，
有我的家。
风雨中，
有我的一颗心，
有我的一朵花。
花落了，

心伤了，
在这天涯。

……

……

“十二号两个小穷毛子！”

看守的喊声，截断了他的歌唱；有两个俄国孩子踏上了楼梯，在过道上徘徊起来了——就像被猎人击败了的雁群遗下的两只小雁一样。然后来了一个看守，用铁钥撑开了我们下的铁锁，向他们说：

“这就是十二号，进去吧！”

于是他们被锁在我的房里了。他们像小鼠一样，远远地避开我，蹲在一边的墙角下探望着我。我看见他们很爱护他们已经裂了缝的西装上衣，珍贵地从身上脱下来，舒展着叠起来，身上只留着一件衬衣和短裤，上面已经积满了日久的灰尘。裤扣散着，用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我知道他们也经过看守的搜查；不过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犯的是什么案件。

他们没有一点睡前的疲倦，总是在翻动着他们带来的两个黑面包和几块糖果。

在他们听见穆果夫宁歌唱的时候，他们向我问了他的姓名。于是他们感觉到他们与他是同一民族，激动了他们的同情心，他们中间的一个说：

“给穆果夫宁送一块吧？”

“你看怎么送？”

他们撞着铁门，那比墙壁更结实些。

“多么结实的啊！多么结实的啊！”

他们从门孔打着口哨，向穆果夫宁的门孔叫着。突然穿着皮靴的白俄侦探的脚步一声声地响近来，口哨便瘖哑了。他们偷偷地互相触动了一下，仿佛他们在隐藏什么秘密，从门孔退远了身体。皮靴声留在门外，有语声送进来。

“孩子们，来！”

孩子们从他的脸上，话声中，不但没感受到同一民族的同情人，反而加多了恶感，所以静听着他的问话。

“叫什么名字？”

“果里。”

他的话声有一些颤抖，眼睛死呆地注视着问他的人。

“岁数？”

“十五。”

“从哪里来？”

“上海。”

“到青岛来做什么？”

“是不想到青岛的。”

“那么哪里是你想到的地方？”

“祖国。”

“祖国？”

分明是极大的疑问，又觉得是意外奇特，皮靴在门外踱起小步子在

想着，自语着：

“祖国？”——“你没有家吗？”

果里的眼睛向上滚动了两下，尽量地展开自己的聪明。

“是的，没有。”

再问另一个孩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回答，只是比果里小两岁，名字是力士。

我却分辨不出他们哪一个是果里，哪一个是力士，身量一样高，面貌又极像，都有尖尖的鼻子，伸出很高，很长，眼睛深入在眼眶里。

在早晨，他们看出我们住的不是房间，而只是小小的洞穴，那么小的窗子，又隔上铁柱与铁网。天是澈清的，在云的缝隙里流着阳光。同时我也看出他们哪个是果里，哪个是力士。果里的脸上落满了雀斑，力士除去下颏上的一个黑疤，全是白净的皮肤。

白云下，
有我的祖国，

……

“王八的儿！睡觉还唱，该打你了。”

有本棒向铁门上冲击了两下，很清脆的。

有我的家。
风雨中
有我的一颗心，

……

木棒落在皮肉上，也很清脆地响了一声。

“你怎么打人？”

“混蛋，你怎么总在夜间闹？”

然后，便没有一句话了。只听见像大树干零落地倒下，交组着粗燥的喘息。

一声警笛换来些零碎的步骤，其中有一个穿着皮靴的把地板蹬得最响。

咳嗽代替了鼾声，在每一个房间里响起。

我和两个孩子没有一刻合拢过眼睛，更兴奋地拥在门旁，小小的门孔挤着我们三个人的眼睛。

“躲开！”

是愤怒激动了他们吗？不然怎么把我的头从门旁推开，那样无情地厌恶着我。可是刚才我对他们像是几年前的童友一样，哪里会惹起他们的愤怒呢？

“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多好！”

“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好像没有国家的人呢？”

“妈妈还不想回国呢，那耻辱在我们的身上会一天一天地加多啊！”

皮靴声响近了，他们起了一阵快感，匆忙地让我向他们手所指的地方望去。是一个警官，身体与胡须都是粗壮的，眸子和他们的眸子是一样的颜色——那个询问过他们的白俄侦探。

“穆果夫宁！”

他的脸色在灯光下看来是一副很残酷的木刻像，使他们看见他以后也感到极大的惧怕。

穆果夫宁的影子从门缝间显露出来，向着那个白俄侦探默然地站着。那个白俄侦探踏着脚，好像故意让他的皮靴在灯下吸取光亮。他严厉地说：

“穆果夫宁！你要守规矩！”

“我很守规矩。”

“这里有报告。”

“那是不真的。”

“你撕掉了值班看守的记章，你不承认吗？”

稍稍地冷静了一刻，他们不动地倾听着。

“他自己撕掉的。”

“混蛋！”

坚硬的鞋底突然在地板上震动了一下，那响声里仿佛表示着人间所有的尊严与残酷。

穆果夫宁没有回答，那个白俄侦探命令另外几个看守说：“给他戴上。”

于是铁与铁绞成的链锁缠绊着穆果夫宁，限制了他步子的距离。

恐怖威胁着他们，使他们不能随着我睡去。

没有月亮。星也藏在云层里。一块黑色桌布般的天空堵塞着窗子。一切的骚音都在这死静的夜中沉默了。

不知某一房间突然响起鼾声来，一声一声地破碎着夜的安静。值班的看守巡视着，骂着，制止着犯人的鼾声。许多犯人被惊醒来，鼾声停止了，可是又起了咳嗽声。等到咳嗽声停止的时候，穆果夫宁的女人还在哭泣——虽然值班的看守也在制止着她。

不仅犯人的行动受着束缚，而且犯人的声响失了自由。值班的看守好像永远要保持拘留所的安静，同时拘留所也好像永远没有安静的一刻。

这两个孩子和我做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很诚意地把面包分给我吃。我常想两个孩子孤零零的，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并且被他们不曾看见过的铁锁锁了起来；在几万里的旅途上，他们困在中途，他们的衣袋里全空着，如果他们以前有了十元钱的话，买了船票当然不会把他们锁起来，那不是很自由地可以从这海上驶过了吗？然而现在属于他们的是什么呢？在世界上所有的之中也只是那面包，只是那几片黑面包。

“孩子们，把面包留起来吧，我不吃啊！”

我是饿着肚子，不是不吃，只是不忍吃。而力士却纠缠着我：

“不吃？不行！”

果里还好，他听我说，我不吃他会立刻允许我，离开我，自己倚近墙壁，用指甲刻记下他所喜欢的歌谱，嘴里哼着不完整的调子。

可是力士还滚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我们吃了你不吃呢？”

旁人把手伸向力士的时候，力士摇摇手，那些手便只好自动地收回去。

我吃过一片面包，力士才放开我。在墙壁上他也划着，划了一个平行四边形，有一边划弯曲了些，像一条弧线，他还在修改着。我想力士是要作一幅画，但是他的指甲几次地贴在墙壁上，又几次离开。

“祖国的旗是什么样的呢，果里？”

力士推动着果里，还在脑子里寻找他所记忆的印象。果里已经把一只锤子和一只镰刀交叉地放在四边形的一角上。

“我记得不是还有一个小星星吗？”

“小星星？”

果里也记不清应当把小星星安排在何处。

“你忘了吗？在上海有一天下雨的时候不是经过一个很高的、白色的楼房，房顶挂着一面旗吗？”

“啊，对，对！”

果里在另一角划下一个星子。

“不对，不对！”

力士只知道不对，也不知道应当把星子安排在哪个位置上。他把四边形向下垂的一边引长两倍，做了旗竿，又划了一个人形肩着旗竿。

“那个人是年轻的，是年老的？”果里指着墙上的人形问。“自然是年轻的。”

“那腰怎么却弯曲了呢？”

力士匆匆把那人的腰给伸直了。

果里赞扬着说：

“好健壮的年轻小伙子！”

“不，我画的是好看的姑娘啊，你没有看见头发那么长吗，那不是还穿着裙子吗？”

力士好像自己也看出那不像长的头发，不像长的裙子，便另画了一面新旗，肩旗的姑娘把长裙子脱下来了，露着两个肥大的乳头，头发弯弯曲曲的已长过肩，好像他要以她的长发和大乳证实她是一个姑娘。

“好看的姑娘，好看的姑娘！”

他们在这样默语着。

肩旗的姑娘结了队，肥大的乳房也结了队。面包仿佛被姑娘偷吃了那样快的减少下来，减少得只余两片。一夜刚刚过去，窗洞上刚刚溜进一缕阳光，印在墙上。力士与果里常常夺取着那墙上的阳光，温暖着自己的脸，张开贪婪的嘴，深深地呼吸，换几口气息。屋里的空气真是太坏，每一口的呼吸里都会使人感到多少细菌爬进喉咙，头昏昏沉沉的要呕吐。

其余的人却像无知无觉地生着，在果里与力士的身上寻找着许多故事讲着，在故事中间有人常提出疑问来。

“他们是外国人，怎么让中国人押起来呢？”

哪里也有聪明的人，给解答着。

“白毛子还不如中国人呢；走到哪里都有人管他们。第八号那个女妖怪，第三号那个疯子，和他们是一样人！”

有一个白胡子的老头，似乎有什么感慨似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记得白毛子打辽阳多凶！”

果里听懂些，力士只顾着吃那两片面包。

一直等到“放茅”的时候，果里觉得是机会来了，想法子怎样把面包转到穆里夫宁的手里。

铁门一个一个地展开，一个一个地锁起。

哗啦哗啦；铁与铁绞着皮肉的声响有节奏地，波流一样地流过来，果里匆匆地把头探到门孔旁，手里准备好了两块面包。不是穆果夫宁，那是一个带脚镣的中国人。

我们门上的锁刚抽出去，两上孩子合力地突然把门挤开，疯狂地向外跑，看守竟被门撞倒地上。

“王八蛋们！快给我滚回来。”看守喊。

看孩子们的意思还不想回来，再一伸手便可以把面包传进穆果夫宁的门孔里。他们望一望穆果夫宁的颧骨，快突破皮肤而外露了。眼睛呢，只是一直线，分成两段，还没有眉粗，让长长的头发与黑胡遮成一个不完整的脸孔，偷偷地从门孔旁躲开去。

虽然看守像放进油锅里的活鱼一样地蹦跳着。他们仍是有些不在意地走回来。当看守的木棒在他们的肩膀和背上断了一根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全没表情，全是惨白。只见他们的眼睛渐渐地张大，张大；气息渐渐地随着粗燥起来，仿佛是两个饥饿的小怪兽，要贪食着食物，要寻觅着食物。

看守又找来了另一根木棒，在他们的头上比量着说：

“认识吗？”

他们的眉间向上抽动了一下：

“啊！”

这声音潜伏在他们的喉咙里。

突然，看守冷笑了：

“王八蛋们，谁让你们跑？”

“不是你开的门吗？”果里喊着。

他会说很好的中国话，然而力士像是一句不懂地停留在他的身旁。

“穷毛子，你们要造反了吗！”

看守这句话果里不懂，他骂一句：

“你娘的——”

看守为了看管别的犯人，他没听见。

这时候已经轮到他们“放茅”了。

看守故意为难他们，用木棒威胁着他们：

“让这两个王八蛋去倒马桶。”

我们屋里的马桶已经有人提起来，看守却抢下来，摆在他们的身前。

那么大的马桶，装满着二十多人的粪尿，孩子们怎么提起，走过狭窄的楼梯呢？同时，谁也不敢替孩子们提，更不敢替孩子向看守说什么好话。

孩子望了马桶，望了看守的脸，转回屋里，放下面包坐下了。我们这屋里的犯人早走出过半数，看守紧逼着孩子们提去马桶，我看看守的神气，就是孩子们不要到厕所去，也要叫孩子们去倒马桶。

“去！”

力士看见果里举着拳头站起，他的拳头已经落在看守的腰部，扯着看守的衣袖说：

“去，去见戈比旦（俄语：长官的意见）。去！”看守终于容许了他们拒提马桶到厕所去，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两片面包却被犯人偷食了。

有一夜，我与他们因为太疲倦的缘故已经睡去，谁知在半夜被惊醒了。

“穆果夫宁，穆果夫宁！”

看守增多起来，在过道上来去着。渐渐地又听见穆果夫宁的女人忙迫地问：

“穆果夫宁怎样了？”

似乎没有一个看守告诉她所要知道的，所以很难使她的两唇闭住，停止她的问话。

皮鞋声一声一声地爬上楼梯——那个白俄侦探又来了。询问所发生的事情。

“穆果夫宁上吊了。”看守回答了。

那个白俄侦探听了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译为俄语自语了一句。这使穆果夫宁的女人听了哭了。

“发现得很早，穆果夫宁还安全。”

她的哭声变做不可制住的呜咽。

那个白俄的警官命令看守把我、果里、力士改押在穆果夫宁的监房里来。

他向穆果夫宁说：

“这次宽恕你。你要知道这是法律所在的地方，我负有责任，是不允许你有轨外行动的。”

“果里，力士！”他转向他们又说：“你们同穆果夫宁谈谈，玩玩，不是很好吗？”

最后他以更严厉的态度向我高声说：

“把你也押在这地方的原因是要你随时都监视他们。如果发现有一点轨外的行动，你立刻报告值班的看守，不然，你就负责任了！”

他临走时，自动地把穆果夫宁用衣服布条结成的绳子拿去。

穆果夫宁上身是哥萨克式的衣服，衣边每处绣着花纹，紫色的，围着绿线条，在线缝间藏满着飞扬的尘屑，像他赤着的脚，在皱纹间夹着的泥渍一样。他倚墙倒着，静默着，仿佛这房间里仍是像只有他一个人一样的孤独。

“小朋友们！”他开始说话了！“你们为什么被押在这里的呢？”

“我们坐船没买船票！”

果里反过来问：

“你呢？”

穆果夫宁摆头不语，把话转了方向。

“你读过书吗？”

果里默认着，力士摆着手。于是穆果夫宁靠近果里，亲切地问：“你读过谁的书？”

“普希金——”

“他是我们最伟大的文学家。他以外呢？”

“高尔基！”

穆果夫宁以很正确的态度教训地说：

“高尔基，以前也是我们很好的作家，可是以后他做了叛徒。”“高尔基是叛徒？”

“真是混蛋！”

“斯大林呢？”

“强盗！”他又嘱咐果里说：“你应当记住斯大林是强盗。”在夜里，果里还在自语着“强盗”两字，但他终没有将“？”“！”择取其一确定地加在“强盗”两字以后。

果里与力士除去向我探询被释放的消息外，便在墙上涂着他们所喜欢的形象。

穆果夫宁每天在墙上用手指刻划着一些字迹，然后自己读着，读到高兴的时候，便唱起来，不然也给果里与力士讲述着故事，或是校正他们的思想，阻止他们往祖国去。

不过他最后病了，便不常说话了。

穆果夫宁病着，眼睛都迟钝了。在“放茅”的时候已经不往厕所里去，每天都使用着马桶。不过这次他却移近门边，等候他的女人经过他的身前往厕所去。在他的女人还没走近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一声：

“晚安！”

“我的小鸽子，你瘦了！”

“不，我很好。”

他勉强着自己说的话，仿佛仍是强壮而有力。

“我看你病了！”

他的女人说了。然后要让自己的嘴唇去接近他的嘴唇，突然却被看守分隔了他们。

果里很奇怪着他们的动作，不自主地问着穆果夫宁：

“那个女人是谁呢？”

“我的女人。”

“她为什么被押呢？”

穆果夫宁脸红了，好像他怕说出他的女人是暗娼而耻辱了自己，不得不骗了果里：

“因为她作舞女——”

“哼，做舞女都不如做‘强盗’！”

这房间里，又是我一个人了，他们离开我同是在一天，穆果夫宁被掙到墓地里去，孩子们被释放又走上了他们自己的旅程，留给我的只是穆果夫宁的女人的哭声。

（选自《战地》，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手铐

在失去了的我的故乡，我被以“叛国”的罪名逮捕了。然而，我终以最大的冒险打伤一个看守，逃出拘留所以外，脱去了自己的手铐。

正是春天。一年中，正是春天的景色那才美丽而诱人呢！那鲜绿的树枝，结满着鲜绿的小叶，在风中，自由地，任性地抖动着，尝着新鲜的空气，风停了的时候，它们仍保持着原有的可爱的姿态，诱着行人；仿佛它们都是最美丽的小姑娘，却不满成人的年龄，使一个最荒淫的男人，也只有爱她，留恋她，而不敢占有她、对她起淫念。那高空中天面，明朗而鲜艳，会使一个忧郁者，从它感受了欢快，会使人疑心它是经过

名画家的笔，描绘、渲染，不然，也是经过人工的移动，搬运，把全部的云片，改换了原在的位置，才配合起来，不让青，白，淡红仅有的三色显得单调。那春风，以一种温柔的气息冲入鼻孔，好像通过全身的血流，直至心的深处；即使潜伏着毒质，中毒而死，也绝没有一句的怨言，遗给人间，且会在脸上留有笑容，表示着死后的极大的满足。那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由地生长，自由地存在；虽然有灭绝的时候，也都是自由地灭绝！

我敬慕它们，更敬慕自己；因为我也自由了，有着它们一样的自由。

然而，我的心，却紧缩着，担心着我再被捕回的危险。不过，我决定了——以我的生命保卫我的自由；如果，我的自由失了，我也死了！

这时候，我恢复自由已经有十几分钟了。我走过江岸的一条石路，走向我的家去。左侧排列着高起的楼房与整齐的院墙，有商店，也有住宅，右侧是一条江流，迅速地流去着，好像故意催促我加快步子。我一边走着，我一边疑心身边走过的行人与划过的小船，不是被侦探查悉了我的行踪在追随着监视着我吗？——怎么他们都以惊异的眼色投向我呢？我检视着自己身上碎了的衣服，破了的鞋子，同时，我也忆想着自己憔悴的脸面，长而且乱的头发，这些不是已经替我说明了我是一个逃脱的犯人吗？我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保持着我能保持的镇静；因为我想像着自己也类似一个流浪人，莫非所有的流浪人都犯罪了吗？然而我发现手腕被手铐遗下的一圈的条痕的时候，这将是最大的证据；我感到了手铐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为什么不早些破碎了它？反而让它伤害了我！突然，我记起了手铐的形样；以铁质制造的一双相连的铁环，垂着一个坚固的小锁。它丑恶，它无耻，它代敌人施展着暴力，我悔恨自己，不该把它抛在路上，应当让它沉入江底，永远不使它摧残我以及摧残任何人。

幸是到家了，我并没被检查过一次。可是，我的母亲被我惊了，哭了。我不知道她曾如何地保留她那样大量的泪水，仿佛她生前没有流过一次，也仿佛她要把她生后的所有的泪水，在这一次流尽。我看她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惨白的脸色，只是因为哭声震动着胸脯，只是握着我的手腕，让我的手放近她的脸颊上，——好像她的心情，要我从手指默默地感受！弟弟，妹妹都包围我，为了会见自己久别的哥哥而感到欢喜，可是为了母亲，又以欢喜换来了悲哀。他们不敢问我什么，也不敢问母亲什么，悄悄地站在我的身边，摸着我的衣袖，衣襟，又从上身摸至下身，他们几乎表演尽了人类的最高的爱情！他们的手指每次触动我的时候，使我跳着的心而更跳，使我感受了他们如何地亲近着我，爱护着我。突然，母亲从她的脸颊抛下我的手，——我知道了自私的心征服了母性的感情，她担心着我被发觉再被捕回以后，连累了她，甚至牺牲了她。她匆忙地离开我，走向另一房间去；取来了我从前的几件衣服。她要我换件衣服逃走，逃向何处，随我自便。可是，我要求她，收留我；她不肯。我再要求她，收留我一天，一刻，待我剪去长发，或是砍断了我的手腕，我情愿此生做一个残缺者；她也不肯，要我立刻离开家门，哪怕只要在门外一步。这时候，我们母子天性所遗传下来的感情断了，如同路上相见的路人一样；也许她死，我死，彼此都没有一丝的留恋。于是，我决心离开她了；虽然我知道街上为了我，已经布满了侦探，像网一样

地隔着我的逃路，网的隙孔如何地使我偷过！我换着衣服，可是母亲又哭了，她的心情，如何地矛盾，惟她自知；她哭着为我梳理头发，洗脸。不久，我便走出了家门；在窗外我听见了弟弟，妹妹的呼声，母亲忏悔中的叹息。

街上的景色，仍然一样美丽而诱人啊！可是并不给我以美丽的感觉。在我只有冒险的恐怖与畏惧。我为了藏起我的手腕，把手深深地伸入裤袋里，——发觉了母亲给我偷放的几页钞票。我的心跳着，几乎要跳出身外，身边驰过的汽车的笛声，都会使我突然惊抖，我急于需要一杯酒，麻醉一下神经；可是走错一家水

果店退出以后才转入地下的酒室，饮尽了一瓶酒。我走出酒室的时候，我的步子错乱了，被我视取的地方，模糊了。

时间，近于正午了吧？公务员该下班了吧？侦探也是公务员，他们不休息一下吗？

太阳以清晰的轮廓留在天面，为什么有时涨大又有时缩小呢？

它的光条为什么有时放射又有时收回呢？它每天每时都是如此地幻变吗？

街树倾倒着，错乱地倾倒着。然而地上却不见有倒下的树存在，仿佛它们都有着弹性，倒下会自动地弹起，仍然在原位直立。

我身边的房屋，都在滚动，旋转，不住地阻碍着我走去的方向。在一条街边的转角处，我突然听见了一声警笛的声响，我好像从梦中醒来了，神经清晰了。我知道逃，让自己的步子越快，越好，跌倒了，再爬起来，立刻继续着逃。我发现前面没有一条去路了，便转入了公园。

大批的警车赶来了，大批的侦探与警察包围了公园，——每一门边都设了双人的岗位，在园里游春的人们，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完全骚乱了，分做数批人群拥塞着每个门口，可是警察不许他们走出，同时，侦探也不得走入，互相堵着门口，双方都是一样地不能满足各自的企图。我藏在人群中，我很安心，至少这一刻我很安心，一刻以后，我不能想，也不知究竟将临如何的境地。最后有一个侦探来了，他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拿着的，就是我抛弃的手铐。他命令警察从这一个门口放人，放出一个人检查一个人。这时候，我该承认自己，不但不醉，而且比常人清醒，——我记起园内的公务员的住宅中，有我一个朋友的家庭，我悄悄地从人群里退出来，去了。

朋友的门锁了，他从窗子看着我，明白了我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我；可是不给我开门，我商议他，几乎是哀求他，收容我一刻，待过这暂时的危难。他终于被我感动了，开了门。我感谢他，不是任何言语与任何礼拜所能表示出来的那般，情绪在我的脑中膨胀着，使我抱住他痛哭。他抚摸我的头，安慰着我。然而，他的妻子，怕为了我，使她的丈夫陷入不幸；要他把我送出，或是逐出。他以严厉的眼色，制止她不该有那种念头，表示一个人的卑鄙，无耻，罪恶，失去了的天性。然后，她走近我的身边来，哀求我，要我自动地离开她家。我看看窗外，是一片绿色，和平而安静，路上没有一人经过，只有在枝间飞舞着的一只小鸟；我要扑住它的翅膀，随它飞出她家，飞出园外，任它飞往何处，我不怕生活不幸福，只要有自由。我看它很久，并不飞近我来；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她：抖动着我的衣襟，催迫着我。因此，他愤怒了，不惜

说出了最伤夫妇感情的言语。随着她也愤怒了，激烈地喊着，逐我去；这种表示，并不是向他报复，而是为了更爱护他。我如果是一个有血气的人，我该走了，——即使走后危险，甚至死亡，可是我仍然忍耐着，看着他们夫妇的感情为我而决裂。

窗外，渐渐地骚动了，杂乱的步声传近来；游人走尽了，侦探开始搜捕了吧？

于是，她疯了一样，骂着我，打着我，扯着我的耳朵，想把我扯出门外。他越劝止她，她越加高她的声音，就像告密一样。他慌了，他的手与脚，都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停放。我不能不走了，他却拖住了我，表示也许在幸中过了难关，如果不幸被难了，他愿与我同亡，所以他更不惜用短刀伤了他的妻子，把她送入内室。我有些惊异，在这世界上竟有他这样的一人，任肯牺牲自己妻子的感情，肉体，为了援助一个不幸的人，为了保存人间几乎灭绝了的正义！这时候，我被他感动得情愿交出自己的头颅，不让不幸临近他。不过，侦探敲门了。好像他已经为我备好藏身处：地下停放的衣柜，我进去以后被他锁了。我蜷伏着身体，眼睛靠近了衣柜的锁孔，窥视着。

我的朋友开了门，侦探进来了，客气地问着他；他也客气地回答着侦探，否认着他收藏任何的外人。侦探几乎信了，并不疑心他什么。然而不久又一个侦探进来了，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拿着的，就是我抛弃的手铐。他以一种凶暴的脸色，逼问我的朋友；仿佛要给我的朋友戴上我抛弃的手铐。

我气闷着，心慌着，头上流满了汗水，一滴一滴地沿着我的脖颈爬下来。我也不知自己在做着什么想象，只听见我的朋友的话声以及他的妻子的呻吟，仿佛是一条一条的钢针，刺透着我的耳孔，我的心。我盼望一切的声音，立刻结束；因为我忍不住了一种精神与肉体，合成的苦衷，我要从衣柜里跳出去。

突然那个后来的侦探，用我抛弃的手铐打了我朋友的脸颊，这种侮辱，比侮辱自己更甚！我想着，为什么让我抛弃的手铐，摧残我的朋友呢？我悔恨着自己，不该把它抛在路上，应该让它沉入江底，永远不让它摧残我以及摧残任何人。

我的全身都被汗水湿透着，眼里却有火一般地燃烧着；不然我的泪水比汗更多。

在我看见那个后来的侦探第二次举起我抛下的手铐要打我的朋友的时候，我暴怒了，一脚踢开了衣柜，一拳打倒了他，从他的手中夺回了我的手铐：

“还给我吧，这是我的手铐！”

（选自《海的彼岸》，1940年9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夜 景

在月光与灯光相混的明亮下的街路上，我遇见一个几乎赤裸着身体的女人，向我跑来；跑近我的身边，她抱住了我。

即使我不是一个勇敢者，我也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夫，不过为什么我的全身都抖动呢？使我想象着世界上确有传说中的魔鬼吗？不然她为什么不向我说一句话呢？我抑制着自己的恐怖心情，镇静了一下，细细地检视着她：脸面被她那长长的开散着的发丝与泪痕遮没着，不让她的眼睛，鼻子、嘴唇完整地露在外面，在她那般枯瘦的身体上，却有着—双饱满的乳头和饱满的腹部——藏着临产的胎儿，腹部以下，便是仅仅被一层皮包裹的两条腿骨，支撑着沉重的上身，我几乎担心着她的上身压断了她的腿骨，她的手，仿佛是巨形的鸡爪，抓着我的肩膀。在我检视以后，我认为她并没有一处失脱了人形的常态，相信谁也不敢把她分划在人类以外，指为其他的动物之一吧？可是，她为什么仍然不说话呢？只是让她的嘴唇颤抖着；她的话，好像都留在她的嘴唇以内。

“你告诉我——你是谁？”

我终于问了。她摆动一下头，让遮蔽她眼睛的一束发随着夜风飘向头后，认真地看了一下我的脸面。于是，她尖锐地叫了声——经过颤抖的嘴唇，好像沿着一条曲线，起伏地传入我的耳孔，使我感受了她所感受的惊奇，恐怖，羞愧。这时候，我知道她捉错了人。然后，她立刻放了我，继续她的路跑开去。

我留在路上，注视着渐远的赤裸着的背影。这时候，我被好奇心所激动，转回自己要走的路，追向她去。

我追上她的时候，这次我拖住了她。她看看仍然是我，她要立刻在我手中挣脱：

“你放开我！”

“我不，我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么？你这个讨厌的大兵！”

她憎恶地望着我，好像要把我身上的军装撕得粉碎。可是我向她仍以友善的态度：

“我要知道你是谁。”

“你想我是谁就是谁！”

她用一只手打起我握住她的另一只手的手来。其实，我该放走她，任她去。可是，我却仍在问着她：

“我问你——你要做什么？”

“我要去，——我就是要去啊！”

“去向哪里？”

“去追一个人！”

“哪一个人？”

“害了我的一个人！”

我听了她的话，不知为什么没有经过一些思索，便很直率地问了她：

“害了你的一个人，是强奸了你的人吗？”

“放屁，放屁！”

随着她就在我脸上打了一掌，我为了隔住她的第二掌，我的手指触

了她的胸脯——这仿佛故意毁弄了她那女人的尊严一样，狠狠地又踢了我一脚。我如果以一个军人的身分，我不该让她这样侮辱我了吧？不知为什么我还在问她：

“你追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我的丈夫！”

“你们为了什么事情呢？”

她不肯说，同时我也没有再追问她，因为夫妇间永远保藏她不肯外传的秘密，所以我放开她，让她跑去。并且我也没有更多的余闲，在一小时内，我要辞别几个好友，明天我将要随着军队开到前方去。

我刚刚走开几步的时候，便听见了她又在背后唤我：

“你回来，我要问你——”

“你问我什么？”

“你是从这条路上来的吗？”

“是的。”

“那么你遇见我的丈夫了吧？”

“你问的真奇怪，我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这路上在夜间很少人走吗？”

“这路上，在夜间，是很少人走。可是我也不敢说我遇见的人，就是你的丈夫吧？我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样的人？”

“他和你一样，也是个大兵！”

于是我记起了在路的转角处，有一个士兵，叫开了一家已经关闭了门的酒店，进去了。我告诉她的时候，她那忧伤与愤怒的神情，才淡了些。她要回家穿好衣服，再去会见她的丈夫；请求我先为她看守她的丈夫，她未来前，不让他离开酒店。

“你为什么不先穿好衣服再追他呢？”

“他怕我追他，他才趁着我睡觉的时候跑了；等我穿好衣服他跑得更远了！”

“你想想，我有什么权利看守他呢？”

“你做些好事，你不可以想一种方法，让他在酒店多等些时候吗？我告诉你，他是爱喝酒的！”

我因为忍受不了她那小羊一样的哀求，便允许了她，我临去的时候，我决定只是去监视一下的她丈夫，并不让他知道我是为她在看守着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夫妇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向回路跑去了，我又问她：

“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呢？”

“我告诉你我的丈夫在机关枪连，他叫张海山。”

然后她去了，我也去了；我们中间的距离，渐渐地延长了。

天上过于明朗的月亮，使得夜云也染上金黄色。有的，如同透明的白纱，轻飘地游览着天空的每处。它们不被其他云块阻留；好像最爱自由，往自由的地方去的。云间，有一些散乱的星子，不住地在施展着自己仅有的一些光亮；有时候，被行云遮没了，仿佛从天上失落了一样。天下充满着月光，使我感受着有一种气氛包围了我。

路边的人家，没有一些声音，骚扰着夜的平静，我想他们已经睡熟了，没有人再知道我从他们门前走过吧？

我走着，我的身影，跟随在我的背后，它总是不肯离开我，更不肯消灭，好像它永远要伴着，要安慰我这样的一个孤独者，实际使我更感受了独身的悲哀。因此我在敬慕着张海山，他与我是同样的一个士兵，可是他已经有了女人，他该比我幸福，在他们夫妇中间不应当再发生任何的不幸——像今夜我所见到的事件。

我走进酒店的时候，酒店的人几乎都睡了，只有一个年轻人在招待他的主顾——一个士兵。我看了那个士兵胸前的记章以后，我知道了他就是张海山。他并不是一个高壮的人，脸上也没有一丝野蛮的神情，从此，我几乎完全默认他不会害了他的女人。他的一只手撑着头，另一只手握着酒杯，倚在桌上，已经是半醉了。我为了监视他，也要来二两酒，与他坐了同桌。他看看我，又要来一些残余的酒菜——向我表示着同情，这也许正因为我们是同样的军装，又被注定了同一的命运；虽然，既不相识，又不是同一连部的弟兄。

我们两人举着酒杯，隔着桌子的距离，相敬一下，各自饮尽了一杯。他第一句话问我的便是：

“朋友，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有家在这吗？”

“没有。”

“好！好！”

他说的很响亮，为我竖起大拇指来。我与他又相饮了一杯，我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哼，什么意思！不要说有家，就是有了女人，不是也累住了脚吗？”

“我想有女人总比没女人好！”

“像我这样的有了女人，可真倒霉！”

我摇着头，表示不相信他的话。于是他的拳头把桌子敲得很响：

“朋友，你不知道我们明天就要开防了吗？”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他的苦衷，以及他与他女人不幸的所在。

我的二两酒还没有饮完，他的女人已经来了。她在未说话前，便扯住了他的衣领，问他：

“你为什么偷着跑啦？”

“我不跑，我有什么办法？”

“你知道没办法，你就不该娶我！”她喘息着，继续喊着：“你只顾你自己，说走就走了，你这没良心的大兵！”

“我愿意走吗？这是长官的命令！”

“命令！狗屁的命令！你只听命令！你就不替我想想吗？”

“我也不是没有替你想啊——”

“替我想？你什么时候替我想过？我看你只知道命令，命令你开出东北，开到西安，你都不该让我知道，不是我来找你，你还能想着我吗？这次你又要开出西安，还等着我找你去啊？这里没有我一个亲人，你想想我哪有钱去找你。再说你今天开到这地方，明天又开到那地方，我看看，将来要把你开出中国，你也等着我去找你吗？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他不做一声，只是听着，忍受着。不过，我看他因酒，因气愤，他额旁的脉络，已经涨满了血流，这并不是为了她的责言，而是由于自己也有更多的责言，无处发泄，所以他说：

“你只知道怨我，——你没睁眼瞧瞧这是啥年头啦！”

“啥年头，你就不养家了？”

她的每句话，都像钢铁的塞子一般，堵塞着他的喉咙，使他无话可说，使他终于哭了。

最后，他向自己的胸脯，猛猛地击了两拳，又掏了所有的衣袋，凑起八角五分钱丢给她了。

“朋友，请你替我付了酒钱吧！”

他向我说了，便走了。

然而她却又追向他去。在门外不远的地方，我听见他们撕扯着衣服和打击着皮肉的声响。这时候，我很悔恨着自己，如果没有我，在他们别前，彼此的记忆中不会再多留这一幕悲惨的印象吧？所以我立刻冲出门外去，解开了他们互相的厮打。于是他在这一刻的机会里装做一匹老鼠样，窜向暗淡的街道去，失了身影。

“你没良心的东西，你去吧，你去挨刀，去挨枪子，让你死后没有葬身的地方……”

她跳着脚，骂着他，她待他好像待她的敌人，只是仇恨，没有宽恕。

当她确定了他不再转来的时候，她的话却柔弱了，柔弱得使人感到女人待男人那种最深的热情。

“你走了，你怎么不给我留下一把刀呢？”

她自语着，然后又问我：

“他真走了吗？”

“是，他真走了！”

我为了我们也要分离，我随便这样说了一句：

“你也回去吧？”

“我回哪去？”

“回家去！”

“哼，我家，只我一个人！”

我只好再这样地说一句：

“你还是回娘家吧！”

“嗯，我的娘家在东北！”

据说第二天的第一列兵车驶出以后，在铁轨上，轧死了一个女人，全身被轧成三段，血与肉都失去了原色与原形；不过，在她破裂的腹部中，仍然有着一个完整的胎儿的头部。

（选自《海的彼岸》，1940年9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渔 家

这山，是中国的名山，为了去游览它，我随着海军测量队做一次短途的航行。

天与海间浮着浓雾，仿佛是一种不可透视的烟气——由天空降落，或是从地上升起，总之，它充塞每个细小的隙孔，使一切的形色，都在它的包围中模糊了。

在岸上停留的人，探望着远方，只望见几步远的地方，在岸下动荡着的只是一条海流，再远些便没入雾中了。这使人感觉着自己以外，完全是雾的所在，惟有自己身边是被雾遗弃的地方；经过一刻便证实了自己也正在雾中——皮肤湿了，衣服也湿了。

四处的轮船，在航行中，不住地叫响着；却看不见它们一些轻微的影子。如果是两只轮船相遇了，惟有临近了，几乎相撞了，才各自辨出所遇的轮船的轮廓。这使旗语在船行中也失去了效力，使任何有经验的航海家也不敢保证自己所驶的轮船绝对安全。

临近海岸的小岛上，灯塔以红色的灯光和一种特殊的笛声，隔着同等的时间，一声一声地连续地叫着，引导着入口的轮船；出口的轮船却延期了。

然而，海军测量队的军用小轮船，一方面因为有司令部的命令，一方面又因为是短途的航行，便准期驶出了。

海上的狂暴的海风，勇敢地冲着雾的包围，激溅着海水，吹往自己所去的地方。它会把一只逆着它行进的轮船在一小时内，减慢三四里，同时，它也会让一只顺着它行进的轮船，加倍速力。海军测量队的军用小轮船，沿着海边行驶，也感受了风力的威胁，船身动摇着，交替地向左右两侧倾斜，倾斜得几乎接近水面——甲板上流入了水，甚至投入了水面，有倾覆的危险。急滚的浪头，打着船底，不让它平行一刻；有时候，突然涌起山丘一样的大浪，吞食着附近的小浪，滚近船底，与船底相撞而破碎。被激起的浪花，从船侧的一面飞上甲板，也许飞过甲板，落向船侧的另一面去。这军用的小轮船，在这种浓雾里，任着海浪激荡与暴风吹打，勉强地转动着机轮，向前挣扎。舱面上仿佛遭遇了暴雨，处处都被水湿，玻璃窗上垂落着明晶的水滴。甲板上已经有人在停留，完全被雾占有。全部的船员，除去为了负责自己职务的以外，都回至自己的舱位，安静地躺下。像他们这样惯于海上生活的人们，也同样地经不起意外的折磨。

海军测量队的队员，有十人，其中陈飞与屠杰山是我很好的友人。我与他们都集拢在大厅里，昏迷着，静默着。在那般死静中，我们的呼吸，仿佛也停息了。

桌上的茶杯，墙上的镜子都被震动落了，碎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也都离了原在的位置，只有他们没有移开自己坐定的长椅，发着怨言：

“这是什么天气！”

浓雾渐渐消溶了。海水也减退些暴力，那山的山底渐渐地从雾中脱现出来。船也安定了。

“快到吧，这船慢得像老牛！”

陈飞最先离开座位，他从玻璃窗透视着外面的山影，好像一段凸起

的天壁，紧接着海边，与船的距离，已经不甚遥远。不过，在进行中，仍需二三十分钟。他从每人的身边走过，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你们谁看见我的小纸包啦？”

他问着，推动一下屠杰山，从屠杰山的背后拾出一个小纸包——被压破了一块。于是他有些恼了，同时，另有几个队员，互望一下，采询小纸包里的东西。

“不要问吧，这不知道吗？”

屠杰山望着所有的人，好像不经说明，他的话，已经可以使人明了。然而我却不知道，我向陈飞伸出手去，要他把他的的小纸包放在我的手里。他给了我，随着我便解开——那是一件有着红色小花的衣料，我有些迷茫了，因为我不知那衣料，他要赠送与谁的，或是别人赠送与他的；或是别人所有，由他暂时保留。

那山近了，我立刻被这景色所迷惑，便把那衣料交还陈飞，随着屠杰山走出门外。我们依着甲板边的铁棚，张望着，山底临近海边，远年的巨石，不住地粉碎着涌来的潮水，隔绝着潮水的去路，让一束一束的鲜绿的海草，留在岸上，给山与海做了一条相隔的边线。山腰长着一列一列的松林与竹林，红色的庙宇，插在中间，好像最大的叶子围绕着最大的花朵。此外，便是从石壁间突出的巨石，山脊没入永远消逝不尽的雾烟中，只是透出一些轻淡的边痕，给人示以高度。这仅是临近我们的山的正面。它的两边延至看不见的远处。它的背后还有一层一层的不齐整的山脊伸出。船因为靠不近水浅的海岸，便在海岸外几丈远的地方停下了。这时候，岸边停着的一只渔船，飘向我们的船来，屠杰山引着我们的眼睛，去看渔船上的一名渔夫，这渔夫穿着蓝布的短衣长裤，腰上束紧着一条异色的腰带，我看了许久，也不明白屠杰山给我的暗示。他好像故意强迫我注视那个渔夫，不许我移动视向。我一直望到渔船近来，那个渔夫也近了我的面前，他并没有什么奇特引我注意的地方。是一个很平常的青年。

“他叫小刘。”

屠杰山开始告诉我。我奇特了。他又说：

“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妻子！”

“很好看的妻子？”

“……是的！”

屠杰山随后笑了。笑得那样神秘。

渔船靠近了，停了，它送我们渡过我们小轮船与海岸距离的一段海路。

在路上，我随着屠杰山行走。陈飞伴着那个渔夫谈话，走在我们后面，他们仿佛是一对最好的朋友维持着最纯洁的友情。走至路的破口处，他们都打了一下手势别了。陈飞跑到我的身边的时候，他又转开头去，问了那个渔夫一句：

“你明天出去打鱼吗？”

“对啦！”

第二天的早晨，他便独自一人走了，携去了有着红色小花的衣料。

海军测量队临时的办公处，是在一处庙宇里另辟了的一所房屋。墙边摆满一周床铺，中间放着大的长桌。桌上有仪器，几页纸张，三角板，

丁字板，长尺和一些其他绘制海图应用的器具。每一床头，有的放着小小的木柜，有的挂着几件破旧的海军军装，有的散着几本书，什么气象学，航海学，测量学，也许有几本最流行的小说，有的贴着字画，或是中国的山水画，这种东西的不同，好像暗示着他们每人的个性。不过他们每人都有一条手杖——这山的名产。因此，陈飞与屠杰山都允许我替我找一支。

海军测量队的队员被分做两批，一批去向海上测量，一批留在室内绘图，每天几乎都是同样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以后，有些留在屋里读书，写字，有些集中在他们特造的一所网球场，有些分散在伸向附近的青村的小路上。我常常只看见他们走去的背身，不见他们回归的面影。所以在夜间常常空闲着很多床铺，没人睡眠。

于是，我有一次特意问屠杰山：

“在夜里，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呢？”

“自然有他们更好的住处！”

“那为什么你没去住过一次呢？”

“我……”

然后摇摇头，代替了他要说而未说完的话。我因为不肯这样地结束我们的谈话，我又问他：

“他们住在什么更好的地方？”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明白吗？”

他笑了。这笑，就是撒谎的证据，而且，我已经备好一句反问他的话：

“那么陈飞呢？”

谁都知道陈飞既无家族，又无亲人的一个孤身者。因此，他诚意地向我说：

“这是多情的地方，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情人！”

然而，我感觉有些疑意。这山附近几乎完全是庙宇与渔家，他们的“情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不仅不知道他们的情人所在地，就是这山的景色，渔家的生活，我还没有过一次深切的探望。这原因，很简单，我缺少一条必有的手仗。这山路，是难行的。

为了寻找一条手杖，有一天我与屠杰山沿着山底的一条草径，走向山间去。山路非常狭小，而且不是挟干草丛间，便是藏在石块下，使陌生人很容易迷失在路上。我们两人经过几条山路以后，走到断绝的地方，我们停于山腰的一处，向身外探望着，前面是叠落的山层，后面是几所模糊的庙影，右侧是茫茫的海面，左侧山脊临近着天边。我有意转向回路去，但他又不肯被这渺小的山路所困败。于是，我们既要前进，也只有爬行，脚踏着石块，手握草束。同时，要试探一下被踏的石块，被握的草束，是否经住我们踏，我们握的力量；然后，让身体靠近山面，换着另一石块与草束，向前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的行动，我们随时都有从山上滚落海下的危险。还没有经过半里的行程，我们的手腕与脚腕已经麻木了，再不听我们使用。我们各自拣了一块平面的石块，不得不坐下休息一下我们疲劳了的肢体。

一团完整的太阳，悬于并不高遥的天空，好像刚刚被潮水从海底涌

出海面。火红的阳光，异常鲜明地碎于海面的一处，碎成一片跳动的光圈和光条。远天下的海面，浮荡着一层雾气，遮没着去向远方的渔船的帆影。在秘密的地方，藏着一些山鸟，互相唱着有节奏的歌子。有时不知从何处飘来一个飞影，在我们的面前飞绕几圈，仿佛特意为我们在寻找去路。

突然，我们看见了在山脊上行走的一队渔家妇女。她们提着同样的小柳篮，几乎完全穿着一样蓝色的短衣，红色的裤子。发上系着红色的发绳，媳妇绕着发饼，姑娘梳着长辫。其中只有一人剪了短发，而且穿着与她人不同的蒜色的衣裤，她停止了，向我们注视一下。我们知道渔家的妇女，甚至刚刚可以步行的小孩，都熟悉山路。她站着，正像给我们做了引路的标志。于是，我们追赶她来，希望她把我们引出迷失的路径以外。可是我不经意中踏脱了一块石，随它从山腰滚落山底。我茫然了，突然被一阵巨潮把我卷入海中。为了不让巨浪吞食我，或者把我打沉海底，我尽量地施展着游泳术，使自己的头部留在海面，挣扎着。

“救救我啊……”

在我看到屠杰山的时候，他仍然停在山腰的原处，好像在注视着远天行过的一块白云。我呼唤他，都像没有听见。

“朋友，救救我！”

这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由于贪生的欲望，不惜向人呼救，甚至求怜。同时，我也知道我的友人被恐怖威胁得茫然了。我终于失望了。

然而渔妇中剪了短发的那人，疯狂地跑来了。跑至与我相近的海边时，她向我说：

“你等等我！”

这句话，给我的刺激，是说不出的；我感觉着是诗一般的美丽，是母亲所有的仁慈，是永远不灭的一句名言。这时候我认为在这世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人类的一切，都可牺牲或毁灭，只要有她存在，我所需要的，已经完全满足。是的，对于生命的留恋，有时人是最自私的。

她脱下外衣，在身上只留着衬衣和衬裤，一下投入海中。她很快地泳近我的身边，她一只手挟住了我的腰部，让另一手，拨着水，向岸上泳行。

“我感激你，永远忘不了你的好心！”我说着。

可是，她把我拖上海岸以后，她散步似地去了。

好像有许多的话，还要向她说，所以我又唤回她来。问她：

“你姓什么？”

“姓刘。”

“你的名字？”

“小玉。”

她回答我的，虽然是两句简短的话，但从她的音调听来，我知道这山不是她的故乡。她是异乡人，近乎我的同乡。于是我又问她：

“你是什么地方人？”

“阿什河。”

“在吉林省吗？”

“是的，在吉林省，离哈尔滨很近。”

“可是离这山很远啦！”

“是的，很远很远呢！”

“那你为什么，跑到很远以外的地方来呢？”

“先生，你不要问我吧！这不都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吗？”

于是，我知道了她也是流亡中的东北人之一。

“你是因为‘九·一八’……”

我的问话，还没有完，她便哭着去了——好像被我引起了她最痛心的往事。

好像仍有许多的话，我要向她说，可是我没有唤回她来，只是追着她，问着她的住址；她哭着说：

“你到村里去问，村里的人都知道我。”

她去了以后，屠杰山才一步一步地爬近来。他觉着他没有救我，带着负疚于我的神情，向我道歉：

“……请你原谅我！”

然后他又问我：

“你受惊了吧？你没有伤了身体吗？”

于是，我感觉腿骨疼起来。在骨髓中，仿佛有着针刺。这时候，我只有让他扶着，才可以步行。

回到海军测量队的时候，天色几乎黑了。所以有的队员都来问我。且叹息着，仿佛为我在分尝一份惊吓的痛苦。

不过，我自己却很坦然；即使死了，也很安心。因为在死前，我认识了一个勇敢的，正直的，使人人都要敬佩的女人——小玉。

经过五六天，我的身体恢复了原有的健康。

在我病后，第一个走出海军测量队的时候，便去往附近的青村。

太阳正在天面的中点，直射下来的光条，比火燃更热；使人的脸上、背上披满着汗粒，仿佛要燃焦了土地，要融化了山石，要吸尽了茫茫的海水。风，也是热风，没有一丝的凉爽，向脸上吹来的时候，几乎堵塞了呼吸。

我走着一条经过修补的山路。路上铺着石块和沙土；有的地方，沙土被风飘去，露了石块的缝隙。路的两边，是渐渐高起的石壁，有几处，经人修饰，被留下些纪念的笔迹。这笔迹新的染着红色，旧的已经透出原有的石质。有的，不知道是新的，或是旧的，是等工人刻字，或是刻成的字。有的，被风雨磨去，只余下一块平平的石板。我走过一处狭口的时候，两面的石壁又渐渐地低落下去，前面开展一片绿色的草原与一些简陋的低小的房屋。

路人告诉我，那便是青村。

山下，渡过一条溪水，两边集拢着洗衣的妇女和洗澡的孩子。我又走过了溪水上石块连成的石桥，走近了那些房屋。那些妇女和孩子，都以陌生的眼睛，探望我，好像在欢迎我，为我做出笑脸。

我在一个老妇人的面前，问她：

“你知道小玉吗？”

“知道。先生，你问她做什么？”

“我要去她家。”

于是，所有的妇女，都放下了自己手中湿淋的衣服，奇异地看起我来，而且有人奇异地指着前面的一所房屋说：“去吧，那就是她家！”

那是草茎的房屋，泥土的墙壁所合成的三间房屋。门在中间，两边是破了的纸窗。窗檐下悬着一串一串的干菜很久了，已经失去了菜质的原形与本色。地上晒着一些湿瓜子。我在门前，停留了片刻，看了看引我注视的一切——没有一处不带着农村的彩色，也没有一处不象征着农村的贫穷与苦痛。

我敲了门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姑娘走出来。她奇异地望着我，好像我们中间，已经断绝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一种感情的联系。

“这是小玉的家吗？”

我问她，她用奇异的视线，在我的身上，看了一个圈子，然后她勉强答应我一声：

“是。”

“你请她来！”

“她不在家。”

“她要在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我去了。

可是她又唤回我，问我：

“先生，你贵姓？”

“姓张。”

“你是海军测量队的吗？”

“不是的！”

“那你怎么认识她？”

“难道只有海军测量队的认识她吗？”

她默然地脸红了，仿佛在悔着自己说错了话。过了些时候，她勉强地试探我。

“你掉过海里吗？”

“是的，我掉过海，她救了我！”

“啊……”

她好像在梦中，刚刚醒来了，让我随她走进屋里。我一坐炕边，破了的苇席，几乎刺破了我的一块皮肤。

屋外是那般明朗，屋内却是这样黑暗，在时间上，好像有十二小时的距离——正午与子夜。尤其是一个人，刚刚走入的时候，眼睛立刻迷盲了；渐渐地闪起金星，黑暗才淡了些，露出屋内的形象，简单的地桌，木凳，破碎的鱼网，水盆中跳跃的鲜鱼，有着一种刺鼻的气味。

我呆呆地坐了很久，不耐烦了，因为小玉家里只有那一个陌生的小姑娘，她给我送来一杯水，并未说一句招待我的话。我寂寞着，沿着屋地踱起来。于是，她似乎为了劝慰我，她说：

“你坐坐，先生，她就回来了！”

“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她‘赶海’（地方俗语，意思是指去海边采拾海物）去了，因为今天是退大潮的日子。”

“她每次‘赶海’都要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最多再一点钟。”

的确，不到一小时，小玉回来了。她提着柳篮，放有新鲜的蛎黄。

她看见我的时候，也同样地有些奇异：

“你怎么来我家了？”

“你家里不可以来吗？”

“不是，我是说想不到你来我家呀！”

这样，她便在奇异中开始平淡了。

她站在我的身边。从她身上发散着的深浓的盐味，浸着我。她的衣服，经过海水浸湿，又经过太阳曝晒，在绿纹中，塞满着白色盐条。而且在袖边裤下赤露着的手腕和脚腕贴住了白色的盐层。

“这是我的妹妹，先生！”

突然她给我介绍了那个小姑娘，这时候，我才看出了她们的脸面，有着相似的特征，宽阔的脸颊，突出的颧骨，健壮的身体与勇敢的神情，几乎是同一的型，我赞美她们说：

“你们真是一时好姊妹。”

“先生，我们还是患难的姊妹呢！”

于是，我们的谈话转向往事去，小玉述说着“九·一八”后她和妹妹所遭遇的事情；最使我难忘的几段是这样的：

“……有一次，在阿什河，被日本炸死了五六十人，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我的母亲呢，她的年纪很大，吓病了，不久就死了。我的哥哥随着队伍当兵去了。这样，我们一家人只余下我们姊妹两个人了，我们投亲戚呢？找朋友呢？那时候，我妹妹的年纪小，事情是要我一个人决定的，我决定了，要我的妹妹随我逃走，先生你想想，我决定错了吗……”

“我们姊妹两人真是苦极啦！逃到天津，又逃到北平，最后，我们才到了这儿。这是什么世界呢？不许我们讨饭，警察把我们赶走啦。我们还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肯救济我们呢？唉，那时候，我们想只有死路一条。……”

“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我们感激他也恨他，感激他的是，我们投河以后，他把我们救上来，救活了，恨他的是：他不该引诱我们，要娶我们一个人做妻子。先生，他为什么是那样的人面兽心呢？现在，我明白了，我很能原谅他，可是那时候，我们骂着他，打着他，我到底离开了他。……”

“幸而我们又遇见了一个好心肠的老人。他可怜我们，收留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恩人。我们有了他，才有现在！”

“这是那个老人的家吗？”

“不是的。一年前，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老人了。”

我们的谈话，刚刚转回现在来，可是，邻家的一些妇女和孩子，都跑来小玉的家，指着我，讲说着。小玉看出了我被她们所拘束了的神情，她立刻停下了自己的谈话。于是，我站起来，表示我要去了。她却说：

“先生，留你在我家吃饭！”

“太麻烦，谢谢吧！”

“一点不麻烦，我们吃便饭，就是为了招待客人，最多也不过炒几个鸡蛋。”

“谢谢，我走了！”

“再坐坐，我很难遇见一个知心的人！”

她的这句话，是从热诚中来的。这样，我们中间，在默默中，好像有了一层深远的友情。

她叫她的妹妹去燃火，准备招待我的晚饭。

然而，我终于去了，只有默默地感激着她与她的妹妹。

（选自《海的彼岸》，1940年9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祖国的伤痕

他来的时候，谁也不知他来自何地，只见他带来了人类最大的复仇的决心——虽然他也带来了祖国的伤痕。

一天的早晨，那十字街头在骚动着。我从梦中，被扰醒来，披起衣服，开了窗子把头伸出窗外。于是，我看见了他，不整齐而破旧的军服，惨枯的脸色，头发很长，长至颈下。在他那颓败的神情中，潜伏着一种流离的痛苦。他的头，枕着手腕，他的背，靠着墙壁，在一家的医院的门旁，沉沉地睡着。在他身外，围满了很多观望的人，疑心他是一个临死的病人，甚至，已是一个死后的尸身。于是，慌忙着，喊叫着，使这常常寂静的街头，在早晨，便破碎了寂静。

他被惊醒的时候，先用右手把左手送入衣扣间的衣缝里停放下来，从衣袋扯出一条裹腿，牙与右手巧妙地结成一个环子，套入脖颈，让它代替衣缝衬托左手。他的右手，仍放在左手的一边，伴着它，照顾着它，好像是它唯一保护者。然后，他扬起头来，才惊异围满他而观望他的人，使他感到了一种疑虑的茫然，且不可解释。因此，有人指认他是一个小偷，偷了物品以后，被人打伤了。同时，更有人说：

“哼，如果不是小偷，谁敢打伤他的手腕呢！”

“真是一个无能的小偷，给他的师傅丢脸！”

“你别看不起他，他这家伙，一定是一个大胆的小偷，他一定常常偷兵营的东西，你们就看看他穿的吧！”

不过，我并不相信这些话，因为我不仅不默认他是小偷，而且，我也没有疑心他类似人们所说的任何一个罪犯。

然而他身边的人，有的大人欺辱了他，有的无教养的孩子借着大人的庇护，随便地戏弄着他，踢他一脚，或是打他一掌。甚至，有一个几乎成年的青年，搜索着他的衣袋，好像故意要找出他的赃物，控他以罪名。他只顾左右照看着，保护着左手，任他们如何地踢他，打他，欺弄他，他也不为自己辩护，或是抵抗他们。可是，他的胸脯，渐渐地突高起来，他的额边的几条脉络，已经涨饱了血流——我知道他是愤怒了。

“我们不应当欺负一个残废人！”

幸而有一个经过的学生这样喊了。

然而，几乎全数的人，都不满意这句话，立刻有人反驳地叫起来：

“他是一个小偷！”

仿佛一个小偷，已经被逐出人类以外，在谁都可以判他的罪名而惩罚他。

于是这不幸的受伤者被几个人威胁着解开了衣扣，让人搜查。一个小布包从他的腰带里被搜去了的时候，他终于说话了：

“还给我！谁敢说那是他的？”

他为了拒绝被人验视他的小布包，突然夺回来了以后，立刻又意外地被几个孩子抢去了，跑了。这时候，他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去追逐他们。

那个同情他的学生，丢下自己的书本，援助从孩子手中又夺回了那个小布包。他笑了，他的笑声中流露了自己对于那个学生的真诚的谢意。可是，有些人不平地重新包围了他与那个学生，以严厉的态度威胁着他们：

“交出那个小布包，让我们检查一下！”

他把那个小布包紧紧地握着，仿佛使它永远不脱离他的手掌，他爱护它，仿佛比爱护自己的左手更甚。所以他说：

“这小布包是我的命一样，我活一天，它就跟我一天；我不能让谁抢去！”

那些人群之中的卑俗者，专以玩弄别人的不幸而解救自己的寂寞，他们恶意地要他交出那个最平常的小布包。

“你们有什么权，检查我的东西？我随便地检查你们的东西，你们答应我吗？”

他的对方始终不肯放过他，去走自己的路，好像只有在这一个无抵抗力者的面前，才可以显得自己的尊严与权威。

“你们如果再难为我，我就撞你们啦？你们是他妈什么东西？”

他已经容忍到最后，从腰间抽出一把军用的刺刀，向他们量着。这时候，他完全表露了一个粗野的军人的个性；无情的谩骂，无情的报复。

我希望快些走来一个警察，解散他们这一幕将要开演的武剧。不然，我担心他们会有人因此而遭遇不幸。因为天色很早，警察终于没有走来，他们开始打起来了。那个学生仍是援助着他抵抗着另外的六七个人。其余的人观望着，像舞台下的观众一样，在紧张的时候，他们的神情也随着紧张。我厌烦他们不肯解劝一下，我立刻跑出去了。

自然是多数人战胜了少数人；那个学生被人抱住了，也许因为“学生”关系，没人敢侮辱他；只是不让他再援助那个有小偷嫌疑的人。败了的人，被他们踏在脚下，而且，强迫地说：“你再不拿出来，我们就要自己动手啦！”

“我的东西为什么要拿给你们检查？你们这群东西，你们欺压像我这样一个受伤的人，你们还有他妈的良心吗？好，你们不怕报应，就打死我吧！”

他的话，惹起了一个人的气愤，故意用脚踏住了他的左手，鲜红的血流，从手腕流下来，一滴一滴地浸透着地面。然而他并没有哀叫一声，或是哀求一句，只是咬紧着牙齿，忍受着不可忍受的痛苦。

“究竟为什么事情？你们这样对待他。”我走近的时候。他们很奇异我。同时，那个受难者向我说：

“先生，请你替我拾起刺刀来！”

“你等等。”我向他说了以后，又继续向他们说：“你们放开他和那个学生，我可以做你们中间的一个公正人。”

我的话，很严肃，我的态度，更严肃。于是他们退开了，还给了他那个学生的自由。那个学生为了向他们报复从地上拾起了那把刺刀。

我说了很多的话，才说服了他。可是那个受难以后的人依然躺在原处，他的右手，已经撑不起他的身体，他的左手，流满了血条。那个学生扶着他，扶起他来。

我向那些经过胜利而骄傲的人们开始说话了。

“你们为什么打人？”

“他是小偷！”

“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小偷？”

“他有一个小布包不给我们检查！”

“你们凭什么检查他的小布包呢？假如他不是小偷，你们怎么办呢？假如他就是小偷，你们应该把他交给警察。你们随便打人比小偷更要犯罪，知道吗？”

于是，他们渐渐地畏退了，散去了。那个学生为了自己时间的关系，把他扶至医院的墙边，也去了。最后余下我们两人。他忍痛地又把左手送入裹腿圈内，只让那个小布包留在手里，想着怎样把它安放在如意的地方。

“你可以给我看看吗？”

我问他。他立刻把那个小布包送给了我：

“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你怎么不可以给他们看看呢？”

“他们都不是他妈爹娘养的，开口就说我是小偷，谁他妈是小偷？哼，反正他们是欺负我没有力量，如果在几个月前，我身体没有受伤的时候，今天我和他们就没有完，一定要打个活来死去，再说像他们这样的，也不敢！现在我受伤了，都看我好欺负了，哼！”

他说着，痛心了，几乎流了眼泪。我听着，被他感动，所以我没解开那个小布包，继续问他：

“你在哪里受的伤呢？”

“在南京，你看！”

他用右手卷起些左手的衣袖，腕上有一个透孔的伤痕，凝结着血迹。

“这是枪伤吗？”

“对啦，是枪伤！”

“那你怎么不入军医院？”

“先生，你不知道，我们退却的时候，退得很乱，我找不到连长的证明，就没有入院证。”

他又给我伸出手腕来，我用手指试出伤痕附近的皮肤，已经肿高；我问：

“什么时候伤的？”

“半个多月了！”

“太久没有医治，不要紧吗？”

“哼，——”

他苦笑了，表示没有适当的话回答我，但也渐渐地愁苦了。他长叹以后，开始自语：

“……我死啦，就算啦！假如这枪伤换在头上，或是更重点儿，我退不下来，还不是早就死啦吗？……”

“我的话，先生懂吗？”

“我懂，可是，我希望快活些。这地方，你有亲戚还是有朋友？”
“亲戚，朋友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地方有，你该先到什么地方去养一养伤。”

“有是有的。可是回不去呀！”

他张大着泪眼，探望着遥不可及的沦陷敌手的远方，摇了摇头。

“你的生活怎么办呢？”

“生活不要紧，只要治好了伤！”

“怎么能说生活不要紧？”

“先生，我治好了伤，还要回前方呢！你看！”

这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不可抑止的骄傲。随着，这骄傲，便引起他复仇之前的一种悲愤。于是他本能地从我手中拿去了那个小布包，解开给我看，其中是十几粒步枪的子弹。我向他点着头，表示我知道他保藏着子弹的用意。然后，他又慎重地包起来，送入腰带去，仿佛送入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在第二天的早晨，我突然发现他去了，那十字街头寂寞着。他去的时候，谁也不知他去至何地，只见他带去了人类最大的复仇的决心——虽然他也带去了祖国的伤痕。

（选自《海的彼岸》，1940年9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海的彼岸

在他用三粒枪弹暗杀了一个被仇视的日本将军以后，在他孤独一身走上长途逃亡以前，他需要会见一个人。这个人曾以自己的不幸换得他的诞生——他的母亲。

他带着自己的一个暗影，沉默地站在这沉默的海边。这时候，这宇宙，静得好像只有他一人生存——人类唯一的继承人。任随深浓的黑幕把他裹紧，甚至被消灭得无形，他似乎忘记已是夜了。任随涌来的潮水，涌近他的脚边，任随暴风卷来的暴雨，浸湿他的衣服以至皮肉，他似乎忘记自己所遭的一切苦难。

虽然，他曾是朝鲜的贵族之子，往日的“昌德宫”上，也曾自由来去。虽然，他的童年，曾在“黄莺舞”和“雅乐”的演奏下，欢快得忘形。

虽然，他在美丽的记忆中，曾保留着“檀君”的光荣和骄傲……但是，这一切都已成为昨夜之梦，渺茫而难寻。

现在，他那天赋的智慧和勇敢，使他常以生命冒险；他不惜以自己的坟墓，代替“南天门”最下层的基底。现在，他在祖国的躯壳中，寻觅祖国已经失散的灵魂；他不让国魂随着“李朝”而去，一去不返。

朝鲜的故宫。——作者注

朝鲜宫廷的舞蹈之一。——作者注

朝鲜宫廷音乐。——作者注

朝鲜人所崇拜的开国的第一个皇帝。——作者注

朝鲜汉城的城门之一。历史上仅存的足以代表朝鲜的唯一纪念物。——作者注

朝鲜破日本并吞后，最后的一朝。——作者注

他的家庭，随着国运渐渐地衰败下来；现在所遗留的，不过是小小的土地和几间房屋——以往万一的繁荣而已。但是，这土地和房屋，在今日的朝鲜人中，也是稀有的。如果他比之于一般的朝鲜人，还不失为乞者之中的绅士。不过，他的家庭，现在已经不再可能允许他像往日一样地自由行走或停。幸而还有这几十里外的海边，不忘它的主人，让他久久地等待，等待他的母亲。

往日贵族的少妇，现在被践踏的老太婆——他的母亲，她从童年到老年，饱尝了人生的幸与不幸，经历了祖国的一度的兴旺与没落；其间，她消磨了六十多年。在这长久的岁月中，她生过五个孩子；最后的一个孩子生了不久，她便成了寡妇。那时候，她还年轻；为了给自己以清白的终生。她不愿再嫁任何男人，她容忍着青春难言的苦痛，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地养到成人；她希望以长久的辛苦，换取自己临终的一刹那的幸福。谁知道她仿佛被恶运注定，今生她难再摸索到幸福的边缘。在监狱，在刑场，在失踪的路上，她已经永别了四个孩子。如今，她又将与最后的一个孩子告别；别后，她便是一个孤独的老人，除去自己的坟墓以外，无所凭依。

被损害的朝鲜人，母亲和孩子常是分离的，常是孤独的；常不知道什么是骨肉的感情，什么是家庭的幸福。二十年前，耻辱的“北京道”上，重造了耻辱的“独立门”，从此，被损害的朝鲜人更加唱起“阿里朗”了。在风雨和夜色所模糊的海边宛如云雾之间一样茫然，天与海，只是深淡两种黑色，一切的景色，甚至奇迹，完全消逝在那两色中。所听的，只是雨滴像水箭一样地射着沙滩的音响，还有不知去向的海风吹过沙滩时所遗下的一阵一阵的吼声。秋夜对于人类的恶毒的摧残，好像已经达到顶点。

他渐渐地看见了在黑暗中慢慢移动而来的一个黑影；又渐渐地听见了那黑影低声地唤着他名字的声音——冲过风雨骚音之间，传近他的耳边。于是，他奔跑过去，抱住来者——他的母亲。

他沉默，她呜咽；这沉默和呜咽，仿佛就是这母子衷心的告别。

他们不敢相望，只是望着远方；自由，幸福，以及他们一切的理想，仿佛就在所望的天与海相连的一线之外——海的彼岸。

久了，她终于说话了：

“那边就是中国吗？”

他默认了。她又问：

“明天，你就是往那边去的吗？”

“是的，明天我就是往那边去的！”

“你真是一个人去吗？”

“……妈，我……我不能带你去，我只能一个人……妈，你该知道，我的路是不容易走的！”

从汉城到北平的一条大道。——作者注

朝鲜属于中国时，在“北京道”上，曾造一“欢迎”中国使臣之门，后被日本改为“独立门”。——作者注

朝鲜有名的民歌，充满着流亡的悲哀，可以说是一首流亡曲。现在，他便是阿里朗的歌者之一。——作者注

是的，“阿里朗”山岗是难行的，纵然是大理石铺平的路。

这一刹那间，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留在海的这边，而他已在海的那边，这无情的海，把他们隔离了；纵然，这海遥远而广大，海上究竟何处是他们再会之所？于是，她藏在眼角的泪水，禁不住地流落下来，突然，由呜咽而哭泣了。这时候，她老年仅有的体力消散了，软化了两腿，支撑不住沉重的身体，不自主地把头贴在他的胸前。然后，她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拭着泪水。

“妈，你安心吧！将来你去找我，或是我来看你，不管怎样，我们必有相见的一天！”

“我在临死的时候，只要再看到你一眼，那就够了！……”

她对于自己这低微到可怜的小要求，也并没有把握；所以她的哭声更大了。

当这哭声引起他一种恐怖的时候，他暴戾地制止她……

“你的哭声是会给别人听见的，不许你哭！”

人的理智，有时约束不了感情，尤其是她——一个不幸的老妇，在与她的孩子告别的一切都不可能预言的时候。

“不许你哭，把手绢给我！”

她顺从了，把手帕给他。她不哭了，直到与他别后。

别后的第二天，她便写了一封短简，等待得到他的通信处，然后立刻寄发的。然而，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那信不曾离过她的身边，伴她，随她而行，行过遥远的旅程。她曾被指为“帝国叛徒的母亲”，而没收了她的土地和房屋，她曾被亲属，友人认为“灾星”，而拒绝收留。从此，在她看来，世界上都是“禁地”，将与人类绝了一切的联系。从此，任她孤行，随便天外还是地底。她在困苦的生活中，卖掉了一切私有物。

最后，在她的身边，好像只余下那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儿：你走了，愿你平安。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

我仍像往日一样忘不了你，在今天，在明年，在死后——墓前长满荒草的时候。

我常想，我并未老，你还那般年少，我们未来的岁月，是很长的；难道我们不能再有一度的相逢吗？逢后，我可以和你永别，死而无怨。

告诉我，你的生活如何？

母 亲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当他在上海收见这封信的时候，信封，信纸，信上的字句，都旧了。惟有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是新的笔迹；还有信尾多了几行新字：

我在病中，不便重写，还是把这封信寄给你了。现在，我知道

据说是朝鲜白头山下的一个山岗，流亡者常常经过此地而去流亡。阿里朗的歌子，便是因此产生的；所以这山岗，也可以说是一条。——作者注

你给我的信很多；但我因生活所迫，住址无定，仅仅收到由人带来的你最后的一封信。惟愿此后，莫再断了往还的音信。

此外，那信仍是原信，并未更改的，不过是信的最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而已。这与原有的时日相比，中间的距离拖得太远了；把人从青春拖到老年，从老年拖到墓边。这时候，他的背，由直线曲成弧线，他往日的黑发，一半已经脱落，一半变为斑白。

他读完信以后，在他的记忆中，开始起伏着一些零碎的记忆，像是来时海边的潮水，涌来涌去。这之间，他曾欢快，也曾感伤；当感伤引起他一丝两丝忧郁的时候，他仅是长叹一声而已。因为他知道，既是革命者纵有母亲，甚至情人，也难免不是孤独者，在这世界上不止他一人。

此后他和他母亲常常通信，未曾有过间断，最后他母亲有一信说，她在世界上难再有长久的勾留了，在她长埋地下以前，希望一见她最后的一个孩子。他被感情所操纵，允许了她。

然而，这时候，日本的魔掌，又伸到上海的每一角落。除去朝鲜的叛徒，革命者，又过起秘密的生活。

在母亲来到上海的那天，他为了迎接而候在码头。他看见了经过海上长途的一只海轮，驶进黄浦江，停在码头；也看见了从旅客之中被拥挤出来的一个老太婆；纯白的头发，无限皱纹割裂了的面孔，以手杖支撑着的衰弱的身体，被幻想所迷惑的幸福和兴奋的神情……他认出了这就是他的母亲。但他不能扶助她，把她引到住所，也不能向她轻轻地呼唤一声。而且，不能避免她的视线触到他的身上。因为在她的身后跟随着日本的侦探。他们希望从她的线索，捉到一个十年不曾捉到的“杀人犯”——她的儿子。

结果，他还是跟着日本的侦探，从他们的足迹上，找到他母亲所住的旅馆。三天以后，他以盗贼的行动，到了他母亲的房间。

夜深的时候，屋内已经熄了灯火，无尽的黑暗占有着一切。床上躺着他的母亲，为了几日来在盼待中所积起的焦虑，使她重犯了旧病。她的呻吟，像是人生最后的失望的叹气。

他轻轻地移近床边，低声地说：

“妈，我来看你！”

这声音，最初给她的感觉，是一个梦。后来，她听清了的时候，立刻挣扎起来，向黑暗中伸出两手，摸索着：

“你在哪呢？……孩子快点儿来，这是我的手……你在哪呢？孩子……把灯打开，让我好好地看看你！”

在他看来，灯光便是一切恐怖和陷害的引线。

“那赶快……赶快让我划一根火柴，一根火柴也好……”

这时候，他认为，他认为火柴的微小的光亮，也是不幸和罪恶的根源。

因此，这片刻的会见，她只是听到他几句话声，不曾一见他的脸孔——他久来的渴望，并未满足。所以在他临去的时候，她嘱咐过他：

“你明天早晨，在我的窗下走过一趟，让我看看！”

他听从她的话，第二天早晨，他特意从她的窗下走过；走过几次，

终于没有看见从窗边探出的她的面影。

后来，他听旅馆的一个役者说，在那房间住的一个老太婆死了，死在早晨刚亮的时候。

十年，十年不短：十年的别离更长。十年之间，他们不得一见，十年之后，一见仍是茫然。谁想到他们两人把这十年的遗憾，一人从生前带到死后，一人从现在带到永远。谁想到十年，十年也是无期的。

他走了，走到无人的街头，不自主地哭了，又不自主地掏出手帕，拭着泪水。他忘了那手帕曾是为了母亲的哭泣而夺来的；当他记起的时候，他把那手帕当做纪念品珍藏起来，不再用它拭泪——因为手帕拭不尽泪水，泪水也洗不清仇恨。

（选自《海的彼岸》，1940年9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中篇小说

老 兵

像这样的破军衣：欠缺着衣扣、领钩，衣袖上、裤角边，破开了一条一条的裂缝；没有皮带，也没有领章，处处满着水滴、油渍所积下的纹痕；在张海的身上，已有六七年了。所以，人家都说他是老兵，而他的年纪，才只有十九岁。

贫血的嘴唇，不明亮的眼睛，低小的鼻子，枯瘦的耳朵……成了一副不健康的面孔；这就是张海，这就是人家所说的那个老兵。

正是飘起秋风的时候。

昨晨的天色是晴朗的，淡色的云团、云块安静地息留在天面上，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的云层间，只是透过了几条金线，鲜明的颜色，诱着眼睛；在高空的一处，仍遗着一条孤零的月痕，不移动，固守着自己占有的位置，在初醒者的矇眛眼中，也许误认了是一面人工制作的画面。

地面上，湿润着，仿佛刚刚被海潮洗过似的！有短草的地方，仍披满了露珠，微小的如同匀整的珠粒，一滴一滴地散落着，吸取着周边仅有的一些亮光；在不知觉中，一滴一滴地滚落下来，渐渐侵入土中去。

晨风夹着一种清爽的气味，从四野集中来，又向四野散开去；好像故意在戏弄早落的黄叶，让它们飘起飘落，徘徊着，滚转着，失了去向，又失了安眠的葬地。

鸡的啼声，已经息了；狗的吠声，还没传来；只有不知名的小鸟遗下几声唤不醒梦人的鸣叫，冲破了清早的寂寞，飞过了，或是飞来了。

充……

充满着这般景色的，是一面坡的地方。

一面坡，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没有什么古迹，也没有什么名胜，冬天同冰窖一样，夏天却是一处避暑的地方。四边绕着山群，并不雄壮，甚至没有一块雄壮的石块，处处都是土质与沙粒交组着的踏平了的小路；南山的破口处，叫做土门岭，有着一座小小的破庙，常常飞起着香火，有时也响着鞭炮；北山下流着一条蚂蚁河，岸旁，有几处生长着蔽天的树林，有几处堆集着农家的小房；东西两山都断了一处的山脚，中间爬过了中东铁路哈绥线的路轨。

街上，有大的商店，小的铺子；有伐木的林场，收买兽皮的皮庄；有出口大豆的粮栈，有异国居留的民会，有土娼，暗娼……人们都在惯常的生活中，很少有着惊人的故事；有的，也只是一些抢夺的消息，久了，并不惹人注意。

这里究竟有多少住户，没听说有过详细的统计。总之，热闹的大街整天充塞着行人，僻静的小巷，很少听见脚步声；不过，谁都知道驻军，有整整的一团，所以在星期日，随处都有军人的影子；虽然，整团的军队，一连一连地分散了，有的进山剿匪，有的驻守着山地，所余下的，只是一部分——一面受着军训，一面维持着地方治安和留守着营部、团部。

营部不常有着确定的住址，有时候，随着全营的队伍出发，或是换

防。

团部的住所，是在蚂蜒河边，靠近车站、俱乐部、公园、东铁和特区两个中学，有着旷大草场的地方。高高的大门，两边延开一圈广阔的木棚，门前悬着一条木牌，写了陆军第八百七十四团的字样。有两个岗兵拖着步枪，绕着两个相对的岗楼在徘徊着，看守着院内的几处办公室和一所兵营；如果看见了长官，不管是军装的，或是便服的，也不管是走进走出，或是闲逛着从门前经过，都要一样地行着敬礼；如果是士兵呢，那是随便的，也许互相地交换着一下军礼，也许无意地打几句招呼，也许故意地开着玩笑……总之岗兵好像没有一刻空闲的时间；最舒适的，只是早晨——起床的号令还没有发出，团部的士兵仍在熟睡中，岗兵在岗楼里抱着步枪，下颚垂靠前胸，也许在朦胧中，贪觅舒快的睡眠。在这般的寂静中，只有厨房中呓语般的歌唱：

羊粪蛋，
用脚搓；
你是弟咧，我是哥，
打壶烧酒咱俩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老婆怎么过？
背着花鼓唱秧歌。

停了一刻，吁了几口倦意的气息；又有异样的歌子，用异样的调子唱了起来：

小奴啊，今年已十八，
十八的人啊，还未出嫁，
妈妈，你好糊涂呀！

随着，张海走出来了，一边扣着衣上仅有的两个铜扣，一边又走进马棚去；然后有了几声鞭打着马的声音和叫唤着马的声音：

“滚起来，滚起来！”

马的草料，送进了马槽，马的嘴送进了马槽的时候，随着，便又是歌声：

情哥哥，
你何时再来？
……
只等明年春三月，
桃花，李花，杏花儿开，
小妹妹与你挂呀，挂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来！
……

不过，这几句唱的并不怎样熟练，有的句子断了，断了许久才在意想中记起来。

“滚，滚！”

一匹壮年的白马被踢打出来，鼻边贴着一些短短的草茎和红色的米粒，嘴里还在贪嚼着最后的一口食料。张海握着短小的马鞭，随着马尾；他仍在甜蜜地哼着：

……

桃花，李花，杏花儿开，
小妹妹与你挂呀，挂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来！

……

这几句在他哼出来，仿佛有着另种的感觉，使他摇着头，眼睛不转动地留在意想中，慢慢地伸开了两手，尽量地向后摇摆着，抖动一下腰背，让一口疲倦的气息，从嘴里长吁出来。他看了看马，马离远了他，已经快走出了门外。他追了几步，追住了，握住了马的缰绳，向马屁股鞭打了两下；马跳起来，他又用马鞭的木把撞着马的肋骨；于是，马抛开了前蹄，驰开了——像一匹驰过旷野的野马。但是，他终于没有放开握住缰绳的两个拳头，任随马怎样拖着他，滑过地面。在马把他拖出门外，拖出很远的地方去，他才喊起了一种怪叫的声音：

“呀——呀！”

岗兵发觉了，奔出了岗楼，追着，吓住了马：像长官一样地怒视着张海说：

“你总是弄这样的事情！”

“你管不着。”

“我给你报告团长。”

“你就说见司令去得啦；团长？团长也不是他妈你家的，你说什么就算什么？”

“你小子，不用扯淡，给你报告看看！”

他把头一扬，缩短了几分眉间的距离，陷入两条短短的皱纹，眼球集中在眼角边，放高了声音说：

“报告？你打听打听再说，我在团部六、七年了，你打听打听，我他妈怕过谁？”

“哼，你仗着有好妹妹怕谁呢？”

于是讲出一些儿更难听的话来，讲出一些他妹妹秘密的故事；可是他却不在意，只是说：

“有妹妹不假，你别胡说！”

“胡说？谁不知道呢！”

“你再胡说，我就打你嘴巴。”

“得啦，你借你妹妹点好光啦！”

“老子命好！”

“天生是打杂的命，舅子的命！”

他用手掌拍打一下胸脯，合成了一个牢牢的拳头，留下一个大拇指，耸起着，摆动着；装做京戏里的人物说：

“老子，是一世的英雄！”

“狗熊吧，别英雄啦！”

“慢慢看。”

他扯着缰绳走了。他看看自己的军衣，又加多了几条裂缝，手腕也破开一块皮肉，凝住了几条血丝；他便不时地暴打着马，而且在怒骂着：

“该死的东西，天天要踹你……”

东山脊上的云层间，从缝隙里渐渐地流出了鲜红的颜色，渐渐地透出了阳光，一条一条地闪耀着，吸取着地上的露水；望过去，不住地刺着眼睛，仿佛是一团野火，在天边燃起，在烧毁地球的一角。

早晨的凉气被阳光吞食着，冲散着，雾一般地飞向天边去，远了，没了，又恢复了初夏的温暖；整夜所积蓄的露珠，一刻之后，在这地面上便完全消去了。

他扯着缰绳，走过了大路、草场、学校，沿着公园的板墙，走进了蚂蚁河边。他把马系在一株老树边，抛下了马鞭子，他沿着河边的沙地绕着圈子。沙地上留着他的脚印，一个连续着一个，一个叠落着一个，由清晰而渐零乱了；这时候，他在脚下寻得一堆平板的小石片。

河水安静地向着固定的方向流去，没尽在山下的转角处。河面清澈着，浅水的地方可以透视河底的沙石、游过的小鱼。吹过野风的时候，有的地方起了条条的波纹，也有的地方打着涡漩；只有中流的一处，好像永远在平静着，被阳光染了金色，在寂寞的空气下，荡着一层光圈。有几只渔船在那里飘来飘去——好像迷失了归去的方向。有时抛下了鱼网，停住了，让黑色的帆影，牢牢地留在水面上；过了一刻，便又划开去。有时，为了拣着鱼群憩息或游动的处所，又停住了，水面上仍是留下了同样的黑色帆影：远些的挂在山底，近些的浮在河上。

不知为什么，河边总是不断大风，残暴地摘取着树上的老叶，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落在地上，留在避风的地方；落到河上的呢？随着河流去了远方。于是，树上的叶子渐渐地稀少了，渐渐地露出了赤裸的小枝、以及草茎组成的鸦巢。

一只老鸦为了寻找自己的鸦巢归来了，被他惊吓一声又飞开了。这时候，小石片在他的脚下，由一堆集成了三堆；然后，他又一片一片地抛开去——让每片石片都是沿着水面，连续地跳起几次，滑过一条长长的距离，在不可猜想的终点，便突然沉入水中了。

太阳滚上了山脊，又离去了山脊的时候，团部每天第一次的军号响了，拖着几声间断的长长的尾音响过了他的耳边。于是，他迅速地解开了缰绳，从老树下迅速地把马引到河边来，用他带来的长刷，给马洗刷着周身的皮毛。马习惯了，驯顺地站着，扬着长颈，仿佛感到了异常的舒适。

“你比我都享福……”

他这虽是对马说的，却没有什么怨意的口气，好像只是给自己解脱着寂寞。

草场上，集中了许多的士兵，由每连的连长率领着，练习着长距离的跑步；另外有值日的营长，或是团部值日的副官监视着。由远处，只

听见他们跑步的整齐声响，有着固定的节奏起落着——仿佛在示威着军人的英勇；并且每连的连长，不时地英勇地喊着：

“一、二、三——四！”

特别用异样的调子拖长了“三”字。

随着，士兵也同样地喊起：

“一、二、三——四！”

也是同样地特别用着异样的调子拖长了“三”字。

这种喊声，充塞着草场，充满着公园、车站、蚂蚁河……好像已充塞了整个的小城市。

火车的笛声，小贩的叫卖声，以及其他的一切声响也起来了；在寂静中，占有了全部的空闲时间。

四处高起的烟囱，渐渐地飘起了炊烟，从一缕延开一片，又化做无数的烟圈，淡了，消入在辽远的高空中。

他扯着缰绳回来，经过草场的时候，所有的连队全散了，士兵走回了自己的营房；余下的只是一些长官，连长，排长……三两个人一群散漫地踱着；有的是孤零的一个人留在一处，做着自己的默想。他还没有走尽草场的一段，已经不知停下了多少次，向所遇见的长官，行了多少次的军礼。虽然他是没有受到军训的人，没有正确的姿势；但是他都保持着很迅速的动作：扬起右手，贴了一下帽边，立刻又垂落下来；在他的神情上，有着一般士兵对于长官所具有的谨慎与恭敬。每次长官给他还过了军礼，他便露了几丝微笑，又继续在自己所要走的路走去。不过，他的步子间，潜藏着绝大的倦意，一步一步地移开去；虽然，他的眼睛，仍不住地寻视着，留意着长官。

“张海！”

这声音，是严厉的；叫的人，是站在草场边角上的一个长官：四十几岁的年纪，高大的身体，有着健康的胸脯和健康的脸色，穿了整齐的军装和带有刺马针的马靴。他的领章，是红色的，周边镶着一圈金线，另外的两条金线横在中间，落着三个黄星。张海望望他，立刻停下了，在距离他有十米以外的地方行了个军礼，他扬起一只手来，匆忙地摆了几下：

“张海快来！”

于是张海像匹小兔似地、蹦跳地跑去；马随在身后，也加快了四蹄。

张海跑到他的面前又行了一次军礼：

“团长，今天怎么起来得这么早？”

这在赵团长听来，好像是废话，没有睬他；却又严厉地问道：“你才回来吗？”

“是，团长。”

“你早晨都做什么啦？……怎么才回来？”

“没做什么，团长。”

“混蛋！”

“是，团长。”

“混蛋，王八蛋！”

于是，张海更加拘紧着自己的身体，一动不动地保持着立正的姿势，注视他，回答他：

“是，团长！”

“以后，要早起来！”

“是，团长。”

“以后，要早回来！”

“是，团长。”

“记住了吗？”

“记住啦，团长。”

马的缰绳，由张海的手移到赵团长的手之后，他孤单单地回兵营去了。

厨房里已经满了浓烟与蒸气，从展开的门缝冲向门外，被风卷着、去着、散着。老厨夫系着很脏的围裙，一边洗着米粒，一边将米投进锅去。他看见了张海，便骂起来：

“天天这么晚回来，你看着，你再这样偷懒，我非给你苦头尝尝不可！”

“你也不看看你那小样！”

“你看着吧，不定哪天我要用菜刀砍下你的头。”

“你算他妈什么东西！”

“你试试看。”

“敢，他妈的，什么东西！”

张海一面还骂着，一面解开了一捆一捆的白菜，一叶一叶地剖开，让完好的与被菜虫蚕食了的分别地集成了两堆。菜根原有的泥水，涂满了他的手指；于是他向自己的衣襟搓了几下——要想让手指上的泥水重新移放一个位置。

门边常常探入士兵的头来，用眼睛搜索几下，催促着他，要他把饭菜快些送去。于是他迅速地把菜叶剖完，向火炉里，多多投入了几根木柴。

同时，老厨夫也逼着他；可是他说：

“我也没长四只手！”

老厨夫警告他：

“一会儿，司务长又该来啦。”

恰好司务长来了，随意检视了一下；倒叉着两手，尊严地站在张海的背后；可是张海没看见他，两手仍在忙动着，继续还驳着老厨夫：

“司务长？谁来我也只有两只手。”

“你说什么？”

他听见司务长的问话，立刻挺直了身体，站好了立正的姿势说：

“没说什么。”

“放屁！”

“是，司务长。”

“完全是放屁！”

“是，司务长。”

“快做饭去！”

“是，司务长。”

在开饭之前，他担起了两个装满了碗筷的柳筐，送到兵营去。同一条板桥似的长桌，由墙的一边延至墙的另一边，有三四十尺的长度；他

把碗筷分开着——十几个碗和十几双筷子分做一批，按照桌子的长度；隔着相当的距离，放下了一批一批的碗筷。随后，他又担来一桶高粱米饭和一桶仅有菜叶的菜汤。他向士兵笑着，做着唤猪的声调：

“啦啦啦……啦啦啦！”

“这小子，你又找着挨打啦！”

士兵们拥过来，有的打他一掌，有的踢他一脚，有的用着巧妙的动作威吓他一下；他摇着手，跳着脚，抗拒着：

“闹着玩，总是动手动脚！”

士兵们不肯放开他；仿佛这是他们生活中所仅有的一些娱乐。但是，不知道是谁不经意地用拳头触了他的眼睛，流下泪水来，眼角红了两块小小的斑点；他暴气起来，举起身边的扁担，向他们挥去：

“打死勿论！”

他也是同样不经意地用扁担击中了一个兵；然后便互相殴打起来了。经过许多人的解劝，才分开他们；但是那个兵仍是扯住他的手腕说：

“走，见连长去！”

“见团长去，也不怕你！”

“谁还不知道你有好妹妹和团长偷——”

“有好妹妹不假，妹妹也是正经人！”

“正经人？得啦，你问问你妹妹自己是不是正经人？”

有一个中士约束住了那个兵，又故意地调笑了张海——他又做起了唤猪的声调：

“啦啦啦……啦啦啦！”

一直到士兵饭后，他又把砸筷和剩余的饭菜用柳筐担进厨房，一样一样地洗净了；饭桶、菜桶，挂在墙上，碗筷放入木柜去——每一件用具都放在所惯放的原位上。然后，才开始了他自己的早餐——残余的冷汤和残余的冷饭；饭后，他便立刻又离开了厨房。

太阳高起了，为着生活忙迫的人们，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走过着一条一条的街道；街道上已经有了来去的学生：男的，女的，挟着书夹的，背着书包的，几乎都是怀着珍贵的青春、幸福、希望的笑脸，走向自己的学校去。他目送着他们，仿佛沉入了某种的幻想中。

随处都有着士兵：为了私事的为了公事的；他遇见很多。不知为什么他们几乎都认识他，向他打着招呼：

“张海到哪去？”

“团长公馆。”

赵团长的住所，是在一条繁华的街尾上，四面围着砖墙，一扇小小的黑色铁门，钉着一块长方形的木牌，写了赵公馆三个字，院内有一所中西式样的房屋，共计七八个房间；可是只住了六个人：赵团长，他的女人，他的儿子赵化雄，一个卫兵，一个厨役，另外还有一个女仆——张海的妹妹。赵团长送了她一个名字，叫她野兰。她穿着蓝色的长袍，有着斑斑的小团花，不认识她的常常默认她是一位朴素的小姐。张海来的时候，她正在打扫着院子。“哥哥，你来啦。”

他不睬她。

“哥哥，你生气了吗？”

“是啊，怎么的？”

“你同谁生气了，哥哥？”

“就同你！”

她被突来的话激动着，抖了一下；她问：

“哥哥，我待你有什么不好的呢，爸爸妈妈死后这二三年，我待你有什么不好的呢，你说！”

“你给我丢人吧！几天啦，我就想说，也没说。不要脸的东西，你要知道你才十六岁，你要知道你是团长公馆的仆人……”“哥哥，我要你说明白！”

“今天你要告诉我——你和团长有什么不好听的事情没有？”她无力地摇着头，脸颊上加深了她原有的两团晕红。“那么，这几天我怎么总听人家说闲话呢？”

她哭了：

“哥哥，你应当明白我，团长的意思，我能不从他吗？”这时候，赵化雄提着两个雌鸡跑来：

“谁敢？”

她拭着泪水：

“什么？少爷。”

“你哭了吗？”

“没，风迷了我的眼睛。”

张海的气愤，仍留在胸脯上：涨高着，落低着，不匀整地呼吸着；可是他问赵化雄：

“少爷，你才说什么？”

“杀鸡！”

野兰摇着身子——像在风里摇着的小树枝一样的柔软，她还在拍着手：

“我敢！”

张海向她 了一下眼睛，故意用一口暴气，冲破了紧闭的嘴唇：

“呸！”

“你吐谁？”

“就是吐你啊！”

“你为什么吐我？”

他想了想说：

“你敢？你那小胆吧！”

“你胆大，你敢，你杀！”

赵化雄摆着手要他们停住吵嘴；把鸡给了张海，跑进屋去，他的嘴还在说着：

“我敢！”

他取来一把尖刀，还没有拿过鸡的时候，便把尖刀又给了张海，笑了一声，仿佛他杀鸡的勇气就在那笑声中消去了，退开了几步。张海却说：

“让我吧！”

于是，他很快地杀了两只鸡：在杀的时候，野兰退开去，躲在屋里，赵化雄没有离开他，却紧紧地闭了眼睛，让眼角集起了两缕皱纹，好像是在替鸡受着死刑。

野兰跑出来的时候，张海用轻蔑的口调说：

“你那样吧，看人家杀鸡你都吓跑了，你还敢吗？”

于是，他们一句一句地交换着，一句比一句厉害起来，终于激愤地吵嘴了。最后赵团长的女人被他们惊醒来，从窗里透出一种不耐烦的声音：

“又是什么事情？”

赵化雄跑进去，完全告诉了她。于是，她一面忙着披起了睡衣，一面怒骂着——一般女人所惯用的一些难听的话，那是谁发的呢？谁也不知道。她拖着鞋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她只是为了张海；不然她怎么只是向张海做出女妖一般的面孔伸出毒狠的食指呢？

张海退开些，好像见了赵团长一样，仍是立正站着，向她投着探询的口气：

“怎么的？太太。”

他的话，好像激起了一阵暴风雨向他袭来：

“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是，太太。”

“都是你张海不好！”

“是。”

“谁要你杀鸡？你不是东西！正是睡早觉的时候，你们就吵嘴，真不是东西！”

“是，是！”

野兰看看张海的那种神情，推开了他。她说：

“太太，你不能这样对待张海，他对赵公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值得你这样骂他？”

这话像一块棉团，也像铁球，堵塞了赵团长女人的喉咙。静了一会，她嘶破着声音叫：

“再过几天，你成了我家的老奶奶了！你凭什么说话？哪里有你说话的地位？”

“不是的，太太——”

“那是怎么的？”

“张海——”

“我明白，张海是你的哥哥！”

赵化雄从中向他的母亲说：

“都是怨你，总是这样吵！”

这句话，做了结束。

响亮的钟声，打了八下。张海提着书包，送赵化雄走向学校去。路上他没说一句，只是到了学校的时候，他把书包交了赵化雄，他问：

“今晚还去吗？”

“去，你回去歇歇吧！”

他回去之后，是没有休息的，仍有打扫营房的工作，踊马，士兵的晚餐……都在等待他。直到天色沉入薄暗中，空中飞尽了老鸦，小鸟，从那时候，才开始了他的休息时间。可是他仍是一贯地把他所有的空闲时间投入骚扰中，忙迫中。他整理一下衣服，换了一双净些的布鞋，悄悄地从团部的后门走出。门外有着几株老树；他的影子在老树下，无声

息地飘过了。在不远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他徘徊着，他的两手相互地打着拍子，为他嘴里哼的歌子伴奏。

小奴啊，今年已十八，十八的人啊，还未出嫁，妈妈，你好糊涂呀！他的歌声，比起早晨唱的，是有着更多诱惑性的。他那样轻快的步子，仿佛他没有遭受任何的疲倦，反像一般人在一天中最兴奋的一刻。

情哥哥，你何时再来，只等明年春三月，桃花，李花，杏花儿开，小妹妹与你挂呀，挂招牌，情哥哥，你好再来！

小妹妹紧抱着你，像双飞的燕一样飞开。

渐渐地一个模糊的影子近了——赵化雄来了。他们走向了另一条路去。

临街的人家，有的老树高过了墙头；从主人在不知觉中，树叶悄悄地从墙内飘向墙外来，一叶一叶地落在他们的身上，或是搔了他们一下皮肤，或是诱动他们一下视线，悄悄地落在地上。他们欢快地走着，转入了一条夹树的街道——那里满着无人打扫的落叶，在他们的脚下做着一种声响。

一条一条的街道：披着落叶的，满着沙粒的铺着沟板的有的僻静，有的污浊，有的骚闹；在他们的脚下，一条一条地爬开去，在他们的背后渐渐地远了。

渐渐地普庆大戏院近了。不过已经是日戏的终场，夜戏还没有开场，正是剧员休息的时候。他们走进了正门，从楼座绕了一周，沿着直通后台的一条小楼梯，熟识地走下去了。他们要去的，是后台的楼上，写有“坤角下处，切莫擅入”的地方。几间小房间紧紧地相靠着；因为过道上只有两个小窗子，门扇已经没入黑暗中了；可是张海仍是很熟识地敲门很熟识地唤着：“筱翠仙在屋吗？”

屋里有老太婆的声音回答他：

“没有！”

“哪里去了？”

“不知道！”

“跟包的（是女剧员的佣人——俗语的特称）呢？”“也不知道。”

于是，他又敲了另一个门：门裂开一条缝隙，随着流出一缕灯光来，继着塞入了一个女人的面孔：散开的发丝，同蛛网般地遮了一半前额，一半脸颊；她那好看的脸孔，一半被隔成了碎块。她的眼睛，滚动着，探索着，仿佛她的视线透不过过道上的层层黑暗；所以她问：

“谁？”

似乎是没有人；可是她默认了：

“又是张海！”

随着便厌烦地闭了门。

这时候张海又叫了：

“玉莲开门！”

“你藏起来好啦！”

“不不！”

“你去吧，人家正忙着呢！”

“我告诉你少爷来啦！”

门完全开了。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在整理着戏装。后来，她斟满了一

杯茶，给了赵化雄：

“对不起少爷，茶凉了。”

“不要米汤（北方俗语献媚的意思）吧，少爷已经有了情人。”张海的话染红了她的脸；她说：

“比你知道的早！”

“你说是谁？”

“筱翠仙呗！”

“喂，她哪儿去了？”

她告诉了筱翠仙去的地方，赵化雄找去了。张海留在屋里，寂寞地扯过来她的戏装分辨了一下，他问：

“你的夜戏不是《虹霓关》吗？”

她点点头；在墙角边，不耐烦地给他让出一把椅子来——意思是说：“离我远些，坐在那里吧，不要说话，不要闹我！”可是他仍在问：

“又是‘压轴子’（北方俗语指每场最后的一出说的）的戏吗？”

“是啊，是啊！”

“喂……玉莲在一面坡够‘打腰’（北方俗语，负有盛名的意思）啦！”

她的嘴角向上抽动一下说：

“那不是全仗张海捧的吗！”

“玉莲一天比一天会说话了。”

“得啦，你不要米汤我吧！”

他随意翻弄着她的衣襟，一只手从她的头后伸过来，环裹了她的脖颈：

“让我们做唱《虹霓关》吧！”

“这也不是戏台！”

“我不可以做一次台下的王伯党吗？”

她推开他，放出一种难于想象的神情：一个眼睛涨大些，有着气愤；另一个眼睛缩小些，却藏着娇情。

他不做声了，无聊了，让屋内所有的寂寞的空气紧裹着他的全身。

过了一会，有了另外的几个女伶，也是为着同样的寂寞与无聊，要向她们的伙伴丢下几句闲话，或是几句笑话——仿佛在她们湖面一样的生活中，吹过了一阵风。同时，张海也感到格外的兴趣，在他看来，她们没有一个动作，一句话不是在触动他的心的——虽然她们有时骂着他：

“你是我亲生的儿子。”

或是：

“当兵的没好人；好人不当兵。”

但是他说：

“好，我就是你亲生的儿子！”

或是分辨一句：

“当兵的没好人；好人不当兵——我也不是当兵的，我是打杂的啊！”在这种情景中，他尽量施展着自己所积蓄下来的一些技能：唱几句京调，说些笑话和学做女伶的动作。甚至喘息了，头流了汗，却仍在继续着，他已经忘去了他整天所有的遭遇与疲倦。屋内的壁钟，随便地

响了几下，这使人从声响上确定不出正确的时间。不过，天色已经黑了，戏院已经响了未开场前的第二次锣鼓；化妆室集齐着第一出戏的剧员，开始化妆了。这时候，赵化雄回来了，又同张海走开了；几个女伶的手，翅膀一样地在灯光里闪着，送远了他们。

街上的野孩子成群了，从这一街头拥到另一街头去，疯狂地做着各种的儿戏，仿佛他们不受任何的拘束，任他们施展着个性。戏院门前的小铺子为观客备好了梨、香蕉、瓜子……悬起了一盏明亮的灯火，招揽着主顾。张海跑去丢下了两枚铜元，只换了一把瓜子；于是他耸起眉毛。铺子的主人看看他的衣服，立刻又多给他添了一倍。然后他分给了赵化雄。

月亮升起来了，夜色并不完全黑暗。鲜明的白云，稀松的一层，满了天面，好像抢夺了世界上所有的新娘的轻纱，集中在一处，飘荡着，诱着未婚的姑娘。同晨雾一样的空气，在朦胧的彩色中，模糊地展开着。夜风从四外吹来，或是吹往四外去，向夜行人不住地散着秋凉。

随处都在渐渐地安静下去，只有一条小巷是在渐渐地活跃起来。

这是一面坡最好的妓女的地方；可是，也同样是狭窄的小路，散着垃圾物，有着使人呕吐的气味，路旁，完全是低小的门扇，一扇连着一扇，延长很远，仿佛是两列相对的鸽巢；不过，比鸽巢多有一页红色的门帘，一盏惨淡的小灯。所有的都是一样，在每盏灯光下，早已安置了小小的岗位——一个简陋的凳子，或是欠缺椅腿的椅子；每处都有一个守岗的女人：有的剪了短发，有的是发辫，有的梳着发饼，她们同是穿着便宜质料而有鲜艳花纹的衣服，她们同是涂着脂粉的面孔：红的颧骨，红的嘴唇，惨白的前额，黑炭色的眉毛……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夜游人，那样多地拥塞着。张海与赵化雄费去了相当的力量，才挤了进来。他们已经吃尽了瓜子；张海嘴里嚼着的，只是最后一粒瓜子遗下的皮壳，他停住了，倾听着一个小姑娘唱的歌：

情哥哥，
你好再来，
小妹妹紧抱着你，
像双飞的燕一样飞开！

……

赵化雄问张海：

“她就是你迷了的那个玉喜吗？”

张海默然着；向她丢了一下调情的眼色，把她紧紧地拥抱过来，摇摆着：

“像双飞的燕，一样飞开。”

她厌烦他，推开他：

“去吧！”

“你再教我唱几句！”

“你怎么天天这样来缠人呢？”

这话在张海并没感到什么；赵化雄却感到了侮辱，所以他向她说：

“没良心的东西，告诉你——这是看得起你！”

“那么，不看得起我呢？”

“就是这个！”

——他让两掌的掌印在她那贫血的脸上替代了胭脂；或是比胭脂更红些。他对张海说：

“回去吧，不和她们惹气吧！”

“再等一会儿不好吗？”

“不，不！”

“下次不来了吗？”

“我这一次就够了！”

“少爷，你先坐车回去吧，我还有些事情。”

赵化雄走后，他并没有什么事情，仍是去纠缠另外的一些妓女；也许有一两个妓女自动地呼唤他，缠绊他，同他故意开玩笑。夜深了，留宿了客人的妓女已经摘落了窗幔；没有客人的妓女，也渐渐地闭上了门扇。于是，在黑暗中冷清了他。在摸索着自己的归路。虽然仍有一两个妓女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向他招呼着：“张海，你住下吧？”

“住下吗？”

“啊！”

“那你不要钱吗？”

当他走到团部门前的时候，值班的岗兵，受惊似地从岗楼里跳出来，喊了一声：

“口令！”

“张海！”

“张海这两个字也不是他妈口令。你天天都不等发下口令就跑出去；如果有人也说张海，放过去不放过去呢？”

“那就随你便啦！”

“不是东西！”

张海想想又补充了一句：

“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吗？”

“岗上如果是新兵呢？”

“哪个新兵，不是先认识我张海呢？”

他自语着，走进了厨房。老厨夫睡了，正响着鼾声，清朗地引着未睡人的睡意。

炕上没有什么铺的，只是一张苇席，破裂的地方，常常刺着皮肤。并且他也没有什么行囊；几年来，就是那一条被子，现在已经破了，不经意中常常落下棉块来。他用衣袖打扫了一下苇席，从炕底扯过被子来，铺好了它，然后脱去了他的鞋袜……当他的身体完全赤裸了的时候，长吁了一口气，衬着一丝的喉音，结束了他的一天。

夜安静着，让他安静地睡去了。

在旅部派遣一位参谋长检阅第八百七十四团的那天，赵团长曾召集所属的营长、连长，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训话。不过，全团除去派出剿匪的部队与负有特种勤务的稽查处，车站守卫队等之外，所能被检阅的，也只有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与步兵数连。而且任何一连都不完整，有的竟缺少七八个以上的兵额，所以赵团长把全团的马夫、厨夫，甚至他的卫兵，尽数地补充进来，也没有补充完全。最后他叫来了张海，他说：

“今天你不要蹓马，也不要再忙别的。”

“团长，是不是叫我顶一个空额？”

赵团长笑了：

“是啦！”

张海听了赵团长回答他的话，便转开了身子；可是赵团长放高一声，吓得他立刻又退回原处：

“团长。”

“慌张什么？”

“团长，没说完吗？”

“当然没有！”

“是，团长。”

“这次检阅与平常不同，处处都应当谨慎，小心……”

“是，团长。”

“在校阅的时候，你听到参谋长叫王发祥的名字，你就答应一声——有，要大些声。”

然后，赵团长又告诉他王发祥是属于守卫团部那一连的，命令他从士兵中借一套完好些的旧军衣；如果是破的，或是脱了衣扣的，要他自己缝连一下或是添补起来。并且发给他一支步枪和两条不十分饱满的弹带。

但是，他向每个士兵借用军衣的时候，都向他摇着头，拒绝他，有的甚至与他开着玩笑：击了他一掌，或是几掌。他在忙迫

中，白白地费去了许多的时间。几乎是一小时以后，他才从许多士兵手里凑齐了一身军衣；不过，上衣过于宽大，下衣又十分短小——这样更使他不像一个军人。

“还缺裹腿，谁有？”他向所有的士兵问道。

守卫团部的这一连全部换好全副武装：刺刀、背囊、水壶、杂囊、弹带……好像在临敌之前准备着出动。

院内飘起了一面红色的旗子，旗的左侧拖长着一队队伍。赵团长来了，三个排长从队外归还了原位，连长向他作了报告。他持着名册点名的时候，却没有王发祥，他气愤了，又放高声音重叫一次：

“王发祥！”

他自己摇了头，仿佛记起了些什么；眼睛寻视着队伍，用严厉的声音叫：

“张海！”

再一次也是：

“张海！”

“有！”

这声音，是从营房纸窗里透出来的。随着，张海便从房里窜出来，自己还在说：

“我刚借来裹腿。”

他还有一条裹腿没有裹好，拖在脚下；跑的时候，像一条蛇虫似地追着他的脚。

在赵团长的面前，他才弯下腰，缠好裹腿；不过，因为他不熟练，而且匆忙，完全没有裹好，中间遗下一条一条的缝隙，透出了裤子的色质。赵团长握着他的肩膀，摇起他来说：

“你看看你自己像什么东西？”

张海刚刚垂下头，去检视自己；又听见了赵团长更暴躁的声音：

“你再看看你自己的皮带！”

于是，张海快些地把眼睛移向皮带。皮带松懈着，没有束紧他的腰，时时有脱落的可能。并且，有一边被刺刀拖成了一条弧线形。他刚要用手去紧皮带的时候，赵团长猛力地把他的手打开：

“你的枪呢？”

他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说：

“忘在屋里啦！”

“做军人的怎么能忘记枪呢？忘记枪就像忘记自己的生命一样！”

“团长，我不是打杂的吗？”

赵团长的脸上透出了几分惭愧的颜色；但是，仍保持着挺直的腰背、脖颈，严肃的声调：

“少说话，不许你随便说话！”

“是，团长。”

后来，赵团长用了一种眼色，放开他取来步枪。在队旁，他估量着自己身体的长度，好插入队里去；但是，他试探了几次，也没有适当的位置；每次被他隔断的两个人，不是比他长些，便是比他低些。最后仍是赵团长拣了一个位置，安放了他。他望望他左右的两个人，才知道同他的身体有着同等的长度；而且，其中的一个人，是他所最熟识的那个老厨夫。他用眼角溜着老厨夫，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是老厨夫分明是用眼角在制止他，然后，偷偷地指了他一下——他看见了自己的衣襟下垂着一段裤带，脏的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颜色，顶端破散着零碎的布条；他避着赵团长掩入衣襟去。

所有的连队在团部集齐以后，赵团长发出了向草场出发的命令。队头是团部的乐队，号音伴着鼓声冲断了路上的车辆、行人，都挤到路旁去。赵团长骑着马，引着向草场去的前路。每个连长执着指挥刀，伴随右手摇摆着，好像尽量让刀刃闪着所能闪出的光条。军乐息了的时候，在草场上停下了全部的队伍，一连接着一连，沿着草场的一边排列下来。

赵团长骑着马，绕了一周，又奔回团部去。

张海立正着，尽量地逞着勇敢的姿式，挺起胸脯来——虽然步枪、弹带……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头不住地流着汗水。他听见连长发下稍息的命令以后，仍是拘板地没有转动。然而不久，有人在他的背后唤着他的名字；于是他转过头来；特区中学的木栅，距离他背后只有几步远，那里聚着许多学生，其中有赵化雄，还在说着：“我看像你嘛！”

张海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赵化雄却没听见，他问：

“你说什么？”

“你不上课吗？”

这声音很高，一个连长听见了，严厉地吓了他几句，他立刻转过头来，脖颈也缩短了些。然而赵化雄更高的声音叫了：“张海！”

于是，那个连长悄悄地走开了。张海又问赵化雄：

“你不上课吗？”

“放午学。”

“不回去吗？”

“我要看看呢。”

赵团长又陪着参谋长步行来了。参谋长停在距离队伍十几米外的桌后；桌上遮了一层洁白的桌布，放着几本土兵的名册，他就是照着那些名册在点名，点名的方式是这样：他呼出谁的名姓来，谁就要从队里跑步出来，跑到他的面前，取了立正的姿式，立刻要回答一声：

“有！”

然后，向后转，再跑步归队。

张海看着这种情形，他的眼睛便模糊起来了。他并不怕什么，只是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觉——他的全身，仿佛遭了绳绑，失去了动作的自由，于是他悄悄地扯了老厨夫的衣襟，让嘴角悄悄咧开一条缝隙：

“这是校阅吗？”

“是啊！”

“那以前校阅怎么不是这样呢？”

老厨夫自然也是不知道；所以张海只有等待着那种新的尝试。参谋长渐渐地叫到了他：

“王发祥！”

于是，张海从队里跑出来；然而他那不是跑步的姿式：左手没有握着刺刀，扛着的枪，随着他的头摇摆着……这样一直跑到参谋长的面前：

“有！”

他还没有向后转，参谋长便指住了他，向他走近来，用视线在他的全身缠绕了几圈，问他：

“你是老兵？是新兵？”

他没经思索地回答一声：

“老兵！”

“老兵？”

“是，参谋长。”

“既是老兵，你应当知道，兵是保国的，卫民的，像你这样的兵是能保国呢？是能卫民呢？”

“……”

“老兵——几年了？”

“六、七年啦！”

“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十九岁。”

“那么，你十二、三岁就当兵吗？”

“是，参谋长。”

“胡说！”

“是，是，参谋长！”

“胡说！”

“是，是，参谋长！”

“哪有十二三岁当兵的？”

“报告，参谋长，我打杂啦。”

“我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当的兵？”

他转开头，皱起眉毛来，仿佛有什么为难了他，使他失去了自主力——他说：

“从今天——”

“胡说！”

“是，是……”

“站好，听我的命令——正步走！”

参谋长试验着他；但是他没有受过一天的军训，自然也不会正步走——虽然过去六、七年间，他听过许多长官喊过正步走，也看过许许多多练习正步走。不过，他只记得，正步走的时候有一种声响，所以他尽量让脚掌打着地，一声比一声响起来。参谋长一面在骂着他：

“这是他妈什么姿式？哪国的正步走？”

同时，一面在叫着：

“左转弯，……左转弯！”

他终于气愤着要张海归队了。

校阅后，赵团长被参谋长唤去了。团部的士兵便集拢着一堆一堆地谈论起来，有的说参谋长震怒了，赵团长是要受刑罚的，有的说参谋长已经气哑了嗓音，不撤赵团长的职务，也要记一次大过，有的装做张海跑步的姿态，惹着大伙笑起来，有的肯定地说：

“你们瞧张海挨办吧！”

同时另有人做着回答：

“那也不怨张海，他本来没有当过兵，硬叫他装兵，他怎么能像呢？……”

“反正这次是够团长受的。”

“活该，谁叫他总留空兵额、扣空兵饷啦！”

“得啦，哪个团长还不是这样。”

“那怎么怨张海呢？”

“不管怨他不怨他，你瞧他挨办好啦！”

张海听了，他跑出去了。在草场的边路上，他恰好遇见了赵化雄。

“上哪去？”赵化雄问。

“有事情，要出去一次！”

“先跟我来！”

“做什么？”

“也有事情！”

到了赵化雄家的时候，张海才知道受骗了——赵化雄为了防避他被处罚。可是他说：

“少爷，我谢谢你！”

他要走开；赵化雄说：

“你在这里，团长来的时候，有我呢。”

“我不！”

可是野兰扯住了他：

“哥哥，你不走吧！”

“为什么？”

“我怕你受罚。”

“谁要你怕？”

“谁要你是我的哥哥呢？”

“我没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妹妹！”

野兰的脸羞红了。

这时候，赵化雄被他的母亲唤了去。余下他们两人静默地守着院地。

过了些时，张海从她手里夺回了自己的衣衫，跑了；她追着他，追出了院外。

“哥哥，你等等我，我有话说。”

他站下了：

“你说吧！”

她没说话，只是追近他几步；可是他立刻又退开几步——他要保持他们两人中间已经隔成的一段距离。

“哥哥，我不愿意你去受罚。”

“那又怎样呢？”

“你不要走，我可以替你向团长求情。”

“谁要借你的光呢！”

他走了；仿佛还在自语着：

“大丈夫，怕什么！”

在街上一家豆腐店内，他买了三斤干豆腐（南方称千层豆腐）又走进一家旅店去，空了两手，走出来。

他再走回团部的时候，士兵都悄悄地避开了，有的去整理军装，有的去修理步枪；却很少有谈话的声音。赵团长正在屋内沉思着，踱着小步子，看见了张海，便叫一个兵取来一条军棍——有三尺多长，一半是红色，一半是黑色。于是张海躺下了，他并没有求情。他知道受罚者应有的姿态，脸孔贴着地面，股部尽量地留在上边。

“再来几个人！”

赵团长为了不能使他有些自由的转动，又叫来了几个士兵牢牢地握住了他的头，他的手脚，然后命令那个取来军棍的士兵说：

“打！”

“多少？”

“没数！”

这在士兵中最怕听的两个字被赵团长说出来，好像使一些士兵也胆怯了，自动地替张海说情。可是没被赵团长允许，军棍终于落向张海的股部去，一声连续着一声，使人想不到哪一声才是最后的结束。不过那种声响，很轻松，没有一声是很清脆的；所以赵团长责骂起来：

“你怎么不用劲打呢？混蛋！”

以后，他夺过了军棍，任自己来执行。军棍究竟在张海的股部上起落了多少次，也没人记下，仿佛经过七八分钟才停下来，赵团长把军棍抛在一边，没说一句话便走了。

“有一天见，大丈夫报仇三年不晚！”

张海说着，从地上爬起来。有几个士兵围过来，扶着他，他推开了他们，自己仍是一样轻快地走向厨房去。老厨夫像是自己遭受了一次惊险，脸色惨白着，探询他的刑伤，

“怎样，还能走吗？”

“你看看！”

他故意给老厨夫跳动几下；而且耸起身子跳到炕上去。老厨夫好意地说：

“你真是王八骨头！”

“你看看！”

他解开裤带，让裤子落到膝下露出的股部却不是赤裸的皮肤，周边用布条裹着一层干豆腐，已经贴在一起，没有了一页一页的原形。老厨夫笑了，赞扬地说：

“老兵！老兵！”

“六七年啦，还有什么不懂的？”

“有你说的；一个老兵不懂的你都懂啦！”

这时候，赵团长派一个卫兵来，特意为张海送来一元钞票——是要他买药医伤的。

他很快地穿好了衣服，跑到赵团长办公室的门前，做了一个跛足者，摸着墙壁走进来，站在赵团长的面前，不住地抖着身子，仿佛是站不住，要用两手撑着桌边。他没说什么，只留下一个谢礼走了。一元钞票，使张海不安了几天，终于在一天夜间又走了出去，嘴里仍哼着他惯唱的歌子：

情哥哥，
你何时再来？
……
只等明年春三月，
桃花，
李花，杏花儿开，小
妹妹与你挂呀，挂招牌，
情哥哥，你好再来！
小妹妹紧抱着你，
像双飞的燕，一样飞开，
……

当他看见了玉喜的时候：

“你生我的气啦吗？”

“不，我还想着你呢！”

于是张海也不分辨她的话，是真实的，或是虚伪的，只是把甜蜜的笑脸，送近她的眼边，用胳膊把她裹进屋去。屋是很小的，底边有一段短炕，放着花布的被子和花布的枕头，侧面摆着地桌，椅子和垂着铜锁的小皮箱，所余下的地方只有一个小小的墙角；他就是把她拥在那墙角边，从衣袋里掏出赵团长送他的那一元钞票，低声地问：

“我可以住下吗？”

她用食指与大拇指，夹住钞票的一角，摸搓了一下，她也低声地问：

“只是一张吗？”

“是，只是一张，一张我可以住下吗？”

“住下要——”

她的话中断了，随着伸出个手指来，于是他的手从她的肩上松松地垂落下来，握成了拳头：

“怎么的？”

她的眼睛张大了；然而，却是笑着，吻着他的拳头，终于被她吻开了，垂直了手指。她问：

“你生我的气啦吗？”

“不，我还想着你呢！”

的确他是在想着她，为了缺少一元钞票，他曾失眠了几夜。有一天他向老厨夫说了许多好话，借了钱；毕竟宿了玉喜一夜。

以后，他几乎是疯了，常常直瞪着眼睛，沉思默想中，有时老厨夫唤着他；他却丝毫没有听见，或是受了极大的惊恐——在这种神情中，他常常无意地打碎了饭碗、小碟子，甚至有一次担着菜桶饭桶，在平坦的院场上跌倒了。所以在几天以内，士兵都知道他是在迷恋着妓女。并且他自己常向人家形容他所爱的玉喜：怎样的面孔，怎样的动作，怎样地抱着他，吻着他，教他怎样地唱歌。

“允许了我，说是要嫁我呢！”

他常常用这句话给自己做了终结；不然便说：

“我忘不了她。”

但是，“九·一八”事变那天，团部发出了戒严的布告：全团官兵，一律禁止外出。

张海在院内踱着细碎的步骤，望着朦胧的月色，几乎望到太阳出来的时候。

第二天张海刚睡着的时候，赵团长命令他去找赵化雄，不许赵化雄参加学生的游行。他趁着这次绝好的机会，去探望玉喜了。可是她的门紧闭着，也许正在留宿着客人。他走了，白白费去了许多时间。

那时候，学生的队伍已经冲破了军警的包围，冲出了校门。张海追去了，直追到车站附近的地方，才追上了队尾；然后他又追上了队头。不过，因为学生的总数有五六百人，他很难辨出赵化雄在队里所占的位置。虽然队里有校旗，区分着每个学校，但是他不认识校旗上的字。最后他沿着队伍，喊叫了赵化雄的名字：学生注视他，好像在疑心他。

他喊了几声以后，有了赵化雄的回答，可是赵化雄说：

“你回去告诉我的父亲，就说我不回去。”

因此张海看守着赵化雄，随着学生队伍走了一天。在晚间，在赵化雄的家里，他看赵化雄独自在沉默着，他问：

“少爷，你有心事吗？”

赵化雄仍是在沉默着。

“你去看看筱翠仙吧？”

“我不去了。”

“你怕戒严吗？”

“不，不是的。”

“为什么？”

“为什么？沈阳都被占了，谁还有那些闲心！”

他继续讲起了报纸上的消息：“友军”怎样轰炸北大营，怎样夺取兵工厂……怎样失去了沈阳，可是张海仍没有完全明白，他问：

“沈阳不是有中国兵吗？”

“那时候，早就退了。”

张海想了想，记起了参谋长的话：

“兵，不是保国卫民的吗？”

赵化雄默默地垂着头，说不出什么理由了。他暴骂了一些时候，不住地说着：

“汉奸……汉奸，汉奸！……”

然而，过了几天，赵团长也随着他的高级长官发了投降的通电。并且在团部的门前贴出了一张布告，仍是一些军人的惯语：什么听候长官的命令，什么绝对服从……其中没有一句是说明投降的理由与事实的。

那时候，是午间，不过，天上没有太阳，各处拥塞着流走的阴云，浓黑的，一层遮蔽着一层，有的在集中着，有的在散开着，渐渐地吞食尽了仅有的一些灰白的云丝，渐渐地要使这世界消逝在黑暗中。有时响过了雷声，却很少有着电光——就是有，也只是那样不明亮的一条，从阴云中划开细小的绿纹，一刻的工夫便又逝去了。

老鸦绕着房脊飞转；那般的鸣叫，使人听厌了。

士兵散开三五人一群，在讲说什么，他们的话声很低，不在他们的身边是听不清楚的，从他们的神情看来，可以知道他们是愤怒了。

张海在草棚旁，把短短的草茎与高粱米粒一堆一堆地混合起来，为马制做着食料。他看见士兵那种不常有的情形，他凑近了些，听见他们说：

“谁愿意做亡国奴，谁就投降；谁不愿意做亡国奴，谁就他妈打，打！”

然后，又有人问张海：

“你是你娘养的，你这回也干一下吧？”

“干什么？”

他们笑了；那好像是他怎样的愚蠢的；可是有人给他说明白了，他却说：

“我还要照顾玉喜呢！”

“她是你的娘？是你的奶奶？”

有人骂了他；甚至有人要打他。

这时候，幸是赵化雄从赵团长办公室走出来了，张海向他跑过来，问他：

“你什么时候来的？少爷。”

“很久了。”

“我还不知道呢，少爷你做什么来了？喂，你哭了吗？”“没有。”

“不，你看你的眼角还有眼泪呢。”

“同父亲吵嘴了。”

他又继续骂了赵团长几句；士兵向他行了一下军礼，都避开去。他叫着：

“为什么，你们都去了？”

士兵停下脚步，可是没人说话。他向士兵给自己做了一次剖白，最后的一句话是：

“——我绝不同意我父亲的主张。”

“我们现在应当怎样呢，少爷？”士兵中有人这样问他。

“应当抵抗，抵抗到底！”

张海很快地推了他一下肩膀：

“小心些，团长知道……”

可是，赵团长终于知道了，骂了赵化雄，并且向士兵声明：违令者，要受军法处置。

从此，士兵直是圈中的猪羊，等候着走向屠场，等候着屠杀。

集聚着几天的阴云，被雷轰碎了，落了秋天的暴雨。地上的积水，流成了一条一条的小河，同蚂蜒河一样匆忙地流去着，流向什么地方去了呢？没人知道，只看见它们冲过街路，好像在追逐什么，触了墙根，山底，或是预防水侵的堤坝，便转过方向，另辟了去路。只有一天的工夫，积水满了整个的小城市，已经占有了小城市的街道、院落、旷场……每家的窗子被水浸湿着，窗外几乎完全断绝了行人。

团部院内，同样也没有一个人或是一匹马，也没有任何的声响，清冷得如同墓场一样。门前的岗兵恰似两个守墓者，一人握着一支步枪，无生气地倚着岗楼的一边，不知他们是在困睡中，还是在冥想中？

过了些时，雨断息了一刻，张海跑出来，望望天色。这时候，有马车的铃声响近了，然后，马车被岗兵阻住了，问：

“找谁？”

车棚垂着一块油布，遮住了车里的乘客，油布上仅有的一块小玻璃，也被雨淋得模糊了。于是岗兵又问了车夫：

“从哪里来的？”

“车站。”

“做什么的？”

“不知道。”

“几个人？”

“两个人。”

是两个人，一个年老些的，一个年轻些的，唇上却都留着一点同样的黑须。他们揭开了车上的油布，探出头来，没容岗兵指问什么，便用手杖推开了岗兵，使马车安静地转入门去，他们走进赵团长的办公室。

又过了些时，团部传遍了一种消息；张海正向每个士兵播送着：“友军”开来了一列兵车，停在车站上，不过“友军”没有下车，只派来两个代表……

雨突然大起来了，雨滴像豆一样、弹一样地投下来、射下来，让积水的地方溅起水花、泡沫。落雨的响音，如同涌来的海潮，空旋间，充满着一种淡漠的气氛，遮没了远处的山腰，近处的屋脊也渐渐地模糊了。

冲来一阵暴风，几乎把树上的叶子完全打落下来，老鸦终年制做的巢子破碎了，一枝一枝的草茎随风飞散着。老鸦依在孤零的树枝下遭着雨淋，有时抖开湿淋的翅子，从树边绕过几周，又飞回了原处；有时有几声短短的鸣叫——那种声音愈发加倍了秋天的凄凉。

可是张海仍是同平常一样地在歌唱着：

情哥哥，
你何时再来？

……

只等明年春三月，
桃花，李花，杏花儿开，

小妹与你挂呀，挂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来。

……

“亡国的时候到啦，你他妈的还有闲心唱呢！”

老厨夫骂着他，是诚恳的没有丝毫玩笑的意思。可是他不听，仍在继续地唱着：

小妹妹紧抱着你，
像双飞的燕，一样飞开。

“你离我远点唱去！”

“管你什么闲事？”

“我不愿意听！”

“硬装不错呢！亡国的时候到啦——就你明白，别人必是都糊涂。我是打杂的，唱两句，你来管我啦；团长都投降啦，你怎么不说他呢？”

老厨夫气愤了：

“好吧，你唱吧，鬼子来了，你就好啦。”

“鬼子来就来吧，老爷到哪都是一份打杂的！”

“打杂？哼，怕你小子那时连命都没啦！”

“放你妈的屁！”

院内响起了集合的军号，张海跑到门边，从门缝望着：雨滴细小了些，仍是飞快地落着，飞快得像一条一条的水线，从天空连到地上；渐渐地被士兵的帽顶、肩膀触断了长长的一列。

“我也看看。”

老厨夫踢开了门，风卷入几缕雨丝，湿了张海的脸，他没有责骂老厨夫，只是不转动地望着。

驻守团部的一连士兵，他们全数排起队来——是平常一样的横队，三个排长把整个队形截成三段，由连长指挥。不过，他们没有平常那样整齐，皮带、刺刀，都错放了位置，有的把皮带挂在肩上，有的卷成一团握在手里，有的把刺刀插入裹腿里，有的随着斜挂的皮带垂在腰间，枪枝与弹带呢，都没有在他们的身边。连长命令他们整理一下自己的军装；他们都皱着眉，紧闭着嘴唇，把脚插入泥水中，没有一下转动，任着无情的风雨吹淋。

赵团长出来了，没有走近士兵的队旁，为了避着风雨，他留在门边了。他还没有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气愤了，骂过了连长，又开始向士兵说话：

“你们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友军’的代表预定今天检阅我们的全团，因为雨天的关系，只好暂先检阅你们这一连；然后‘友军’的队伍好开进来。你们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要冲突吗？要……做什么？人家能不疑心吗？”他想了想又说：“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要先解除武装。”

他派卫兵去收理枪枝弹粒后，又叫来了张海：

“你再干点事情！”

张海沿着队旁，把刺刀一把一把地集拢在自己的手里；当他每次接
过一把刺刀的时候，他总是看见有几滴泪水伴随雨水落下来。他搬送几
次，才把刺刀完全搬送到库房去。

突然，有一种疯狂的叫喊响近，成群的学生拥向团部来。赵团长立
刻从衣袋里掏出了手枪。张海跑到他的身边，特意告诉他：

“那里有少爷呢！”

赵团长斥开张海，走近学生去：

“你们要听从当局一切的命令，不许妄动——”

学生打断了他的话，喊着反对军人不抵抗而投降的一些口号。

他把手枪对准着学生喊：

“我看你们谁敢妄动，我就枪毙你们谁！”

赵化雄从学生中冲出来：

“爸爸，你先毙我吧！”

“谁都是一样！”

赵团长立刻开了一枪；但是，开枪的时候，张海要抱他的胳膊，没
有抱住，触动一下他的手腕，使他开放的一弹从赵化雄的头上做了流弹。
于是他把手枪又瞄向了张海：

“你要找死吗？”

“不，那是他。”

“他怎么的？”

“团长，他是少爷！”

“打的就是他！”

他再把手枪伸向赵化雄的时候，所有的学生完全骚动起来了；士兵
混成一团，冲向库房去。他退转屋内，命令他的卫兵守住办公室的门扇。

只有张海孤零地被遗在扩大的院场上。

西山上的阴云，正在溶化、消散。太阳在山脊的沙土上，留了一片
淡漠的红色，渐渐地没下山脊去，白色的云层间遗有几条艳丽的霞光，
雨后的景色，是鲜明的；整个的城市，都在恐怖中。

团部的四周，被“友军”包围起来了，士兵与学生破坏了库房，夺
取着枪枝。赵化雄一人握着两支枪，还有弹带，喘息着，从人群里拥出
来：

“张海！”

张海来了，赵化雄向他送出一支枪：

“这是你的！”

“做什么？”

“你没看见现在是什么时候么？”

“打仗吗？”

“是的。”

“少爷，我不能。”

“怎么？”

“我还要照顾玉喜呢！”

天黑了的时候，学生还在计议着一些什么计划。可是团部附近的地

方，已经响起了枪声——团部外的士兵为了援助团部内的士兵，开始向“友军”冲击起来，团部内的士兵也趁着这个机会向外冲围，所以团部无形中便作了战地。

在黑暗的夜色中，一切的形色完全消退了，只见弹粒遗下的火线，像光条一样，一条交织着一条，在黑暗中织成了花纹。士兵破着喉咙在喊：

“杀呀，杀呀！”

这种喊声中，潜伏着一种人类最大的英勇和斗争的光荣。

在第二天的早晨，团部四周遗下了许多的尸身，有的伤了头部：眼睛，前额，脸颊……有的看不见伤痕，只是衣服上有一个小的洞孔，有的满凝着鲜血，在手上、衣服上以至地上，有的破碎了前胸，或是后背。虽然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友军”，他们却是同样地安静地躺着。

团部的木栅栏拆毁了几处，余下的几乎都倾斜下来贴近了地面。门前的岗楼碎了，集起一堆木片，有的突出着粗大的铁钉。门前仍有岗兵徘徊着，不过，是“友军”了。

蚂蜒河边有着稀松的枪声——逃出的士兵还在抵抗着“友军”。不过，街市已经被友军占有了，他们的骑兵队，炮兵队绕着每条街道，向居民示威着。

已经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可是许多烟囱还没有飘起炊烟。每家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街上也没有了好玩的孩子和小贩。处处都加深了一种凄惨的色调——尤其是团部附近的邻家，许多的房脊、院墙、窗子、门扇遭了弹击，地上散着一些砖与玻璃的碎块，其中杂着无数的弹壳。有一家白色的墙壁上，凝结着一团血迹，仿佛是谁故意喷了一口红色一样，四边散开着飞溅的斑点。还有一家的玻璃窗上，印着一个手掌的血印……

天上的云，很难辨识究竟是什么色彩，不像灰色，也不纯是白色，也许在画家的调色板上，感到了调色的困难。

赵团长仍是穿着上校的军装，不过帽上青天白日的帽花裹起了一层红绒，他所有的士兵，只余下二三百人了，而且，完全做了“友军”的俘虏，被看守在连部里，营部里；团部里呢，比较少些，其中有张海、赵化雄、老厨夫，还有其他一些兵和学生，共计是二十几个人。他们的两臂都系在一条长长的麻绳上，麻绳的一端系在马桩上。几个“友军”的士兵持着步枪向着他们，看守着他们。

张海悄悄地对老厨夫说：

“我太饿了。”

“你怎么不唱啦呢？”

“友军”的士兵听见了，骂了他们几句不完整的中国话，又踢了他们几脚，指着他们说：

“跪下！”

老厨夫跪下了，张海却没有听从，于是“友军”的士兵用刺刀比量着向他说：

“你的，跪下！”

“我不！”

“什么的，你的？”

张海默然地站着，眼里充饱着泪水，滚转着，从一眼角滚到另一眼角去，始终没有流下一滴来。

“什么你的不跪下？”

突然，张海的衣服被刺刀划开了，露出赤裸的胸膛来；他好像在向着马桩、天边的一块流云，勇敢地喊了：

“中国人不是人了吗？”

随着他的话尾，从激愤中冲出了一片叫声——他是怎样忍受着他的胳膊，从麻绳移到另一麻绳上去，是怎样忍受着被挂在马棚里，空悬着肢体：两臂与一条横木束在一起，使两脚距离地面有一尺多；而且有一个“友军”的士兵，用刺刀向他调笑着，让刀刃常常靠近他的胸脯：

“好的有？”

张海那般神情，好像被火焰燃烧着，眼角起了几条红色的丝纹。老厨夫痛哭着，只有一种哭声，泪水仿佛已经流尽了。他哀求着“友军”，“友军”拒绝之后，还打了他，他看着“友军”离远了些，他又哀求赵化雄说：

“少爷，你忘记我们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不给我们求求情呢？”

赵化雄惊奇他的话，他一面注视着“友军”的步子，一面低声地问：

“你说什么？”

“那你怎么不给我们求求情呢？”

“我不是已经同你们一样了吗？”

“团长呢？”

“现在，他是他，我是我了。”

赵团长欢送一位“友军”军官的时候，赵化雄的衣服被老厨夫扯动一下，仿佛是要他向赵团长说几句好话。可是，他却愤恨地从赵团长身上避开视线，垂下头来。

在下午，在团部院内的一角，集满了“友军”的弹箱，还有一架平射炮，正对着门外，摆好了开放的姿势。由“友军”的命令，从麻绳上解下他们，把他们分做两人两人的一群，交给他们一种工作——搬送着尸身。

张海与赵化雄被分在一起，他们两人默默地相望着；突然张海望见了“友军”的弹箱，他说：

“少爷，你看，那都是给我们预备的。”

赵化雄没说什么，悄悄地拖起一个学生的尸身，可是被监视着他们的“友军”踢落下来，指定他们去拖“友军”的尸身，于是，他们听从着，把“友军”的尸身一个一个地送进房间去，在他们拖起第一个学生的尸身的时候，“友军”重新指给他们一处停放的地址：营房的后边，凹下的地方，因为雨天的关系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死水池，四周飞集着许多的蚊虫。

“走吧，有了你安息的地方。”

张海拖着死者的脚；赵化雄拖着死者的头走着，一边默语着，一边为死者整理着头发，拭着脸上的血迹。他看着监视他们的“友军”在他

们的身后离远了些，他开始低声地唤了几声死者的姓名，继续又说：

“你安心吧，朋友，我们有人为你复仇！”

“少爷，你不要难过吧，哭又有什么用处呢？”张海说。

“你不知道，他死的太惨了。”

“你看见啦吗？”

“我怎么没看见呢？我们俩是一同往外冲的，我听见机关枪声太紧，我身前的人一个一个倒了，我要退回来，他不肯，刚刚冲到门旁就倒了。可是他当时还没死，我听见他大声地唤过了我的名字。以后我便不知道了，也许又中了刺刀？你看——”

张海顺着他手指处，看见了死者几个破碎的衣孔，摇起头来，好像不相信死者的血就是从那些衣孔里流尽了的。

他们走到死者葬地的时候，踌躇起来了，不肯让尸身离去他们；可是“友军”监视着，走近了他们，才勇敢地投下去，仿佛投下一块垃圾物。

渐渐地死者完全水葬了。可是有一个“友军”的长官，却谴责了那几个“友军”的士兵。

张海向赵化雄说：

“官总是比兵好。”

“怎么？”

“你看那个官的样子，是不愿意把他们的尸首送到屋里去，把我们的尸首抛在这里。你看那个官的样子，一定是生气了，一定是骂着兵呢。”

那个“友军”的长官命令他们从水中拖出了死尸，留在地上，听候他的指示。

于是张海又向赵化雄说：

“官总是比兵好！”

“好什么？”

“不管把尸首送到什么地方去，你看看，不总是比抛在这里好的多吗？”

但是，那个“友军”的长官交给他们几把刺刀，要他们把死者的头与身体分成两部分，身体又抛到水中去，头悬在门上示威着。

“官总是比兵好吗？”

这是赵化雄问了张海；张海不作声了。

他们的工作完后，又把他们绑起来，系在马桩旁边。可是赵化雄的母亲和野兰来了，一面哭着，一面还叫着。团部门前“友军”的岗兵向她们伸出了刺刀，阻止她们走入院内。经了赵团长的证明，才放开她们，在她们看见——她的儿子，她的哥哥的时候，她们哑了喉咙为了哀求赵团长她们跪下了。终于还是经过“友军”的许可，发给赵化雄、张海两张通行证，由她们领回家去。

这时候，逃出的士兵更加激烈地反攻着，使“友军”全部开赴前方去，并且，把俘虏的士兵恢复了自由，命令赵团长把他们重新点编一次，组成了不完整的两连士兵，经过赵团长的训话，发给他们每人一枝步枪，二三十粒枪弹，维持地方的秩序。

然而，天刚刚黑下，逃出的士兵已经包围了整个的小城市，每处的山脊上都有弹声响来。每家的窗子，不管是纸窗或是玻璃窗，都是黑黑

的，没有一处，有着灯火。平常临睡前的一切骚声，都停息了，只是不时地有几声孩子的哭声；但是随着也便瘖哑了，仿佛是被吓住，或是被什么堵塞了。

写着赵公馆的那个房间，也同样在这般的死静中。赵化雄的母亲，在黑暗中摸索着，吁着长长的气息，整理着她所有的珍贵物品。野兰常常从屋门跑到院门去，探视一下再跑回去。不知她是向谁说：

“街上还很安静。”

张海与赵化雄呢，他们两人相伴着，在院场上慢走着，谁也不说什么话。

突然，张海说：

“我要——”

他的话又被他吞入了喉咙。赵化雄伸长了脖颈，仿佛要从黑暗中，看出他的表情来：

“你要，你要怎的？”

张海不回答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加快地走了几步，又慢下来，渐渐地慢得几乎停住步子。赵化雄停下了，拖住了他，两手握住了他的两肩，他问：

“你要怎的？你要照顾玉喜吗？”

“不，我要从军去！”

“怎么？”

“我要从军去！”

这声音，比较高些；所以野兰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她急匆地问张海：

“哥哥，你说什么？”

张海好像没有什么适当的话回答她，停了一刻，他说：“没说什么！”

“我不信，你要告诉我！”

“什么你都要问，去吧！”

然而，她跑来了，陪伴他们走着，张海斥了她几次，她毕竟没有离开他们；直到他们走入屋去，她才独自去了。

电灯随着亮了一下，闪出了一张简单的铁床，床边的弹带、裹腿、匣枪……此外完全是一些模糊的东西。然后，电灯便熄灭了。这是一间卫兵住的房子，赵团长唤去了卫兵，房间空闲着有两夜了。赵化雄躲避着门扇和窗子，把张海扯向一个墙角去，好像用嘴在吻着张海的一个耳朵。

时间在静悄中过了一刻。

张海说：

“你大一点声说，我听不见。”

“你先不要从军去——”

张海不等他说完话，便抢着说：

“我不能不去从军了。像今天这样的生活，少爷，我一天就够了，你呢？”

“我先不要你去从军，我是另有一个主张——”

“什么主张？”

“我要先做一个凶手，然后，我们再一同去从军！”“做一个凶手？”

“是，做一个凶手！”

“我要知道——你做谁的凶手？”

“我要知道，你可以做我的助手吗？”

窗外透入的几缕月光，浮起了一层恐怖的暗影，浸满着屋内的每个角落——这种阴森的色调，会使人感到异常的不安。张海向窗外探视一下，他匆迫地问：

“我要知道——你做谁的凶手？”

“我要知道——你可以做我的助手吗？”

“可以，当然可以。”

这时候，窗外突然响了一声惊恐的叫声，有一个头影在月光中划过了窗边。张海高声地问：

“谁？”

“我，我……”

野兰来了，她站在他们的身前抖索着，然后她抱住了张海，她哭泣了，说道：

“哥哥，你吓死我了，你才说什么啦？”

“没说什么。”

“你不骗我吧，哥哥，我听见了。”

“你听见又能怎样？”

“不是的。你不能帮助少爷去冒险。”

张海对赵化雄说：

“她既然听见了，就听见了吧！我要知道——你做谁的凶手？”“我的敌人！”

“敌人？……谁？”

“我的父亲！”

野兰哭出了声音：

“哥哥，你不能那样杀他，他是团长，他待我们很好。你想想，不是的吗，哥哥？”

“哼，他待你好，待我好什么？”

“哥哥，你怎么对我总是这样大的气呢？我要你的脾气好些，准有一天，你可以做团长的卫兵。”

“我可以做团长的舅子，还卫兵呢？”

于是她痛哭起来，在哭声中，好像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可是，她没说，从张海身边悄悄地向赵化雄走去，让她的脸孔留在月光里，映着那一粒一粒的泪珠，明晶而又纯洁的两条珠绳。

在死静中，这里好像是空闲的房间，没有人声，也没有任何一些轻微的骚扰。

她抽动了几下喉音，终于说话了：

“少爷，我可以同你说几句话吗？”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我没有读过书；可是我知道——一个人是不能杀他的父亲的，不是的吗？少爷？少爷是读书的人；比我知道的更多，你怎么可以杀你的父亲呢？”

“我要杀的不是我的父亲，是我的敌人！”

“少爷，你是那样狠心的吗？”

张海的两手，伸入赵化雄与野兰的中间，张开了，隔远了他们两人的距离。

“走吗？”赵化雄问。

张海说：

“走，枪呢？就用卫兵的匣枪吗？”

“也可以，不然，家里还有两支，最好还是不惊动我的母亲吧，好吗？”

他从床上拾起匣枪来，检视一下它的每一细小部分，然后装饱了弹粒，插入腰间。

张海用几句最严厉的话威胁了野兰，不许她把这个消息传给任何的另一个人。最后他又说：

“如果有人发觉了，我就要你的命！”

他们的影子从屋内飘出了门外，向一条路上飘去了。

在多日的雨天之后，突然有月亮冲出了云层，是格外的新鲜，明朗；不过有飘走的云块，常常遮蔽它，使地上失去了它所给与的明亮，迷矇了夜行人的眼睛，不注意的时候，会把脚步陷入泥泞中。虽然天面上还有星星，尽量地闪着，但是它们终是代替不了月亮的明亮。

夜风渐渐地加深了秋凉，浸透衣内，使人感受了初冬的清冷。

沿路的人家，没有什么响声，好像完全停止了呼吸，让夜行人从路上安静地走去。可是，四外的枪声却一刻比一刻加多，总没有停过，并且不时有炮弹拖着火线，冲过了月亮下朦胧的山脊。

他们走着，步子非常轻快。张海指着房屋下的黑影说：

“如果那里有人等着我们，我们就没处跑了。”

“如果有人惊动了我们，必要时，我们就先打死他。”

然后他计划着怎样从团部逃走的方法。张海有些急虑，他想了许久，说：

“逃走是很难的吧？”

“不难，团部只有几个鬼子了，必要时，叫他们和团长一同去，我们的士兵，谁肯把我擒住呢？”

他们转入了一条狭路，两边都是很高的院墙倒下来的黑影，遮着他们的去路，院内的老树，几乎脱尽了叶子，交叉地伸出墙，在地下络成了蛛网般的影子。

渐渐地有着一种匆迫的脚步声近了，他们站下了，让身体贴紧了院墙。

“哥哥，我看见你们了。”

这是野兰的声音，她继续又说：

“我跟你们走了一路啦。”

张海走近她的身旁，仿佛用着权威者的态度在命令她：

“不许说话，立刻回去！”

他挽着赵化雄的手，又走开了。

她却不听他的话，仍在后面追随他们。并且劝阻着他们，她的话虽是很低的，可是，却很清亮地传向很远的地方去。

他几次地转过头来探视她，他怎样地加快着脚步，与她的距离仍是

不过几步远。他突然退回来向她说：

“你回去，不能再跟我们多走一步。”

她仍是不听他的话，于是，他把她推倒在路上，他们迅速地跑开去。可是她却放开声音叫了：

“哥哥，我还有话说！”

他惊慌地制止着她：

“不许你叫！”

“我不叫，哥哥。你不能去；你去了，不会再有回来的一天啊。爸爸、妈妈都死了，现在在我身边的亲人，只有你，我不忍让你去做犯罪的事情，我更不忍看着你受死刑……”

“你回去！”

“哥哥，我说的话，你想想吧！”

“我没什么想的，你回去！”

“我不能，除非你先打死我。”

“好！”

于是他从赵化雄腰间取过匣枪打死了她；在开枪的时候，她特意向他挺出了胸脯，顺从地受了一弹；并且他的枪口是堵着她的胸脯放的，所以路上并没有感受什么意外的骚动。

不过，赵化雄再走起路来，好像走上了崎岖的山路，抛开的步子，一步比一步零乱起来了。

张海呢，仍是一样地走着，只是呼吸有些不匀称，可是走到团部门前的时候，却很镇静地把通行证交给那个“友军”的岗兵检视一下，走人了。

院内停留着的“友军”战器已经全部出动了，只有三五个“友军”的士兵在徘徊着，在监视着赵团长新编的两连士兵，此外没有什么改变的。营房里仍燃着灯火，马棚里不时有几声蹄声不知是马蹄打着马槽，还是触了板壁……同往日的夜里一样。不过，已经该是睡觉的时候，怎么没有士兵习惯的鼾声呢？

那所很大的房子，不仅是赵团长的办公室，还有会议室，卫兵室，传达室，寝室……排了两列，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过道。他们悄悄地走进去，又悄悄地留在过道上。他们看着在许多镶着玻璃的门扇上，只有办公室透进了一层灯火，张海指了指说：

“进去，就在那屋呢。”

赵化雄在门前踌躇了，张海催促他：

“少爷，什么事情，都要快才好。”

于是赵化雄掏出匣枪来，勇敢地推开了门。但是屋里没有赵团长，只有一个卫兵向外探视着什么。他问卫兵：

“团长呢？”

“已经睡了吧？有事情吗？少爷。”

“他在寝室吗？”

“是。少爷，你的脸色怎么那样难看呢？”

“没什么。”

“呀，你怎么带着枪呢？”

“不许你说话！”

他退出来，把办公室的门紧紧地闭住。在寝室的门前他突然停住了，他问张海：

“你可以代替我吗？”

“什么？”

赵化雄把匣枪送近他的手边说：

“你可以代替我吗？”

“你怎么的了！”

“我不能杀他了。”

“为什么？”

“我的头已经晕沉了。”

他一只手撑着墙壁，几乎要倾倒下来；而且他的呼吸也更加急促起来了。

过道上，安静得可以使他们的话声透入每间门内去，就是有老鼠的骚音，也可以清楚地被人听见。

然而蚂蜒河边的战争正在激涨着。密连的弹声，没有停过一刻，从那种声音里可以听出是在渐渐地响近了。

张海想了一下，便允许了赵化雄，不过，他慎重地问了一句：

“我毙了他，你不怨恨我吗？”

“不，我要感激你呢！”

于是，张海取过匣枪，独自走进赵团长的寝室，他摸了一些时的墙壁，灯才亮了。

“做什么？”赵团长问。

“不要动！”

“怎么？”

“不怎的！”

随着，连续地响了几弹，完全中在赵团长的身上，没说一句话便死了。

然而院内却发生了极大的骚动。

天还没亮的时候，街头已经传遍了这惊人的消息：赵团长被张海杀了，张海临逃的时候，被院内“友军”的士兵开枪堵击了，同时他也还了枪。以后团部新编的两连士兵发觉了，冲出了营房，为了援助张海，击毙了所有的几个“友军”的士兵，以后，又冲出了团部，沿着蚂蜒河河边进击着正在作战的“友军”的后方，冲开一条去路，与逃出的士兵合成了一团，于是“友军”不得不败退了，所以三小时后这个小城市又复活了。团部做了临时的警备司令部，在门前贴了几条新鲜的标语。

不过，张海当时却受了重伤，手腕与大腿中了两枪，倒在团部的墙根下，有一两点钟的工夫。老厨夫在骚动平静以后走出来，才发觉了他的呻吟声，然后通知了团部留守的士兵，把他送进医院去。据医生说枪弹已经伤了他的骨子。虽然他没有死亡的危险，但是医好之后，也只是个残缺者了。经过医生注射了两次救急针，还没有恢复他清醒的神志。赵化雄呢，并没有受伤，他在团部的骚动中逃出来，跌倒在路上的泥泞中。当团部士兵出动的时候，才遇见了他；在夜色中士兵误认他是逃走的受伤的“友军”。他当时说出一些呓语，才辨出是他，便从队伍中留下了两个士兵送他回家：但是他已经不能走了，两腿就像被暴风吹皱了

的轻纱一样地抖索着，他的神经已经失去了常态。那两个士兵在没办法中，便拖起了他，送回团部来。向他的头上浇了两杯凉水惊了他，他跳起来，向墙壁乱撞着。不得已也由老厨夫把他送入医院，做了张海病中的伙伴。他们两人的床，紧靠着，特别加了一个看护照顾他们。

渐渐地退尽了夜色，太阳爬出了山脊，向房屋的窗子投着光线。这还是秋雨后第一次恢复了些温暖，狗舒适地窜出了门外，抖着自己的皮毛。被暴雨冲散的小鸟，又飞集来，绕着人家的房屋鸣叫，好像在探询人家是否平安。

赵化雄清醒些的时候，他贪婪地注视了一下他身边的四周，随手又扯开了窗幔，透入一块天色！太阳上正浮过着流云，配合着各种色调，仿佛是女人最美丽的刺绣品，无意中抛开了，堵了天面的一处。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了看护。

“医院，先生。”

他的眼睛，从清醒中，又渐渐地朦胧下来——不知他在怎样的意想中搜取着什么印象。

过了些时，他看遍了屋里仅有的四张白色铁床，当他的视线接触到他身边的一张铁床的时候，他叫了：

“张海！”

看护制止他，说明了他所唤的那个人的病状，又说：

“医生说，他不能再受一点惊动。”

他要检视张海的伤处，也被看护拒绝了，他只给张海舒展了一下被子，手贴贴脸颊，然后他哭了。

看护送他一杯牛奶，他指着张海问：

“他呢？”

“他还不能吃，现在他只需要休息。”

于是他也拒绝了看护给他送来的那杯牛奶。

在中午他的母亲来了。她是那样疯狂地奔向着他，把头投到他怀里哭了。

“妈，你坐下。”赵化雄说。

她的手握住一块衣襟集起了一缕皱折，仿佛要被她撕裂下来。“妈，你要安静些，这里不是我一个人，你看看还有好多别的病人，我们不能扰乱他们。”

看护也在劝慰着她，告诉她在医院是不能任意骚扰的，并且给她指着张海说：

“这个人受了很重的伤，又流血过多了，不能再使他受一点的惊动。”

她看着，辨识出来张海的面孔，她便惊叫了一声，把遮在张海身上的被子，从床上拖下来，她做着命令的神情，对看护叫起来了：

“你去叫警察来！”

看护奇怪。

“他是凶手。”

最后医院方面向警备司令部报告了，警备司令部正在计划防御的事情，没有多余的人员，结果派来了赵团长以前的两个卫兵，看守张海和赵化雄，有必要事时，再由他们报告警备司令部。

她看见了，来了她以前的卫兵，便命令他们说。

“押起张海来。”

他们垂着手没有听从。她气愤了，她说：

“怎么？团长死了，你们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么？”

“我们要……太太……”

然后赵化雄向她说：

“你有什么话要说，等张海好些再说吧！”

张海清醒过来，已经是两天以后了。他经过了七次的注射，甚至每一小时都有一个医生来诊察一次。在他第六次注射的时候，他的体温才由四十度减至三十八度多，他会哼了几声，或是抛开一只拳头。第七次注射以后，他知道自己伤痕的痛苦了，常常在床上翻滚着，暴叫着，仿佛是要由床上滚落下来，躺在地上。有一个看护站在旁边，支配那两个卫兵怎样照顾他，怎样不使转动，怎样把他的手，安放在适当的地方，免去撞触手腕与大腿的伤痕。

赵化雄常常注视他，又常常避开他，好像怕他那惨白的脸色，和那深深陷入了在半合拢着的眼睛，探问他两天前的情形，他不知道，也不知道战事怎样了和谁来探视过他，他只是这样地自语着：

“谁是我的朋友？谁肯答应我一声——我是你的朋友。”

赵化雄说：

“我是你的朋友——”

“那我请你快快放一枪吧，要对准我的头放啊，把我的头打得粉碎才好。”

“你说胡话了吗？”

“不，不，我很明白。难道你从我的脸上还看不出来吗？你就是从我的声调上，也可以听出我那不是胡话啊！”

“那么，你是什么意思？”

“你没看见我的伤吗？是那样痛啊！”

赵化雄故意说：

“一个人应刚强些！”

于是，张海不做声了，眼睛同嘴唇一样地闭住了。那双健全的手握成了拳头，几次地要击打自己的头顶，几次地都被他身旁的两个卫兵握住。

他安静了。可是，在他那痛苦的神色中，潜伏着一种忧郁的神情。

赵化雄劝慰他说：

“你安心吧，医生说你的伤，并不重，至多两个月就可以出院，也许不过一个月呢。”

于是有轻淡的微笑代替了他忧郁的神情；可是过了些时他又说：

“你不要像哄一个小孩哄我吧，少爷。”

有时他睁开眼睛，常常把视线投到窗外去；遮满着窗边的树枝，向他抖动着。枯黄的叶子，从他眼前一片一片地落去了，余下的只有可以数出的几片，飘摇着，已经没有多久寿命了。飞走的小鸟常在窗边绕着圈子，那一刻的勾留，像是在探望他，为他留下几声欢快的声音。可是弹声激烈响起来的时候，他便缝闭了眼睛，转入初醒的朦胧中。

这时候，赵化雄又轻轻地问他：

“你又在想什么？”

“我如果没有受伤，不是也在前线了吗？啊，那我该是怎样快乐呀！”

赵化雄又故意说：

“在前线也许死了，那还不如现在吧？”

“死了也值得！”

“那么现在更值得。”

“……”

“现在你好好养，总有一天，你有在前线上的时候。”

医生来了，张海问他：

“你对我说真话，我的伤有好的一天吗？”

医生为他的逼问，随便指出了他伤愈的日期。可是，因为他体质过于虚弱，医生经过几次慎重的诊断，始终没敢施用手术剖取他大腿里的那粒枪弹，所以他渐渐感受了伤痕的更严重。不过因为战争的关系他也很少关心着自己，常常默语着那一句话：

“守住这个城市吧！”

赵化雄出院的那天，恰有退败的消息传给他。虽然一切人都在欺骗他：

“不要紧。”

或是：

“至少还能守两个月。”

可是，他听着那种紧急的弹声，和院内人员那种惊恐的神情……没有一处不是在证实他们对他的欺骗，他同人们一样清醒着，他能接受欺骗而安心吗？并且有一次枪声几乎响近了他的耳边，他问看护，看护什么都没说。以后老厨夫来了，才告诉他团部被“友军”占领一小时又败走了。此后，他便在夜里失眠了。窗外完全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堵塞了，屋里的灯光透不进黑暗的深处，只照亮着窗边的几条枝影，模糊地抖摇着。

远处、近处有犬吠的声音，一声声地连续着掺杂在远近的枪声中。

看护匆忙的脚步声，在过道上响来响去。他在床上翻转着，在他身旁看守的那两个卫兵在默语着什么；然后其中的一人走了，余下的一人对他说：

“我也要逃命去啦。”

“我呢？”

他问的人已经走了，他还在问着自己：

“我呢？”

窗外出现了新鲜的景色：红色的火焰冲着浓厚的黑暗，窗外的树枝也被染了红色，甚至他的脸上，也好像涂了胭脂。

床上的几个病人，都唤着看护，有的问战情，有的找家人。张海呢，他唤来了医生，他说：

“请你给我伤口上多裹几层药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这个恩人！”

医生不明白他的意思，注视他；他看看自己身上的白色病衣，他问看护：

“我自己的衣服呢？”

“不会丢的，你放心吧。”

“谢谢你，给我拿来。”

“做什么？”

“我要穿。”

“在医院里不许穿自己的衣服。”

“我出院啊！”他已经叫起来了。

医生与看护都误认是他的神经变态，他反驳着说：

“我比谁都明白。”

“那你怎么说胡话呢？”

“谁说胡话？”

“不然，你怎么要出院呢？”

“那你们叫我等着死吗？”

他指着窗外涨大着的火焰，枪声更加响近了。

以后赵化雄跑来了，没有向张海说什么，便把医院的负责人找来了，给张海办好了出院的手续，又把他带来的一身衣服给张海换了，移到担架上去，由医院的两个人担起来，他看看自己的表说：

“恰好还赶得上火车。”

张海问：

“这样忙，你怎么不早点来呢？”

“我的母亲看住了我。”

“现在她呢？”

“在家。”

“那你怎么来的？”

于是赵化雄说：从他出院他的母亲怎样看守他，又说：不管怎样也是看守不住他；不过这次所难的是没有路费，直到她去厕所的一刻工夫，他把一个皮包的铁锁，用锤毁了，偷了二百多元钞票跑出来了。最后他说：

“这就好办了。”

但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的头从车窗探出去，看见了他的母亲，一面追着火车，一面摇着手：

“回来，化雄！”

他勉强地垂下头，听张海在说：

“现在我好了，再没人挂念我了。…”

这时候，一面坡已经完全被“友军”占领了。

他们去的地方，是长城边处没有“友军”的岛上。那里，有着绿色的海波，被卷起的浪头，高出水面一、二尺还多，散开了一片水花，一片泡沫，被风卷去了，被海吞没了。有好飞的海鸥，天天绕着海边戏取着海水，也许迎着、送着入口与出口的船只，有绿林围裹着的红色楼房，幽闲的歌声就是常常从那楼窗里送出，送向很远的地方……

可是，他们在那里没有认识的人，钞票在两日内使用尽了，幸好有一个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他们这样逃难的人。以后不久难民收容所解散了，赵化雄失踪了，只有一次在报导义勇军的消息里，发现过他的名字。张海呢，在陌生的地方，没有谁认识他，也没有谁再叫他老兵。不过他的确是老了些：唇边生了短须，眼角多了皱纹。可是他在短短的时期中，

却学会了好多技能：在雪地上，可以不穿棉衣，可以用身体滚代替步行，
可以没有任何乐器，独唱一首熟练的歌子：

你们……

你们有钱的老爷呀，太太呀，

你们有钱的小姐呀，少爷呀，

你们怜悯怜悯我吧！

……

你们怜悯怜悯我吧，

我，我——

我这远方来的，

我这无家可归的，

我这遭灾受难的，

我这缺臂少腿的人啊。

……

……

（《老兵》，1936年1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秘密的故事

几年前。

我热恋着的青子姑娘，她很勇敢，很聪明，很热情，有着健壮的身体，有着比宝石更动人的眼睛。可是，我不爱；我爱的是她那纯洁的灵魂，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欺骗的话。

那时候，我们都是中学的学生，在放假的日子，总是有着我们的密约：看电影，逛公园……主要的还是在松花江边，谈着我们将来想象中的生活——幸福的，仿佛在构思美好的梦境。

中学毕业了，我们因为家庭贫困——我考入了免费的警官学校，她失学了。

她为了留恋我，不肯离开我，她说她要在街头过着乞讨的生活。可是她家里来人了，不许我们互相交换一句别前的赠言，逼迫她走上火车，去了——我们便这样地别了。

从此，我们断绝了一切的消息。

日本人抢占了我们这个城市以后，日夜都在加紧防御的工事：重要的街头，设了武装的岗兵；僻静的地方，用沙袋做成了堡垒。而且，派出无数的便衣侦察与宪兵；不仅是潜伏的义勇军受逮捕，就是谁家有一条军用的皮带，或是一条军用的裹腿，也许遭了死刑；所以天天传着杀人的消息，恐怖威胁着每个人。

于是，有许多人从军去了，逃亡去了。

然而，我这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正在做着侦缉队的分队队长。这种职务，使我如何地苦恼着，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既不能听从日军的命令，去杀热血的同胞；我更不能等待，让日军杀我。所以，我也做了这样的决定：不是从军，便是逃亡。

我只有一个母亲，很少家族亲戚，在她以外，我走，我没有什么留恋的。同时，我也知道，在我以外，她更没有什么留恋的。我知道她不会允许我离开她，让自己在晚年做一个孤独者。为了避免她知道，几天来，我都是偷偷地忙着整理我所要带走的东西，预定在月底，走上我的旅途。不过，为了寻找一件小东西，却迟误了。虽然它并不是什么高贵的物品；可是，我保留它有五年了。经过几次的变动，经过遥远的旅程，我都没有丢失它，更没有损伤它，不是随伴我的身旁，便是留在我的皮包里，没有一次忘记它所在的地方。为什么这次却不见了？我翻尽了我的每个衣袋，甚至拆断了皮包的缝线，也没有寻到它。就是我肯忍着失去了它，不让它再迟误我的行期，可是，我该知道它究竟是怎样在我身边失去的。就是我寻不到它，我也要找出寻不到它的原因来，不然，我绝不肯做了最后的结束。

“你找什么？”

母亲问我。她的声调，很不自然，仿佛有些惭愧，有些虚伪，有些愤恨，在她的神情中。当我说出我所寻找的小东西的时候，她垂下头，在沉思中向我说：

“不会丢的，放心吧！”

“你怎么知道不会丢呢？”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怎么会丢呢？”

“那么，你拿去了吗？”

我逼问母亲，她默然了，笑了。可是，她的眼里有泪水滴落下来。她说：

“是我拿来了！”

于是，她害怕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裹，给了我。我的心，跳了，有着死人复活以后的欢快一样，立刻脱去了一层黄纱，让被包裹的小东西，赤裸地露在我的眼前。它是一页像片，一面是一个年轻姑娘的面影：短短的黑发，分梳两条短辫，辫尾垂在她的肩上，垂下两条辫绳，大的眼睛，遥望着，好像在遥望着她遥远的希望。深色的衣服，很朴素，没有一丝异色的花纹，只是她的胸前，两乳凸起的地方，淡了些原有的衣色；另一面是几行秀丽的字句：

袁倪，赠送你这张像片的人，永远是属于你的人，你不要忘记她，她永远记着你。

青子

这时候，神秘的记忆，神秘的景色，擒住了我，忘记了日军的刺刀，临近了我，我的头很昏沉，眼睛好像被遮了一层黑纱，被我视取的一切景象，渐渐地都在模糊了，死亡与生存，在我已经失去了区别。

“袁倪！”

袁倪是我的名字。母亲唤着我，使我惊跳了一下，仿佛被她从梦中惊醒了。我没说话，悄悄地走开了。她仍在我身后唤着：

“袁倪！”

我从这两个字的声调上，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的慈爱。于是，我又退回来，我问她：

“你为什么偷去了青子的像片呢？”

“我看出你要丢掉我，你一个人要走了，我能拖住你吗？我能让你走吗？我想，只有偷来青子的像片，让你在家，在我的面前多留恋几天。袁倪，是你真要走了吗？”

“不是的！”

“那么，你收拾两个小包做什么呢？你要送我乡下去做什么呢？唉！一个人如果骗了他的母亲，也不是什么英雄！”

我还说什么呢？只有告诉她：

“是的，我真的要走了！”

于是，她的眼里，突然落了几滴泪珠，继续地落成了珠链，仿佛我的话，伤害了她。

她经过一刻的沉思，向我说：

“我让你走吧！”

我的心刚欢快些；可是她又说：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好的！”

“你肯吗？”

“肯的，你说吧！”

“你要同苓子结婚！”

苓子是一个护士，是母亲在我童年时给我订婚的姑娘。我从没同她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也可以说我爱女人的感情，没有一丝是属于她的；虽然她常常穿了美丽的衣服，修饰了美丽的脸面，买来些美丽的东西来看我，好像倾吐着她所有热情爱着我。我几次地商议母亲解除我们的婚约，她总是不肯允许我，一直迟到现在。

我扑到她的身边，我问：

“结婚吗？”

“是，结婚。”

“我不能，我不能同苓子结婚，我还要等待我的青子呢！我不是早就说给你听了吗？”

“那么，你还说起苓子做什么？”

“袁倪，你的岁数不小了，总还是年轻，总还是我的孩子，你只知道等待青子，你不知道姑娘的心——像天上的云彩一样，一会儿一样啊！再说，你不见青子有好几年了，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再说，这几年的工夫，你怎么能知道她没有结婚，还等着你呢？”

“就是她忘了我，她结婚了；我也要在她结婚以后，我再同苓子结婚。”

“你是铁的心，母亲的话，你一句都不肯听。”

她痛哭了。

我问她：

“你逼迫我结婚，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只是你要走了，即使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在你走后，我也多一个人照顾照顾我啊！”

于是，我听从她，结婚了。

苓子待我很好，仿佛她情愿做我的一个仆人，任我随意地使用她，支配她，甚至不是她的错误，而我苛待了她，指责了她，她也要用笑脸在我面前赔罪。冬季最冷的天气，燃起的壁炉，已经温暖不了我们的房间，她总是在我未睡前，脱去了自己的衣服，赤裸地投入冰冷的被里，过了些时，她会向我说：

“袁倪，你来睡吧，被子已经暖了！”

在早晨，我还睡着，她已经起来了，燃起了壁炉，烘暖了我的衬衣，她唤着我：

“起来吧，袁倪！”

如果我贪恋早晨的睡眠，我斥责了她，她便像乞丐一样，倚在我的耳边，哀求着我，要我起来。

渐渐地她感动了我，有些爱她了，所以在我预定的行期，又延长了三天。

于是母亲常常向人家说：

“一个人娶了媳妇，就扯住了他的腿！”

我听了她的话，有些愤恨了，我想向她说：

“你对你的儿子，用了阴谋！”

为了报复她，我又提前了我的行期。

不过，在我辞职的前一天，在队部值日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意思是说：在中央大街五号院内第十八户，每天都有许多的青年来往，

甚至夜深，还没有散尽，好像在密议着什么，好像有义勇军活动的嫌疑；这位告密者是院内住户之一，恐怕被日军破获后，自己受了连累，特先告发了。

我怎样决定呢？把这匿名信转给总队长吗？如果中央大街五号院内第十八户，确是义勇军的一份子，那么，他们是热血的青年，是伟大的英雄，我怎么能看他们遭到逮捕，受着死刑？而且，我将用什么赎我终生不可宽恕的罪恶？把匿名信撕毁吗？如果，被总队长调查出来，我便不必逃亡，或是从军，随处都有留我的墓地。最后，在我没有决定办法前，我要先去调查一次。我整理一下身上的警官服装，又配好了一把短刀与一支手枪。

五号的院门，是在中央大街骚乱的尾边，有大的商店，小的铺子，提篮的小贩，卖唱的乞者……集中了杂色的人群。院内共有三十多家住户，每家都是同样小的门扇；宽大的窗子，同样地染着深黄色。所有的住户，都很杂乱，有的是商店的主人，有的是小职员，有的是白俄……我沿着院路徘徊着，注视着第十八号房间，门扇紧紧地关着，窗上遮了一半窗幔，另一半透出了屋内的一个桌角。我没有看见有人走出来，或是有人走进去，只是有眼睛，常常从窗边窥视我。这时候，我悔不该穿着警官的服装，惹人注意，于是，我要走去了。

可是，在我临去的时候，我看见窗边一副女人的脸面，她见了我，立刻避开了，在她闪过的那一刻，我认出了她。这好像神话中、传说中的故事，谁会相信是事实呢？

我自己也好像在梦中，走去敲响了门，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走出来了，问我：

“找谁？”

我不想回答他，只想走进去。可是他的胳膊横在门边，隔着我，仍在问我：

“找谁？”

“青子，青子！”

我忍不住了，喊了，几乎喊破了我的喉咙，他装做不知道的神情，凝视着我。

我拍响了门边，又喊：

“我已经从窗外看见了青子！”

于是，青子来了，她穿的是黑色的棉袍，黑色的皮鞋；黑色的发丝，遮了一半前额，一半衣领。她仍是从前的神情——笑的时候，露出白的牙齿，两颊陷入一对小涡；只是她的皮肤粗糙了些，不是从前的柔嫩。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唤我进屋，只是让身体靠近了我，偷看我的警装的每一细小部分。我呢？昏了，火一般的血流，燃着我的全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看她，偷偷地让眼睛转向了侧面。

这时候，忧郁的天色，加多的阴云——灰白的云块，集满了天面，渐渐地低沉下来，几乎落遍了地面。如飞棉一般的雪花，弥漫在四处，染白了屋脊、枯了的树枝，而且染白了她的发丝，她的衣肩。

一只失群的小鸟，被严寒趋逐着，迅速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了。她的眼睛，直直地注视我，终于问了我：“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要说的话太多，我不知道怎样说好……我们进屋去谈谈吧！”

“我们就在这不好吗？”

她为什么这样冷淡了我？意外的会见抑制了我一切的想法。我摸摸她的衣袖，我问：

“你不冷吗？”

“不！”

“我们还是进屋吧。”

“不，不方便。”

“你不住在这里吗？”

“住在这里。”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有你的母亲吗？”

“没有。”

“那又有什么不方便的呢？你结婚了吗？”

她的眼睛避开了我，顺手为我打扫一下肩上的积雪，默示着否认我的问话，而且在爱着我。

“这是谁的家呢？”

“朋友！”

我想她仍是从前的脾气，不喜欢任谁知道我们的关系。我怕难为她，便把我的住址告诉了她。约她在下午五点钟来我的住处。

我与青子的会见，使我记起了我们的往事，像在年前，像在昨天，就像才经过短短的一刻；使我厌倦苓子，不该让她占有了我；使我愤恨起母亲，我想向她说：

“你对你的儿子，用了阴谋！”

同时，我也在咒骂着自己，为了一时感情的动荡，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如果我仍是坚决地拒绝了母亲，那么，我可以向青子表白我等待她的好心；可是，现在，我所有的好心，完全被苓子夺取了，践踏了。就是青子肯原谅苓子，她也不肯宽恕我吧？现在，难于解决的问题，等待着我解决。为了我与青子的约言，为了我们的幸福，要使我与苓子结婚的证书变做废纸，好像满了一杯苦酒，要苓子饮尽；满酒的人，不是我，更不是青子，而且，也不能确定是母亲。总之，在事情没有决定前，我不敢预定事情的终局。不过，我相信是一幕悲剧，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担任剧中的主角？——是苓子？或是我与青子？至于演期，也很难指定，我想必要经过长久时日的排演吧？所以辞职的呈文被我撕碎了。

可是，那匿名信，却被我私自保留了。如果我因此被判了任何的极刑，我也安心。我不管青子是被人告发，或是被人陷害，我相信她会向我剖白，不掩藏任何的秘密。

我下班的时候，苓子正依在窗边等待着我——每天都是这样等待着我。看见我的时候，立刻给我开了门，好像别了几年那样热诚地把我拥进屋去。每天她下班的时间比我早些，恰好与母亲同吃晚饭；她却要饿着肚子，一直等到我回来。有时候，我因为友人的邀请，下班以后，不回家，便随着友人去了，回来的时候，也许是深夜了；然后她才独自去吃了些已经冰冷了的饭菜，如果，我没有吃饭，她会重新热了饭菜，而且她不惯用老厨夫，总要亲自把饭菜送到桌上，问我：

“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菜呢？”

我随便答应她几声，或是谈些另外的什么事情。

可是这次我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吃完了饭。她奇怪了，问我：

“今天的菜，你不喜欢吃吗？”

“不！”

“饭冷了吗？”

“不！”

“那你怎么吃这么少呢？”

“我的胃有些痛。”

“你病了吧？你的脸色那样难看呢！”

她惊了，仿佛是她自己的生命遭遇了危难，匆忙地披起大衣要为我去找医生；我制止了她，她不肯，几乎要和我吵叫起来！母亲听见了，立刻把我送上床去，她说因为天冷，我穿的太少伤风了，叫老厨夫给我泡了一杯红糖水，她要我一气喝尽，最好使身体流出汗来。

“伤风症是很厉害的病！……”

苓子代替我向母亲劝阻着红糖水，她用医学的知识向母亲解说着伤风症的病理。她动摇了母亲的主意以后，她自己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张开两手，要哭了。

我看看表，快五点钟了。于是，我向母亲说：

“你去请刘医生来吧！”

苓子却说：

“刘医生在船坞，太远了，来去一次，要一两点钟，我看还不如我回医院去请一位医生来。”

母亲也同意她的话；我却激愤了：

“我不信任别的医生！”

于是，母亲去了。

然后，我又叫苓子去于家包铺给我买包子；可是她说：

“多远啊！半点钟也买不回来，还是在附近买吧！好吗？”

“不好，我只喜欢吃于家包铺的包子！”

于是，她又坚持叫老厨夫去买。我看表只差十分钟五点了，我激愤地说：

“不用你去买，不求你；我自己去买好啦！”

“老厨夫不是一样吗？”

“我信着他，还叫你去做什么？”

她的手，拍打着我的胸脯，做了笑脸，好像在哄着一个孩子：

“睡吧，不要生气，我不是不愿意去买，我是担心家里没人照顾你，我走了，不放心呢。睡吧，不要生气，我去给你买，睡吧！”

她刚刚走出，时间已经是五点钟了。

我从床上起来，整理着房间，老厨夫知道了，劝我躺下，他要我指示他，他去工作，我没听从他，要他去了。最后，我从墙上摘落了我与苓子结婚的像片，把友人赠送我结婚的银盾，移换了位置，放在使人看不见的地方去。

一刻钟过去了，青于还没有来。这时候，我才知道一秒钟也是长久的时间。

直到苓子买了包子回来，我仍没有看见青子的影子。

苓子把包子给了我，勉强地吃了一个。她的脸色，被寒风吹得惨白，

而且，还在喘息着。

“你跑啦？”我问。

她点着头，默认着，然后她伸出左腿来，给我看，她的丝袜碎了一条；膝骨破了，流出了血丝。她自己在默语着：

“跑着，跑着，就跌倒了。”

“你跑什么！”

“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嘛！”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使别人遭受了不幸，这不是罪恶吗？这时，我却没有这么想。看着她独自躲在一边，用手掌揉搓着伤痕，为着忍痛，她让眉间积起了一束皱纹。

我问她：

“痛吗？”

她却否认：

“不！”

“你不怨我吗？”

“不！”

“我不信！”

“一个人应当坦白，难道我要欺骗我所爱的人吗？”

她的话有些感动了我。我说：

“为了我，苦了你！”

“只要为了你，怎样苦了我，我都愿受。”

她的话，使我有些怨着青子——不守自己的约言。

可是第二天早晨，青子来了。那时候，我还在熟睡中，被敲窗的声响唤醒了；我披起衣服，走下床去，苓子也没有醒来。在门边我问了几声，也没听见回答。以后，我才知道她正倚着窗子，一面向屋窥视着，一面在等待着开门的声响。

她走进客厅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拥抱了她，随着我又退缩回来，因为我与苓子的房间，母亲的房间，厨房的房间，每间的门扇，都贯通着客厅，从每间出入，也都要经过客厅。如果是苓子起来了，我所隐藏着的秘密，要全部被她揭开了，并且几年来她已经知道我另有着爱人——青子。虽然，她没有见过青子，但是我所保留的青子的像片，她早已熟识了。母亲起床很晚，就是她看见了青子，我也有话向她解说。苓子起床很早，我怎样让青子避见她？或是怎样让她避见青子？我既不能有更好的方法使青子随我走去，又不能使她长时间的睡眠，我只有等待着让意外的事情在想象中发生。不过，我向青子说话声音却是很低，几乎使客厅外的人听不见。可是青子总在说：

“你大些声，我听不清楚！”

我这是在受刑罚了；刑罚；也许不会这样的痛苦——我回答青子说：

“我的喉咙很痛。”

开始她述说着我们别后她的生活，以及最近日军怎样轰炸她的故乡，使她怎样地逃出来。

我一面听着她的谈话，一面还在听着每间房间所发出的声响，甚至老厨夫的咳嗽声，也使我受了虚惊。我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说给青子，只是感慨地说：

“我们别了五年多了！”

“还差四个月十二天，才五年呢！”

“你记得真清楚，这么长的时期，你都没有忘记！”“你已经忘记了，怕是你已经忘记了我吧？”

她连续地说了些谴责我的话。我说：

“青子，这不怨我，是怨你；我不知道你的通信处，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警官学校，你怎么不给我一封信呢？”

“你不知道，我离开你以后，就随着母亲到很远的乡下耕地去了。那里不通信，你想想我怎么给你写信呢？半年以后……”

她的话，自动地中断了。我逼着她走下去，她却拒绝了我，在不安地探视着我。

我的神经被多方分割着，却忘记了招待青子，于是给她指了指椅子，让她坐下：可是她仍在站着，不知她在想着什么，一只手撑着桌边，一只手揉着一条白色的手帕。

我特意又给她满了一杯茶，她说：

“谢谢你！”

我看她那种突变的神情，我不能不说：

“你怎么这样客气了呢？青子，你变了！”

“我没变，是你变了！”

我张开了两手，让她尽量地注视着我，我说：

“有什么变的呢？”

“你做官了。”

“这是为了生活！”

好像她不肯原谅我似地问：

“你做的什么官呢？”

“侦缉队的分队队长。”

她听了我的话，她的眼睛睁大了些，身体抖动了一下，在她失神中，她手里的茶杯落地了，响了一声清脆的响声，碎了。随着，我便听见了我的房间也有了响声，不是床板受了震动，就是有什么东西触了墙壁。我的心跳着，走近青子，她却推着我，我问她：

“青子，你怕我吗？”

“不！不！”

可是，她的神情，不是表示她还在怀疑我吗？我为了避免她的疑心，我特意向她说明了我会见她的原因，并且，把那匿名信给她读了。她说：

“这不是告密，这是陷害！”

“陷害？”

“你不相信我吗？”

“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呢？”

这时候，我确是听见了苓子抖搂衣服的声音，我不得不向青子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她先走了，虽然我们一段的谈话，还没有终结。为了陪送她，我在街上绕了一个圈儿。回来的时候，苓子已经走了。

事情总是不如意，我的精神已经失常了，总队长却要我去侦查一件盗匪案件。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去找青子，只是她许我找她的日期是在两天后。为什么在两天后呢？她也没有说明正当的理由。不过，我为了

尊重她的意思，走了一段中央大街又转向了归路。并且我受总队长的命令，也要准备些报告的材料。

下班以后，我一直走回家去。苓子并没有在窗前候着给我开门，是老厨夫代替了她。

客厅里没有一个人，无意中使人感受了几分清冷；虽然壁炉的木柴正在燃烧着。我没有停留，便走进母亲的房间去，她在默默的冥想中愁苦着。我唤了她，她怒视我一下，我问她：

“你生气了吗？”

“我没生气，可是有人生气了！”

“谁？”

“你的人，苓子。”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她的每句话，都有些抱怨我的口气，好像因为我增加了她的愁苦。其实她正应当抱怨她自己——结婚是她的主张。

随后我走回了自己的房间。苓子在床上，一只手掩着前额，一只手握着我保留着的青子像片，注视着，好像侦探在检视着一张逃犯的像片。她脸上遗着几粒未净的泪水，身边的白色手帕，却已经湿了。她看见我，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因为短短的时间，不容许她藏起避我的秘密——青子的像片仍留在她的手上；不过，她有些难为了自己，脸红了。

“今天忘记等着你给你开门了！”

她从苦脸上勉强地透出几缕笑丝。仿佛要我宽恕她的过失。我随便地问她：

“今天你怎的了？”

“头有些痛！”

“今天你起来得太早了。”

她看我笑了，她故意抑制着自己真实的激愤，做出虚伪的怨恨的神情说：

“如果今天我起来不早，我怎么能看见那个女人？”

我心跳了，已经不必再问她气愤的原因，完全明白了。不过，我仍是装做不知道的姿态，探询她：

“哪个女人呢？”

“你说‘哪个女人呢？’”

她学着我的声调，有些在讽刺我。我仰起头来，一面在地下徘徊着，一面在自语着：

“哪个女人呢？”

她指着青子的像片说：

“就是她！”

“奇怪吗？怎么就是她？那么，以后再有女人来，你都想是她了？”

“我只差一步没有遇着她；可是你陪她刚刚走出门去，我从窗子看见她了，她的眼睛，同这张像片的眼睛一样，很大，也很黑呢！”

“你敢说是青子吗？”

“不是她，是谁？”

“同事的女人！”

“那我怎么看见你们握着手呢？”

“不是握着手，是我给了她一元钱。你知道她很早地跑来做什么？是因为同她的男人吵架了。我给了她车钱，又劝她回去了。”我突然转换了暴躁的声调说，“现在，我才知道，你也是一个好疑心的女人！”

渐渐地，她相信了我的话，感到自己理屈了。扑到我的胸前用多样的表情，多样的动作，企望激动我欢快些，原谅了她。可是我为了更加强些自己的理由，不能不向她施用更大的苛责。于是，我握着她的手腕，猛力地从我身边推开，使她跌倒地上，哭了。

窗外已经黑了，玻璃窗上好像披起了黑纱，或是黑色的布幕。邻家的灯火，染黄了白色的窗幔。从窗边经过的脚步声，很清楚地透进来。屋里的黑暗，渐渐地由稀薄转为浓厚了，一切的形象都失去了轮廓。在死静中，只有钟声摆动的节奏，伴着苓子的哭泣。她两手环裹着我的腰，脸面藏在我的颈下，她在我面前忏悔。

不知为什么，我的愤怒由虚伪变成真实，向苓子提出了离婚的问题。于是，使她从我身边松软下来，像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孤女。要求我收容她，怜爱她，而且跪下了，用手拍打着我的腿骨，在换取我的同情。

“你不能这样狠心！”

她哭诉着，嘶叫着。我说：

“你少说些吧，请你立刻离开我！”

“不，不离开你，永远不离开你！”

“一定要你离开。”

“那我就自杀！”

“你不是很可以独立生活吗？”

“我不，我不！”

她的喊声很高，母亲听见了。

母亲长叹着，走进来，给我们开了灯。她问清了事情的起因，她袒护她的儿子，又严责了苓子。不过，苓子向她说了我提出离婚的问题的时候，她却骂了我。她说：

“你说离婚，你说的不是时候！”

“要在什么时候呢？”

“要在我死后！”

于是苓子取得了有力的保证。她一面安慰着母亲回去了，一面劝说我：

“吃晚饭吧！”

我没吃，她也没吃。可是她睡了的时候，我还清醒，想着母亲给我留下的一句可怕的话：

“要在我死后！”

夜深了，因为日军的岗兵限制行人的自由，街上早已冷清了。不过，手风琴的乞讨者，还倚在街旁，奏着熟练的调子，哀怨地在苦诉着人类的不平，一声声地透入窗子，透入我的耳里，占有了我的灵魂。

“要在我死后！”

这句话引起了我一种幻想：——想象那琴声是母亲的葬曲了。

在夜里，我曾失眠了。像疯人一样，穿着衬衣冲向外边去了一次，受风吹了，肚子痛了。苓子醒来，给我揉搓着，陪了我一夜。

早晨起来，就去看青子，虽然她约我的会见还有一天，但是，我的确受不了那比一年、一世纪更长久的一天了。

路上，很冷清，清道夫刚刚开始他们的工作。阴暗的角落，还迷藏着一层模糊的夜色。我走到中央大街五号门前的时候，看见十八户的门开着，窗前停了一辆载重的马车，已经有人向车上搬运东西。

这也许是侦探的习惯养成了我，没有进去找青子，退开了，停在另一条街边等候着。

经过半点钟的工夫。那辆载重的马车，满载着零乱的家具被一匹老马拖出了院门。有一个陌生的男人随靠车边走着，向四处张望。我让车辆去远了些，向我拖开了一条长些的距离，然后，我才随着车尾走了，转过几条街道，转入了一处的院内。我留在门外走了。

在当天的晚问，我也在同一院内租妥了一间房间，恰是第一户的家里，从我的窗里可以清楚地望见院内的几条小路，也可以清楚地望见院内走过的行人。

我为了不在家里留宿的缘故，向母亲、苓子说侦缉队的事情太忙，总队长给我加多了夜班。苓子怕冻了我，为我选了两条厚的被子和一个鹅毛的枕头。

不过，空闲的房间，太冷了，玻璃窗上，已经结满了霜花。我用气息的温暖，让玻璃窗化开了一个吻印，从窗里透视着窗外；可是，一刻的工夫，又冻了，模糊了。于是，我加多了房钱，要房子的主人，给我燃起了壁炉。两点钟以后，窗上的霜花，完全化开了，流成了一条一条的小河，流下窗沿去。

天黑了，我向外窥视着，只看见走过的人影，却辨识不出任是谁的脸面，所能区分的，只是孩子，或是大人，男人，或是女人。

屋里，高悬着一盏孤灯，却明亮地照着四壁，明亮地照着壁上的花纹。房间是很漂亮的，不过用具很简单，只有几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张铁床，在窗边另有古典式样的画框镶着一幅油画和我被灯光剪了的一幅剪影，这一切都在死静中，我的剪影也很少移动。

炉火烧红了炉门，好像是红色灯笼的一面，地板上加强了一处更明亮的地方。

我仍在窥视着窗外。落雪了，一个人走过了，又两个人走过了。

这时候，我已经失去了疲倦的感觉，只知道恨这雪夜；不然，在月下，我不是可以看清了走过的人的脸面吗？

一夜尽了，我也没有看见青子。

为了必要探知青子房间的号数，向总队长请了一天病假，在窗边守候她，终于看见了她走入第十六户的门去。我这才安心了，在清醒中，想象着一些梦景。

可是窗外的孩子成群了，吵叫着，打破了我的安静。他们戏弄夜里的积雪，在我的窗前做着肥胖的雪人。

我很喜欢孩子，也很喜欢他们的动作，所以，又把我诱到窗边去。

不久，又跑来一个女孩，穿着一身整齐的棉衣，梳了一对短短的发辫，红色的辫绳，在风里不住地飘打着她的脸颊，她向其他的孩子喊叫着，她要做他的伙伴。可是他们拒绝他：

“谁认识你！”

她向每个孩子都投着同样的陌生的眼光。她突然挤入了孩子群中，随着人家的动作给雪人做着头部。可是，有一个男孩推出她，打她一掌，同时她也还他一掌。

我看他们要打起架来，便敲响了玻璃窗，让他们的眼光集中到我摇摆的手指，做着制止他们吵架的表示。他们两人不听，仍取着斗争的姿势。我跑出门外的時候，女孩已经失败了，倒了，脸上还有了一块小小的伤痕，流血了，她哭跳着，不肯完结。我哄着她，把她抱进我的屋来。她仍向屋外挣脱着，我说：

“天太冷了，你不怕吗？”

“不，不怕！”

“你听我的话，不去吧，等我去打他，好吗？”

“好！”

我给她拭净了脸上凝集的几滴血迹，剪了一块小小的纸块遮贴了她的伤痕，我一面温暖着她冻冷了的手，一面问着她：

“你几岁啦？”

“五岁。”

“姓什么？”

“姓王。”

“叫什么名字？”

“小青。”

“你常同他们玩吗？”

“不，妈妈昨天才搬来。”

“昨天才搬来，妈妈不放心，要找你啦，快回去吧！”

可是窗外的那个男孩，伸出一只拳头，横着她的去路。我立刻叫着她说：

“小青，小青，我送你去。”

我抱起她来，那个男孩才让开我们的去路。

我问她：

“你家在哪里？”

她指给我窗前斜面的一页门。我抱着她走向第十七户去，她却又校正我走错了去向。她说：

“是那家。”

她指的是第十六户。

过道上，很黑，走进去，便迷了眼睛。我不知道第十六户内哪个门是属于她家的；我问她，她却任着喉咙叫起来了：

“妈妈！”

我知道青子也住在这里，我担心着小青的喊声骚动她看见我，我低声地说：

“你指给我你住的屋子。”

她寻遍了沿着过道所有的几个门，都没有确定地指给我，仿佛她已经记不起她的屋子，使她又叫起来：

“妈妈，妈妈！”

在我背后有一页门开了，因为我抱着小青的缘故，她的视线正向着我的背后：门里的人她看见了，我没看见。我听见了她扑出两手叫着：

“妈妈！”

我转过身的时候，看见有一页门开着，门缝间透出的光线，使我清楚地看见了她所扑着叫着的那个人，是青子，是她的母亲。

我是痴了？是气愤了？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该怎样地动作；我只是把小青送近青子，等候她伸出手来。她呢，像要接受，又像要拒绝，我看出确是难为了她。

我们身边走过的人，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好奇的眼色，或是被我们引诱着停留了一下。

结果，我把小青放在地上，没做一声，便走了。

“青子，我才认识了你！”

我骂着青子。

不过，我又怀疑青子，她为什么从我理想中逃脱了？我有什么负疚于她的事情使她从我理想中逃脱了？我重检了我们中间所有的事迹——没有一样，我负疚于她；同时她也没负疚于我——除了我们这次会见以外。

我不管她对我是怎样的态度——即使她嫁人了，丢弃了我，我也要知道她嫁人了，丢弃了我的原因。其实，如果她有她的苦衷，她嫁人了，丢弃了我，向我说明，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为什么欺骗我？如果她确是义勇军的一份子，她也该相信我们几年的爱情是她生命最大的保证——虽然，我是侦缉队的分队队长。为什么欺骗我？

我要知道她欺骗我的原因，特意给她备妥了一枝手枪和一粒子弹，她也许还记得我发枪是怎样地准确吧？

晚饭的时候，我回家了。

母亲与苓子都说夜班太辛苦人了，一夜的工夫，我已经瘦了。而且苓子向我说：

“侦缉队如果一定要你加夜班，你可以立刻辞职！”

“这不是人干的职业，我早就够了！为了生活，还说什么！”

“我们宁肯遭罪，也不愿看你这样受苦。再说，我们节省些，你的薪金已经够用了。”

这一天的夜里，我在家里留宿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从前整天地留在家里，因为街上每处都有日军的狰狞面孔，常常使用胜利者的暴力，威胁着我们这些被征服了的同胞，就是我们这些公务员，不因为任何的缘故，也常常受了欺辱；所以我宁肯牺牲自己的一切自由，避在家里，读些自己喜欢的小说，或是朗诵几首诗句，或是整理犯人的口供；小说、诗句固然可以感动我，送走了整天的时间，可是犯人的口供却常使我读不完一页，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我甚至不能读完一段、一句。比方，义勇军和一些其他政治活动分子，他们被捕了，便是做了犯人，使用人类最残酷的刑具逼迫他们的口供，这在几世纪前，早已应当灭绝的野蛮的暴力，却仍被最无理性的暴徒遗留着，使用到现在，好像犯人永远不是人类的子孙，如同牲畜一样。而且，现在把这种暴力使用在同胞的身上，就是忍受不了刑逼，承认了自己的口供。他们的犯罪事实是什么呢？也不过是为了他们的祖国——好像在祖国的生命的危亡中，做了祖国的医生。这是他们的罪名吗？那么，如果不是母亲逼我与苓子结婚，或是不会见到青子，我也许

承认了同样的罪名。这个星期日，不仅是没有整理犯人的口供，就是小说、诗也隔离了我。吃过早饭，我便走向我的另一住所去了。

房子的主人特意问我昨夜为什么没有回来，我说：

“怎的？”

“有人找过你了。”

“留字了吗？”

“没有。”

“怎样的人？”

“先是一个女孩子来了，后来，她又领来一个女人。”

她说着，还在比划着她所说的女孩和女人的身量，怎样的脸面，怎样的衣服。

“说什么了？”我问。

“什么也没说。”

我已经完全知道了找我的人是谁。我要走进我的屋里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句话：

“她告诉我她们住在十六号。”

她也许怕我不知道第十六户的门扇，特意引我到门外，指给我了。

我不想再离去我的房间，要直守到青子再次到来。

一点钟过去了，两点钟过去了，她仍没有来。每次我听见有人走进来的脚步声，都引动我，推开门，探视一下。我耐不住这无尽的等候，我去找了她。她的门锁着：不过我从窗边看见她的东西并没有移动。

时间磨难着我，已经疲倦了，我沿着房间的角落踱着，踱着，我企图踏落一条地板，让我陷入地下的底层。同时我用拳头击打着墙壁，让细碎的粉面落满了我的衣袖。

已经是夜了，青子来了，她仍是扯着小青，苦恼的情绪，使她不敢抬高眼睛看我。

我只是做着苦脸，没有说话。她先说了：

“你恨我？”

“不！”

这是我勉强说的——她也许感到了，她用眼角斜视着我的动作，走近我的身边来，又问：

“你恨我？”

“不！”我更勉强些。

“那么，你躲我做什么？”

“我怕你了，青子。”

“你肯原谅我吗？”

她问着我，随着两手环裹了我的脖颈，候我给她答复。她看我做了原谅她的表示，她笑了，小青也笑了。

然后青子肯定地向我说：

“我已经结婚了！”

这句话，仿佛是说我所想念的希望，已经完全绝望了。可是，我很镇静，让我的表的摆动声，从我耳边一声声地响过。为了不使沉默包围着我们，我随便拣了一句话问：

“姓什么？”

“谁？”

我不愿意说是她的丈夫，便指了小青的头顶说：

“她的父亲。”

“姓张。”

这两个字的字音，刚刚冲出她的喉咙，小青便校正她向我说：

“姓王，姓王！”

她仿佛被小青揭开了秘密，脸红了。我看她那般受窘的神情，我便继续地说：

“随便姓张姓王都好！”

可是小青仍施展着她那童年的记忆力：

“是姓王！”

然后，她看小青离去她的腿边，躲在墙角，在观望着我放置的一束鲜花，她说：

“是姓张，小孩子就会胡说。”

“张先生在这吗？”

“不，他在外埠。”

“职业？”

“经商。”

“那么，你们怎么分居呢？”

“我们的感情很不好。”

这句话，仿佛在我的绝望中，又闪开了一丝的希望，我的心从冰冷中温暖起来。

她有些疲倦了，经过一刻的休息后，她又兴奋了，她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又来到这里？”

我沉默着。

“我是为了你！——”

我仍沉默着。

“哼，几年来，你哪知道我所受的痛苦，怨谁呢？都怨我的母亲不好。其实也怨自己年轻，答应母亲，结婚了。”她更兴奋地张开了两手说，“袁倪你来，我要求你离我近些，最好是让我握住你的手，你听着：我结婚以后，没有一天忘记你。唉，我这好心有谁知道呢？甚至，我每天打听你的消息，想知道你的住址，逃来时找你。可是那时候，你在警官学校已经毕业了。直到现在，我不顾一切逃来了，我并没敢预想可以找到你。谁想到竟有意外的事情使我们会见了呢？如果我是一个基督教的信徒，我要说那是上帝的力量！”

我听着，受她感动了。我问：

“我们的会见，在你也是快乐的吗？”

“是的！”

“那么你这次来，是为了我？”

“是的！”

“可是，你见了我，为什么又躲避我搬家呢？”

她想了想说：

“谁的事情，也都是有后悔的吧？不然为什么我见了你，又想不见了？”

“那么，你也后悔了吗？”

“不，也不能说是后悔！”

“怎样呢？”

“我总感觉你会有一天知道我结婚的消息。我还有了孩子。我怕你伤心，也怕自己伤心！”

“你早些告诉我，我也不偷偷地随着你，搬到这里。你明白吗？”她走的时候，小青还在留恋我，我也很爱小青那最高贵的纯真，我说：

“小宝宝，我愿意常常看见你。”

小青扑着我，我要留她在我的屋里，青子不肯，终于让小青哭着随她去了。

这次青子走后，我悔我没有拖住她，要她听见我要说的这句话：

“我比从前更爱你了！”

她遗下的欢快，在我也许是生来第一次感受。

可是，我与苓子却常常吵架了。

有一天，我回家去吃早饭，知道母亲在夜里复犯老病，在她的床边坐了许多，被苓子唤去了我。

苓子低着声音问我：

“昨夜你在哪住的？”

“在队部呗！”

于是她哭了。

早晨的阳光，占有了全窗，屋里十分明亮，墙边仅有的一些污痕，很容易触入人的眼里。老厨夫在做早饭，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又加为母亲煎药，不住地从客厅走来走去，每次都隔不了三两分钟；所以，苓子特意地抑制着自己的哭声，怕被老厨夫听见，或是看见。

我很奇怪，这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我只有默默地等待着她说明。

“告诉我，你昨夜究竟在哪住的？”

“队部呗！”

“不是的！”

“谁说不是的？”

“我说不是的！昨夜我为了母亲的病去找了你，我几乎问遍了队部里所有的人，都说你从来也没有在那住过一夜，也更没有加什么夜班！袁倪，你告诉我，你不在家住，你都是为了些什么事情？”她很温柔地说了许久，我却没有一句话来答复她；仿佛她已经耐不住我那般的沉默，她又问：

“袁倪，是怕我知道的吗？”

“我的事情从来没有怕过谁！”

“那么，你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适当的方法，使我们的谈话做了结束，我只有用气愤的脸色，威胁她，让她随着我的沉默而沉默下去。然后她哭着，悄悄地向自己说：

“哼，袁倪有了外事。”

“我住了妓女！”

“如果，你真是住了妓女，那你不对！”

她并没有生气，也没暴躁，只是表示要我尊重些她的意见。可是我

看事情，已经破碎下去，我便任它再多些破碎：“离婚好啦！”

“离婚？为什么你总要说离婚？”

“不为什么，就要离婚！”

“那你不如说要我自杀，你不知道我有孕了吗？”

我记得她从前向我说过一次，我并没有在意。这次我看她的肚子确是有些大了，——大腿与胸脯间，好像由直线变做了弧线。

她独自地默语着，仿佛是在说：

“你不爱我，还不爱你的胎儿吗？”

我总是坚持着两个字——离婚，我这可以给她做了一切的答复。

不过，此后我不在家里留宿，她不再问我过夜的地方，她也并没有把这种事情转告了母亲，好像她自己该忍受着更大的悲哀，不拖累她以外的任何人。并且待我，仍是如从前一样，没有引起她一丝的反感。好像她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宗教家，用宗教的慈爱感化我，相信我总有一天在她面前做祈祷式的忏悔，要求她宽恕我的罪恶。

有时候，她看我欢快着，她便随着我的欢快更欢快地问着我：

“你有什么秘密？”

或是：

“告诉我吧，你的秘密！”

如果我因此转变了脸色，她便急快地收回了她的问话；所以我们感情的线段，是完全由她一个缠系着，不使它中断，分做两段。

都是因为事情太多，几天没有见着青子了，也许因此更想念着小青。

在我窗前集拢着的孩子，一天一天地玩着，他们永远不厌烦雪人的工作，几次地都在检视着他们的脸面，却没有一次见过小青。

我的意思是要叫小青找来她的母亲。我不愿意常常跑到青子的友人家去找她；并且有时候，她也不在家。

那天，在下午，我从队部回来，在孩子群里，我发现了小青。我从很远的地方就叫着她：

“小青，小青！”

她却躲避我，好像躲避童话中最可怕的怪物。

我看她垂下头，走向她去了；用手托高了她的下颚。她推着我，拒绝我的手触动她。

“你不喜欢我吗？”我问她。

她怕我，不敢正视我。我又问她：

“你怎么不找我玩呢？”

“妈妈不许我找你。”

“为什么？”

“她说你是白眼狼。”

小青的话，不使我有一丝的猜疑，因为她有着人类最珍贵的纯真。我仍在问她：

“你怕我吗？”

“怕！”

“那么你怎么敢在我的窗前玩呢？”

“你不在家。”

“妈妈不管你吗？”

“妈妈也不在家。”

“噢，没人管你了！”

“不，还有爸爸呢！”

她的小手，为我指着她住的那页窗子，仿佛说她的父亲就在里边，正是这时候，窗子开了，从窗里探出一个男人的头来，是年轻人，留着长发，下颚边，垂着一条淡色的领带。不认识他的人，也可以知道他不是商人。并且以我侦探的经验，很难误认了人。他探视着我，向小青摇着手。

于是小青像一只脱笼的小鸟飞向他去了，并且，不住地喊叫着：

“爸爸，爸爸！”

不知为什么小青的喊声，透入我的耳孔，比刺入一把尖刀还痛，使我气愤了那么久。进屋的时候，甚至，我的动作也失了常态，把一个墨水瓶误做了茶杯，浇了茶水。

在窗边，我看见了青子回来，又看见被小青称做父亲的那个男人走去了；他去后，我从他整幅的身影上记起了他就是第十六户所有的人中，是我最熟识的一人。

我张大了嘴，伸开了两膊，让胸间的闷气，尽量地吐出几口；然后，离去了自己的房间。

在青子的门前，我轻轻地敲响着，在我听见她的回声以后，才走进去。

也是同我住的一样的房间，有着很完全的设备，在床边的小桌上，还有两盆结着花苞的鲜花。不过，一切东西都没有经过整理，也没有放在适当的位置。例如：两条被子都没叠好，散在床上，有一条的被角，已经触到地上，墙角边，堆集着麻绳，小碗，和一些被撕了细碎的纸屑。这种杂乱安置的习惯，有如下流旅店的景象。

青子对我站着，小青从我们身边绕着圈子。我不看青子，讽刺她说：

“聪明的青子，我更认识了你！”

她把小青推开去，高扬着头，抖着嘴唇，仿佛容忍不了我那样的讽刺，她说：

“你不要说这些话吧！”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你也许明白吧？”

“我有我的苦衷，请你原谅我！”

“事情永远都可以原谅的吗？”

我握起结实的拳头，击响桌面。她立刻制止着我说：

“你要担心些我的小英！”

“谁？小英？”

小青给我指着床上的一边，在模糊的色彩中从被边露出的小小的脸面：半合拢着眼睛，惨白的脸色。

“小英，我的弟弟！”小青告诉我。

小英像才生下不满几个月的孩子，我为什么从他的脸上也感到了憎恶呢？故意又把桌面击了两拳。

青子跳着，敲打着自己的胸脯向我说：

“袁倪，你安静些吧。”

“怎么？”

“小英病了，病得很沉重呢！”

“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样，即使你仇恨我，你也不应当在孩子身上寻找报复！”

“我才知道你这样爱护你的孩子！”

“谁家母亲不爱她的孩子呢？”

我似乎是再没有什么适当的话说给青子，因为她已经不肯容忍我，好像她宁肯使我们的爱情决裂，她也并没有一丝的留恋。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用些严厉表示，换取些她无情的言语，使我更愤懑些，使我忘去想念她的好心，让我们几年来，一丝一丝积蓄起来的爱情，在这次做最后的结束。而且有着比我们爱情的痛苦更大的痛苦——日军的刺刀，弹粒，天天准备着屠杀我们，我哪有更多的力量被缠绊在爱情的痛苦中？

青子在床边拍着小英的胸脯，用着一种最流行的调子哼着催眠歌；每句的尾音，都很冗长，而且低沉，会使一个人从兴奋中疲倦下来，合拢着眼睛，渐渐地走向梦境。可是等了许久，小英还没有睡去。因为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耐心等待，便用严肃的神气扯了一下青子的衣袖，她给我的表示，却是任何事情也要在小英睡去以后。——母子的感情也许超过了一切！

“我现在有话说。”

我逼迫她立刻从小英身旁移开，激起了她的反感，终于气愤了，她说：

“你如果这样不讲理，我没有一句话向你说，现在我就要走了！”

“走，太慢，你跑吧！你也许还记得我从前用匣枪打飞雀吧？”

我从大衣里抽出了匣枪。于是她更暴力地向我的匣枪，伸近头来：

“给你打，给你打，你不打死我，我不答应你！”

可是我却把匣枪从她头边移开些，躲避着她，垂向地下去。我告诉她：

“我要去了，等些时间再来！”

“你要知道一个独身女人的住所，没有经过允许，男人是不可以随便来的！”

她说着，她的身体都气抖了。

小英在床上哭叫着，悲惨充塞了这房间。

我说：

“好吧，我永远不来！”

可是小青，还扯住我的衣襟，不喜欢我离她。在我拖开我的衣襟的时候，小青被我拖倒了。

在同一天的黄昏，被小青称做父亲的那个男人，手提着一个小皮包回来了，又走出了。虽然他不像一个旅途上的旅人；但是，青子携着小青却充满了别离的神情，在他身后送行，给他打扫着肩上的尘灰，给他皮帽垂下的帽绳，打了结，好像怕冷风吹冻了他的下颚与脸颊，并且在默默地低语着，仿佛嘱咐着旅人，为旅人祝福着平安。这种别离，绝不同平常的分散，使双方都怀着恋别的心绪。

天黑以后，我在青子的窗前，徘徊了几周，终于没有走进去。因为我看见的窗幔上集拢着一些错乱的头影——侧面的嘴唇，不住地动着，不过说的话，我没有听见一句。

自与青子会见以后，我便被她丢在一只小船上，在梦想中，在茫茫的海洋中，她握着舵，使我失去了自主的去向。现在，舵，不知是她交还了我，或是我从她手中夺来了。总之，是被我握在手里了，我要驶向我自主的去向。

我决定辞去自己的职业——不是从军，便是逃亡。

母亲病了，苓子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并不担心母亲，因为她要求我与苓子结婚，而且不许我与苓子离婚，我已经使她满意了，在我心里，对她没有一丝的遗憾。苓子呢，她有她的职业，她可以维持她的生活，并且她有豪富的家庭。虽然她深深地爱着我；但是，我对她总是路上相识的路人一样；就是有时我抚慰她，或是留恋她，也是被她感动了而可怜了她——仅是短短的一刻。如果，我们别后，我丢弃了她，我也很安心，因为伤害她的人，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她始终不同意我离婚的意见。如果让我们的别期延迟在她生产以后，我也许因为新生的婴孩激动了感情，留住了，那么我将永远做了她的丈夫；永远在失去的土地做着奴隶，任人鞭打，屠杀，直到死后，才有终结，而且给自己的子女也造定了奴隶的命运，就是我仍有离去的决心，那在我的感情上，将受了更大的打击，更苦的连累。

我在家连续住了两天，日夜都被那种错乱的心绪纷扰着，虽然有苓子安慰，但是她的话，已经很难打动我的心。我在家多住几夜的原因，是要她给我理好我所带去的東西。因此她近两天在上班工作的时间以外，也没有一刻休息的工夫，为我洗着衬衣，缝了两条棉绒的短裤。她说：

“路上风冷，我怕你肚痛！”

在床边，堆集着的一些东西，都是经过了她的手，费去了她长久的时间。

“你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苓子停止了她的工作，笑着问我。我检视了一下，所要准备的東西，仿佛已经齐全了。我说：

“你再替我想想吧！”

她在地上踱着，拖着很慢的步子，一面沉思着，一面随手拎着东西，有的丢开了，有的又堆在床边。她的脸色随着天色暗淡，渐渐地布满了忧郁，天已经完全黑了。她从床下拖出我的小皮包的时候，特意地开了灯，灯亮了，她忧郁地揭开了小皮包，她问我：

“你看看，你要带去不？”

“什么？”

“你的宝贝！”

是青子的小照片，在她的手中举着给我看。我说：

“不要了！”

“你应当要！”

她的忧郁神情中透出了几分嫉恨，虽然她勉强笑着，让笑遮掩着她的脸。

“为什么我应当要？”

我故意逼问她，她立刻反问我：

“为什么你保留几年却不要了？”

“让我保留着吧！”

我接过青子的小像片后，她已经抑止不住她那极大的嫉恨；虽然她表示了同意我的话。

我望望青子的小像片和片后的字句，突然被我撕成了碎片。于是青子的嫉恨淡了；可是她表示着好像她自己毁坏了一件珍贵的东西，仍在惋惜着：

“你看看青子的脸破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从地上拾着被我撕开的青子小像片的碎片，在她每次拾起一片的时候，都要检视一下，是青子的某一部分，是眼睛，还是鼻子。

“你看看她的嘴给你撕了两半！”

她拾起两块碎片，向一处配合着给我看；我过来，又抛开了，表示我已经看厌了。她好像替我忧愁了，长叹了一口气。

不过，在夜里，她却欢快地睡去了，在睡脸上，还遗着欢快的笑容。可是，我失眠了。

夜深的时候，我听见有人打门，那响亮的声音，仿佛已经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我刚想从床上起来，老厨夫已经比我先出去了，他回来，给我送来一个纸条：

袁倪，请你立刻来你的住所，我有要事商谈。如果你还留恋我们从前的感情，你当允许我这次的约请。

——青子留

这简短的几句，已经占用纸条的一面，另一面还写了几个大字：

切勿迟延。

我去了。可是我去并不是为了她的邀请；而是怀着很大的愤恨，要趁着这次机会寻找报复。

路上很黑，而且密布着日军的检查网，甚至每一步我都要受他们一次检查；幸而我有侦缉队的记章和证书。不然，我也许遭遇了奴隶所要遭遇的侮辱：被解开每个衣扣，在冬夜里，赤露着前胸，经过长久的搜查和诘问，如果不经意说错了话，也许被打了几掌，被踢了几脚，也许指定地点被迫着跪下，跪到他们高兴的时候。

我没有先走回我住的房间；我看青子的窗子亮着，我便去了，可是她不在家，只留小英一人在床上，孤零地守着一盏灯光。他的脸色在灯下更加惨白了，而且不住地嘶叫着，不知他是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还是需要他母亲的照看。我担心着，他嘶叫着破了喉咙，我给他抖动了几下枕头，仍是没有止住他的嘶叫，并且摇起自己的小拳头，触着脸颊，这好像是他完结生命前，仅有的一刻挣扎了。不知为什么我被他感动，几乎流了眼泪，虽然他不是我的儿子。睡吧，安静些吧！

睡吧，安静些吧！

我给他哼着，希望他能被我的哼声催眠了。这时候，有一个老太婆抱着小青走过来。她说她是房子主人的仆人，青子出去前嘱咐她暂时照

顾一下小青、小英，她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也没能把小英哄睡，又怕惹着小青不安，才抱小青离去房间；然后她又叙述她所知道的小英的病状。她说：

“先生，你看看他究竟是什么病？”

我奇怪她，凝视着她。她也在奇怪我，问我：

“先生，你不是医生吗？”

我否认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又向我说：

“小英的妈妈说去找医生，怎么医生没有来呢？”

“小英的母亲还没回来呢！”

她有些失措了，问我：

“那么，先生你是谁？”

“我是小英母亲的朋友。”

于是她有些悔着自己说太多不必要的话。过了些时，她又向我谈起一些更不必要的话：关于我的家庭，我的业务……甚至我是否结婚，有无子女。我很讨厌这好说话的老太婆，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候着青子。

在一点钟的时间内，我又去找青子两次，她仍没有回来。我想她也许又在排演一幕戏剧，让我担任了剧中的主角？因为我有了决心要见她一次，又因为长时间的候等，苦恼着我，我便给附近的一个饭馆打了电话，要来两种菜和半斤白酒，我一口几乎饮尽了一半。

炉火刚刚被我燃着，室内仍是侵满了冷气。幸而我在饮酒，身体没有觉到寒冷。不过我的头，渐渐地有些晕沉了，我身边的一切景象，好像都在旋转着，甚至我自己也在旋转中。

门响了，我以为青子来了；在我面前的人，却是那个老太婆，她抱着小青在默语：

“小青的记性真好，她还记得先生你住的这个门。”我问她做什么来了，她说小青打着她，要她去找母亲。我看小青的脸上还有泪水，我便留下小青，要老太婆自己回去了。“你找妈妈吗？”

我问小青，她随着我的问话又要哭了。我立刻制止她说：“不要哭！不要哭！”

她凝视着我，不说话。

“你看我都不哭。”

“我也不哭！”

我用手指在她的脸上揩下一滴泪，给她自己看，我问：“你才哭了吧？”

“哭啦。”

“不怕羞？这么大的姑娘哭了。”

“妈妈也哭呢！”

“什么时候？”

“今天，她哭了一天！”

我想青子是为了小英的疾病吧？

屋里温暖了，我身上只留了一件衬衣。菜快尽了，白酒还没喝完；这时候青子来了。她的眼睛转动着，不住地搜索着我，好像她有许多话，要向我说出。可是我第一句话说的是：

“你要知道一个独身男人的住所，没有经过允许，女人是不可以随便来的！”

她哭了，夺去我一杯酒饮了。她说：

“你杀了我吧，不必谴责我！”

我随便检了些前次她骗我的事实做证据，我无情地责骂了她。她容忍了，她说：

“你喝醉了。”

“你才喝醉了。”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色吧！”

我对着镜面，才知道自己的脸色红了。不过我相信我的神经，还是清醒的。

小青睡了，睡在青子的怀里。青子准备了与我长时间地谈话，她把小青移到我的床上去。然后，她抱我，不允许我再饮酒，余下的酒，完全被她饮尽了。可是她不知道我又偷偷地给饭馆打了电话；役者又送来半斤白酒的时候，她要退还，役者说已经睡了，又被我的电话唤醒了。她想了想，也只有留下了。不过她抱在怀里，不给我饮。我抢夺着，她问我：

“你怎么这样爱酒了呢？”

“那，你让我爱什么？”

于是她把酒分开饮，她一杯，我一杯，一边饮酒，一边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问：

“今天，你很忧郁吗？”

“不，我从来不忧郁。”

“你也看看你自己的脸色吧！”

“我常常这样。”

“那么，你是常常忧郁？”

“我有什么忧郁呢？”

“你的小英，不是病得很危险吗？”

于是，她特意又跑回家去一次，给小英吃了药。她自己向灯光自语着：

“一个女人生了孩子，就像犯人被判了徒刑一样！”

“你不是很爱你的孩子吗？”

“我生了他，能不爱他吗？”

我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不是讽刺她。她突然又饮尽了一杯酒，讽刺了我：

“哼，男人总不肯原谅女人；而要女人永远原谅男人！”我不做声，静听着她的话：

“你不知道，我离开你以后，就随着母亲到很远的乡下耕地去了。那里不通信，你想想我怎么给你写信呢？半年以后——我就有了丈夫。他叫王长英，那时候，他是中学的学生，他待我很好，——”

“所以你忘记了我！”同时我饮尽了一杯酒。

“如果说我承认我忘记了你，那是我欺骗了自己。”

我摔碎了一个酒杯，小青醒了，一刻，又睡熟了。

“你不要生气！”她继续说着，“可是我也不能说我不爱王长英。”

‘九·一八’，他是义勇军的重要分子，没有一天不是冒着死亡的危险，这次来到此地，如果不是你收到了那封匿名信，他也早就死了——”

“那么，你感激我吗？”

“感激你！”

“那，为什么你欺骗我？”

“你忘记了你自己的什么职务吗？我为了保全他的生命……”

“为什么保全他的生命，欺骗我，不相信我？”

第二个酒杯，又从我手中碎了。她咬紧牙齿，狠狠地说：

“你不要生气吧，现在他已经死了！”

于是她从衣袋里掏出自日的一份报纸，指给我看国内版的特号字标题：

谋刺黑省警备司令暴露，主犯王长英被捕枪决……

这新闻，我已经在早晨读过了；不过，我没有十分注意。这次读后，却感到些恐怖、悲愤，同时仍有欢快充塞着我的胸中。我对青子却更讽刺地骄傲地问了：

“现在，你又向我剖白做什么？”

“现在我需要向你剖白！”

“你忘记了我是什么职务吗？”

她勇敢地挺起肢体，勇敢地问我：

“你身边有枪吗？”

“有的。”

“好的！”

她说着，随着向我挺出了她的胸脯，那做了母亲的两乳，更大地凸出在我的面前。我问她：

“做什么？”

她默默地指着她的胸脯——指给我要中我的弹粒的地方。我推开她；她却又靠近我。我故意又问她：

“为什么这样靠近我呢？”

“怕你打不准！”

“你不知道我的枪是指哪打哪吗？”

“知道；我要为你更方便些！”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从前的爱人。”

“那么，为什么你要我打死你？”

“因为，现在我没忘记你是什么职务！”她叫起来了，“因为你要尽你做走狗的责任！”

“如果，我要尽我做走狗的责任，你的死期不是在今天，是在我会见你的那天，你明白吗？”

她听了我的话，安静了些。

窗外，渐渐地有了鸡啼声，随着暴风从远处送来，一声一声地可以清晰地听见，明亮的玻璃窗，从窗里可以看见一条月痕，在遥远的空中。

这房间在夜色的围裹中，无形中充塞着苦难的象征，小青孤零地睡

在床上，如同一只死了的小狗，被人丢在荒凉的原野上，没人看守，也没人探望；有时候，因为我们高声的谈话，激动她翻转一下身体，或是任意地摔动一下手腕，立刻又安静下来，恢复了她熟睡的姿态。

青子从桌边移开些，避开我。我叫她，要继续我们的谈话。她转向我的时候，她的眼角，流下了两条小河；突然又垂下头去，让泪滴汨汨地落在她的衣襟上，在灯光中，好像落下了晶亮的珠粒。我没有什么话向她说，只有让她默默地哭泣，让自己在静默中，望着窗外月边的几粒小星闪动着，牵动了渺茫的幻想。

门响了，我们都受了一下小小的惊动，那个老太婆又来了，她用惊人的声调说着，唤着青子回去。仿佛要青子去看看小英，母子二人做最后的一次会面。青子打了一下桌子，默示着她与小英永别前的决心：拒绝这一次多余的探望。我劝慰她，她尽量表露着不满意的神情向我说：

“这是加害我一样！”

然后她疯狂地笑了，笑声中杂着极大的悲哀：

“我的刑期要满了！”

小青醒来，张着小手，用哭声添补她断续的泣声中遗下的空隙，仿佛是有节奏的合音，使我从沉默中转向了兴奋。

那个老太婆却更阴沉着脸色，等待青子伴随她走出我的房间。

炉中的柴禾，旺盛地燃烧着，壁炉的小铁门红了，有几处跳动着火星。我坐的地方，离炉比较远些。可是，我的脸面感到涨红了，血流几乎达到了沸点。青子恰是靠近炉边。在她不经意中，她的衣角会触了炉门，好像她却没感受炉火的热力，常常移动椅子，更近些靠近炉边。我要她离远些，那个老太婆高兴了，误认我催促青子走去。

“你自己先去吧！”

青子说了，那个老太婆失意地去了；临去的时候，她默语着小英的苦命，咒骂着青子，好像青子遗下了最大的罪恶，任谁也不可宽恕的。

不知青子怎样地把小青哄睡了，不过她没有离开小青，担心着她离后小青会立刻醒来。

我劝慰她止住哭声，应当想到自己的生活，怎样预计。虽然她不是一个孤独者；但是也许比一个孤独者更加痛苦，因为她有小青、小英，也许更累了她。我说：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情愿帮助你！”

“是诚意吗？”

“可以做我的誓言！”

“不是被什么欲望引诱的吗？”

“不是的，决不是的！”

这句话我欺骗了青子，也欺骗了我自己。我不是企图占有青子吗？这不是青子所说的欲望吗？

可是她听了我的这句话，却突然跳到我的身旁，用两手接成了圈套，裹住了我的脖颈，问我：

“你肯原谅我的以往吗？”

我用神情默示着，我接受了她的话。她又说：

“如果你允许我，此后，我便属于你了！”

于是，我更坚决地重说一次我已经说了的话：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情愿帮助你！”

于是，她给我送来了许多东西：花绸的棉袍，中国式的大氅，绅士惯穿的棉鞋，另外还有黑色的眼镜。我全部收留了，因为她很忙碌，没有时间容许我问她。

我猜想青子送来那些东西，是王长英生前所有的，青子担心他的东西会引起被侦查的线索，特意让我保留着吗？可是青子熟知我的习惯，不爱穿中国式的衣服，她怎么会故意使我厌烦呢？既是做为给我的赠品，也要先取得我的同意，所以我又否认了自己的猜想。

我为了要知道我所猜想不出的原因和探望小英的病状，去找了青子。可是，她不在家，仍是那个老太婆看守着小青与小英。我问过青子回来的时间，她没有确定答复我。然后我便不再问她什么，我怕惹起她不断的谈话缠住了我，不过我停留着，注视着小英，从他的脸色上看来，我绝不相信那个老太婆所形容的那般危险，就是他必定死，他的死期，也要在遥远的时日里。我敢这样确定的缘故，是因为他的身体都在温暖着。他的呼吸，有着匀称的节奏，我的手指可以引着他的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所以我想：

“小英有复活的希望。”

然后，我把小青抱起来了，吻了她的脸颊，她也许认做我比那个老太婆是她更近的人，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这像永远不让我从她身边离去。

“你不走吧！”

她更紧些握着我的手，不许我从怀抱中放下她！使我不得不装做童话中的人物，给她讲了一个童话中的故事。结果，我把她放在地上，我却失败了，她张着两手，跳着脚，要我给她找来她的母亲。我哄着她，我说：

“你听，一个没有母亲的人！”

“‘母亲’？”

这两个字在她起了疑问，我立刻又重说：

“你听，一个没有妈妈的人，很好，很好，可以自由，可以随便玩玩，不是吗？”

“不，我怕他！”

她指着小英，我说：

“你不要怕他，他是你的小弟弟。”

“不，我怕他！”

“你怕他什么呢？”

“怕他哭！”

“不怕。他哭的时候，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在童心中发生了这样大的效果，她允许我走了。我临走的时候，又加重我的声音，向她重说一次：

“不怕，他哭的时候，你告诉我！”

“记住了！”

这是她在自信力中说出的。

在我回来不久，小青便跑来了。她比划着，述说着小英的哭态，我用种种的方法，让她先去，她跳着，在我面前哭了。我为了她止住哭声，只有陪她去一次。然而，我见了小英的时候，他不哭了；我指给小青说：

“你看看，哭吗？”

她默然了，那个老太婆却替她承认小英哭过了；因为方才是小英吃药的时间，老太婆给他吃过药了，叫了几声。

我相信小英如果不遭受意外的骚动和逼迫，他会安静地处于昏沉中；因为他那沉重的疾病，已经使他没有余力发出哭声；所以我嘱咐那个老太婆慎重地看守着小英，不要使他被任何的声响惊动。

“不怕，他哭的时候，你告诉我！”

我向小青说着，去了。

因为整夜失眠；时间又是午后，我也没有过一刻的休息，身体感到了极度的疲倦，好像我曾被人雇去，做了一天劳苦的短工。

有多少问题，摆在我的面前，需要我解决，比如怎样与青子结合，又怎样与苓子离婚……可是我更需要休息。

我刚刚在床上躺下；然而小青又跑来了，她见了我，还没有说话，便哭了。不知她受了怎样的惊吓，使她的面部潜伏着极大的恐怖。我用各样的声调，像母亲责问儿子，像法官审问犯人，像长官发出命令，像乞丐向人乞讨……探询她。她几次地张开嘴，要有话向我说；可是她的喉咙被哭声堵塞着，她所有的话完全被堵塞了。

过些时候。虽然，她并没止住哭泣；但是她已经哭尽了力量，哭尽了泪水，只抽动着胸脯，颤抖着肢体。我把她抱在怀里，仍在探询她，她只是用手指着我的眼睛，指着窗外，好像她哭的原因，都在她所指的地方。

“你去！”

她扯着我的衣领，要扯着我去。我站起了，可是我没有放开步子，我说：

“你告诉我，做什么去？”

她抖着，又落下一滴泪水，他说：

“小英哭了。”

“他吃药了吧？”

“没！他挨打了！”

“是那个老太婆打了她吗？”

“不，妈妈！”

“妈妈？妈妈回来了吗？”

“回来啦！”

我固然相信童年纯真的心，纯真的话，可是小青这次却动摇了我这种信念。因为我知道任谁的母亲，绝不会在她儿子的病中施用暴力；更是青子，她曾在我面前那样爱护着小英，并且，曾在深夜中为小英邀请医生，购买药品；所以我向小青说：

“你撒谎啦！”

我的话，仿佛冤屈了她，在她童年的脸色上，也透出了严肃的神情，向我分辨着：

“谁？谁撒谎啦？”

“你，我说的就是你！”

她打了我；我怕再惹起她的哭声，装做我有了过失，而且错怪了她，使她快些走开，我要继续休息。

结果，还是我伴随她，走向她家去。我从窗外便听见了小英暴叫的声音，我进屋后，他的声音震抖了我的耳孔。屋里只有青子一人，我只看见了她的背影，两手握着两条绳头，尽力地向外扯着，好像她打了绳结，担心绳结不太结实，要在最后，做一次紧缩。我唤了她，她没有转向我，只顾自己的工作。我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眼睛正在仰望着棚顶的一角，并没有因为我而有一丝的转移。而且咬紧牙齿，完全是一个疯人的表情。我只顾注视着她，唤着她的名字，没有被其他任何东西引动我一下。我拍着她的肩，她不动，似乎失去了感觉；然后我沿着她握着的绳子望去，我惊了，那条绳子绕着两圈，勒住了小英的脖颈。

这时候，小英好像在凝视着他母亲的发丝，四肢安然地放在固定的位置上，呼吸渐渐地缩短了，低微了。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容我探询明白我所有的疑问，突然从青子手中夺下了绳子。青子叫了一声，随着我的手倒了。我从小英的脖颈上解下全部的绳子，让他的皮肉间，空空留下两条深陷的绳痕。我看他不平地摇动一下手，然而，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挽救他的希望，只有看他安静地合拢了眼睛，结束了他那短短的一生。

小青任着稚气支配着她，在小英的身边转着，探视着。我推她，是要她离开小英远些，因为我不愿意使她在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死的印象，她却推着我，她说：

“ 你去吧！ ”

我停着。于是她又指着小英向我说：

“ 他不哭了！ ”

“ 他永远不哭了！ ”

她没有明白我的话，她说：

“ 他睡了！ ”

我默认着她的话，她又说：

“ 妈妈，也睡了！ ”

青子仿佛是睡了，不动地躺在小英的身旁。不过她的胸脯，不住地被呼吸激动着。我用了极大的声音，才唤醒她。我用两手支撑着她的身体，让她坐起来。她好像没有睡醒，仍在疲倦，仍要继续睡呢。

“ 青子，你告诉我，你疯了吗？ ” 我问。

她却狂笑了，那种笑脸使我感到恐怖。然后她拍打着手掌，叫着：

“ 我的刑期满了！ ”

我摇摆着她的身体，是要她更清醒些听我的话。

“ 你自由了吗？ ”

“ 自由了！至少有了男人同样的自由！ ”

“ 可是，青子，你忘记了罪恶！ ”

“ 罪恶？谁的罪恶？ ”

“ 你的！ ”

于是她张大眼睛，似狼一样无情，扑着我，好像要立刻吞食了我。

她问：

“ 谁的？ ”

“ 不是你的吗？ ”

她在我的左颊上狠狠地击了一掌，代替给我的回答。我为了她变态

的心境，同时我也不敢再问她杀小英的主因。虽然她又向我狂笑了。她的确是快乐了吗？即使快乐在反面，也正有着她更大的悲哀；因此，才引起她自杀的动机，或是意外的悲惨的念头。我因为在这时候另有约会，要青子休息一下，等我些时候。然后，我又把小青叫到门外，我嘱咐她，要她注意她母亲的动作。同时我更担心着青子任着变态的心境，怕给小青也辟了一条同小英一样的去路——我说：

“你的妈妈，打你的时候，你就找我来。”

“妈妈关了门，扯住我，打我，怎么找你呢？”

“那你就大声叫我！”

“叫你什么？”

“袁先生。”

“你再教我一次。”

“袁先生，袁先生。”

“袁先生……”

她仿佛担心自己记不住，特意在我面前读了几次；并且要我听着她是否说错了字音。

在屋里，我一方面等候着约定的友人，一方面我的心，不安地跳着，想着青子为什么失去了她的热情，更失去了她那纯洁的灵魂？所余的只是勇敢，聪明，又加多了暴徒一样的残酷。也许因为她遭遇不幸，改变了性情？

在我与友人约定的时间前，我就听见小青叫起来：

“袁先生，袁先生！”

可是又发生了什么不幸呢？这时候，我所想象的、记忆的影子，完全消散了。在我全部知觉中，只能感到小青的呼声：

“袁先生，袁先生！”

也许我经过了一刻的清醒呢？才辨出小青的呼声是在我的窗外，在院场中。我跑出门去的时候，更知道是邻家的孩子，举起拳头，隔断着她的去路。

“做什么？”我问她。

她没说话，只是用手唤着我。我又问：

“妈妈做什么呢？”

“躺着呢！”

“打你啦吗？”

“没有。”

“那你叫‘袁先生’、‘袁先生’做什么？”

她指着邻家的孩子，意思是说她也有着苦衷，然后我说：

“你要上哪去呢？”

“找你！”

“找我做什么？”

“妈妈找你！”

我去了。

青子屋里的全部东西，好像都经过她翻动了，乱了。不过，在墙角边放着两个整齐皮包和一个小的手篮，好像为一个旅人所准备的。

青子从床上下来了，她尽量地镇定着自己的精神，勉强恢复了她的

常态。她合拢着眼睛，深深地吻了小英的脸颊；然后，她用被子裹起他，裹成了一个长的包裹。并且在床上换了一条白色的被单，给小英做了墓地。

“你忘记没有你的誓言？”

她突然地问了我，使我感到了几分的迷惘，我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问你，你没有忘记你的誓言？”

“我不会忘记，青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再重说一次给我听。”

她好像在考试一个投考的小学生；我也只有以小学生的身分回答她说：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情愿帮助你！”

她把头转向另一个方向，嘴角故意向上抽动一下，有些责怨地说：

“哼！你的誓言，说过了几天？你记得吗？”

“记得，是在昨夜！”

“是的，昨夜。在明天，你也许失去你的誓言了吧？”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青子。”

“因为我才听你的话，已经有些不坚决了！不是的吗？也许你自己听不出来吧？”

于是我用严肃而坚决的声调说：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情愿帮助你！”

“你听我的话吗？”

“听的！”

“那么，今晚你随我上火车吧！”

这突来的话，使我更加有些迷惘了。我抑制自己不安的情绪，安静地问她：

“去什么地方？”

“黑龙江。”

“在黑龙江什么地方？”

“自然有地方！”

“我不可以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买票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没有追问她，更没有探询她究竟是什么原因。现在我只有听她的话，任她怎样支配我。如果她是神经失常，也不妨让她施展一下她所有的想念，也许会因此渐渐地恢复了常态；不然，我逆着她的想念，我也许会使她变做疯人。如果她确是有理性的动机，我为了她，也要忍受一切的苦衷，因为她是我的爱人。

我们约定了登车的时间以后，我走了。

我向房子的主人，辞退了我住的房间；把我的东西，又送回家去。

在马车上，我怕迟误登车的时间，要车夫鞭打着马。但是到家的时候，我把送回的东西交给了老厨夫，我却悄悄地留在客厅里。因为我听见了老厨夫告诉我：母亲独自看戏去了；又听见了苓子在母亲的屋里哭泣着，低语着，那哭声和语声混合在一起，恰是哀祷的调子。我用眼色告诉了老厨夫放轻脚步，不让他骚乱了一丝的安静。我悄悄地移近母亲

的门旁，从锁孔中投入了视线。我只看见她的一半脸面，她的不完整的胸脯；此外，被锁孔的周边完全隔断了。她没有一丝的转动，停在窗边，仰着脸，好像在痴望着谁家的房脊，紧皱着眉，闭紧了嘴唇，连续的泪水，已经湿透了她胸前的一块小小的衣布，她那愁苦的神情，会把一个快乐的人引入悲哀的深渊；所以我也不敢直视她，终于让耳孔代替了眼睛占有的位置。我安静着，静听着她的话声：

“……我的话，可以向谁说？哼，只有袁倪，他又是那样地好闹脾气，我从来所不能忍受的，在他面前我都忍受了。可是，他总不原谅我，真痛苦呢！哼，为什么我只是爱他，别人都是我所不爱的呢？他不也是人类中的一个人吗？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管他怎样待我，我都不肯离开他。不怪朋友说：她要永远爱他一个人了！是的，我要永远爱他一个人了。我相信我的热诚会征服他。他会有一天悔恨他自己。不过，他要走了，祝福他平安——平安地去，平安地回来。即使我们别后的会期，是在老年，我也要为他等到老年……”

时间不容我再多迟延一刻，我便推开母亲的门进去了。她受了一下惊动，然后她扑住我，笑了。我要她为我整理好了的东西，拿给我。她慌了，好像没有她停脚的地方，不住地踱起来。我催促她，她才把我要的东西拿给我，问我：

“你要走了吗？”

“是的。”

“今晚吗？”

“是的。”

“你没有告诉母亲呢！”

“你替我告诉吧！”

“我怎样告诉呢？……说你从军去吗？”

“是的。你再告诉她放心好了！”

“你也放心吧，我会很好地待她，也许比待你更好！”

然后我又说许多话安慰她。她吻了我，她说：

“你去吧，因为你是从军去的，你是为祖国去的，这种离别，我很坦然，你不信吗？你还看不出来我的脸色吗？真的！我很坦然，你去吧，只要你去后不忘记我！”

“是的，我永远不忘记你！”

她从衣袋里掏出一束钞票，强迫我的手握住。我看她那更加凸出的大肚子，预想她不久将有一次灾难到临，我不忍接受她赠送的钞票。于是我又伸出手，伸入她的衣袋里，她激愤地推脱我的手。突然，她衣袋的一边，被撕开了一条长长的裂缝。我也许是怕这种无意的纠缠吧？把钞票放入自己的衣袋里。

最后她问了我登车的时间，她另换了一件不常穿的新鲜的衣服，脸上涂了些胭脂，她要为我送行。这时候，我也有些慌了。不得不劝阻她的好意。但是，她仍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我一定要去送你，我才安心！”

然而终于被我阻止了。

我在匆忙中，在友人的家里，解决两件必要解决的事情：写了两封信，一信给侦缉队总队长，请了短期假日；一信给苓子，说明我必定离

婚的意见。

在车站的时候，我把两封信投入了信筒。

终年没有休息的车站，终年在骚扰中，孩子的哭声，车夫的叫喊，小贩的卖声，甚至奔走中的脚步声……天天是一样，天天没有停过一刻。尤其是哈尔滨的车站，集中着哈满、哈绥、哈长三条支线的路轨，也许更加疲倦了。车头的笛声，已经使人听厌了；铁轨没有一时不在铁轮的轮转下发出更厌人的声响。候车室内，除去头等、二等还可经常保持着洁净外，三等、四等已经失去了清爽的空间，烟气飞腾，烟蒂满地。任着车站的役者怎样地重视自己的职责，也只能在清早有过一刻的洁净。然而，自从日军侵入我们的土地以后，贫苦的难民，都在这意外的动乱中逃难，整天拥塞在候车室，争购车票；整天有许多人们，没有购得车票，在候车室留宿。一方面，也因为自己没有旅店的宿资，所以每个角落都做了他们的宿地，人与人混杂着，蹲缩着，蜷曲着，有的已经失去了人形。青子就是领着小青在他们那些人丛间踱着，沉思着。

虽然离卖票的时间还有好久，但是在三等卖票处前，已经挤满了买票的人们，被维持秩序的路警排成很长一列，仿佛是一条被绞成的钢绳，没有一丝的余地，让后来者挤入，只有在尾巴的地方，继续地排列起来。然而我与青子都散在那排列的外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票数，最多不过是那排列中的人数的半数。

“明天早些来吧，你的意思呢？”

我问青子，她想了想，坚决地说：

“一定要今天走！”

于是，我们便发生了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们谁也没有解决的力量，除非与售票员有特殊的关系，才有办法。然而，我们与车站的任何路员，也没有一人是我们的相识者；所以我仍是商议她说：

“明天吧！”

她更坚决地回答我说：

“今天，今天！”

我看她那坚决的神情，是有重大的事件迫着她；我却不知道那件事的内容。

“坐二等车吧？”

我知道二等车的乘客，是比较少些，也许容易买车票，她却说：“那太费钱了！”

“青子，你告诉我，我们究竟要去什么地方？”

“昂昂溪。”

从哈尔滨到昂昂溪的一段旅途，所需的时间与旅费，我很熟知；所以我说：

“还是坐二等车吧！”

“钱不够，而且我们也不是什么贵族！”

“青子，少说些吧；我有钱呢。”

她终于不肯接受我的意见。突然我记起了一样很好的办法——从前为了侦缉犯人，在必要的时候，常常随着犯人走出很远的旅途。于是，我给一个路警的警官掏出了我的侦缉队的记章和证书，意思是说我不是平常的旅人，而是有公事的责任者，应当享受铁路优待的权利。并且侦

缉队的人员，不知为什么常常被人鄙视，被人厌烦，甚至被人遗弃，不愿意相识，也不愿意发生平常的友情，好像是垃圾箱里的垃圾物，早已被人丢弃。所以，那个警官平淡地给我介绍一个路警，买了两张昂昂溪的三等车票。

一列长长的车辆，在夜色中，已经燃起了灯火。乘客的影子，错乱地堵塞着车门。我与青子、小青，在那样拥挤中，挤入车里，幸而我们还占有了两个座位，小青留在青子的怀中。

乘客的喊叫与紧张的情绪，每个人都像在逃脱着死亡的境地。只有我与青子安静，默默地相望，没有说一句话。小青呢，依着车窗，用手指融化着车窗的霜花，描绘不成形象的景物，诱着我们，注意地鉴赏着。

站台的铃声响了，在说明已经是开车的时间了。然而，因为日本宪兵检查旅客没有终止，又强迫站长延长了时间。

有许多乘客被宪兵推下车去，被捕了；有的，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被捕的原因，茫然地遭了留难。

乘客在没被检查前，都惊惶了，仿佛在等待着一次临头的大难。有的母亲怕听自己孩子的哭声，怕惹起了宪兵的愤怒，特意用手帕给孩子堵塞了嘴。同时，我也不安了，并不是担心着自己，而是怕青子因为王长英的案件受了连累。可是青子却镇静，没有一丝的惊色。不过我为了她的安全，要她与我移换座位，因为我的座位在车角边，灯色模糊，不容易分辨脸色。她却拒绝了，而且在斥责我：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胆小的人！”

这种口气，是鄙视我，抬高她自己，表示着一个勇敢者所应有的勇敢。

“人家如果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呢？”我又低声地问她。

她思索着——好像我问的话在她也认为是有着相当的理由。

日本的宪兵，已经走入我们坐的车内，开始搜索着乘客的行囊和每个衣袋，诘问着每人的职业、去处和一些不必要的话；渐渐地走近我们。我为青子的镇静，却使自己更加不安了，急促地问她：

“兄妹？”

她注视一下小青，然后说：

“不，夫妇！”

“我们做什么去呢？”

“我回娘家。”

“我呢？”

她把手摔在自己的腿上，默示着我最后问她的话，没有一丝的必要性。不过我仍追问她：

“你叫我说什么呢？”

“你就说，你送我去！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检查刚刚临着我们的时候，所有的宪兵，已经被他们的长官命令下车了；然后车轮便开始了转动。

车上的乘客，都自动地揭开了车窗，集拢在窗边，不怕冷风吹打，探出头去，仿佛在留恋着自己的故乡和送别的亲友，有的默然地流了眼泪，有的，疯狂地摇着手。青子抱着小青在呆呆地沉思着什么。因为窗边没有给我留下一条缝隙，让我投出视线；我便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向

车门去了。虽然，我知道站台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人是为送我来的；但是我要看看灯下的人影，房屋，日军刺刀反映着的光亮和天上的星，孤零的月，飞向远方去了的白雪；并且我要尝尝夜风是怎样的寒冷，送别的哭声是怎样的响亮，日军怎样地唱着胜利的歌子，怎样虐待着被他们征服了的奴隶……我要集中这一切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灭的画图。谁曾想到呢？我的眼睛突然触着一个人的脸面：披着长发，流着眼泪，拖着临产前的大肚子，沿着站台的边缘，追逐火车，一边检视着每个乘客的面影，一边在狂叫着：

“袁倪，我有话说……袁倪……”

这是苓子，是我已婚的女人，我看清她，她却没认出我来，因为她在明亮的灯光下，我却在车门里边，一层模糊的夜色围裹了我。

车远了，也留她在远处，放着缓慢的步子，拍打着自己的胸脯，仿佛在咒骂着这万恶的黑暗的夜色。

昂昂溪距离齐齐哈尔中间还有一段旅途，铺了轻便的铁轨，通过着小型的火车，好像普通的电车一样，狭小的车轮，狭小的门窗；最狭小的是乘客的座位，在车壁的四边，绕着一周木板，使乘客在拥挤中只坐下一半臀部，上边有几处悬起木条，让乘客安放东西的地方，仅有的两盏小煤油灯，暗淡的灯光，仿佛是在遥远天边的两粒星星，仿佛是庙宇所有的阴森，使人在神秘与恐怖的色调中，记起、羡慕那古老的明亮的火把。仅有的小火炉，任是怎样地加多煤块，怎样地燃红炉铁，也抵不住从车缝间冲入的冷风；所以，小青藏在她母亲的大衣里不敢扬起头来，我的两脚，已经冻僵了，失去了知觉，好像不是属于我的肢体，已经从我膝骨下离去，甚至我全部的血流，已经凝结了冰流，只是冰冷，痒痛。这般的痛苦，在冰冷的土地上还是我第一次尝试，使我不能不承认我所在的地方是寒带。假如是北冰洋，我想也不过如此的寒冷，这次使我不敢否认寒冷的暴力和冻掉了耳朵、胳膊，冻死了行人的消息。

列车进行的速度，已经足够迟缓，像我童年坐在牛车里一样；然而渐渐地更加迟缓下来，终于停住了，汽笛不住地鸣叫起来，那细微的声音，如同儿童在野地上游戏，吹着小小的铁苗。每个车门都开了，然后乘客才知道路轨上被暴风卷来的积雪阻隔了，积成了一条白色的雪岭，几乎高过了车头。

有一个提灯的人来了，他穿着破旧的衣服，长长的毡靴，如同岔道夫一样，只有从他那红黑色的制帽上的一条金线，可以被人认出他是这列车的车队长。他要求乘客集中些人力援助车头，推送车辆，冲过那处难关。不然，用任何的方法，都要迟误更多的时间。有许多乘客抱怨着，反对他的主张。虽然也有许多乘客同意他的主张，但是，仍都留在车内观望着别人。这时候，青子把小青从怀里推开，自己跳起来：

“我同意车队长的主张！还有谁同意？随我来！”

她并没有同我商议，便独自跳下车去。小青在阴森的灯色中孤独了，惊恐了，哭了。

一般男人鄙视女人的心理，竟被她动摇了，感动了，随她取了一致的行动；所以，不久列车又继续着未尽的旅途驶行了。在她刚刚走上车的时候，她吸取着所有乘客的视线，仿佛她整幅的身影，没有一处不蕴藏着诱惑力，被人做了谈话的资料。而且有两个年轻的姑娘为了靠近她，

一方面又好像借着她的光荣，向男人逞着骄傲。

青子很冷待她们，在她们问话之外，不愿意多说一句。不过，她们两人只有一人好守着沉默，另外一人却是那样多嘴的姑娘，她赞扬了青子之后，又问起青子一些不必要的琐事来，她很兴趣地指着我在问青子：

“他是谁呢？”

青子装做看护小青，没有回答她。可是她又指着小青问：“这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

“只有这一个吗？”

“是的。”

“他是谁呢？”

她的手指，又转向我了。青子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的丈夫！”

“啊……”

她掩着嘴唇，笑了一声，然后，偷偷地注视着我，好像要从我脸上查清美好和丑恶。因为我扬起头来，她有些不好意思了，随手抱去了小青问：

“你的妈妈呢？”

小青指了指青子。

“你的爸爸呢？”

小青仰着头：在记忆中搜索着回答。

“那呢！”

她故意在小青面前逞着聪明，指了我一下。然而小青却摇摆着自己的头，否认她的话说：

“不，不——”

“那呢，你的爸爸！”

“不，他是袁先生！”

我感受了一阵极度的不快，感受了血流加高了热度。不过，青子却安然地说：

“我的丈夫在外面几年的工夫，孩子也不认识他了，孩子听人家叫他袁先生，她也常常叫他袁先生，真是有趣！”小青你再叫他袁先生，袁先生！”

“袁先生，袁先生！”

小青放高声音叫着，扑着我。我立刻把她抱过来，担心她任着童年的纯真，揭开了我与青子中间的破绽。

然而那个多嘴的姑娘，为了讨青子的欢心，却使用种种的方法，引诱着小青。

“你来吧，和我玩！”

小青不怕陌生人是她的个性，任谁都可以打动她的童心，像在她的母亲面前一样。同时她要施展着个性，任谁也不能制止她；所以我又把她交给了那个多嘴的姑娘。

“你叫小青吗？”

那个多嘴的姑娘听我叫过小青的名字，她也故意无聊地问了小青，小青承认，点着头说：

“是，是！”

“不是啊！真不是啊！”

“是，谁说不是？”

“我说不是；该叫你袁小姐。”

小青不明白她的话，迷茫地问：

“什么袁小姐？”

“就是袁小青，你明白吗？”

“不，王小青！”

“你姓袁，为什么叫王小青呢？”

“我姓王，我姓王！”

幸是青子立刻改正地说：

“我姓王，她随我姓！”

然后她又说：

“小青要睡了，来吧！”

在无意中认识的那个多嘴的姑娘，使我与青子都感到了极度的不便，甚至给了我与青子很好的教训，应当向那个多嘴的姑娘表示最大的谢意。

齐齐哈尔是大的城市，曾是“九·一八”不抵抗主义声中抵抗过日军的根据地。虽然，当地的驻军，终于失败了，退出了；但是，给中国却留下了一页光荣的历史，给我却留下了永远不灭的记忆。

当我与青子、小青走下小型火车的时候，我被齐齐哈尔的灯火燃起了那些记忆，并且在马车上，青子给我讲了许多中国抗战的故事。我不时地从马车里探出头去，企图探望一下这齐齐哈尔在抗战中所遭的伤痕与残缺，可惜被沉黑的夜色完全遮没，如同无人凭吊的古老的墓场，只是一片凄凉。我在默默中感受着那凄凉的滋味。

幸而旅馆的主人笑着脸，殷勤地招待我们，使我的心，由凄凉有些转向了温暖。虽然，我知道他完全是一个拜金者的变态所有的神情。他没等我们说话，便指定一个役者领我们去看房间，他问我们：

“你们二位是什么关系？”他好像是负疚似地又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二位是夫妻呢，还是朋友，亲戚？如果是朋友、亲戚，是要找两个房间的；如果是夫妻呢，自然一个房间就够了。”

“夫妻。”

我与青子几乎同时回答了他同样的话。

然后，我们在许多房间中，择出一间，宿资低价的，而且方便，屋门恰好靠近楼梯。屋内有椅子，有桌子……还有宽大的铁床，没有一处，不使我们满意。

然而我们写好店簿临睡的时候，我却感到了些碍难。除去小青之外，我们还有两个人：我与青子，仅有的那张床铺，究竟属于谁呢？青子让我睡在床上，她伴着小青睡在地上；可是，我不同意。我们踌躇着，徘徊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同睡一张床铺呢？我们不是已经结合的一对爱人吗？即使我没有任何的表示，她也不应当处于无言、无动作的静默中。我为了激动她的心，给她做了种种的暗示。她愤恨了，潜伏着骂意地说：

“我最讨厌的，是男人的无耻的欲望——认识一个女人，便想占有

一个女人。可是，袁倪，我不希望你也是那样的男人！”

于是，我要她伴着小青睡在床上，我睡在地上。第二夜，我们仍是这样分配着睡眠的地位。在临睡前，青子让小青坐着，望着我，她问：

“他是谁？”

“袁先生！”

“不是！”

“是嘛，他是袁先生！”

“我叫他袁先生！”

“我也叫他袁先生！”

“不，你叫他爸爸！”

“爸爸？”

“是，爸爸。”

“不是；爸爸走了，在哈尔滨就走了。”

“那是你的爸爸，这也是你的爸爸！”

小青信任她母亲的话，随着向我叫了几声：

“爸爸，爸爸！”

这时候，我感受了一种难言的欢快，也许正是王长英一种难言的悲哀吧？

然而我与青子睡眠的地方，仍是分开，她在床上，我在地上，总是隔着一段不可突破的距离，隔绝着我一种最大的欲望。我翻转着身子，失去了睡意。

“为什么她要小青叫我爸爸呢？”

我在猜想着这原因。

因为旅途中的疲劳，终于睡了。可是，因为役者打门的声音又把我唤醒，我在朦胧中，没有听清楚他告诉我的话，我们在躺着，问着青子究竟是什么缘故。她只是匆忙地说：

“快起来，快起来！”

然后她又匆忙地跳下床来，把我的被褥，完全移向床上去，让地上不留我一丝睡眠的痕迹。

究竟有什么意外发生了呢？她上床后，又叫我也上床去。我急促地问她：

“这是什么事情呢？”

“小声些！”

她命令我，而且握住了我一只手腕，她用力地把我扯上床去；熟睡的小青被她的动作惊醒了，哭了，她一边用方法制止着小青的哭声，一边指着我在问小青：

“你看看，他是谁？”

“袁先生！”小青立刻继续地说，“是爸爸！”

“对啦，是爸爸！”

她说着，好像在赞美着小青的聪明和记忆。不过，我却向她投着奇异的视线。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她问我；我气愤了：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事情呢？”

她把嘴唇尽量地送近我的脸旁仿佛是要吻我的耳边，低声地说：“检查！”

被日本宪兵检查以后，我完全明白了青子为什么要我移到床上，为什么要小青叫我父亲；所以，我又自动地把我的被褥送下床去。她却制止着我，要我睡在床上，然后，她让小青在我们中间，仍断开一条距离。

灯光明亮着，屋内的每个角落，也如同白昼一样，墙上的花纹，我可以看清楚那精细的图案，是古典的画壁。

小青睡了，我们还在醒着；任我怎样使用催眠的方法，我也没有一丝的睡意——青子也是一样吧？我们相距不过一尺远，两人的视线常常接触着，合拢了一条立刻又各自分开，各自随便投向什么地方：白色的窗幔，门边的铁锁……我们谁也没有话说，从我们门前走过的人们会想起我们是睡了，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可以听清他们的脚步声和高声的谈话。旅店里的一切骚扰的声音，在我耳边，几乎完全没有遗漏。我失眠了，我悔我没有备好安眠药片，如果我有，我要尽量地多吃，即使我因为多吃死了，也绝不愿意再维持着只是名义的夫妻关系，因为我忍受不了这骚扰和痛苦。

因此，我向青子表示有离去她的意思。她在话里，有着斥责地意味说：

“你到底忘记了自己的誓言！”

我受不了她这无辜的斥责，从床上坐起来，握紧着两个拳头互击着问她：

“是谁忘记了自己的誓言？”

“是你，是你！”

我否认她的话，立刻坚决地说：“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情愿帮助你！”

“你听我的话吗？”

“听的！”

“那么，你睡吧！”

这种不舒快的睡眠，一直经过了两天。白天里，没有一些精神支撑着疲倦已久的肢体，而且青子常常走出旅店，留我看守着小青，她好像故意难为我，使我更加疲倦。有时候，我探询她外出的原因，她不肯向我说明，仿佛她的事情都有着一种秘密性。最后，我也不愿意用话换取她的沉默。不过，我注意她的神情，以及她从外面带来的一切东西。有一次又在她外出的时候，突然，我从一个小包裹里捡出了两支手枪和几十粒子弹，我并没有问她枪支与弹粒的用处，可是她发觉了。当时，我很奇怪，她怎么知道解过她的小包裹呢？后来我才知道，她在那小包裹打的结扣，是有特殊的样式的。我为了不安的情绪，立刻问她手枪与弹粒的来处与用处。她说：

“我总要告诉你，可是现在你不要问。”

于是，我更加不安了。

为了追求青子的欲望和尊重自己从前的誓言，不敢有一丝的悔意，我要在她面前忍受着一切。

那天，是我在齐齐哈尔的第五天了吧？

青子从怀里放下小青，握住我的手腕。她默然着，她的眼里流动着一层浅浅的泪水，她那勇敢、聪明、热情，她那纯洁的灵魂，完全浸在

泪水里，别了我几年的神情，又出现我的眼前。然而，她却比从前多了一种狡猾，使用种种的方法测验我是否遵守誓言。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情愿帮助你！”

我连续地说了几次，表示让她相信我。可是她像孩子一样地戏弄我：

“你再说一次给我听！”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情愿帮助你！”

“你听我的话吗？”

“听的！”

“那么你帮助我杀一个人！”

这突来的话，使我迷茫了，我的手脚失去了适当停放的位置。

她拖起我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肩上；然后又握住我的另只手，她问：

“袁倪，你为什么发抖呢？”

我不相信自己胆小，我曾有过一些勇敢的故事，便是保证，而且我相信自己的勇敢——肯用生命去做任何冒险的举动。我发抖，是为了恨她。她好像是一个导演，不仅不给我剧本，而且不给我说明剧情，只是在临演出前，派定我一个悲剧中的角色，让我演最后的一幕；不管任何的演员，谁能担任我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所以，我用严厉的言语拒绝了她。

然而，她转换了一种无情的脸色，怒张着眼睛，咬紧着牙齿，缩短些眉间的距离，加多了几条短短的皱纹，如同一头凶狠的野兽，要施展所有的暴力威胁我，征服我。

小青为了她那可怕的脸色哭了，张着两手扑着她，要她抱起来。她被小青骚扰而厌烦了，突然打了小青一掌，把小青从床边打落地上。小青被惊得哑了喉咙，仅有些哼声，表示她还有着气息，我把她抱起来又送到床上，唤着她。她好像从梦中醒来了，又放开更大的声音哭了。青子向着手掌，威吓她闭起嘴来！

“我看你再哭——”

小青为了要我掩护她，不住地向我叫着：

“爸爸，爸爸！”

她被我哄着，终于渐渐地安静了。

可是，青子却暴躁地表示了与我绝交的决心。她说：

“你走开！”

她要把我从房间里驱逐出去，然后她又说：

“不然，就是我走开！”

她没有走，我也没有走，我们两人默然地相望。我想走近她的身边，握握她的手，说一句我们永别的赠言：

“青子，现在你真是一个暴徒了，我走了，青子！”

然而，我想她的不幸——王长英与小英的死亡，也分享了她的一些悲哀；所以，我尽量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很和气地向她说：

“你不该这样待我，青子。”

她仿佛要在我面前示威，不住地用手掌在桌上打着响声，怀着很大的仇恨说：

“我不该这样待你？我该怎样待你呢？哼，一个忘记了誓言的人，

是应当死在我手里的。”

“那么，你杀我吧！”

“我不如杀一个小鸡！”

我的确容忍不了她那无情的讽刺，故意给她提出反证，不过，我仍是和平地说：

“你忘记了吗？我曾对我说过：‘此后，我便属于你了’的话吗？”

“我没忘记！”

“那么，你现在叫我走开？”

“如果你不忘记你的誓言；此后，我自然是属于你了！”

为了追求青子的欲望和尊重自己从前的誓言，不敢有一丝的悔意，我允许了她的要求。

于是她狂笑了；在笑中，有着她意外的欢快。然后她吻住了我一面的脸颊，许久，不肯放开我，好像要从我脸上吻下一块肉，才是终了。这种爱情究竟给我一些什么感觉？是欢快呢？是痛苦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垂直着两手，任她吻着我；因为我的思想充满了杀人的情景。

“我并不是不告诉：如果我早告诉你，只是怕你心慌，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然后她又说出要杀的人是黑龙江省的警备司令。杀他之后，可以引起当地的动乱，可以由一部分反正的兵士占领已经失去的齐齐哈尔，可以集中四处的义勇军，做我们收复失地的先锋。

我知道了这是暗杀，不过她没有给我讲暗杀的方式，只是指定了暗杀的时间：

“在明天晚上，八点二十五分钟。”

随着她给我一支手枪，让我检视了它的每一细小部分。并且要我找出来她留给我的眼镜，中国式的大衣……完全配置在我的身上，化装一个绅士。她从我身边转着，在看我是否有绅士的风度，她说：

“你走两步给我看看！”

我走起来的时候，小青都笑了。青子却冷静地注视着我。有时候，给我整理一下不称身的衣袖，有时候她在校正我的姿势，她说：

“你的步子轻些落地！”

或是：

“把头再仰起些，望着我；手的动作要更自然些，噢，对啦，是这样，是这样，对啦，还是我的袁倪，不是别人所能比的！”

最后，我又换了自己的衣服，随她去认识认识警备司令的住宅附近的地方。

我没有多余的心情探望风景；虽然这是我陌生的地方，诱我注视。我只是随伴青子走过繁华的僻静的街道，领我在一所红色的砖房的四边绕了几周，给我讲着附近的几条街道；转向什么地方，贯通什么地方；某条是安静的，某条是骚乱的，某条是有着最多戒备的岗位。她低声地向我说：

“你要选择一条路，在必要时，好做你的逃路！”

因为我不熟悉的关系，还是她给我选了通至西首兵营的一条街路，她说：

“这是最好最方便的一条路！”她指了指那兵营的远影又说，“那

就是我们反正的兵士的举事的地方，你从这一直往那跑就可以，你要记着！”

她又领我到西首的兵营，把兵营所有的门口都指给我了，并且告诉我一句进门的口号，证实是我，而不是另外的任何人。

“你记住！”

她指着沿路的一些特征：几株老树，两列低小的泥房和一片宽大的旷场。她的意思，是要领我重走一次。不过，小青累着她，不住地向她喊着：

“妈妈，我饿了！”

于是，青子不得不随着小青走回旅店。在她给小青吃饭的时候，她自语着：

“幸是小英死了，不然也会被他累死我。”

我听着，故意向她开着玩笑：

“那么，你还为什么留着小青呢？”

“因为有小孩，我们走路，可以方便些。不然，我也要她随着小英一路去了。”

“可是，明天晚上谁照顾她呢？”

“把她送到友人家去！”

不久，她便吻着小青，抱着小青走了。回来的时候，只有她一人了。夜来了。

夜又来了——八点二十五分钟前一小时的时候。天庭下开始飞起了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来，在暗淡的月光中，仿佛是白色的花瓣，仿佛是落满着秋霜残败的老叶，被暴风摘取着，给大地送来，经过短短的一刻，大地便被饰成了银白的世界。

青子出去了，几乎是整天没有回来；同时，我也几乎整天没有离过旅店，只是沿着房间的四壁踱着，感到了生来从不曾感受的心情，不仅记忆着过去，而且在幻想着将来，这一切都在激动我的热情，使我更加留意。最怕的是壁钟，我不时地注视它，我的心随着它在摆动，它很有节奏，移向八点二十五分去；我却心绪烦乱，好像渐渐地走近了死亡的境地，最大的恐怖包围了我。不久，青子回来了，她身后随来一个青年军官。

“袁倪，你镇静些！”

她望着我说了，随着把我介绍给那个青年军官，握了手。他赞扬着我说：

“勇敢的朋友，听说你放枪最准，我们这次全靠你了！”

他说完便走了；他来是为认识我的脸面，准备在我的逃路上迎接我。我与青子又谈了许多必要的话，最必要的是她说明了暗杀的方式：

“八点半钟是警备司令赴约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他的门前堵住他，不容他说话，我们就开枪。”

“那么，你不必去了！”

“不，有女人走路方便些！”

并且，她交给我几页冒名的名片，防备街上日军的检查。不过，我们雇乘的汽车，在街上并没有被日军留难，还余几分空闲的时间，我们要车夫又多绕了几条街道。我们近了警备司令住的那红色的砖房的时候

候，恰好是八点二十五分的时间。

院内有一辆汽车开出了，刚刚开出红色砖房的院门，便与我们的汽车相遇了，我第一枪先打中了那汽车的车夫，车立刻停了，可是我们乘的汽车却没有停住，青子用枪威胁着车夫。车停住的时候，已经多走了一丈多远的地方。我看见有两个卫兵从那车里拖出一个高贵的老年人，一面逃脱着，一面还击着，只是一刻的工夫他们都中了我的枪弹，可是我的左腿也受了他们的弹伤，距离我所乘的汽车只有十几步远，我便没有了走上汽车的力量。

这时候，西首兵营反正的兵士，已经发动了，响了密连的枪声，同时日军也出动了，一边防堵着他们，一边搜捕着我们，渐渐地有弹粒近了我的身边。

“青子，你自己快逃吧！”我喊着。

然而，她却逼迫车夫把我拖上了汽车。在我们汽车冲进那旷场的时候，证明我们的汽车难于逃脱了，前后都有日军截断了我们的去路。

青子命令车夫停住了车轮，她跳下车去，拍了我胸脯一下：

“袁倪，我逃了！”

我听了她的话，立刻握住了她的衣襟：

“我呢？”

她没等我说完，也没踌躇，便向我的头部放了一弹；然后她踏着雪路，冲着雪花，在雪天下去了。

她去后，我对她没有一丝的仇恨，所抱怨她的是她赠送我的一粒弹，没有打中我致命的地方，只是在我左耳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弹孔；所以我终于被捕了。

几天后。

每处都在传说着我所造成的一个故事：袁倪是一个凶犯，他的母亲病了，苓子被他提出的离婚意见逼迫着，在临产前自杀了，青子随着反正的兵士，已经逃入了山林。

从此，我们又断绝了一切的消息。

（《秘密的故事》，1940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舒群小传

舒群，中国现代作家。1913年9月20日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1989年8月2日病逝于北京。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他有着贫苦的家世和不幸的童年，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至1930年间，曾在哈尔滨一中、苏联子弟中学就读，受到很好的教育，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在哈尔滨参加抗日义勇军。

1935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6年5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代表作、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作品描写抗战时期一个失去祖国的朝鲜孩子流亡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故事。作者用简练、直叙的手法塑造小主人公纯朴、勇敢、倔犟的性格，使读者对主人公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的憎恨。小说表现出一种自然质朴的风格，在文坛上引起一定的反响。

“七·七”事变后，他抵达陕北，在八路军总部任随军记者，曾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随后任延安鲁艺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

第四版主编。1938年4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战地》。1940年8月出版了中篇小说《秘密的故事》。1940年9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海的彼岸》。其中《秘密的故事》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某城市为背景，用第一人称讲述了青子投身秘密抗日活动的故事。作者塑造出一个坚贞、果敢、机智的女性形象，小说情节起伏，有神秘的传奇色彩。

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局文委副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文联副主席。解放初期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和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1950年11月撰写了长篇小说《第三战役》。手稿在“文革”中被抄走，未能出版。长篇小说《这一代人》于1962年8月出版。小说以一个女技术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历为主线，再现了我国五十年代初经济建设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

“文革”后，他的文学创作又有新成就。《少年Chen女》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了十年浩劫对人们心灵摧残的现实问题。小说通过人物外表和内心活动表现Chen女孱弱、敏感的性格，从而使这个人物的形象鲜活逼真。1986年10月发表的《毛泽东故事》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人物进行真实细致的描写。作者敢于突破禁区，展现伟人的生活，使伟人更加人性化，打破了领袖人物的神秘感。这部作品早在30年前就开始动笔，经过长期酝酿，再三修改才得以完成，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创作心血。

舒群主要著作书目

- 没有祖国的孩子（短篇小说集）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老兵（中篇小说）1936年1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战地（短篇小说集）193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秘密的故事（中篇小说）1940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海的彼岸（短篇小说集）1940年9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崔毅（短篇小说集）1954年4月，沈阳，东北人民出版社
我的女教师（短篇小说集）1954年10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这一代人（长篇小说）1962年8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舒群文集（1—4） 1984年12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舒群小说选 1985年8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毛泽东故事（短篇小说集）1986年10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